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文 | 研 | 通 | 讯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20年第2期 总第十五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 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通讯》

刊 期：总第十五期（2020年2月—2020年4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 笑

编 辑：周诗雨

编 务：陈天传

特邀编审：徐 军

特邀摄影：刘学红等

装帧设计：杨 宇 张雪洽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2020年第2期

总第十五期



目录

01 疫情期间专题学术活动

- (一) 特别推送 02
 - [01] 渠敬东 | 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 02
 - [02] 周飞舟 | 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05
 - [03] 周程 | 病毒是什么? ——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的过程考察 07
 - [04] 王缉思 | 当代世界的身份政治和“文明冲突” 10
 - [05] 段晴 | 天灾人祸所生发的信仰与习俗——基于古代于阗文明的观察 12
 - [06] 张建君 | 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 15
- (二) 疫情下的省思 16
 - 王明珂 | 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 16
 - 葛兆光 |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 23
 - 程乐松 | 黄昏永续——“虚假观察者”关于疫病的琐言 27
 - 彼得·伯克 | 作为社会记忆的历史 32
- 梁其姿 | 中西传统的公共卫生与疾病的防控 39
- 吕植 | 代价沉重的进步: 对野生动物保护修法的建言 49

- 余新忠 | 瘟疫的历史意义与疫病史的现实价值 58
- 范家伟 | 疫情省思与医疗社会史研究 60
- 陈昊 | 作为反派的动物? ——重思疫疾和动物的历史 63
- (三) 海外来信 66
 - 杨治宜 | “绿林”疫影——危机时代的非常与日常 66
 - 程莹 | 隔离的历史与当下——南非疫情手记 72
 - 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 | 北京随笔 78
- 葛兆光 | 疫情下的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 85
- 戴燕 | 大疫之下的东京读书记 88
- 章永乐 | 南特高研院访学记 91
- 季剑青 | 重建小的共同体 98
- 陈诗沛 | 数字人文与历史上的灾害研究 101
- 玛蒂娜·舒伦德 | 一战时期的疫苗研发 103

108 文研学术

- (一) 北大文研讲座 110
 - [166] 王立铭 | 新冠肺炎——从哪里来, 向何处去? 110
- (二) 文研课程 113
 -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赏 113
 - 明清宫廷建筑与宫殿陈设 115
- (三) 读书的风景 117
 - 共凝神于贝叶——记三个学期的梵文写本读书会 117
- (四) 丝路现场 121
 - 荣新江 | 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2012年初考察纪要 121
 - 朱玉麒 | 伊朗——来自民间的视野 124
 - 林梅村 | 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接触——2012年伊朗考察记 128
 - 王一丹 | 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 132
 - 李零 | 波斯笔记——统一宗教 136
 - 罗新 | 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140
- (五) 线上雅集 143
 - 贾妍 | 云养一只“青铜猫”系列文章(一) 143

146 在线展览

- (一) “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新疆”专题展览 148
 - 新闻报道 148
 - 展品选粹 149
 - 延伸阅读: 走近袁复礼——展览背后的故事 157
- (二) “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专题展览 160
 - 新闻报道 160
 - 展品选粹 162
 - 延伸阅读: 博物文化传统不是科学也不是科普 168

174 文研回望

- 文研院联合三联中读推出“文研学堂”音频讲座 176
- 新栏目、新形式、新举措——文研院线上开展新学期学术活动 178
- 文研院“特别推送”上线 与北大名家“云”见面 180
- 文研院举办“袁复礼旧藏西北科考团摄影”线上展览 183
- 文研院推出“海外来信”呈现全球学人的理性坚守 183
- 文研院举办“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线上展览 185

186 文研纪事

- 文研院联合三联中读推出“文研学堂”音频讲座 176





【编者的话】

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通讯，是我们成立三年多来不同寻常的一期。

今春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给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文研院基本取消了公开的线下活动，邀访学者也未能如期到访。但几乎与疫情形势逐步严峻的同时，院务会就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预判，并迅速动员工作团队集思广益，为在新学期的特殊条件下继续“涵育学术，激活思想”做好准备。2月下旬以来，文研院的微信公众号发挥了沟通和连接的桥梁作用：我们依托线上平台，新增“特别推送”、“疫情下的省思”、“海外来信”栏目，并延续“文研讲座”、“静园雅集”、“专题展览”等既有学术活动，探索讲座、论坛等学术互动的形式。无论是征文还是线上活动，身处海内外的往期邀访学者、北大校内外的学界朋友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本期通讯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征稿、学术纪要、实录摘编、新闻稿……我们力求如实的反映我们所做的工作，以及所收获的温暖。

真诚地希望，在这段不寻常的岁月里，文研院依然是大家眺望学术前沿的窗口。



疫情期间
专题学术活动



（一）特别推送

【编者按】

“特别推送”栏目聚合北大人文社科领域相关学者，展现中国乃至国际社会为应对疫情挑战所做的努力与学术前沿问题。特殊时期，栏目以视频为载体在线上进行，并以纪要的方式在通讯中呈现。

透过屏幕，学者们或以医学视角看待人与病毒的互动，或省视疫情背后的人文现象，或回顾考察古人应对灾难时的方式及信仰理念，或阐释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或把握国际政治的脉动，或为疫情背后的现代社会总体特征把脉。

01 渠敬东 | 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

“特别推送”第一期的主讲人是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3月5日，渠敬东教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讲座视频，主题为“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视频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于3月18、19日推出，总计观看量达1.8万。

视频中，渠敬东教授表示，在特殊时期，通过线上形式，讨论当社会面临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作为一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应如何反思既有社会的研究模式、研究范式，是特别有意义和帮助的。在他

看来，社会学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探索“人的科学”的重大历史任务。常规研究和日常生活的研究，是晚近以来发展出的研究模式。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的是那些突变的年代。渠敬东教授阐明，社会学永远都面临两大主题，一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形态，二就是社会的急剧变迁，急剧冲突，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突变所带来的政治、文化、宗教，乃至人心的影响。问题在于，日常化的学术研究，似乎已经让以这些研究作为职业的学者们陷入到了

“盲人摸象”的境地中。当社会处于危险边缘的时候，既有的观念和认识似乎都无法提供解决危机的途径。

正如当今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近些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和宗教冲突其实也渗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整体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乃至人们的心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健全学术发展的体制，不单需要学者们立足当下和面向未来，也同样需要不断重回历史重大时刻和宏大事件，以此获得给养与激发。对此，渠敬东教授说道，“我个人认为要重新考虑我们社会中正常和反常的关系，要重新考虑秩序和变迁的管理，要重新考虑日常生活和重大危机时刻的关系，要重新考虑经典历史和理论和我们今天中层研究的范式和方法的关系，要重新回到人与社会生命关系上来”。

渠敬东教授提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传染的社会。这一特点不仅限于诸如病毒等有形物质之间的传播，同样也体现在人们心理上的恐惧的传染。在不确定的时代里，人在自我保存的基本原则下，容易陷入到不安与恐惧之中。现代社会的传染性加剧与人们恐惧的集聚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更大的恐慌潮流，对社会产生强大的破坏力。这使得我们必须讨论国家、社会乃至宗教和文化，对于危机时代有什么样的治理和重建作用。当社会经历变化，甚至是在面临突变的情况下，我们也同样需要思考应该如何理解国家主权中的生命意识，如何在保卫社会的同时，保护其中的生命。

针对这些问题，渠敬东教授分享了他的理解与思考。他认为国家主权中的生命



渠敬东教授

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也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种生命不仅是对于公民个体而言的，也是对于人们相互连带的生命状态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必须在解救危机的情况下，充分地考虑到民间的反映，这种反映不只是各种意见、看法和观点上的潮流，也必须考虑到民众恐惧心理的传染和传播机制。国家治理必须要照料到现实、具体的生命，照料到身体和心灵的生命，也要照料到生命背后的那些故事、那些痛苦、那些危险，也必须照料到那些失去生命的传播效应。

因而在治理过程中，信息、知识和心理的保障是十分重要的。如何把握危机前端的征兆，如何在多重信息中做出判断，如何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的平衡，是突破在危机状态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瓶颈的重要问题。渠敬东教授提到危机治理中的良好秩序，必须要靠联动机制来塑造。这



一机制要让行政部门做出有效的、积极的、准确的反应，发挥调动资源的能力，让专家及时提供合理的、准确的科学知识，以及保障安全的技术手段，让媒体和民间的公众及时反应潜在的危险信息，在相互团结中塑造勇气，让知识分子和学者能够从人类历史和文明以及当下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中，对于生与死、对于人的存在和彼此关联、人的身体和心理等等提供充分的知识和智慧，提供心灵的慰藉。只有民众的自我认识和历史认识得到普遍的提高，只有国家以及行政的部门能够从人性的角度，能够从人性复杂的构成面向，从那些我们曾经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我们对于危机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思考中，才能找到解决现实危机的资源和德性。

除了建设不同领域的人群所形成的联动机制外，渠敬东教授认为我们也要思考当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哪些呵护。这不只是在所谓科学意义上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呵护，还包括我们如何重造人们相互间的人伦关系，相互友爱的关怀，以及对人类的普遍同情，还有那些我们从不同的文化，甚至宗教中体现出来的信仰和对人的呵护。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思考这场危机，或今后面临危机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最后，渠敬东教授从学术的角度反思，认为我们必须重建面向变迁甚至剧变的社会学，必须重新塑造我们面向危险的、面向重大变化的学问。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世界历史的面向，重新回到社会构造的各个复杂的系统，重新回到人性的构造，去整体上检视我们真正经历到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遗忘。在视频讲座结束时，渠敬东教授再次表达了学者的责任便是将一切有关生命的历史和现实牢记下来，这也是所有人真正面对自己生命应该做的事情。

(整理：徐铖)



02

周飞舟 | 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特别推送”第二期的主讲人是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3月20日，周飞舟教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讲座视频，主题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本场讲座于3月28日上线推出。

周飞舟教授指出，2020年是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成功实现之年，也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在过去几年中，周飞舟教授坚持带领学生在全国多个贫困地区开展关于“脱贫攻坚”的调研，并运用社会学的方式分析实地收集的材料。值此特殊时期，文研院邀请周飞舟教授，通过线上形式，分享他近年来的经验研究成果，探讨“脱贫攻坚战”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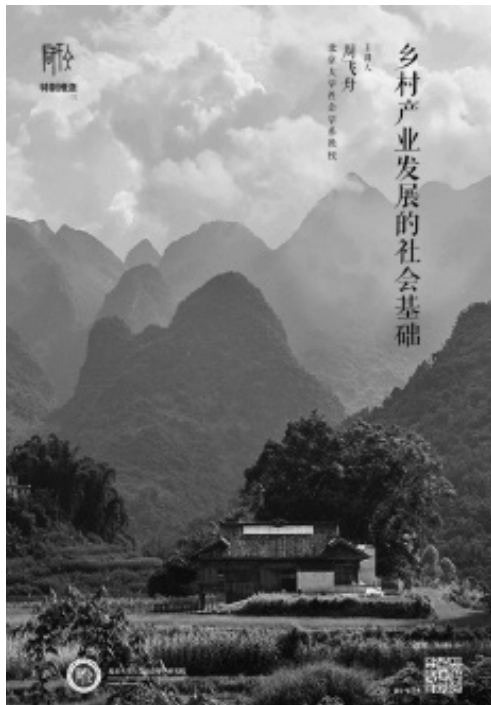
周飞舟教授认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战，也是乡村振兴的第一战，而“社会基础”是其中特别重要且关键的一个问题，关系到乡村产业能否健康发展、繁荣壮大。首先，他通过湖南永州野猪桥村的例子提出，乡村产业发展会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政府的投入和“资本下乡”彻底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脱贫攻坚战”里效果最显著的就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全面改善，而它带来的正面效应，就是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人员大量的外出——这是脱贫攻坚战的主要

策略，也是取得最终全面胜利的最重要保障。外出打工是农村劳动力的第一选择，也是脱贫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农村中也存在因种种原因不能外出的人员和家庭，因此乡村产业发展最后攻坚克难的关键所在，是使这部分人待在家里也能挣到钱、有活干。而乡村产业发展到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劳动力问题，其实也就是人的问题。周飞舟教授将其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管理的问题；二是“乡土性”或“乡土扎根”的问题；三是产业生态的问题；四是农民劳动力从哪里来的问题。

然后，周飞舟教授通过案例介绍的方式继续讲述乡村产业发展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及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在甘肃省临夏



周飞舟教授



相比之下，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的香菇产业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乡村产业案例。周飞舟教授指出该产业有两个特征，第一是把香菇产业规模做大，大到可以开拓市场、影响价格、形成品牌；第二是形成了一套“六统一分”的组织化体系，由农民分户承包大棚经营，技术、品牌和销售市场等等都由政府和龙头企业统一管理。取得利润的关键在于香菇得到及时的采摘，及时采摘就需要及时雇人，因此该产业最核心的问题是劳动的及时性和质量。在分户经营的模式下，农户们主要是利用社会关系，请熟人与亲朋好友帮忙，这些人不容易偷工减料，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可以看到，乡村产业中劳动力或者人的瓶颈问题是靠社会关系来解决的。

周飞舟教授谈到，这种“统分结合”的产业组织形式很适合中国国情。即产业中越往上的部分越是政府或者企业来主导，比如政府主导，公司直接经营的种植园、大产业园等；产业的下面部分由农户分散经营，政府给予一些奖励、补贴和补助；中间的部分有一定的合作程度和组织程度。在他看来，这种“统分结合”形式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统”解决了农民自己解决不了的基本技术和市场的问题，“分”则由农民解决了人的问题，即解决产业发展的劳动力问题。劳动力数量不够、劳动力质量不好、劳动力不好好干活这三个问题其实是靠“分”来解决的。而这正是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农村产业发展所普遍面对的问题。“分”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村庄原有的传

东乡县布楞沟村的案例中，村里的养羊业总量上发展了，但集中于两家，大部分农民由于成本问题不再养羊，产业的覆盖面反而减少。这个例子说明，乡村产业其实是扎根在很复杂的系统上，这个系统和当地的自然气候、地形地貌、农民的传统、当地优势产业甚至是水草的关系密不可分，牵一发而动全身。扶贫的时候对一个东西做改变，会引起整个产业的变动，也会影响到很多农民的生活。在湖北宜昌五峰县业产坪村的案例中，吃构树叶的养猪业能否发展成功最核心的问题在于监督，以防止农民偷偷掺进普通饲料。这一方面要靠信用，靠关系，动员朋友做示范，另一方面要靠技术手段。

统，农民基本的社会伦理和社会关系，这就是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问题。

最后，周飞舟教授讲述了乡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系。他认为，乡村的发展一定是由产业带动的，或者叫做“产业带体系”的带动。如养猪和香菇都可以发展为一个产业带，而产业带的发展取决于很多因素。它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和社会的投入，即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建立。但要使这个体系长期健康地发展，能够有市场竞争力，取决于人的问题，也就是劳动力的问题。周飞舟教授提出，农村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是不断流动中的劳动力。“流动”有多层含义，一是在城市和村庄之间的空间上的流动，这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一是在不同生命阶段

之间的时间上的流动，每个人都是家庭生命周期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从时间和空间上看，不断流动的劳动力，其实是为农村的产业发展，尤其是产业带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形成提供了劳动力的基础。在视频讲座的结尾，周飞舟教授再次强调了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总结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乡村产业中劳动力或者说人本身的问题，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从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其实也是人的城镇化，或者说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整理：徐铖）

03

周程 | 病毒是什么？——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的过程考察

“特别推送”第三期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周程，主题为“病毒是什么？——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的过程考察”。4月3日下午，在北大电视台的技术支持下，本期讲座通过北大快手、B站、央视频、百度、人民日报新媒体账号等官方视频平台直播开讲，当日累计观看量达35万人次。

讲座中，周程教授基于科学思想史的视角，讲述与考察了人类发现首个病

毒——烟草花叶病毒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冠病毒疫情，探讨了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等问题。

首先，周程教授简单回顾了人类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并介绍了病毒的基本特征。按照美国主流教科书《现代病毒学导论》给出的解释，病毒是亚微观的寄生性的含有蛋白质衣壳的遗传物质颗粒，是一类极小的非细胞生物，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无法被光学显微镜观测。然后，周程



周程教授

教授按照烟草花叶病毒发现的时间线，依次考察了这一过程中的八个关键节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巴斯德和科赫提出的细菌致病学说启迪，德国农业化学家麦尔发现烟草花叶病是一种植物传染病。俄国植物生理学家伊万诺夫斯基首先用实验证明烟草花叶病致病因子是一种滤过性病原体，但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种有别于细菌的新型病原体。由于传染病皆由细菌或其毒素引起的观点获得了广泛认同，因此当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新型病原体——口蹄疫病毒被“发现”之后，德国微生物学家吕夫勒和菲洛施等人仍继续将这种新型病原体视作一种“极小生物”。荷兰细菌学家贝杰林克虽然赋予了“病毒”概念全新的涵义——“传染性活流质”，但很少有人能接受。一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植物病理学拓荒者杜加尔基于实验研究，将“病毒”的概念发展成为“可在细胞内

自我增殖的亚微观颗粒”，但他既没有看到这种颗粒形态的病毒，也不知道其本质。

1935年，美国生物化学家斯坦利借助酶蛋白质结晶技术制得烟草花叶病毒结晶，并指出“病毒”是一种蛋白质，颠覆了很多人对生命和物质的认知。英国的鲍登和皮里很快就用事实修正斯坦利的研究结论，他们在1936年证明，烟草花叶病毒中除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外，还含有少量的RNA。1939年，德国生物化学家考舍终于直接观察到了烟草花叶病毒，并确认其为杆状颗粒，但他给出的烟草花叶病毒的大小尺寸并不准确。

在依次分析了这一过程的研究进路与研究背景之后，周程教授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提出，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决定着科学家认识新鲜事物需要一个过程，例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科学共同体内部对其命名、分类与防治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非常正常。实际上，在不可能做大量的重复实验或不可能进行充分质疑的情况下，科学家对新鲜事物的理解与预判难免会出现错误，历史是帮助我们认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科学家的局限性的最好教材。

周程教授接着谈到，从最初断定烟草花叶病毒为滤过性病原体，至终于直接观察到这种滤过性病原体为一种亚微观颗粒，人类整整用了41年。在这一过程中，很多科学家都为人类加深对病毒本质的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这批跨时代、跨国别、跨专业科学家持续性的、反思性的“集体学习”，第一株病毒是不可能这么早就被发现的。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家虽

然在研究烟草花叶病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出了一些符合事实的、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他们的论文或报告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倘若历史都是如此，今天的科学家就应该更加谦虚地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时更加谨慎。历史事实说明，一味地迷信科学和盲从科学家并不能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理，也无助于解决时代提出的诸多科技难题。怀疑的世界真理多，盲信的社会谬误多。科学始于疑问，过去是如此，现在恐怕也是这样。



烟草花叶病症

周程教授还指出，烟草花叶病毒的发现过程表明科学的发展是累积性的，很多重大发现都是由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才完成的。因此，有必要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和合作交流的机制。他认为，只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建立平等对话的机制，才有可能使每一位科学家的真知灼见都不至于被埋没，同时确保任何权威的认知盲点都不至于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真理越辩越明，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批评错误观点和理论不是为了压制这种观点和理论的传播，而是为了提出一个更有竞争力的观点和理论。周程教授进一步说，要建立合作交流的长效机制，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大家都理解的话语体系；其次需要搭建一批方便各国学者高效沟通的平台，不能画地为牢。如果大家研究的过程中不是基于普遍主义立场行动，就不可能建立起庞大的“行动者网络”，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那么强大的如实表征病毒本质的能力。

最后，周程教授结合此次疫情指出，不同的科学家在这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疫情中，科学家尤其是领军科学家最应该做的，是铭记科学研究所具有的局限性和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并支持在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和合作交流的机制。他强调，每位科学家对建立健全的科学文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此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文研院守正创新，施行新举措，开拓新形式，创办新栏目。“特别推送”、“海外来信”、“线上展览”、“疫情下的省思”等十余项微信公众号栏目，持续输送优质内容，将学者的思想跳动与人文关怀呈现给大众。未来，文研院将继续探索，相继推出更多精品栏目与内容，敬请关注。

（整理：徐斌）



04

王缉思 | 当代世界的身份政治和“文明冲突”

“特别推送”第四期的主讲人是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3月27日，王缉思教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视频，主题为“当代世界的身份政治和‘文明冲突’”。经过后期剪辑及整理，相关视频及文稿于4月10日在文研院公众号和官方网站推出。

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身份政治都是过去三十年造成政治共同体撕裂的重要症候，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本次视频讲座中，王缉思教授对身份政治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进行了重点阐释，并回答了如何看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问题。他认为，只有理解身份政治，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世界政治的真谛。

王缉思教授首先从美国电影《利刃出鞘》讲起，来谈论美国的身份政治。他指出，这部影片其实是美国当代社会的一个政治寓言，反映的是今天美国身份政治最突出的一种类型——本土白人同新移民的冲突。20世纪，美国和世界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引起和决定的，左翼与右翼分别站在劳苦大众和资本家一边，而现在政治的主题正在从经济或意识形态转为“身份”。随着新移民的进入，美国传统的瓦斯普文化（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受到“多元文化主义”冲击，政治也随之出现一左一右的转变，而其实质是多元化和民族主义的竞争。左派开始更多关注如何促进少数族群、移民、难民、



王缉思教授

妇女、LGBT群体等“边缘群体”的利益，右翼则弘扬传统文化与本土身份，抵制多元文化，并在如今压倒了左翼。王缉思教授谈到，美国法律规定的平等并没有带来经济或社会上的平等，社会歧视始终存在，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极度加剧，其中新移民的贫困最为明显。

而到本世纪初，受技术创新、廉价劳动力、发展中国家廉价产品的冲击，这种社会衰败现象蔓延到了白人的工人阶级，导致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甚嚣尘上。而特朗普上台，使这种白人民族主义从边缘走上了主流位置。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出现两极分化，共和党和民主党正在分别成为代表白人与少数群体的政党。他

认为，如果这个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就会完全取代经济和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而美国在贫富分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等强烈冲击之下，是否需要寻找并确定最大的外部威胁以恢复凝聚力的问题也非常值得思考。

接着，王缉思教授以欧洲和中东为例，说明当代世界政治也出现了与美国类似的趋势。他提出，欧洲与美国不同，本来就是多元的，欧洲大陆在宗教、民族、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多样性导致它很难在政治上达到统一。而对今日欧洲产生最强烈冲击的，是穆斯林移民大量增加所带来的身份政治。迅速增长的穆斯林社群与欧洲原住民在文化、生活习俗、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使他们不仅难以融入欧洲主流社会，而且强烈地抵制欧洲现代文明。比如伊斯兰教对以教法全面支配伊斯兰共同体的追求，同以个体自由为核心、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做出区分的现代欧洲文明，构成了尖锐冲突和巨大挑战。

他进而提到，几十年来在欧洲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人权政治，不仅难以抵御伊斯兰教，反而为它的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欧洲要找回应对伊斯兰教挑战的政治和精神资源，就必须诉诸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是欧洲身份政治的突出表现。然后，王缉思教授又谈到了中东地区的身份政治，如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就呈现了宗教、民族与政治复杂交织的情形。

在分别讲述了美国、欧洲与中东的身份政治之后，王缉思教授向观众阐释了讲座主题“身份政治”（或“认同政治”）的概念。他提出，“认同”或“身份”是

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个人在一定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这种身份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在许多欧美国家，身份政治成为不断深化的身份群体争取承认和获得权益的活动。

同时，政党及其领导人通过笼络身份群体来巩固并扩大选民基础。他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已经陷入身份政治造成的自由民主制度危机，身份政治本来是少数身份群体反抗主流身份霸权的武器，如今却打着平等、公正、尊严的旗号，煽动民粹主义，掩盖阶级矛盾，深刻地分裂了社会，威胁着很多国家的政治稳定。

最后，王缉思教授分享了他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评价和看法。亨廷顿所指的“文明”是一个文化单位，是最高级的文化群体，是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而文明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宗教。他指出，亨廷顿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其文明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影

论的核心是担心美国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变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是论证身份政治的鼻祖。

然后，他具体介绍了“文明冲突论”的相关批评与论战，以及如何看待“文明冲突论”的问题。一方面，冷战后的世界政治证实了亨廷顿观点的深刻预见性，多元文化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之争确是现在美国政治的主线，西方和非西方的区隔，确实也是当今世界主要的政治特征。但其中也存在偏颇之处，亨廷顿关于儒教文明同伊斯兰教文明合作对抗西方的预测是错误的，伊斯兰国家最终能否实现现代化、能否接受西方民主政体等问题尚待解决，“东西方文明”、“亚洲价值观”之说也

大可质疑。总的来说，亨廷顿开辟了研究世界政治的另一个视角，其学说带有他那一代人既正统又保守，有时又趋于尖锐的特别色彩，而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深入解剖、理解，并做出自己的回应。

讲座接近尾声，王缉思教授对本次讲座内容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认为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身份政治在美国、欧洲、中东等地区割裂了社会与国家，并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念和左派右派的划分提出了挑战。而“文明冲突论”虽然有明显的片面性和偏狭性，但也为理解今天的世界政治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视角。

（整理：徐铖）

05

段晴 | 天灾人祸所生发的信仰与习俗——基于古代于阗文明的观察

“特别推送”第五期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3月24日，段晴教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视频，主题为“天灾人祸所生发的信仰与习俗——基于古代于阗文明的观察”。经过后期剪辑及整理，视频已于4月18日在文研院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同步推出。

历史上灾祸与人文现象往往相伴而生，新的民俗、信仰的形成是灾难退却之后的遗迹与遗存。段晴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于阗语文献的研究，曾在文研院就于阗王国的民族、社会、宗教等问题带来多次讲演，而本次视频讲座，她将目光特别投向天灾人祸降临之下的于阗人，

考察其应对方式及背后的信仰和理念。

首先，段晴教授简要介绍了古代于阗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文明交往中的特色。她以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尉迟达磨王的颂词》为例，指出其中的一个语句就涵盖了印度文明、斯基泰文明与中华文明，从而印证处于丝路南道的于阗王国曾是多元文明的中转枢纽。

随后，段晴教授分别就天灾和人祸两个方面讲述其中生发的人文现象。多种证据显示，大约4世纪时，于阗王国曾经历了一场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特大干旱，而《大唐西域记》记载的“龙女索夫”的传说反映了于阗王室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这则传说中，虽然实行的是中原也有的人祭，但牺牲贵族勇士以祭山川河流则是斯基泰人特有的古代习俗。段晴教授因而指出，于阗人是最后的斯基泰人，虽然普遍接受了佛教信仰，至少在精神层面依然保留了斯基泰人的原始信仰。这种原始信仰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对天和自然的敬畏。

段晴教授接着提到，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又体现在人与天的交换关系上，《歌者奥义书》等早期印度教文献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而为了实现人与天的交换，各种适时的祭祀仪式应运而生。通过对比婆罗门教的祭祀活动，段晴教授认为，斯基泰人的原始信仰中肯定含有大量宰杀牲畜以祭祀天神的习俗。图瓦地区具有200匹殉葬马匹的斯基泰人大墓，以及《后汉书·班超传》中对巫师借口取马祭祀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她进而指出，杀生祭祀就是在人与天的交换关系中，人类试图安抚天神的手段，是一种因自然灾害而生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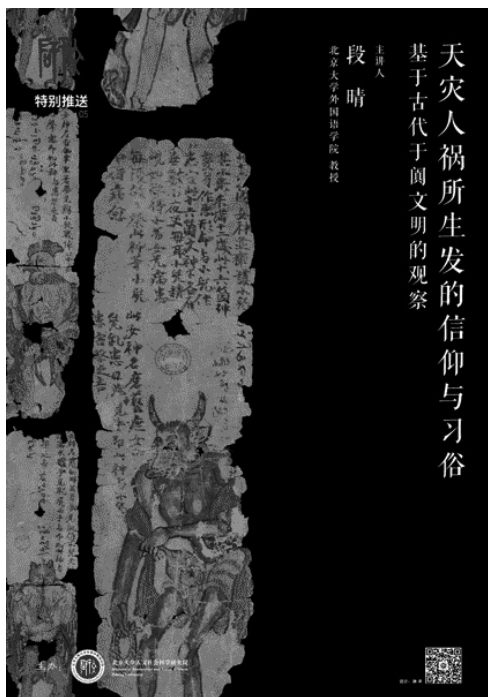


段晴教授

人文习俗。“龙女索夫”的传说不仅说明6世纪中叶的于阗人仍没有放弃对自然和天神的崇拜，而且反映了他们关于人转变为神的观念。根据新疆洛浦县博物馆的几幅氍毹，段晴教授解开了古代于阗人如何变神的奥秘。

在介绍了古代于阗对旱灾的应对之后，段晴教授围绕于阗人的佛教信仰，继续探讨人间灾难所生发的信仰与习俗。她提出，佛教是真正致力于人类社会的以人为本的宗教，而各种人祸的存在是促使佛教不断发展的动能之一。佛教最基本的理论认为，人处在轮回当中，整个轮回充满苦难，终极目标就是摆脱轮回、摆脱苦难，因此佛教的发展一方面形成了更深入的哲学阐述，另一方面也衍生出赐福社会的宗教仪轨。

通过考察曾经流行于古代于阗的佛经，段晴教授发现，其中除宣讲大乘佛



法的外般若经类经书外，以具有祈福攘灾功能的陀罗尼类佛经居多。她认为，这些佛经的流传必有特殊原因——正是由于人类社会灾祸横行，佛教就必须具备攘灾功能才能够赢得广泛的信众。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相关语句看，观音菩萨显然是专门为救苦救难而设计的。而且，这些陀罗尼经还富有因地制宜的特色，为适应不同地域、不同民众的驱邪避难的需求而分别进行创作。如印度佛教《五护经》，就是专门针对气候湿热、毒蛇毒虫出没的印度东北部地区而创作的。此外，于阗故地的人们还形成了佩戴佛寺为其量身定制的护身符的习俗。

接下来，段晴教授将目光转向于阗疾病和瘟疫流行时产生的人文现象。她指出，古代于阗人对待疾病有着积极的态度，所谓积极，是指他们相信医生，相信世间总有良药可治病。在古代于阗人的观念中，天灾是人不能控制的，所以要实行牺牲，而疾病属于人祸，是需要对治的，不需要牺牲。而要解决人祸，于阗人往往诉诸佛教。佛教的陀罗尼作品中含有很多延年益寿、对治疾病的咒语，例如于阗语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既含有讖记，又含有对治的内容，从中寄托了于阗人对健康长寿以及对抗疾病的渴望。段晴教授进而提到，由于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也需要精神抚慰，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样的作品，就是人类与灾祸相处时，伴随着人精神层面的需求而生的必然产物。最后，她向观众展示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对治十五鬼护身符》，阐释了其中体现的古代于阗医学观念，以及他们对受胎妇女和幼儿的爱护。

在视频讲座的结尾，段晴教授简要回顾与总结了本次讲座的内容，并分享了研究于阗文明的心得感悟。她谈到，多年来对于阗语文献的接触令她心中升起对于阗文明的无限敬意。于阗人作为最后的斯基泰人，不仅有着对传统信仰的执著，又是富于创新的，能够接纳所有善好的信仰。它遭受着无数自然灾祸的侵蚀，在大漠边顽强地生存了千年以上，如今留存的护身符及他们的观音信仰，其实都是于阗社会苦难的镜像。而以于阗文明反观今日，段晴教授提示，

疫情终会改变我们的一些习俗甚至是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更有意识地关注疫情之中的人文精神层面，来促进有益

于社会的的习俗的形成。

(整理：徐铖)

06

张建君 | 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

“特别推送”第六期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建君。4月22日，张建君教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完成录制，主题为“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4月30日，相关视频在文研院公众号和官方网站推出。因讲座内容所涉及的数据尚未发表，下文以提要方式做简要呈现。

透过视频，张建君教授利用丰富的数据分析，分析了全国各地在应对疫情防控和面临复工复产的具体表现以及影响它们个体表现的因素。

武汉流入当地的人口数、各地级市的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当地政府应对疫情的响应速度、执行力强度和领导干部的素质水平等都是影响疫情防控的主要因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结构性的因素和主观能动性带来的差别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经历了几个月的抗疫战斗，中国基本上成功地控制了国内疫情的蔓延。从2月



张建君教授

开始到3月，全国各地面临的重大任务、重大挑战转变为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相比，复工复产涉及到方方面面，更为复杂，需要精准施策才能够见效。

(整理：周诗雨)

（二）疫情下的省思

【编者按】

“疫情下的省思”栏目围绕新冠肺炎疫情及古今之间相似的公共危机，向相关学者征稿，希望汇聚大家从医疗史、社会学、公共政策等不同角度作出的省思与检讨。截至目前，十余位学者或呈递原创的新作，或对旧文附加修订与按语，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作出思考与检讨。

王明珂、程乐松分别从历史人类学与生活省思的角度出发，反思人们出于焦虑与恐慌而做出的种种行为。余新忠、范家伟与陈昊从医疗社会史角度展开探讨，呈现较为丰富的历史启迪。梁其姿、吕植等深入考察社会制度与法律，探讨公共卫生与动物保护主题。葛兆光从国家等概念入手，呼吁历史学家多做文献考证工作；袁剑所译彼得·伯格文则从作为“记忆生活”的历史出发，有异曲同工之意。

王明珂 | 猎巫危机——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

王明珂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长期从事羌族、西南少数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

为了一项研究，近几年我经常翻阅一本 15 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著作《女巫之槌》（*The Malleus Maleficarum*）。这是一本猎巫实务手册；由论证女巫存在及其邪恶本质的神学基础，到说明如何对女巫侦询、审判及处刑。在它广为流传的 16、17 世纪欧洲，对女巫及巫术的恐惧与憎恶，曾造成约十余至二十万人（大多数为

女人）被指为巫而遭到凌虐及处死。也因此，今日这本书普遍被认为是代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之迷信、愚昧与不宽容的最终代表作。相对于此的是 17 至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学者们普遍认为它让人们摆脱上帝旨意的束缚，让人们相信依藉理性思维可以让这世界更美好，从此奠定自由、民主与人道主义基础，并促成近代科学与

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最早由此受益的欧美国家，因而得以领导全球进入 20 世纪现代化世界之中。当然，学者们也将猎巫风潮在 17 世纪晚期的快速退却，归因于启蒙运动之科学理性思维所推动的人权概念及司法进步。

我提及这一段欧洲“猎巫”之暗黑历史是因为，它的主要背景之一是黑死病流行及人们对此疫疾的集体恐惧，此与今日我们面对的新冠肺炎横行的情况有些相似。在集体恐惧下，人们猜疑这些“毒”由何处来，以及该如何消灭它们。借着找寻及认定女巫来发现“毒”的源头，严刑拷问哪些女人参加群巫和魔鬼的夜间聚会以探索其传播途径及范围，最后经由审判及将女巫们烧死来消毒。无论如何，最终猎巫这一套“防疫抗灾”程序并没有克服黑死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猎巫审判与最后的公开行刑有另一层意义；它们为一种仪式化的社会暴力，人们藉此克服集体恐惧，并凝聚因恐惧、猜疑而濒于分崩离析的社会群体。由此角度，许多研究欧洲近代初期猎巫风潮的学者都认为，在集体恐惧与焦虑下，人们猜疑并施暴于内部或身边敌人的“猎巫”（找寻替罪羔羊）行动从未消失。近日因新冠肺炎而产生的许多人群间的恐惧与猜疑，以及各种政治、区域社群间的相互指责、攻讦与暴力，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因着新冠肺炎的暴发，在中国大陆与海峡两岸间，以及在全球各国之间，都掀起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猎巫暴力。这是比病毒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人类社群与“病毒”

显然，所谓“启蒙运动”并未让人们脱离人类最原始的蒙昧——社会中根深柢固的族群、阶级、性别等人类社群区分，与因此产生对他者的偏见、歧视与暴力。在人类社群认同下，“病毒”常影射我群之外的人；富贵阶级认为穷人脏且带有病毒，男性认为女性有毒，在族群认同下人们更认为“非我族类”可能为本群体带来毒害。

对外界与他者之“毒”的嫌恶与恐惧，让社群成员更感觉内部的安全与温暖。新冠肺炎之暴发与全球传播，在全球许多地方，由小区到国家，人们的普遍反应便是封闭边界、隔绝流动。这其实是人类十分原始的一种社群自保反应。这种社群自保，最近也反映在国内许多偏乡村落的封路行动上。事实上，不待恶性疾疫或其它外来灾难来袭，人类社群平常就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在此，人类社群泛指小至一家庭、家族大至国家、民族的人类群体。人类社群的封闭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内部“自己人”之间的团结与情感，以及大家对“外人”的防范与敌意，又如实质的空间边界如村界、国界，与透过服饰、饮食、生活习俗等等主客观因素展现的“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他们，尤其指的是与一社群紧邻的其它社群，甚至是我群内部或边缘的“非内部人亦非外人的他者”，如许多大陆民众眼中的台湾人。因最接近而在资源竞争与分享中最具威胁，也因常接触而纠纷多，让人感觉最可能由此让外界的“毒”进入社群内。最近在许多新闻报导中，都可见到因争夺医疗资源以及防疫，而造成各种邻近人群间的紧张与冲突，包括海峡两岸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反映的便是此一现象。

也因为人类的社群认同,人们对“病毒”的认知与恐惧经常错综复杂。对一人群来说,有近身的、能被人们直接感受的以及能被控制的毒,有远方的、常涉及人们主观想象的、难以预测及掌控的毒。人们更常将此两种毒联结在一起;猜疑内部的毒(内忧)与外界、远方庞大的恶毒势力(外患)相联结,因此感觉外界黑暗势力已通过“内奸”侵入体内或身边。近一年来台湾、香港的局势变化,与一些欧美国家的介入,可能让许多大陆民众有此感受。另一方面,在部份台湾民众心目中,受猜疑的内部之毒是被视为“亲共”的台湾人,他们被猜疑将外界之毒(中国因素)带入台湾。这样的内部之毒与外界之毒及其联结,可以是十分真实确凿,也可以被虚构想象。所以,一个社群(应说是其中的统治阶层)常创造、想象及强调一些外患、内忧,以巩固社群团结。一个中国政治谚语,“无内忧外患国恒亡”,其真实意义便是如此。

在过去欧洲的猎巫风潮中,宗教或俗世政权领袖警告群众,外部敌对势力(魔鬼)已透过内部敌人(女巫)渗透到社群内部,于是透过猎巫之反渗透行动,巩固人们在上帝之国中的凝聚。今日世界许多政治群体领袖的作为与此并无不同:建构外界庞大的恶毒势力,猜疑并施暴于与之勾结的内部敌人,以此凝聚一想象的共同体。

二、族群、性别群体与“病毒”

最近许多社会人群与国家对新冠肺炎的反应,由此产生的诸多现象与言论,也印证这不只是一个医学防疫抗灾的问题。“病毒”被加上许多有政治、族群、文化、性别

偏见的联想,因此人们对肺炎病毒的恐惧,也与他们其它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其中一种恐惧,一种在此之前早已在学术界被一再夸大的恐惧,便是因中国宣扬“大国崛起”带来的西方世界之中国威胁论,或更带有种族、文化色彩的文明冲突论。在这样的想象与恐惧下,新冠肺炎之发成为一种触媒,在全球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政治社会体制与中国有别的国家,皆发生华人被排斥、辱骂或遭肢体暴力的替罪羔羊现象。

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的华人,或说普通话的人,被人们想象为与外界恶毒势力相勾结的内部敌人。在此想象下,人们平日对街坊邻居华人的不满,常转移到对中国的嫌恶上;相反的,对中国的恐惧与嫌恶,也会转移为对身边“中国人”的猜疑与仇视。最近美国福斯新闻节目主持人杰西·华特斯(Jesse Watters)在谈话节目中的侮辱中国言论,以及同一人2016年对美国华人的侮辱性报导,反映的便是此“内、外敌人”相勾结的心理丛结。

内、外敌人相勾结的想象与恐惧,也反映在欧美的女巫传说中;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本地女巫会在晚上飞到某处,与魔鬼以及一大群女巫聚会。川西羌族也有类似的“毒药猫”传说;人们将疾疫与意外死亡怪罪于村中某一女人,这种女人被称为“毒药猫”。同样地,在羌族传说中,寨子里的毒药猫女人会在晚上与外面一大群毒药猫聚会,吃人肉;这传说也流露着人们对内部敌人与外界邪恶势力相勾结的恐惧。不同的是,近代初期欧美各地曾发生严重的猎女巫历史事件,而在羌族地区,说某人为毒药猫只是村寨民众间的闲言闲

语,人们不会真正对这些女人施暴。虽然如此,日常性的人际或人群间之猜疑与仇恨言语不能被忽视。如1692年美国麻州萨冷(Salem)等地猎巫事件的例子,由证人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来看,这些所谓“女巫”在被送上法庭前多已长期被其邻人猜疑并闲言为巫了;这情况,与过去羌族村寨中人们对“毒药猫”的闲言闲语并无不同。

这些传说以及历史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人群与人群间轻微的猜疑、歧视与仇恨言行,包括幽默与言论自由遮掩下的轻佻讥讽,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伏流。在人们对巨大灾难的恐惧下,这样的伏流便容易激起为集体暴力之历史浪花,也就是被记载为“历史”的严重暴力事件。最近各国街头、地铁以及电视媒体、网络上的仇恨言论与霸凌行为已有激发现象,随着疫情的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

人类理智与理性十分脆弱。对此启蒙运动也没有太多帮助。美国传播与教育学者尼尔·普斯特门(Neil Postman),曾以一耸动惊心的例子说明人类理性之脆弱;1920年代末德国仍为世界理性的中心,有世界最顶尖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然而不到10年之间,1930年代中期的纳粹德国成为失去理性的野蛮世界。二战之后汗牛充栋的对大屠杀(Holocaust)的研究与反思,也对人类理性没有太大帮助,因此并不保证同样的事不再发生。最讽刺



王明珂研究员

的例证便是,大屠杀受害者犹太人所建以色列国,现今在加萨走廊扮演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者角色,而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道组织对此沉默无言。

将大规模屠杀暴力归罪于李自成与希特勒,或只注意大屠杀历史事件,都无法让人们对此有真正的认识与反思。集体暴力的源头在日常生活的人际互动间,当灾难式的集体恐惧发生时,施暴者经常只是平凡人,而受害者则是他们的邻人。两本探讨纳粹德国统治时期屠杀暴力的书,其书名正分别为《平凡人》(Ordinary Men)与《邻人》(Neighbors)。后一书,作者格罗士(T. Gross)描述的是1941年在德国统治下的一个波兰小镇Jedwabne的屠杀事件。该镇的波兰居民将镇上另一半的居民,他们的邻人,约1600位包括老弱妇孺的犹太人残忍杀害。前一书,作者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研究德国警备军101营(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一个在波兰执行灭绝犹太人行动的单位,他指出这些参与屠杀犹

太人的军警都只是十分平凡的人，没有特殊暴力的人格特质，没有特殊社会背景，但他们却能毫不手软的执行此任务。这也就是前面我提及的，大规模猎巫暴力肇基于日常生活中对“女巫”的猜疑与闲言闲语。

西方的女巫传说与川西的毒药猫传说，另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被指控的绝大多数为女性；这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对女性的歧视。最近许多医护人员，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受到民众各种缘由与形式的暴力。我们可以由此思考：一个全球性的医疗文化现象是，女性从事医疗照顾（如护士、接生婆、临终照顾者）的人口比例远超过该行业中男性。没有任何道理女性特别宜于这些行业。事实上，这是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不幸的是大多数人类社会皆如此），人们认为疾病、死亡是危险与有毒的，因此常让女人（或鼓励她们）来从事这些行业。甚至在一些社会中，人们认为女性具有毒性，因而宜于处理一些与疾病、死亡有关的事务，以毒制毒。在传统中国的一些地方民间，人们相信女人属阴，因此可以处理一些“不干净”的事务，此也是出于同一种性别偏见文化。南丁格尔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但南丁格尔如何成为护理人员牺牲奉献的符号则值得我们深思。

在欧洲猎巫风潮中，许多被指为巫而遭到凌虐处死的都是从事医疗照顾的女性，反映的便是这种人类性别偏见与人们对疫、死亡恐惧之心理丛结。总之，女性并非特别宜于从事医疗照顾；这只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古老性别偏见在今日世界医疗体系中留下的狐狸尾巴。了解这一点，自然我们对女性护理人员应有更多的尊重与爱

护，且应有更多男性投入此危险行业。

以上这些现象均显示，在许多方面近代科学理性与人本思潮并未让人们脱离原始社群生活中的蒙昧；这也说明为何许多后现代主义人文研究常聚焦于族群、性别、身份认同等议题。然而至今人们在这些方面的省悟与反思仍然是远远不足的。

三、全球化跨界与“病毒”

新冠肺炎、SARS 等病毒的产生及传播，似乎皆和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有关；因人类活动跨越边界，让与野生动物共处的病毒进到人类生态圈之中。不仅如此，人类历史上几次严重的传染病暴发，经常发生在大规模人口移动的跨界场景中；如 14 世纪蒙古西征为欧洲带来毁灭性的黑死病，如 16、17 世纪欧洲殖民者为美洲印地安人带来造成大量人口灭绝的传染病。此



南丁格尔

似乎表示，世界各地人类在其特定环境中，与其他人、生物（包括各种细菌）以及病毒，共同形成一地方性生态体系。人群的大规模跨地域流动，带来异质生态体系间的接触，因此也常为人们带来一时难以与之同生共处的细菌与病毒。

然而在今日全球化的场景下，我们应思考的不只是人口跨境流动带来的“陌生病毒”问题，而更应反思在此潮流下，人们与来自异国及异文化“陌生人群”相接触而产生对后者的敌意与暴力。在全球化的商品、资金与人力流动下，许多人家中有了菲籍或印度尼西亚籍佣人，工厂中有了土耳其裔或巴基斯坦裔劳工，超市货架上亦出现许多东南亚及中东食品，与产自墨西哥及中国之物美价廉的家电。然而此欣欣向荣的全球化场景，只是在此体系中获益的国家及其国内获益族群的美好体验。而另一些人的体验则是，农人因全球化市场而难以决定该种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祖训成为空谈，农村人口流向都市而成为全球化工业生产链的底层劳工。工人及其他低收入职业族群，则因全球化劳动人力与资金之跨国流动，而让低薪成为他们（无论本国与外籍劳动者）无法脱逃的宿命。知识、职业与教育评鉴的全球化与市场化，似乎让北大、清华、台大、哈佛的学生家长们愈来愈富有；不对，事实上是家长愈来愈需要有钱才能让子女进入全球排名前列的名校以增强其职场竞争优势。最糟的是，全球化，特别是二战后的全球化浪潮，将种族主义与社会阶级区分合理化，因此让 19 世纪以来人类对阶级社会与种族主义的反思及革命成果化为乌

有。这现象在东亚全球化最彻底的新加坡及香港尤为明显；商业大楼中的银行经理及跨国企业主管、一般商家及白领受薪阶级、家中的雇佣及体力劳工，皆在全球化下大致依种族、国籍——如欧美各国白人、华人、马来与东南亚各国人——之区分而各安其位。

恐惧常来自于“陌生感”，相反的人们安于自己熟悉的世界。许多美国人习于每年一万上下的国内人口死于枪枝暴力，习于为了安全晚上不宜出门的生活，也习于接受因医疗与保险体系缺失而大量民众死于流感等疾病之宿命，但对于身边的华人与中东裔穆斯林，则常感到陌生而常心生恐惧与猜疑。全球化下的人群流动与讯息传播，拉近了不同文化人群间的距离，同时也让人们感觉“陌生的”异类已逼近自己身边。便是如此，在全球化下人们服膺一些利益分配原则与公平正义，却愈来愈不能宽容亦不愿了解身边外来者的“陌生”宗教观点、社会体系、人伦道德与人权价值。

近二三十年中国之崛起，无疑是以广大国土之自然资源、13 亿人口之智慧与劳动力，以及强烈的经济动机，投入于全球化市场的分工体系之中。在近两年来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之抵制；其理由是中国未能遵守这些先进国家设定的全球化游戏规则——不仅违反智财权等保障先进国家在全球化国际生产分工中优厚利润之规则，更逐渐不能安于在此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基层位置。华为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这个以美国为首、以欧美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大家庭中，努力进入此大家



受天花感染而死的印第安人

庭核心的华为，成为其他家庭核心成员心目中的内部之毒，因而成为后者对崛起之中国的恐惧与反感的替罪羊。

或许在某些方面，华为以及中国的确应做些改变，以适应全球化市场。然而此事并非如此单纯；如我在前面提及的，人们对“病毒”有许多基于认同偏见的联想，此非生物现象而是人文现象。在一群体内愈和自身相似的“异类”，愈容易让人们觉得像是进入身体内的“病毒”，因此也愈让人们感到恐惧。一位美国朋友曾对我说，美国本地出生华人说的流利英文常让他听得起鸡皮疙瘩；反映的便是此现象。再说，全球化市场及价值观，可说是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主义版图扩张，自然涉及全球化强权之间的竞争与敌对。全球化不只涉及生产、贸易、消费、金融上的合作、竞争与垄断，也因人们跨界接触而激化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之争。文明冲突论将此简化为“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因此极易为全球带来严重的政治与军事冲突。无论如何，美国智库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

(PIIE)所称的全球化理想，“经由各国间的合作来促进繁荣及和平以创造一更好的世界”，只不过是一华丽的谎言而已。

四、全球化与区域性人类生态

近年来世界许多的变化，如全球金融危机、中东乱局与国际强权的介入、欧洲难民与移民问题、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近日因新冠肺炎造成国际流动封闭。这些全球化挫折给我们的启示或许是：人们应关心及反思世界各地的人类生态问题。不同于简单而刻板化的西方与非西方体制，人类生态指的是环境、生计、社会、文化的综合体。全球各地因其环境及人们对其利用、开发有异，产生特定的社会体制与文化，如此形成不同的人类生态体系。无论如何，人类生态关注的是人们是否生活在一富足、安全、公平、和谐的社会体系之中。这是一种内省与反思的关怀，期望因此造成体系的自我调整。

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地打乱了本地的人类生态体系。以中国来说，近数十年来飞跃的经济成长与物质建设，无疑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然而亦无可讳言的，在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许多体制、价值观与个人惯性行为似难以配合这样高速的经济成长，更因追求高效率的“便宜行事”文化而让体系内各层面发生落差及矛盾。人类生态观点，将环境、经济、社会、文化视为一有彼此连动关系的整体，因而认为对此之关怀也应是整体性的。环境是否能负担及永续支持经济开发及其成果；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是否

能遵循合理、公平与一致的法则；在环境利用与经济生业之合作、竞争下，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及其制度是否能维持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和谐及保障弱势者；以及什么样的文化能规律人们的行为，而让上述环境、经济生业与社会体系得以顺利运转。

当今世界人们有很多理由反对全球化，但全球化的趋势仍不可挡。不久后新冠肺炎的流行将结束，中国势将继续追求高经济增长并在全球化场域与美国及西欧各国一较短长。然而如何“消化”过去的成就以完善一稳定且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是

值得大家深思及共谋的。在全球化场域亦然；若让全球成为一理想的整体人类生态体系尚远不可期，或并非全球化下大国相竞的终极目标，那么各国或各区域国家是否应因地制宜地完善自身的人类生态体系，并尊重彼此的选择？或许中美贸易战与新冠肺炎流行可被视为一种警讯：全球各国间的竞争非仅在于全球化程度及优势，而更在于如何完善自身的人类生态体系。

本文首发于“一席”公众号，经作者修订后于2020年3月17日发表于文研院公众号

葛兆光 |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

2019年底，文研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老师受邀访问东京大学。在此期间，他将过去的一些随笔集结为一本集子，题为到后台看历史卸妆。下文为他对这一书名所作的题解以及其中的一篇文章——《以“国家”的名义》。

一本随笔集的题解

现在是2020年的2月，我在日本东京。编辑来信说，这个随笔集需要一个书名。

用什么做书名好呢？还真没想好。原本这是给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专门编的一个专辑，专辑可以杂拌儿，也不需要题目。现在要让我取名，让我很为难。近来心头时时笼罩的，是国内疫情，不仅

让人心忧，让人哀伤，还总让人看不透云雾掩的真相。说到“真相”，不由得就想到，历史学者肩上的责任，仍然是在寻找“真相、真相、真相”。一百多年前，世界历史学大会上充满自信的这个历史学宣言，尽管在如今后现代潮流质疑下，寻找真相这一意义受到了冲击，可我还是觉

得它仍然需要坚持。毕竟中国还是在现代的延长线上，并没有一跃而进入后现代。

现实的真相总是被政治遮掩，历史的真相也常常被需要所伪装。胡适所谓“历史是一个随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并没有大错。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两面，一方面它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真实故事，揭示曾经有过的爱与恨、剑与火、血与泪，提醒后人谨记教训；但另一方面也常常会粉墨登场，演经过权力粉饰过的肥皂剧，赚取观众的眼泪、同情和服从。所以，有良心的历史学者不仅应当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且有必要到后台，去探看卸了妆的历史。也许，那时看到的历史才是

以“国家”的名义

一

读历史书，书上总是说唐帝国多少大方和自由，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很留恋那个自己很酷很阔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自信和骄傲，使唐人觉得中国就是整个“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门大敞开着，还说这是“海纳百川”。一千二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侣到中国来，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临行时总是送一堆书，儒经也有，佛典也有，连那些不那么能登大雅之堂的《游仙窟》甚至《素女经》、《玉房秘诀》，也随便他们抄回去。并不觉得这就被偷窥了国家机密，也不觉得这就丢了上国斯文，倒总觉得这是“以夏变夷”。只有一回例外，就是在吐蕃日益强大，弄得唐帝国寝不安席的时候，一个大臣于休

没有乔装打扮，没有矫情说教，没有编造剧情的“真相”。所以我总觉得，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在于到后台看历史卸妆，或者去帮历史卸妆。这份工作，学术一点儿说，叫做史料批评或者文献考证，而文学一点儿说呢？就可以叫拆穿伪装或看透纸背。

于是，我把这部随笔集起名为《到后台看历史卸妆》。它并不切题，也不能概括内容，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盘旋在我心头的，一直是真相，至今历史学家需要做的，也是寻找真相。

2020年2月于日本东京大学

烈上过一份奏折，叫《请不赐吐蕃书籍疏》，但是好像也没有下文，该送的照样送，大包小包，看看当年日本人自己编的《将来书目》，就知道这种“文化馈赠”在唐代是多么大方。

大方的背后是富强，自由的基础是自信，到了帝国外面突然出现敌国外患的时候，汉唐以来中国人那种睥睨万国的心理，就开始悄然变化。特别是在“八尺卧榻变成三尺行军床”的宋代，尽管口头不说，心里却总是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个写诗写得很好的张耒就说过，“为今中国之患者，西北二虏也，……君臣不以挂于口而虑于心者，数十年矣”。

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下，过去的自信和大方，统统变成了谨慎和紧张，只是口头不肯多说，害怕一言成讖。

二

这个时候，有人意识到书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识不能随便的外传了。理由呢？据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尊严。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郑重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文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怕传到北方的辽国。据说，当时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里面有很多朝廷的内部消息。欧阳修说“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另外呢？据说有的文字不那么高雅，说是怕“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編集，有误学徒”，实际上是怕北方的辽人小看了大宋，丢了国家的体面。欧阳修的建议结果如何？我没有考察。表面看来，理由相当正当，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体面，不能不小心。

几十年以后，元祐四年（1089），也算是欧阳修的学生吧，那个有名的苏辙出使了一趟北方，就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里说，我们大宋的民间印刷品，“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褒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意思和欧阳修差不多，大概是应他的呼吁，第二年也就是元祐五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褒之文，不得雕印”。

于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关安危的背景下换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气，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变成了惴惴不安。



葛兆光教授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讲述活动上

三

小心翼翼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当国家毕竟还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间时，这种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过，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马上就变味道，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安危和尊严出的主意，反过来却授政府以柄来钳制言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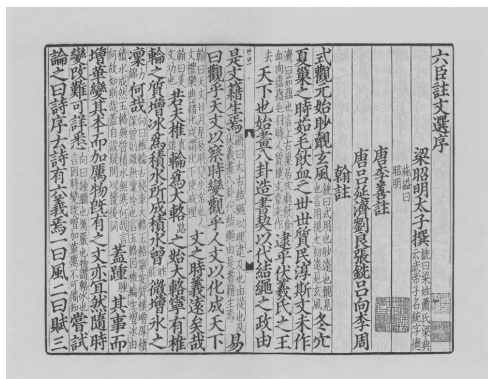
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样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夹带私货，特别是怀有某种不良意图的执政者越俎代庖，把这种正当行为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的时候。就在这份元祐五年（1090）的礼部令中，借着对敌国的担心，执政者便暗度陈仓，顺手就控制了本国的知识和思想空间。禁令中说，不仅“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就连“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而且“候印讫，送秘书省”，这口气，这腔调，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

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沿着惯性往下走,接下来,皇帝伪装成政府,政府替代了国家,以“国家”的名义钳制新闻出版的官方行为,似乎接连不断。北宋的大观二年(1108),由于各地书商生意红火,有个负责淮南西路教育的官员叫苏轼的,就建议把印刷权力收归国子监,不要让民间的书商自己印诸子百家的书,免得“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到了政和四年(1114),一个叫做黄潜善的人,也乘机大讲时文的坏话,把他们自己用来考试的时文和导致考生死背教条的毛病,都算在了出版商的身上。他说,因为读了书商的东西,他们的学问“读之则似是,究之则不根”。三年以后(1117),又有人就引用控制印刷的禁令,觉得读书人现在讲话写文“不根义理”,就是读了“编题”、“类要”之类的出版物,所以建议“禁绝书肆私购程文镂板市利”。

四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来是士人的建议,最后钳制的是士人自己。

以“国家”的名义,政府有了对思想控制的合法权力,于是,关于出版的钳制就越来越严厉。举两个南宋的例子,一个是对于自由思想的控制,庆元二年(1196),国子监建议,读书人要以《语》、《孟》为师,不能传习语录,应当禁止这些语录出版,免得这些“欺世盗名”的理学家思想坏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舆论》之类的书统统销毁。一个是对政治新闻的管制,像南宋绍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销毁各



宋刻本《六臣注文选序》

种小报,因为它“始自都下,传之四方”,把各种本来只让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事、程文,甚至“官员陈乞未曾实行之事,先传于外”,搞得民间的小报比官方的朝报还受欢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销毁,把新闻大权统统收归自己,规定只有官方朝报才可以报道消息。

其实,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写于2003年

程乐松 | 黄昏永续——“虚假观察者”关于疫病的琐言

程乐松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参加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活动,研究领域为六朝及隋唐道教史、两汉思想史与早期道教、宗教经典诠释学。

大约三四周之前,文研院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者发了一个倡议,希望我们还在进行时的疫情发表一些感想。以我的观察,这些学者都是文研院气息的爱好者,这是一种很纯粹的喜欢,非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才是真正可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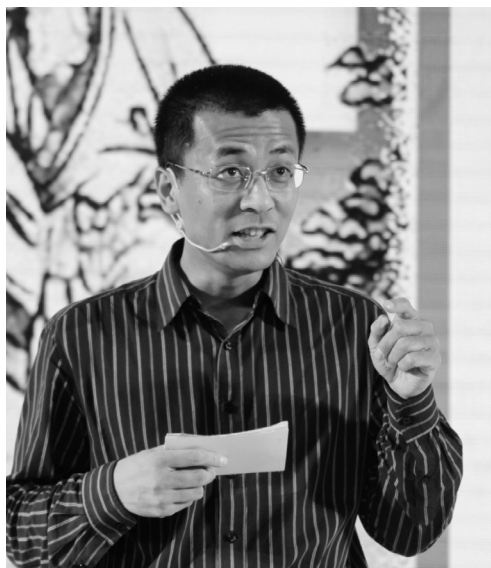
文研院的老师还特意叮嘱,“你应该有很多话说,毕竟你是做道教的。驱瘟避疫是你本行啊…”彼时我觉得有些无奈。道教研究学者应该会作法、应该能炼丹,这种玩笑中蕴含着强烈的常识压力,似乎也成为某种职业性的技能要求。这种压力一直让我很排斥承认自己是一个道教学者,而这样的排斥又常常被解读为看不起道教信仰。尴尬的两难就是一种日常。常识的压力就是一个人文领域里的职业学者有责任也有必要展示他的专业知识。通过某种快递式的知识把尘封在故纸堆里的过往以一种比附的方式呈现出来,牵连到某个当下的鲜活处境,进而让读者在“原来历史上这种事情也时常发生”的宽慰和“他们用如此原始和不科学的方式应对危机”的优越感中安然喝下完全无益也无害的知识饮料。

我想,作为一个道教学者,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从《道藏》里找到若干驱瘟的仪式文本及关于大疫治愈神迹的记述,得出

不是结论的结论:其一,你看,虽然他们比我们落后那么多,但他们都挺过来,我们也能挺过来;其二,愚昧和落后的观念才是造成灾难的人为机制。这也是社会赋予一个职业学者的话语空间,正确的做法就是顺坡下驴地在话语空间里展开言说…

这样的姿势在我看来十分不真实。在人生最悠长宅家假期里,我一直在无法写作的焦虑中、与家里的小魔王斗智斗勇中、不停手地刷疫情数据中、乐此不疲地打听各种小道消息中熬过日历里的每一张纸片。在这样的真实经验中,真正无可抵抗的就是“日常”的统治力,我们那么拒斥当下持续了几十天的“假期”的“日常”,我看到了日常之间战争,以及高度秩序化的混沌。“不真实”的感受让当下的“真实”成了敌人,我们通过不断回向日常秩序的方式对抗当下的“日常”。正像一个在森林里迷路了的人,森林的风景是完全不可见的,不断涌来的就是迷失的惶恐和因此产生的懊恼的自责。

最近一个多月,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景观就是,疫病给了所有人话语生产的良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话语生产与观念交叠对抗“非日常”的焦虑和恐慌。这些话语生产的基本形态过于复杂,一个可能的共通之处就是所有说话者都是虚假的



程乐松老师在“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讲述活动上

观察者，自以为是的局外人。在一个概莫能外的社会危机中，保持观察者的视角展开言说是逃离焦虑的好方法。于我本人而言，尽量保持不与这种“异常的日常”对抗的心态并且小心地不加入话语填充物（Discourse Landfill）生产的狂欢是应有之义。

昨天，也就是3月18日，听到渠敬东教授在视频中提及涂尔干关于社会密度和传染性社会的论述，蓦然意识到最具有传染性的不就是说话的欲望和虚假观察者的视角吗？置身其中又超然于外的悖谬一直是所有知识人不能逃脱的宿命。进而开始怀疑，保持不与“异常的日常”对抗的心态是否也是矫情？如果是，那么就尝试放下抵抗，感受一下反思异常的“日常”。于是就有了以下的Landfill（鄙人十分喜欢这个词，就是填充物，几乎没有什么用，而妙处就在于“几乎”）：

毫无疑问，这个春节假期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奇特的，它长得出奇，也压抑得出奇。假期与疫病的迭加让隐约的恐惧和难免于难的担忧被放大了很多，我们又没有办法用忙碌抵抗它们。我们最缺乏的就是，与恐惧和担忧平和相处的能力。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被日常秩序驯化了，只能活在“实际的”抑或“被想象出来”的高度秩序化了的日常里。真正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是无序与庸常。

我们为什么盼望假期呢？日常生活的秩序中包含着一种典型的吊诡：高度重复的日常必须时常被假期打断，以避免把人们抛入庸常的疲役之中。假期的安排是日常秩序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功能就是打断它，并且以此保证日常秩序以可中断且可恢复的方式持续下去。同时，我们的日常秩序只有在被中断的时候才被显现出来，才可以被观察和分析。退而言之，即使在真正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活在一种想象出来的秩序之中的。毕竟在一个高度秩序化的社会节奏中，每一个体的丰富性和经验的偶然性虽然可以被忽视，但终究不能被消灭。

如果说被中断的日常秩序就是我们盼望的假期，那么太长的假期又让我们对日常性的统治力有了充分的认知。疫病期间自觉减少出门，职业社会的日常秩序的核心——工作——几乎停摆，那些曾经毫无余隙地包裹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我们突然看到了日常秩序像黑洞一样强大的席卷能力。一旦日常秩序这个黑洞停止运转，时间就以很缓慢地方式压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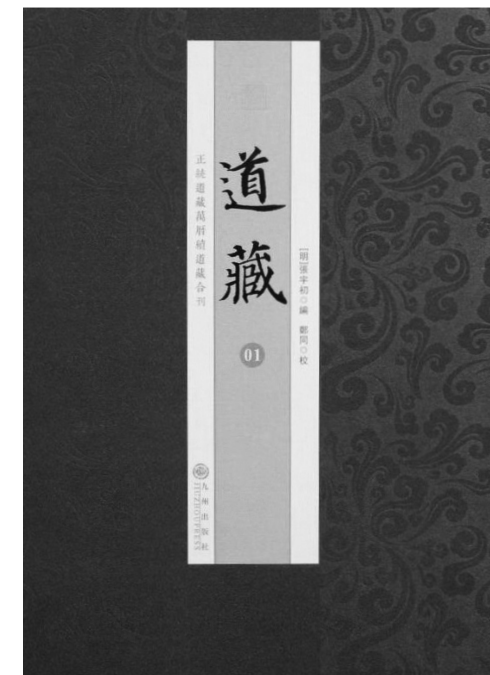
了每一个人的耐受力，闲得发慌就很直白地表达了“悠闲的限度”。

过往的数十天，在两种日常模式之间进行剧烈且不合预期的转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我们不得不处在“何以丧失日常进入无序”的不断省察和“何时回到日常秩序”的持续焦虑之中。这种焦虑既有面向过去的省察，也有面向未来的猜测。在被迫的无所事事和用以抵抗“虚假悠闲”的没事找事儿中，我们可以尽情地放纵自己的焦虑和烦闷情绪。更要命的是，这些情绪被持续放置在我们意识领域的焦点位置上，不断放大，直至变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公共“症状”。确实的状态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知道”。由此，持续且充满矛盾的信息与各种被知识和权威包装过了的话语就成了真正的刚需，我们自觉地被席卷到不断被生产出来的话语和相互矛盾的信息之中，用信息的焦虑抵抗秩序的焦虑。

在疫情面前，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最根本的认知挑战：长期被灌输的、关于科学与世界秩序的信念，不得不在无序的信息与话语的映照下反复被质疑。扑面涌来的信息和话语都有一个预设，它们的使命是揭示真实、传递客观。它们尝试说服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一切仍然在知识的秩序内，所有的无序只是来自暂时的未知。以此在智识的秩序重建中抵抗未知的、现实的风险与恐惧，制造一种有趣且脆弱的印象——因为我们能够理解这一切，所以我们能够掌控它。此外，就社会信息的生产 and 分发机制而言，我们会看到一个特别奇怪的矛盾：所有的信息渠道和内容似乎

都是指向秩序的，然而他们被选取和理解的过程却是完全无序的。不妨说，我们活在一个高度混沌的信息布朗运动之中。与此相对，对于任何一个个体而言，这些高度混乱且缺乏真实性判定的信息又必须被秩序化，并且整合进一个丰富但划一的世界认识之中去。

最近的四十天，我身边最活跃的信息源就是中学的一个校友群。分布在天南海北、国内海外的，都被疫情中断了日常生活和职业节奏的数十人不断在群里以各种姿态发布信息并进行评论，我自己也十分严肃地上传过好几条已经被辟谣的所谓新闻。严格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信息混沌中的孤岛，我们首先想要得到的不是真实，而是确信和秩序感。秩序感的需求与怀疑



张宇初《道藏》书影

的本能成了内心交战的双方。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显然不是日常话语和公共知识，而是一些不明觉厉、不知就里的术语堆砌起来的“专业表述”。谈到疫情，你要不能说出免疫风暴、不能知晓某几个英文字母缩写出来的且你也知道到底是什么的药物或者设备，那么你就是缺乏话语自信的。

不妨说，当代社会给人一种十分荒谬的在场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任何人可以充分利用有限但被打扮得十分真实的信息，辅以自己的脑补实力，假装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现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共情的能力，用情感的方式“体贴”地加入任何一个现场。与此相对，从理智意义上，我们又都是怀疑者和局外人，哪怕是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同样遭到超然的审查和诘问。

复杂的在场感并不是解放了我们的理性认知能力，而是放飞了我们的想象力。在日常生活的秩序里，我们的想象力总是被理性和常识统治的，而在日常秩序缺位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就彻底告别了常识的压力，开始在谎言、事实与自我感受之间不断漂移。其合理性就是，断裂了的日常秩序让我们可以尽情地在想象中试验混乱的边界和无序的后果。只有在这个时候，所有在平时被嗤之以鼻的怪力乱神都被以可能性的名义占据了话语生产的某一个角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起来。



患者在方舱医院内阅读《政治秩序的起源》

这时，知识人或者科学家们就会用他们用专业术语和知识壁垒构造出来的、具有权威的话语提示已经漂移的想象力回到论证的伦理要求上来。于是乎，辟谣成了重要的话头。就我个人而言，方方女士与张文宏大夫两个人共同构成了基础的想象力空间，情感性的表达和理性的知识成为过滤和质疑信息的两个端点。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往复之中把自己埋进关于真实性的焦虑和省察性的反思之中，抵抗“无序”带来的不知所以且不知何时终了的焦虑。

除了面相各异且难辨真假的信息之外，以省察的名义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话语生产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作为象征的“病”或“病人”。无序的“日常”让每一个置身于其中的人都有一种“病态”的直觉，于是，病的象征性意涵延伸成为最简易的话语生成方式。不仅有一些人病了，社会也病了，思想也病了。简言之，我们都是这个无序病症的共病者。

自觉的反思与省察通过不断指出此前被我们认为是“有序的世界”由于自满或

无知而遮蔽了的，其中包含着的无序的风险，以此来生产对抗“无序”焦虑的诠释。如果关于事实的信息是为了说明“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那么反思性的话语则是为了应对“为什么”“会怎样”的问题。诠释并不是为了解决，而是为了平复焦虑。让人恍然大悟的诠释使得听者可以暂时进入“无序背后的有序”的安全区间之中，而这些诠释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我们所谓的有序与日常就潜藏着这些无序与混乱。质言之，我们不是真正指出了混乱的根源，而是尝试说明在进入混乱之间的日常中就包含了某种混乱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关于日常的定义将无序和混乱消解在更新的日常描述之中。在其中，此前遮蔽真实的日常的误解和偏见，成为无序的替罪羊，而我们重新安然地活在一种持续向完善秩序前进的感受之中。

大抵上，职业学术的时代，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学者就是负责信息生产和鉴别的，而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的职责就是用诠释的话语和省察的语气顽固地保卫日常，即使这种保卫方式就是不断地用诠释重构它。在一个无限放大的关于“疫病”的隐喻之中，如果我们都是病人，那么我们就同时都是病理学家。

不得不承认的是，津津乐道的病理分析与治疗方案之间的距离，是无穷远。

诠释就是终结处，而不是行动的起点，这就是绝大多数公众对于反思性诠释缺乏信任和尊重的根本原因。诠释总是要直面诠释者们共同建筑的巨大障碍，即理性设定的所有人都拥有的怀疑能力和责任，以及经验的神话和对效果的迷信。因此，所

有的诠释起步于怀疑，也要终结于怀疑，在所有人都被赋予怀疑权力的时代，抵御怀疑的唯一方案就是行动及其经验的结果。然而，诠释的最后波澜就消失在行动开始处。省察与诠释总是尝试让有序与无序融合在一个新的秩序结构之中，这种尝试一直是未完成的，行动对秩序的拆解与诠释对秩序的重构根本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面相而已。

不妨说，在被日常性统摄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是埋首于其中的，并且活在一个关于秩序感的迷信之中。与之相对，那种超然其外的病理诠释和秩序重构总是在日常断裂处才出现的。

被无限放大的疫病隐喻和百无聊赖之中对日常的省察，让我们看到，某种秩序变成日常的基础就是其中必然包含着面向未来的“混乱”可能性，日常的截断和裂缝是必然，而不是某种偶然。善于反思且具有无穷想象力的我们既不是活在理性与秩序的晴朗之中，也不是在无序与混乱的永夜之内，而是在晴朗与晦暗的交界处，让黄昏永续。

本文于2020年3月24日刊发于文研院公众号



彼得·伯克 | 作为社会记忆的历史（节选）



彼得·伯克（Peter Burke）为剑桥大学文化史荣休教授、著名新文化史学家，学术专长为西方史学思想和欧洲文化史。本文由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袁剑译出。

传统观念认为，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简单的。历史学家的功能就是成为一位“回忆者”，成为对公共事件记忆的监护者，而这些公共事件的记忆则以有利于行动者的方式被记录下来，从而使这些人获得显赫声名，而他的后代也能从中受益，从这些事例中学到很多。历史，正如西塞罗在如今广为引述的文章中所说的，是一种“记忆生活”（*historia vita memoriae*）。

众多的历史学家，像希罗多德、傅华萨（Froissart）以及克拉伦顿勋爵等，都声称要通过书写以使对重大事件的记忆能够活下来。两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在其序言中就特别指出了这一点，通过传统的隐喻，将时间当成是一条河流，而将所发生的事情作为最后将烟消云散、了无踪迹的文献。拜占庭公主安娜（Anna Comnena）将历史描述为是抵挡“时间之流”的“堤岸”，而“时间之流”则会将世上的一切都卷入“遗忘的深渊”之中，普罗科皮乌斯则认为他所描述的哥特、波斯以及其他地区的战争史“最终，时间长河将不会因为缺少记载而淹没那些极为重要的事件，从而不会使之被人遗忘并完全灰飞烟灭”。在实现了“在记忆之书刻下你的印记”的但丁和莎士比亚看来，作为文献的行動的观念也可以

被看成是“记忆之书”观念的一部分。

这是对记忆与书写历史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这种观念认为，记忆反映出事实上发生过的事件，而历史则反映了记忆，尽管如今看来过于简单。历史与记忆都日益变得问题重重。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并将之书写出来，这不再被看成是单纯的行动，而这在过去曾被如此看待。不管是记忆还是历史，都不再客观。在这两者当中，我们正学着作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解释以及歪曲。在这两者当中，这种选择、解释和歪曲都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它并不是单个人的独自行为。

对所谓“记忆的社会结构”的首次明确阐释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出的。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社会集团所建构起来的。单个人的回忆，从字面上的意义而言，是一种生理意识。然而，正是社会集团决定了什么是“值得记忆的”，同时也决定了如何加以记忆的问题。个人意识对公共事件的认同，对于其集团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回忆起了”众多他们未曾直接经历过的事情。例如，一条新闻事件，有时可以只是一条新闻而已，但有时却能够成为某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作为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忠实信徒，哈布瓦赫对记忆的社会学用一种就算不是极端，但也非常强烈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观念。哈布瓦赫并没有坚持认为（剑桥大学的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k Bartlett）在1932年则认为他是这样的），社会集团的回忆跟个人的回忆在字面意义上是相同的。然而，哈布瓦赫曾经受到过法国史学大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更为明确的批评，布洛赫指出了从个人心理学那里借取概念并将之简单地运用到“集体”行为上（例如集体表达（*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集体心态（*mentalités collectives*）、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时的危险。尽管如此，布洛赫还是准备采用集体记忆（*mémoire collective*）这一术语，并用这些跨学科的术语来分析农民的习俗，比如，关注在传统传播的过程中祖父母的重要性。

在作为社会建构的集体记忆与以某种老式的实证主义方式所看待的具有客观性的书写历史之间，哈布瓦赫做了明确的区分。但是，在目前对于历史书写的历史的研究中，对待历史书写的看法跟哈布瓦赫对待记忆的态度一样，将之看成是像罗马元老、中国官僚、本笃会隐修士、大学教授那样的社会集团的产物。这正一遍又一遍地表明，在不同的地点与时间，历史学家已经用不同的视角将过去看成是值得记忆的（战斗、政治、宗教、经济等等），而且他们也将过去用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依据其集体的观念，集中在事件与结构、伟大人物或日常民众上面）。



彼得·伯克教授

正是因为我倾向于后者这一关于“历史之历史”的相对主义观念，因此我用“作为社会记忆的历史”作为本文的题目，使用这一术语作为一种便捷的表述方式，用一种简要的原则来总括选择和解释的复杂过程，并就对过去加以记载和回忆的不同方式之间的同源性加以强调。

“社会记忆”这一短语及“相对主义”的术语确实造成了尴尬的局面，因此我必须在下文中设法说明我的看法。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类比，被视作像他们所具有的吸引力一样令人不可捉摸。假如我们使用像“社会记忆”这类术语的话，我们确实在冒将观念具体化的风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假如我们拒绝使用这类术语的话，我们就会处于这样的危机之中，即，我们无法注意到个人观念受到他们所属集团的影

响的不同方式问题。对于历史相对主义而言，我的观点并不是说对过去的任何研究就像对任何其他问题的研究一样好（可靠、合理、敏锐等等），一些研究者较之另一些人更为见多识广，也要明智得多。问题在于，我们只有通过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类别与图式框架（或者像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表达”）清楚知晓之后，才能（像当前一样）找到通往过去的入口。

对此，就有必要在这一系列跨学科的文章中对历史的地位加以重新定义。历史学家关注，或者说至少应该关注两种观念下的记忆问题。首先，他们需要将记忆作为一种历史资源加以研究，在对历史文献加以传统评判的同时，对回忆的可靠性加以评判。实际上，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已经这样做了，而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当时才开始意识到“口述史”的重要性。甚至我们当中的一些在更早时期工作的人，也已经从口述史运动中颇有获益，而在这之后，我们就有必要注意到一些书面记载中的口述证据和传统。

其次，历史学家注意到，或者应该注意到那些作为历史现象的记忆问题，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关于回忆的社会史。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像个人记忆那样的社会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我们就必须对选择的原则加以认可，并去关注这些记忆是如何在不同地点、不同集团之间发生变化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记忆是具有可塑性的，因此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它们是怎样被型塑起来的，又是被谁型塑起来的。这些问题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由于某种原

因而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但如今，关于这些问题的书籍和会议却已经铺天盖地。

于是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回忆的社会史，对此我准备加以提炼并将之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或问题：

1. 公共记忆传播的模式是怎样的？这些模式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改变的？
2. 什么是这些记忆的功用，过去的功用？这些功用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3. 反过来，遗忘的功用是什么？

一、社会记忆的传播

（从略）

二、社会记忆的功用

社会记忆有什么用？很难回答这样一个大问题。假如哪位律师参与撰写这一系列报告的话，他（她）可能会重点论述习俗和判例的重要性、目前行动的理由与合法性与过去息息相关、法庭中证人记忆的作用、“时间无法溯及”的观念，换句话说，时间“不管人们的记忆在何处……并不会充溢到对方那里去”，而对记忆证据所持态度的转变，则是读写能力与文字记载传播的结果。

作为一位文化历史学家，通过询问为何有些文化较之其他文化似乎更关心对过去的回忆，我发现它有助于探究社会记忆的功用问题。将传统的中国人对其过去的关注与传统的印度人对其过去的无动于衷做对比，这早已是老生常谈了。在欧洲，对这类问题的对比也明显多了起来。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right）认为，尽管尊崇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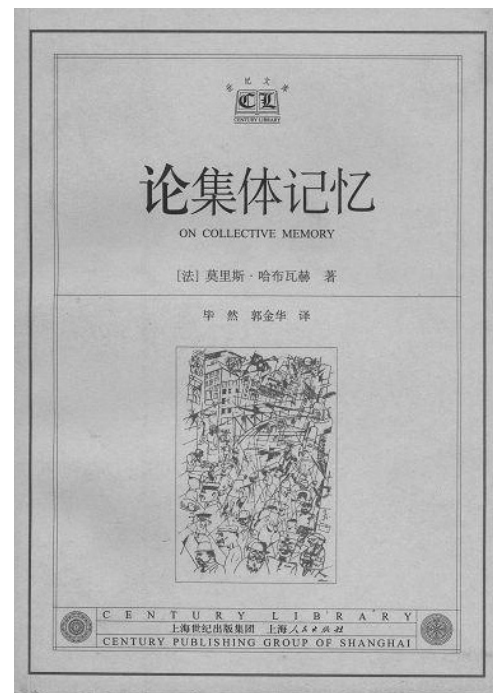
且对“民族遗产”深表关注，但英格兰人的社会记忆是相当短暂的。在另一方面，爱尔兰人以及波兰人拥有相当长时期的社会记忆。在1969年探访贝尔法斯特期间，我记得曾看过一张威廉三世的马上戎装像，墙上用粉笔写着“记住1690年”。在爱尔兰岛南部，人们仍然对英格兰人在克伦威尔时期的所作所为愤愤不平，这种感觉就像昨天刚发生过一样。在波兰，安德烈·瓦依达（Andrzej Wajda）的电影《灰烬》（1964年），表现了在拿破仑时代所激起的民族争论，瓦依达将这种观念看成是波兰人民徒劳无用的英雄主义。而在这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近乎同时，电影《英烈传》（The Charge of Light Brigade）（理查德森执导，1968年）仅仅被看成是古装剧而已，英格兰人都快被遗忘了。在社会人类学家约翰·巴内斯（John Barnes）所言的“结构性忘却”中，他们要么蒙受痛苦，要么就为之欢欣鼓舞。由于结构性忘却与“社会记忆”的概念既互补又对立，因此我将之重新命名为“社会忘却”。

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对待过去的态度会这般截然不同呢？常言道，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但也可以说，历史是被胜利者所遗忘的。他们能够去遗忘，而失败者却无法接受所发生的情况，而注定对此耿耿于怀。用文化根基的概念，或许可以做出另外的解释。当你具有这些文化根基时，你会对此毫不在意，而当你失去这些文化根基的话，你就会苦苦追寻。爱尔兰人和波兰人被连根拔起，因为他们的国家被瓜分了，他们对其过去岁月的魂牵梦绕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于是就回到了

哈布瓦赫所关注的问题，即，地点与记忆之间的关系。

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为运用过去的历史、运用社会记忆以及运用神话以确立认同提供了鲜明的事例。就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忆起1690年，或者重现7月12日的盛况，或者像1966年爱尔兰共和军炸毁纳尔逊纪念柱那样，或者像波兰人在1945年后所做的那样，在德国人摧毁之后重建起华沙的古老中心地位，所有这些都是要表明“我们”是谁，以从他人那里将“我们”区分出来。这些事例还很多。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事例。

十九世纪后期被不无争议地描述为是“传统的新发明”时期。当然这也是一个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书影

追寻国家传统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纪念碑被建立起来，而国家仪式（如法国国庆日（巴士底日））也被设计出来，国家史在欧洲学校中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所有这些举措的目的，在本质上是为了证明或体现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不管是像意大利和德国这样的新国家，还是像法国那样的古老国家，都是如此。在法国，依然需要建立起对国家的忠诚，而这一古老国家中的农民也转变成成为法国人。

涂尔干的社会学强调共同体、协商以及团结的重要性，这一学科本身也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这样看来，我们过于紧跟涂尔干及其追随者哈布瓦赫是不明智的，也不应该将社会记忆的社会作用看成是并不存在的冲突与异议。我已经多次提及了北爱尔兰的情况，而这即便算不是唯一的那个，在冲突的记忆与记忆的冲突方面也是典型的事例。考虑到社会认同的多样性，敌对记忆的共存、替代性记忆（家族记忆、地方记忆、阶级记忆、国家记忆等等），用多种术语来思考不同社会集团的记忆运用问题，当然会更有成效，因为这些社会集团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或者“值得记住”的，有着不同的看法。

美国文学批评家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创造出“解释性共同体”这一短语，来分析对文本的解释上所产生的冲突。通过类似的方式，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的不同“记忆共同体”的术语也能有效地进行思考。但有必要一问的是，谁想让什么人去记住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做？谁对过去的看法被记录并保存下来？

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表现出对过去一些时候反映出来的更广和更深的社会冲突的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前对下层历史的重要性的争论，这种争论至少可以追溯至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这位历史学家兼诗人那里，他告诉沙皇，他想撰写十八世纪农民领袖普加乔夫的生平事迹。沙皇的回答简单而粗暴：“这种人没有历史”。

官方和非官方对于过去的记忆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而非官方的记忆相对而言较少被研究，有时候却能成为历史的推动力量，诸如1525年德意志农民战争中的“美好旧法”(gute alte Recht)，英国革命中的“诺曼桎梏”(Normannische Joch)等等。除了使用这种类型的社会记忆之外，还难以解释地理学上的异议与反对之声，例如，在实际上，数世纪以来，一些村庄参加了不同的抗议活动，而其他的村庄却没有。

作为造反行动中的常见特征，对文献的系统性破坏被1381年的英格兰农民、1525年的德意志农民、1789年的法国农民所想起，这些可能被解释为是信仰的表现，即，记载并无法证明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它们是在建立在统治阶级的偏见之上的，而普通民众才记得真正发生了些什么。这些破坏行为引发了我最后的话题，即，遗忘或社会忘却的功用。

三、社会忘却的功用

我们经常会从背后解释清楚问题，使之真相大白。为了理解社会记忆的运作问题，可能就有必要对以往社会组织、驱逐、

镇压与控制的通知以及谁想要谁去忘记什么以及为何要这样做之类的问题加以探究。忘却(Amnesie)与“大赦”(Amnestie)相关，而“大赦”在过去被称为“忘却之举”，这是为了社会团结的利益而对冲突的记忆正式加以抹除。

对过去的官方检查制度都很有名，而且也不必再谈对《苏联百科全书》的众多改写。一些革命或反革命政府喜欢通过改变街道的名称以表示与过去的决裂，尤其是当这些名称涉及到重大事件的日期时，在我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访问保加利亚那会儿，手头唯一的一本导游手册是1938年的导游图(Guide Bleu)。但是当中的街区地图经常使我迷路，因此我不得不向路人询问怎样才能找到“11月12日大街”。没人表示奇怪，也没有人面露微笑，他们只是简单地指了指方向，但当我到达那里，发现“11月12日大街”已经改称为“五一大街”了，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这一境遇可能被看作是一种鼓舞人心的暗示，就算在我们当代所谓的“极权”统治之下，非官方的记忆还是充满着顽强的生命力，而清除这种非官方记忆也困难重重。

所谓的“《苏联百科全书》综合征”的出现并不是这种统治的新发明。早在欧洲近代早期，也有这样的现象，至少在官方层面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路易十四及其谋臣非常关注我们所称的“公众形象”问题。他会铸奖章以纪念其治下的重大事件，其中包括1693年摧毁海德堡。然而，当这些奖章被收集到一起以形成他统治时期的“奖章历史”时，这种特殊的

奖章就从记载当中消失了。路易十四似乎意识到对海德堡的摧毁并不会增进他的名声与荣光，因此就从官方角度对此事加以压制，最终从记忆之书上抹除干净。

对令人难堪之事的官方检查制度也为人们熟知。这里值得加以探究的是其非官方的镇压或控制，而这又不止一次地激起个人与集体记忆之间类似的难堪问题。弗洛伊德关于每个人内心“审查”的著名隐喻当然来自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官方检查制度。与此类似，社会心理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也认为，我们一直在用编纂《苏联百科全书》式的方法重新书写我们自己的传记。但是，在这两种审查者——公共机构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类空间，即集体的但却非官方的审查者。集体能否像个人一样压制那些不利于回忆的东西呢？如果可以的话，那又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可以思考下面这个由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记录下的故事。在加纳北部，对贡加(Gonja)的领土划分的起源据称是创建者雅克帕(Jakpa)，



纳尔逊纪念碑，1966年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毁。

他将王国分给了他的儿子们。“当这个故事的细节首次在本世纪初被记录下来时，英国正将其控制力拓展到海外，雅克帕据说有七个儿子，这与划分的数量相对应……但正在这时，英国人来了，七份国土中的两份没有了……六十年后，当国家的神话再次被记载下来时，雅克帕被认为只有五个儿子。”这是一个过去被用来为现在提供合法性的经典事例，对此，马林诺夫斯基将神话的作用描绘成是机构的“宪章”（从中世纪历史学家那里借用了“宪章”这一术语）。

我并不认为这种使过去适应于现在的现象只能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才能找到。确实，在某一特殊社会集团成员所共有的对过去的印象以及对过去的残存记载之间的主要差异通常很容易就能展现出来。一种周期性的神话就是“构建父亲”，这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马丁·路德的故事中是建造新教教堂，对涂尔干（或马克斯·韦伯）来说则是构建社会学，等等。总的说来，在这些神话中发生的事情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别被略去了，似乎这些过去的英雄们的主要意图已经被带到我们现在了。

书写与印刷并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类神话的传播。但是，它们所能做的，就是去保存对过去的记载，而这些记载与神话并不一致，而神话消蚀了这些记载，对过去的记载成为令人难堪的过去，而对于这种过去，人们基于种种原因并不想去知道，尽管要是他们对此知晓的话，可能对他们会更好。比如说，它可能会使他们免于受到危险幻觉的威胁，这种幻觉将过去、

现在和将来看成是英雄与恶棍、美好与丑恶、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简单斗争。神话不再被人所轻视，但并不建议按字面意义去加以阅读。

希罗多德将历史学家看成是记忆尤其是荣耀记忆的捍卫者。我更想将历史学家看成是难堪事实的捍卫者，而这些难堪事实则是社会记忆的内在框架。官方通常称之为“提醒者”。这一名称事实上是对讨债者的一种委婉说法，官方的工作是要提醒民众他们最好应忘记什么。历史学家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成为一位提醒者。

（本文最初以《作为社会记忆的历史》为题，收录于托马斯·巴特勒所编《记忆：历史、文化与思想》一书。）



梁其姿 | 中西传统的公共卫生与疾病的防控



梁其姿为文研院第七期特邀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李约瑟-毛文奇基金教授、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社会史和近代社会文化史。本文原系梁教授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所作的文章，收录于“中央研究院”科学教育推动委员会主编的文集《2003，春之煞——SARS流行的科学和社会文化回顾》。此次受文研院邀请，特增补新的按语。

作者按

十七年前的一场非典，对身历其境的人而言，是毕生难忘的经验。当时感到的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恐惧，至今仍然清楚记得。事后大家似乎认为社会已汲取教训，对新型传染性疾病已有了解，并具备了较高的警觉性。载录这篇旧文的科普小书主要是为了把这场源自东亚的疫灾留下一个历史记录。想不到才十七年，我们再经历一场比非典更恐怖、规模更大，同样源自东亚，祸及全球的疫灾。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并没有汲取教训。

重读这篇旧文，觉得当时我对社会防疫的能力仍抱有启蒙式的乐观，认为只要解决肮脏、贫穷、无知等问题，社会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疫疾。只要政府能按章专业地整合医学卫生的科学知识、加强公共建设、配合着以高科技收集到的统计数据，负责任地落实妥善的公卫政策，我们就可以安枕无忧地过日子。然而，今天这场在非典后十七年的疫灾，竟发生在更富裕、病毒科研更国际化、公共建设更现代化、管治更高科技化的时代。为甚么社会防疫的能力反而跟不上呢？

这场看似自然反噬的疫灾或许是警讯，让我们对追求物质享受、科技知识、基础建设这些启蒙时代的价值作更深刻的反思：物质生活的丰盛是否纵容了我们各种贪得无厌、甚至惹祸的欲望，如过分的口腹之欲？科技与建设的高度发展是否扭曲了人与自然应有的兼容关系，让新病毒可乘虚而入？人对财富、科技与权力无止境的渴望、不择手段的追求是否合乎公共利益？这些追求是否应有更清晰的道德规范，让社会能更有效与合乎公义地动用资源来管理灾难？

启蒙式的人定胜天的乐观对控制疫灾，已起不了长久作用。更重要的恐怕是如何克制这种傲慢，谦卑地探索人与自然共处之道。这项后启蒙工程需要动员社会各层面，艰辛地共同创造新知识、启发新思维与发展新的管治策略。二十一世纪的防疫，应该要进入新阶段了。



梁其姿教授开设“物质文化史的方法与实践”工作坊

一、前言：传统模糊的传染观

疫病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同样长久，但是人类对疫疾的理解却随着时空的不同而有重大的差异。因此历史中社会对疫疾的预防与治疗方式亦各有特色。如果拿今天被认为放诸四海皆准的医学与公卫理论与历史经验做对比的话，我们看到极为有趣的变与不变。

在各种流行病中，最令人产生恐惧感的是具传染力的疫病。此次流行的 SARS 虽然死亡率不特别高，一直到今天，全世界因此而死亡的人数不及一千，但已足以另各国闻疾色变，受影响的国家无不以最严厉的预防措施来应付。这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个病的传染途径仍无法完全被掌握。然而，“传染”这个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在 16 世纪以前并不是一个清楚或普遍被接受的概念。无论在东西方社会皆如是。古希腊文的 epaphe，

synanachronis，拉丁文的 contagio，梵文的 upasarga，阿拉伯文的 adwa 或汉语的“传染”、“相染”、“渐染”等名词虽然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与今天用以指涉接触传染的名词有语源关系，但是这些名词在古代社会所表达的概念是与今天所指的“传染”是不同的。

如果仔细分析古典医书中的这些名词，我们发现其实它们并不明确地指涉人与人之间的传染，而多隐含作为病因的各类感染，包括环境气候、道德等方面的污染。如活在受污染的统一环境中的人皆得病，就是一种“传染”，或者由于受某种腐败道德的感染而得病，也属“传染”。对今天已受“细菌论”或“病毒论”洗礼的现代人来说，这些古老概念不是“含混不清”就是“迷信”，但在前近代的人的宇宙观与知识范围里，实在难以找到疫病透过接触而传染的充分解释。尤有进者，传统的社会伦理或宗教教义往往排斥这个传染的解释，一来如相信接触传染，人自然会在疫灾时弃亲不顾，违反基本道义，另一方面，对某些宗教，如伊斯兰教来说，神的力量无限，疾病的传播亦应在其掌握之中，因此不可能脱离神的意旨另有传染的途径。

不过，虽然在经典的理论中找不到接触传染的根据，但人害怕与病人接触、为了保命而抛弃染疾亲人的例子在古书中俯拾即是。这种出于惧怕染疾与死亡的直接反应毋需医学理论的鼓励，古代社会对诸如麻风、鼠疫等疾病的畏惧亦主要来自这种直接的反应。但是由于古人无法准确解释疾病传染的途径，无从制定系统的预防政策。因此一直到近代之前，东西方社会

面对疫疾，仍以治疗为主，并没有完善、系统化的预防措施。

二、中国传统的防疫措施

不过，预防之道当然不单指家规模的公共卫生制度。在近代以前，预防疾病最主要的方式是个人卫生，而一些类似公共卫生的措施，也多限于社会或地方内，并没有国家级的制度。事实上，中文的“卫生”一词虽然最早出现在庄子的《南华经》，而且在传统医书中经常出现，但是一直到清末，此词的意义，仍局限于个人“保生命”的策略，包括养生之道、治疗之方等。“卫生”被冠上“公共”之形容词，并含有“国家政策”的意思，是晚近的发展。中国有极优良的个人卫生传统，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诸如不饮生水、不食生食、起居有节等习惯，这些习惯至少自宋代以来就相当普遍，大大减低了个人染病的机会。

而地方士绅或官员也在平时或有疫情时实施施粥、施药、施棺等措施。这些措施虽然看来是为了体恤贫民，但施善者在有意无意之间考虑了防疫的问题。例如在乾隆 14 年（1749）江苏荆溪发生饥荒，当地有能力的人即在公所施粥济饿者，其中一位医生并说“恐其染疫也，煮姜汤于衢，使饮之。”当时的有识之士已深知疫疾往往继饥荒而来，让饥民吃饱，有较好的抗病能力，确能减低他们染疾的机率，是很合理的防疫措施。当疫灾真的发生时，地方富民或积极的官员通常也施药施医，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宋代开始的政府机构惠民药局，原意是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药物提供人民。这个机构到了明中叶以后

虽已多荒废，但每逢疫灾，有心的官绅仍会利用药局施药。如明万历 44 年（1616）余杭发生疫灾，知县在城内分四处开局施药，并请医生进驻施医制药。一些更积极的官员，如明末句容令陈于王每年夏秋相交时组织 32 个当地医生分头到附近 16 乡巡视，施医药以防疫。有时施药的是地方士绅，如明末绍兴人祁彪佳便经常在家乡施药济民以防疫。1636 年发生疫灾，他与当地 10 位医生签下合同，在他开设的药局施医施药，据说当年从 6 月至 8 月的疫灾期间，有一万多人曾前往求医受药。这类例子在明清社会中并不罕见。

我们可以想象在明清期间各种疫病大概不是当时的医药能充分治疗的，因此，每次疫灾都有高的死亡率，埋葬死者成为极重要的工作。我们看看明末 1642 年桐乡大疫的惨状，就可了解埋葬的重要性，当时死者数量增加的速度惊人：“故始则以



“鼠疫战士”伍连德

棺殓、继则以草殓、又继则弃之床褥，尸虫出户外……掘泥窖为葬埋，计或五十一壑，或六十七十一壑，不三月而五、六十窖俱满”。可见暴露的尸体很快成为严重的卫生问题，及时埋葬病死着是绝对迫切的任务。1821年发生在江南的霍乱大流行也产生同样的危机。当时苏州附近的信义乡有如下的经验：“针刺医药，百无一效，且传染无已。甚有数日间，全家俱毙。里中鬻棺之铺，晨夕操作，不敷购用。木价骤数倍，匠役工食亦如之，贫民至不能具棺。”幸得当地一个叫钱铸的善人，出钱为贫民购棺、择地掩埋，才因此“赖免缠染”。

的确，每逢大疫，施棺助葬成为极重要的防疫措施。当时医者与有经验的地方官僚都知道如尸体处理不妥会导致疫灾或使疫情恶化。清初名医周扬俊对兵荒往往引起疫情有如下解释：“大疫之沿门阖境，传染相同者，允在兵荒之后，尸浊秽气，充斥道路，人在气交，感之而病，气无所异，人病亦同。”他又提出如“因骸骼掩埋不厚，遂使大陵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者，漂泊远近，人在气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正因如此，施棺施葬是防止“疫气”散播的重要措施。其实按传统的习俗，地方应于晚春天气转热之前将所有暴露在外的尸骨埋葬妥当，这一方面有宗教上的意义，另一方面有防疫的意义。助葬在明清时期多已不靠政府的力量，地方上有能力的人往往组织葬会或以个人身份来协助埋葬。按不完全的统计，明清时期施棺助葬的地方组织至少有589个，最早的设于1564年的江苏。同时许多同时期的综合性善会亦会施棺施葬。

传统医生亦很早即认为脏水或死水会带来疫病。宋代名医陈言就出“疫之所兴，或沟渠不泄，畜其秽恶，熏蒸而成者”。这个想法亦促使宋以来都会立法管理垃圾、粪便、污水等弃置问题。政府也会注意定期疏浚渠道的工作。但是这些措施若不是经常遇到阻力，就是无法贯彻执行，禁令也未必普遍被遵守。简单来说，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卫生工作，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很成功的例子。

此外，中国亦有一悠久的“病坊”传统，许多学者认为这些病坊等同医院。其实虽然从5世纪以来佛教传统的病坊，到宋的都市型病坊，至明清的养济院、普济堂等都偶有置医生治疗其中的贫病者的例子，但是这些机构主要的功能仍是恤民，即收容贫病之人，而不是治疗。在宋代一些地方的“安济坊”可能在病房的设计上，考虑到“隔离”的问题以防传染，但是这种设计并没有受到重视，后来的机构亦没有往这方面发展。换言之，传统的病坊难以与今天的医院相比，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亦与病坊制度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中国传统里并不是完全没有隔离的概念与措施。两种疾病使得明清社会产生较大的恐惧感，从而发展出特殊的隔离政策。在南方，闽、粤人对麻风病的惧怕产生了明末以来的“癩子营”类的收容机构。在北方，17世纪入主中原的满族人欠缺对天花的免疫能力，为了避免受感染，强行隔离患痘者及其家族。对于麻风的传染性，明以来的医家有较多的描述，同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染渐被强调，这是中国传染观念变化的重要发展。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南方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自16世纪以来渐渐出现强制收容麻风病患的机构。机构名称不一，或称“癩子营”，或称“存恤院”、“癩民所”、“养济院”不等。而且城内居民越来越要求这些机构远离城区，地方官也往往在僻远处安置麻风患者，同时不准他们入城。到了18世纪，南方省份的这类麻风院已相当普遍。从乾隆时期刑案的例子中也可看出清代人认为麻风传染性强，往往强迫患疾的亲人或邻居另辟居所，或入住麻风院，远离原来的家庭或社区，有时因此引起纠纷，甚至杀机。麻风患者成为社会排斥的“公害”是明末以来南方社会的独特现象。

至于满人对天花的恐惧，起于17世主中原前后。之前由于满人与汉人接触并不频繁，少有染天花者，满人也因而普遍缺乏免疫力。17世纪以后他们为了自我保护，实行一系列的措施，如设立避痘所，禁止未出痘的“生身”入关，只准已出过痘的“熟身”进入中原。满族取得政权之初，更在北京设立查痘章京这个官僚制度，分中、东、西、南、北五城，令巡城御史负责严查是否有出痘者，并将患者及其家属驱逐于城外20至40里外。理论上清政府在城外设村收容这些被隔离者，但是仍免不了患者弃亲以自保等做法。稍后清政府曾度放松隔离令，只在病家周围“引绳度邻右八十步”，并禁人进入绳圈内。但在1655年以后仍逐疹如前。同时法令亦规定出西洋贸易返国者，官员得上船检查，有痘症者必须待平复后才能入城。这系列措施在满族最强盛时实行，后来也渐松懈下来。同时到了清末，满人对天花的恐惧亦减低了，

这早期的强势隔离政策亦渐被世人遗忘。

传统中国社会的种种防疫与卫生措施，主要的动力多出自地方社会本身，特点是灵活而机动。许多措施是在疫情发生以后的被动应变，但也有其成效。然而，需要长期性、跨越部门策划、强力贯彻的政策，则很少见于公共卫生领域中。如都市的污水问题、病坊、药局的专业化等就是明显例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甚少极与长期性地在这方面合作。一方面，公共卫生概念、政府要为人民的健康负责这个想法，并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另一方面，传统的知识，亦无法产生公共卫生政策的具体内容。因此一直至清末，我们不曾见全国性的防疫或卫生体系。这类型的公共卫生概念与做法，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

三、西方18世纪以来的公共卫生制度与防疫发展

大概可以说，直至18世纪初，东西方的防疫概念与措施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由于中国优良与丰富的个人卫生传统，及地方社会灵活的组织动力，使得在防疾效果方面，中国社会可能占了优势。但到了18世纪，西方的公共卫生的概念与策略渐趋成熟，这方面的经验先从都市或城邦的管理开始，到后来由国家中央主导跨部门的全国性策略，一方面汲取了新兴科学的知识，一方面依靠茁壮中的主权国族(nation-state)的政治与经济强势，这些都是西欧社会的独特历史经验。

此时欧洲正处于乐观的启蒙时代。社会改革者认为“自然”有其秩序，人有能力控制与操纵自然。只要知道疾病原因，

就可以改变或控制环境以防止疾病。同时他们也认为所有公民应享有健康的权利，人民健康问题也是国家应积极介入的范围。欧洲人开始要求的是一种开明专制的公卫制度，由上层强力策划与推动，同时改革的重点在发展快速、环境欠佳的都市，目的是减少疾病、改善人的健康。

公卫制度从收集精确统计资料做起，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从18世纪开始系统地、定期地收集有关气候、疾病、出生、死亡等统计资料。一套精细的统计数学方法渐趋成熟并普遍运用在行政事务上。中央与地方亦逐步建立一个有机的行政体制，由地方（如法国的地方卫生议会）提供系统的、科学的资讯并执行政策，由中央（如法国的皇家医学协会）主导政策方针与提供行政资源，并各自整合不同学门的专家，以讨论问题及执行政策。可以说到了19世纪初期，欧洲较富强的国家中央都能大致上掌握全国人口与疾病变化情形。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西方主权国族化之后行政管理科学的革命性发展。

在这第一波的公卫行动中，主导的卫生思想仍是传统的环境与气候理论。目标是针对脏臭的致病“瘴气”（miasma）。为了改善都市空气的流通、水质等问题，18世纪的公卫专家开始拆城墙、移建坟场、搬迁城内的牲口屠宰场、改善下水道与污水沟系统、拓宽道路等。因此参与这波运动的专家包括药剂化学师、工程师、兽医、统计师、医生、技术官僚等。许多史学家认为18世纪欧洲人死亡率的下降，与这波公卫改革最有直接关系。



宋·李唐绘《村医图》

到了19世纪初，都市贫穷与疾病的关系更受到公卫专家的重视。这与当时新的疫疾有关。19世纪的欧洲已脱离传统疫疾，如麻风、鼠疫的威胁，而面对的是与工业革命、长程贸易息息相关的新疾：霍乱与肺结核，而这些高死亡率的疾病特别影响都市贫民。在细菌论提出之前，这些新疾似乎更进一步证实了“瘴气论”，肮脏、贫穷、疾病似乎是个铁三角。卫生专家在推动公共卫生策略时自然地把技术问题、社会问题、医学问题同时考虑。其中污水与贫穷、疾病的关系显得最为突出，因此，下水道工程与污水处理问题，成为改革的重点。在这方面，英国的发展无疑领先各国。法国巴黎也有长足的进步，1788-1907年之间，平均市民可用的下水道增加了84倍。下水道的改善确使19世纪后期，霍乱在欧洲的疫情大大减轻。英国著名的公卫先驱查德维克（Chadwick）、法国的巴杭杜沙

特雷（Parent-Duchatelet）在19世纪中所领导的改革成为西方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在19世纪末巴斯德（Pasteur）、柯赫（Koch）等科学家提出细菌论，强化传染理论，并把公卫思维移至实验室内之前，英、法的公卫策略是最完整的。直到今天，19世纪中的英、法公卫改革成就深具启发性。

欧洲18世纪以来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医院改革一项。上文提到中国有古老的“病坊”传统。其实西方也有以恤贫病为主的宗教机构。不同的是，基督教西方的传统病坊一直依赖丰厚的资源得以发展，而中国的佛教病坊则随着唐以后佛教被政治压而没落，之后的俗世病坊所得到的资源既无延续性，亦不丰厚。基督教医院早在7世纪的拜占庭时期开始往专业治疗机构方向发展。当时这些称为xenon的慈善医院已不只收容贫病，已开始与医学专业做初步的结合。医院中已有驻院的医师与助护，而且这些医护人员在城内各属相关的专业行会，他们的专业资格、职业行为因此受到审视，而医院如教堂一样，也成为城市的主要特色。到了9世纪，医院的医生制度已发展出一个较完整的等级制，能当主治大夫的只有城内最具名望的医师。换言之，基督教传统中的医院较早与医药专业结合，并渐摆脱宗教色彩。这个结合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即16世纪以后已类似今天我们所了解的医院。

鼠疫在欧洲的猖獗也推动了医院的改革。在15世纪末以前，欧洲主要城邦多以严厉的隔离政策处理鼠疫。此时，鼠疫是

被认为会透过接触而传染的例外疾病（另一例外是麻风），由于死亡率极高，城邦政府往往以强大的武力、警力，结合着政治与法律界精英来强势执行隔离。但是这种将全区、全城、甚至整个省份与外界隔离的政策往往有极负面的后果：如阶级分化、家庭分化、经济危机、行政贪污（医生或官僚受贿而隐瞒疫情）等，而且经验也证明这种社会成本极高的隔离方式不一定有效（当时人不知道鼠虱是媒介，病人虽被隔离了，但病鼠无法被隔离，疾病照样传播）。因此15世纪以后，欧洲主要城邦在对抗鼠疫时调整了隔离的政策，那就是加强发展防疫医院制度。其中最大型之一是米兰在16世纪初建的鼠疫医院，这医院共有280个病房，并具三个功能：作为隔离场所、治疗场所、康复场所。在1630年鼠疫中，米兰鼠疫医院曾收容1万6000个病人。可以说，从16世纪开始，鼠疫在欧洲富裕的地区中不但推动了医院制度的发展，也促进了医学伦理的建立。在新型医院服务的医生多在城邦的医学院受训，他们效忠城邦，或国家、或地区，而不再如从前般只为权贵服务，谋取个人利益。欧洲医生的社会地位，也是从此时开始提升。这些类似城邦公务员的医生如遇疫灾时自己率先逃离，会被严重处罚，包括丧失市民与行医的资格。到了17世纪中后期鼠疫已渐淡出欧洲舞台之际，这类的鼠疫医院在欧洲大都市却处处可见。

18世纪后期的医院改革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此时主要的改变是彻底消除医院过去的宗教性质，而改为完全的专业治疗机构，同时紧密地与医学教学结成一体，法国

大革命是推动这个重大改革的临门一脚。这方面的改革在 19 世纪正式上轨道，将欧洲医学专业的发展带入新时代。此后，医生从书本学习到临床实习、正式行医等都有一套完整制度与程序，教学医院成为训练的主要场所，这一切并直接由国家监控，而医生亦通常被视为应为国家服务的公务员。

19 世纪西欧国家发展出来的公卫制度，首次受到严厉的挑战是在 1918 年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当时一场所谓“西班牙流感”之疫横扫全世界。卫生策略在此时的重点已因细菌论革命而转进实验室。欧洲主流的专家以发展疫苗为最高目标，反而轻忽了一般的防卫策略。英国的高死亡率（至少 22 万 5000 人死亡。染病率从 30% 至 70%）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卫系统过分依赖在实验室的科研，对采取传统防疫措施的态度过于消极。其实这次流感病毒的疫苗要十多年之后才被研发出来，根本对当时的预防无任何助益。反而澳洲因为严格执行传统的海港检疫而受害较浅。可以说，在实验室研究细菌与病毒成为预防医学的主流之后，20 世纪初的西方公卫体系仍在适应新方法 with 疫情。这个让全世界丧失 2000 万至 5000 万人口的疫灾促使公卫体制进一步现代化，这个发展在美国尤其明显。

四、清末以来中国的防疫与卫生工作

相对于欧洲自 18 世纪以来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国近代公卫与防疫的发展无疑是被动的、举步维艰的。首先，公共卫生制度的主要推动力量，并非来自对改善卫生

环境的要求，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之际，对维护国家主权的坚持。自 1860 年代以后，外国人为了防止世界性流行的霍乱，纷纷在上海、厦门、汕头等海港成立检疫站、订立检疫条例，并由外国人执行。

1894 年香港爆发鼠疫之后，外国人主导的防疫措施更是严格执行。清政府深感主权被剥夺之苦，在庚子乱后推动“新政”时，公共卫生制度的建设逐成为重点之一，为的是保卫国家尊严与取回主权。1902 年天津发生霍乱，外国人极为恐慌，并向清政府明确表示，如果要取回天津主权，清廷必须将公共卫生现代化。这就是当时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成立第一个中国主导的卫生机构“北洋卫生局”的背景。这个机构以德、日的卫生警察制度作为蓝本，监督城市内的公共卫生设施，并负责奉天省各海港与铁路的检疫工作、管理医师与药师药品、医院等，俨然一现代卫生行政官僚体制。从 1902 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为止这 10 年间，清政府的确企图成立全国性的卫生体系，以北洋卫生局作为起点，希望全国各地模仿成立类似的制度。但是无论在行政基础方面、专业知识方面、资源配合方面，当时的中国实在没有条件在短短 10 年内建立庞大繁复的体系。

清政府在失去政权前夕在公卫方面最后一击是对东北鼠疫的对抗。1910 年冬东北的鼠疫情势日渐严峻，鼠疫随着工人返乡过年的途径流窜。外务部派留英的马来亚华侨伍连德医生至哈尔滨指挥防疫事宜。伍于 1910 年 12 月底到达，次年元月策划整套防疫计划，用军、警力量将地方分区管治、检疫，利用学校及其他空置房

屋作为隔离病人之用。同时禁止所有大型公众活动。每区设有隔离站，替人量体温把脉。同时所有交通工具均受检、城内的巡警亦需负责逐家检疫的工作，这一切都以西式防疫方式进行。当时伍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尸体埋葬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今的疫灾中均最令人伤神。当死亡率达到高峰时，虽然尸体已不棺而葬，但竟一度超过六星期没有任何埋葬的行动，堆积尸体长达一里多，这当然不是由于缺乏棺木，而是严冬冰硬的土地难以挖掘，根本无法下葬。伍为了尽速解决问题，要求朝廷发飭令，允许集体火葬。他已顾不得此举违反汉人的下葬传统，而清廷也完全配合他的要求，让尸体堆积的问题确及时得到解决。就这样，伍连德成功地运用国家的公权力来强力执行不受欢迎的紧急政策，达到防疫的目的。

不过，虽然此役得伍连德的专业修养、魄力及清廷的充分配合，但是由于医生、警力与经费的短缺，仍有不少无辜丧命者，包括被误诊而死在隔离站的人，死亡人数也至少达 6 万。

东北的鼠疫过后，伍连德的声望达到高峰，他不但在 1911 年 4 月在沈阳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被各国代表选为会长，同时他也成为随后成立的“北满鼠疫防疫处”的处长，专门负责鼠疫与霍乱的防止工作。半年后，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政权，但伍连德的工作却并不因此而终止。民国以后，他仍出任防疫处，直至 1931 年日本人占领东北为止。他并且在东北建立了几间鼠疫隔离医院。不过，民国期间他的防疫经验

处处显示西式防疫法在中国社会生根的困难。1917-1918 年陕西发生鼠疫（当时亦有专家认为此疫其实使肺炎而非单纯鼠疫，即当时流行全世界的感冒大疫），伍连德奋不顾身投入现场指挥抗疫的工作。

大概他认为工作应类似六年前的经验，但是他很快发现当地并无统一的指挥中心、前往关注的官员来自各不同单位，各有看法与计划。中央的卫生官员多无足够的专业训练，又不接受伍的意见，而地方上的人甚至为了反对防疫，企图放火杀害防疫人员。伍这次挫败的防疫经验显示民国以后，比前清更弱勢的中央无力推动有效的防疫政策。

疫后，北京虽在 1919 年成立中央防疫处，但是其实虽有作为。要等到南京政府成立后的 1930 年代才有较积极的全国性政策。1932 年国民政府完全收回各海港的检疫权，结束检疫由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这个设在上海的“全国海港检疫处”同样由伍连德主持，当时他刚因日本之占领东北而卸下“北满鼠疫防疫处”处长一职。当然，不久，这个新成立的全国性制度也因日进一步侵华而终止。

从清末到南京政府时期，伍连德无疑是中国近代防疫的主要角色，他亦以“鼠疫战士”（plague fighter）自居，立志将现代化的卫生防疫方法带入中国。这位西化医生的专业知识与对防疫的投入，是毋庸置疑。从他的自述中，可看出他较单纯地以抗疫为目标，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考虑。但其他人是如何看待他的防疫工作呢？当时也曾受西方医学教育的史学家陈垣是以这样的态度肯定伍在东北的贡献：

“东三省之役，我当轴者受日俄之迫挟，以为是轻视各国人民之生命，我不实力，彼将越俎而谋之。我当轴者始怒然惧，急草检疫制度，遣议赴奉，收复主权。京汉铁路至兼用女医检疫。大功告成，监过赐见，中国臣民且随外人一而俱免拜跪……然是役苟非伍君之资望，则亦不足以摄服众宾，其不假手他人，主权旁落者几希。”换言之，就算对有识之士如陈垣而言，此次鼠疫的教训，并非防疫工作应如何进行，而是主权不能被侵犯的问题。而伍的功劳首在保卫了中国的主权，真正的防疫功绩尚在其次。之前，陈垣在讨论中国应否参加1910年的“万国卫生会”时，也曾作以下考虑：“吾国独不在万国中耶？人不与我入会，抑我不入人会耶？……盖一入会，则人将干涉我之不卫生矣。虽然，宁可受干涉，不可不入也。未识吾政府知有此会乎？”可见当时关心国事的知识人，对卫生问题的看法，充满矛盾、焦虑与不安。在政治问题、爱国情绪与卫生事业之间，无所适从、不知取舍。

至于一般百姓，对新兴卫生政策的怀疑更不在话下，并且纯粹从个人日常经验出发。陈垣以讽刺的口吻举出清末人几种抵制卫生政策的普遍态度：“某屋某人好洁甚，亦不免于疫，某屋某人不洁甚，亦不见其死，卫生之说伪也，此又一等。从前无人言卫生学，未见人种绝，今日人人言卫生学，未见病疫绝，此又一等。年稍大者曰：卫什么生，我几十岁，何物不食，何水不饮，亦未曾死去。凡此皆抵制卫生之说者也。”虽然，

中国近代社会对卫生政策的原则与需求，没有太大的了解与共识。

中国近代公卫制度发展的经验，相对于西方社会从18世纪以来以整合各专业为基础、从上到下贯彻全国的发展过程，实在有太多不同之处。或许中国近代独特的历史处境、社会对健康问题的不同期待使得华人社会在落实公共卫生或防疫制度时，总无法完全专注于专业层面。

五、结论：为何中国社会仍重医疗、轻卫生

今天大家对SARS的防治有一普遍的批评，就是重治疗，轻卫生、预防。其实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问题的话，比较容易得到启示。治疗是面对疾病最直接了当的解决方式，中国医学传统也有一强壮的传统，从不需要其他方面的支援，对一些疾病的疗法，传统中医也有极辉煌的历史。然而健全的预防、卫生制度的必要条件就复杂得多，需要跨专业、部门的精密合作，以及自律性极高的人民，缺一不可。它需要高度发展的行政科学、行为科学及自然科学的配合，近代西方公卫制度是一个特殊时空下的产品：主权国族体制的建立、各种现代科学专业的形成、现代工业化的茁壮所带来的财富、启蒙思想下的开明专制理想。这些条件的巧妙配合让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得以实现。与其说中国社会做不到是一种羞耻，不如说欧洲在19世纪成功地发展出来的坚实基础是一项奇迹。

要移植一朵基因复杂的花朵到完全不同的土壤来的时候，如草草率行事，这花不是迅速枯萎，就是长成了变种的花，不

符合原来的期待。除非种植者花更多的心思去研究、改变土壤的成分，甚至改变花的基因，让它更茁壮美丽地长在新的土壤中。这些都需要极大的智慧与坚持，甚至需要一些好运气。

1911年汕头绅商为了应付他们高度顾虑的西式防鼠疫措施，自行设立鼠疫防疫会，此会的重点是免费提供血清注射。就是以单纯治疗的方式对付鼠疫。其章程

之一这样说：“文明国对于防疫，皆为法律所规定，医士得按法疗治之职权。我国人民知识未广，甚难强行，惟有听人自便。”商会的反应是典型的，灵活、机动而带有理性，这个反应无疑在传统中找到养分（传统的施药不外如是）。对于抽象而强制性的防疫制度他们则充满疑虑与不信任。今天的我们与百年前的华人相比，有多少改变？

吕植 | 代价沉重的进步：对野生动物保护修法的建言



吕植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曾担任“文研讲座”主讲人，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决定，明确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受文研院邀请，吕植教授及其团队（史湘莹、肖凌云、赵翔）撰文，对如何借助这一修订，推动检疫系统完善、信息公开与公民参与，做了进一步阐述。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给整个中国带来了一个特殊的春节，并波及到世界。病毒源于蝙蝠，虽然中间宿主还不完全确定，但已有研究都直指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特别是脏乱的市场，诸多野生动物活体在不自然的状态下聚集在一起，为病毒变异和跨物种感染提供了温床。公共安全与野生动物直接挂钩，让“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的口号有了真实的

切肤之痛。“病毒猎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利普金表示，希望中国永久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否则十年后病毒可能再次来袭。而从十七年前的SARS到今天的新冠病毒，暴露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现有法律政策和执行监管中存在漏洞，亟待修订和完善。

在1月20日疫情公开发布后，十九位院士学者在1月22日呼吁全国人大紧急修

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禁止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贸易，从源头控制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此后的一项公众意愿调查表明，在近十万被调查者中，赞成全面禁止吃野味和野生动物贸易的都在95%以上。

公众之所以有如此高涨的意愿，与疫情造成了巨大的健康与生命损失直接相关。一个多月来，每天的疫情一个个跳动的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和我们同样的人和家庭，这让全社会陷入巨大的伤痛之中。不仅如此，“战疫”还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代价。据估计，光春节7天，餐饮、旅游和影视业的损失就在一万亿元左右，服务业整体受到冲击，生产短时间无法恢复，波及全球的产品供应。很多人估计，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高于SARS。

科学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例如亨德拉、尼帕病毒，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等，都和动物有关。统计发现有超过70%的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与宿主野生动物长期协同演化，达成平衡，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到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加之交通的便利和人口的流动，使得流行病爆发的几率大大增加。

许多人称此次疫情爆发的事件是“灰犀牛”——远看似乎没有威胁，而当它一旦被触怒、向你奔袭而来时，能够逃脱的几率微乎其微。用这个概念来比喻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对人类的潜在风险最恰当不过。非典时期，对野生动物食用和交易的

禁令也曾如这个月这样猛烈，然而半年一年过去之后，“好了伤疤忘了疼”，风险又被监管者和从业者所忽视，没有从根本上杜绝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和消费。因此，疫情的再次爆发有其必然之处。所幸的是，这一次，人大做出了快速和积极的反应。就在昨天（2月24号），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并决定由全国人大立即启动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的工作。

那么，《野生动物保护法》究竟有什么问题，应该如何修订？

一、改变理念

《野生动物保护法》应以保护为目的，并纳入公共安全的考虑。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色彩。《野生动物保护法》最早发布于1988年，当时的立法目的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方针是“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动物和木材、矿产一样被视为可利用资源，保护就是为了利用。在2016年该法修订时，对目的和原则做了相应改变，分别为“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正在全社会逐渐形成共识，成为这个时代新的价值观；并且通过SARS和此次新冠病毒的爆发使更多人认识到野生

动物与公共安全的关系，因此建议此次修法将目的和原则分别修改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和“严格保护，规范管理，有效监督”。

二、明确定义、扩大保护范围

对野生动物的定义，建议采用人们通常理解的概念，即生活在自然和人工环境中、未曾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只对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即三有动物）进行规定和保护。也就是说，该法只保护了濒危物种和三有动物，不规范其他一般动物，包括蝙蝠、旱獭等具有潜在公共健康风险的物种，其捕杀、交易和利用基本不受任何约束。这是法律的漏洞之一。

出于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保护的考虑，建议将该法的规定范围改为所有野生动物，除了非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适用《渔业法》等其他法律的规定；对农业、林业、公共卫生有影响的陆生野生无脊椎动物，适用《农业法》、《森林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的规定；作为特种繁育陆生野生动物可商业利用的人工繁育种群列入《特种繁育动物名录》（见下文），适用《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规定。

这样的安排，既扩大了保护范围，填补监管漏洞，又回答了公众担心的“野生鱼能不能吃”，“苍蝇蚊子是否保护”等问题，同时厘清野保法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约束对象的分工与衔接。

与此同时，建议尽快修订自1988年以来未曾更新的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让不少已经濒危的物种得到应有的保护；取消“三有动物”，将其与之前未保护的动物一起列为“一般保护动物”。

三、禁止野生动物的食用和贸易

这也是此次修法人们最受关注的一点。首先让我们梳理一下目前《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动物的贸易和食用是如何规定的。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虑，我们着重分析了陆生脊椎动物的合法利用路径。

由此看出，只要有行政许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可以进入市场进行商业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需要人工繁育二代以后进行商业利用，除医药（可直接利用野生的）外；所有野生动物都可以进入市场进行食用，除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无论野生还是驯养繁殖的）；所有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都要求检疫证明。野生动物利用的行政许可、检疫和销售营业执照分属林草部门、农村农业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结论是，贸易和食用的口子开得很大，难以控制公共卫生风险。

而且，这个体系设计得如此庞杂难以完整操作，无怪乎各地和部门由于行政和执法人员人力不足，能力欠缺，加之各部门职责不清，监督和执法不严就成了常态。违法成本低，导致大量无证经营、经营内容与许可不符，没有检疫证明以及利用合法的驯养繁殖许可掩护野外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非法贸易的“洗白”等行为，已成为多年的沉痾。



吕植教授在文研讲座上做主题发言

改变应该先从禁止食用做起。食用野生动物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维持生存的必需而多是奢侈消费，这从网上披露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大众畜牧餐厅”的价目表上就可以看出。面对吃所带来的巨大健康风险，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重建的今天，我们不仅应该从伦理上做出取舍选择，而且有必要受到法律的规范。我们的建议是，把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不得进入食品市场的规定，扩展到所有受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野生动物。

问题来了：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算什么呢？

四、建立驯养繁殖动物白名单

由于之前《野生动物保护法》对利用的鼓励，以及地方和部门产业及扶贫等政策的支持，我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商业为目的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利用产业，并且较少考虑疫病的风险。2003年8月，

在SARS疫情消除不久，国家林业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卫生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等12个部门即联合发布了《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单》，包括果子狸等54种动物。近年来驯养繁殖的经营者不断增多，据统计，2004年时约有16000家。而在今年1月22日-2月8日，国家林草局应对疫情的紧急执法活动就检查了各省共70216处人工繁育场所。这个庞大的产业，也是今天禁食野生动物面临的巨大困难之一。

这些经营的动物中，有一些繁育技术成熟、健康风险可控、拥有大规模可持续繁育种群且无需从野外捕获野生个体的动物。对于这样的繁育动物种群，我们建议建立《特种繁育动物名录》，即白名单，允许繁育子二代以上的动物商业利用，进入市场。为了与野生动物区别，可以将这些动物定义为“特种繁育动物”，按照家禽家畜的标准，由农业部门进行管理。

白名单以外的其他所有野生动物，则规定不可以商业化繁育，只能用于科研、保护等小规模繁育，以防洗白。同时保护白名单上合法养殖户的利益。驯养繁殖一直以来因为一部分人存在以野捕代替养殖的非法行为受到保护人士的诟病，究其原因还是执法不力，违法成本太低。因此要从制度上降低执法的难度，提高违法的成本。例如，白名单的制定需要严格的标准和流程。

首先，白名单应满足下列要求：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健

康，圈养种群可持续、规模化，且无需从野外补充种源；有适于该物种的合法检疫标准，且经科学评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低；建立物种系谱、繁育档案和个体数据。特种繁育动物个体使用植入型芯片进行个体标识，并保留组织样品两年，供DNA抽样检查。保证谱系明确保证可追溯；从养殖到利用的全过程做到信息公开，便于国家相关部门执法监督，以及公众监督。

此外，除了动物白名单，对有能力和技术，符合操作规范的企业和养殖户也可设置白名单。这些进入白名单的企业与养殖户及其养殖动物的相关情况和行政许可同样应做到信息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一旦发现违法行为，应考虑撤销许可。

明确了以上内容，凡是市场上出现野生动物的贸易和消费就成为非法，消费者也应同样以违法论处，这将大大减轻执法的难度，提高执法效率和力度。

列入白名单特种繁育动物可不可以吃呢？这取决于检疫的可行性。

五、检疫是瓶颈

尽管允许进入市场的动物简化为白名单上有限的驯养繁殖动物，大大减轻了检疫的工作量，检疫仍然是一个瓶颈。除了地方兽医站人员和技术能力的缺乏外，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对大多数生物物种及其在不同食物和环境条件下的流行病研究，无法建立针对该物种的检疫规程和标准，因此目前进入市场的大部分野生动物，包括蛇类、竹鼠，都无法进行防疫检疫，即便是养殖成功多年的养鹿业，也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全链条完善的检疫规范体系。

按照《动物检疫法》第四十二条和四十七条规定，驯养繁殖的动物从野外种源的捕获、到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各个环节都应有合格的检疫，而《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则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肉类。如果以这两个法律的要求作为进入白名单的红线，能够满足要求的动物寥寥无几。经调查，主管农业农村部目前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10种陆生动物以及鱼类、贝类、甲类3种水生生物种的《产地检疫规程》，并没有出台专门适用于野生动物产业全链条的检疫标准，如果检疫也只能“借用”上述家禽家畜检疫标准的方式，不能做到对公共卫生风险的精准防范。

没有标准的原因很多，包括研究不够没有足够的依据，而要为检疫标准做系统性的研究成本太高，野生动物养殖涉及到至少100多个物种，成本就更高。所以短期内绝大多数野生生物种很难做到合格检疫。但是，检疫是一条红线，不能逾越。在批准白名单的时候，相关物种具备检疫标准应该是一个前置条件，各地的主管部门在批准养殖许可的时候一定要弄明白检疫标准是否可以达到，否则对养殖户和企业可能造成误导，带来财产损失的风险。

如果真正做到繁育动物对人类的健康风险可控，除了繁育技术的成功外，还需要加强对野生动物疾病的而研究——深入了解物种在野生和圈养条件下的疾病和携带病原、以及人畜共患病和新型疫病的风险，据此建立一套针对该物种在饲养和经营不同环节的防疫检疫标准和规程，有了

检疫的保障方可进行繁育进入市场。这是一套成本不低的操作。究竟应该谁来支付是一个难题。无论如何，针对野生动物的防疫检疫管理办法应该尽快出台。

六、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行业的思考

然而，目前禁食野生动物在眼下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难题是，合法养殖了用于食用但没有检疫标准的动物，该怎么办？特别是近年来有一批贫困地区获得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开展养殖的农户，会受到禁食的大力冲击。诚然，禁食野生动物出于公共利益，人人有责，但是让一些弱勢的群体为此承担更大的代价，有失公允。禁食的举措与1998年天然林停伐的情景非常类似，在措施上，是否也可以考虑采取类似的做法，由国家财政，包括扶贫部门，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从业者，特别是有可能返贫的农户，

进行转型支持或补偿？同时，也呼吁支持禁食的社会团体，也加入支持贫困养殖户转型的行列。

无论是禁止野生动物食用和贸易，还是建立特种养殖动物白名单制，亦或是依法依规进行检疫，此次修法将无疑会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消费行为，降低野生动物的消费需求。而疫情本身已经引发了相当一部分人改变自己消费行为的意愿。在刚刚进行的公众调查中看到，绝大多数消费过野生动物的人表示以后不再消费野生动物。这与生态文明的倡导、全社会环境意识的提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是一致的。因此，可以预期野生动物消费市场的逐渐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行业的萎缩估计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由国家还是由社会，多管齐下支持合法养殖户的平稳转型，于社会和生态而言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同时也是保障禁食野生动物的规定能有效实施的关键之一。



旱獭与藏狐（摄影：鲍永清）

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经过2003年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两场疫情，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野生动物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相关部门和少数从业人员的小众事件，而是涉及到全国14亿人甚至对全球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社会事项。因此，公众理应对野生动物的相关信息，特别是管理和执法的信息享有知情权。

管理不到位、执法不力是目前社会和野生动物主管和执法部门的普遍的抱怨。除了人力和经费缺乏、权限有限、权责不清这些客观因素——这的确是应该予以大力支持的，此外，其中是否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甚至知法犯法？信息公开将有助于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对此，国家已有成例可做参考。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就对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做了详细规定，并设立专门的条例保障公众参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值得借鉴。一旦信息被公开披露，这些保护部门接受的就不仅仅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小范围监督，而是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如此一是将对政府和部门形成依法行政和积极作为的源动力，二是将在相当程度上减轻政府执法人员的工作负担，提升执法效率。

随着公众社会意识的不断加强，现已涌现出了一批野生动物保护的热心人士和志愿者，活跃在野生动物保护的前线，发现和举报违法现象，协助和监督执法。事实证明，这些志愿者的提高了会发机构的行政效率，如果有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进一步保障社会公众和相关公益组织参与的权利，无疑会协助政府实行

更加高效的公共治理、野生动物保护和公共安全维护。

法律具有规范和引导的作用，其最终的目的，是逐步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改变人们对野生动物只是“肉可食，皮可用，骨可入药”的狭隘理解。此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重建对自然的敬畏，维护人与自然之间、人与野生动物及其病原体之间的生态平衡，最终为的是人类生存的安全和长久利益。

对此，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后记

本文写于人大决定出台之前。在人大决定中，对禁食和可食做了如下规定：

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

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属于家畜家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并公布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其中“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动物”与前文所说的白名单类似。本文所提及的一些考虑和问题，可供今后的修法和实施参考。

2020年2月26日



【编者按】

在对本次疫情的反思中，国内外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2020年3月10日，文研院以“从医疗社会史的视角看瘟疫”为主题，发布由余新忠、范家伟与陈昊三位历史学者撰写的笔谈，梳理疫病研究里带有丰富跨学科维度的前沿问题，对传统中国疫病和防疫观念加以再认识，并透过“有害动物”的谱系窥见人与环境和自然的关系变迁。多维度的反思，带给我们新鲜的视角与启迪。

余新忠 | 瘟疫的历史意义与疫病史的现实价值

余新忠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史研究。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以“微寄生”和“巨寄生”两个概念来认识人类生命的生存状态，认为“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由致病微生物引发的瘟疫，无疑是人类所处的微寄生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藉由微寄生乃至疫病，人类与自然的勾连变得更加的细密而深广。不仅如此，在作为展现人与国家关系的巨寄生体系中，瘟疫的影响也从未缺席，不仅自古就与饥荒、战争一道成为影响人类规模扩张的三大敌人，而且也因此成为了影响人类文明机制和历史

进程的重要的自然性力量。由是观之，在人类的历史上，瘟疫实际上站在了人与自然、个人和社会与国家等诸多关系的链接点上。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灾难，但也往往是历史的推手。处于诸多链接点上的瘟疫，在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诸多伤害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警示。显然，瘟疫作为一种无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但非全然的是负面，实际上，很多人类科技进步、生活设施的改进、制度建设乃至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等等，都与瘟疫的刺激有直接的关系。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瘟疫本身并不会独立产生意义，其对历史推动作用发挥，



余新忠教授

无疑有赖人类的理性和反省批评精神。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在在显示，瘟疫不只是天灾，也是人祸，天灾或不可控，人祸总应努力避免。而要避免重蹈覆辙，反省和批判无疑是最好的武器。而对反省和批评来说，若不能立足历史来展开，必然就会缺乏深度和力度。由是观之，包括瘟疫史在内疾病史研究，无论对于我们认识历史还是理解现实，以及更好地面向未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研究的目的，显然不是站在今日的立场上，俯瞰式简单评判过往的人与事，而需要我们首先进入历史的情境，理清历史演进的脉络，理解其演进背后的逻辑，然后再“抚今忆昔”，思考从中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同时，似乎也很难指望从历史中得到某种直接的行动指南，哲学家陈来教授曾反思在SARS事件时指出：“人文学科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的意义，本来也不在于对于某种突发的自然灾害提供直接的对策，而在于在学术研究的同时，长远

地促进社会的进步、价值的稳定、文化的发展、精神的提升。”故而，从历史的梳理和讨论中，我们可以获得的，可能主要是通过拓展视野、转换立场，以及发现丰富多元的信息、人类智慧复杂的表达和人类核心价值的共通性来启迪我们的思维。于此，我们不妨从对中国历史上的疫病应对入手，看看通过梳理这一段历史，究竟可以从中得到怎样的历史启示。

如果我们从瘟疫及其应对的一些具体方面入手，可能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

第一，历史上瘟疫流行轨迹显示，疫情分布与人们通常的想像正好相反，人口越多，社会经济越发达，瘟疫也就越多。这充分表明，对瘟疫来说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在我们疫病防治必须充分考虑到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和现代医学应对疫病的有限性，若现代医学水平和卫生防疫措施不能及时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现代化带给人类极有可能不是福祇，而是灾难。

第二，我们通过对各此疫情后果的探析，表明瘟疫对中国社会的直接破坏和影响，似乎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么大。相对于那些直接表面的影响，瘟疫在人们心态和风俗信仰方面相对隐性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和关键。这种影响对社会历史的作用虽不像人口死亡、政权更替、经济衰退那样直接和明显，却是非常深远和重要的。这也就是说，就是在近世中国，瘟疫的实际的破坏力并不见得如人们一般想像的那样大，其更重要的影响可能在于给人们带来的莫名恐怖和信心流失，以及对人们心灵的强烈震撼，也就是疫病引发的社会恐

慌。这一认识，在2003年的SARS和当前的新冠肺炎流行的社会反应中已得到极好地印证。如果能民众充分了解这一点，对无疑会大大有助于社会和民众心态的稳定。在瘟疫面前，如何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尽量地缓解和消弭民众的恐惧心理，当为政府首先必须面对的大事。不仅如此，其还进一步暗示，瘟疫决不仅仅是疾病和医学问题，而是关涉方方面面的社会政治问题，对突发性疫病的防治，完善的社会机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比单纯的医疗更重要。

第三，古代特别明清以来，社会力量在疫病应对中发挥着非常积极正面的意义，这充分显示了社会力量在瘟疫的防治拥有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充分发挥地方社会力量能动性的前提下，建立国家主导的现代卫生防疫机制的重要性。这一认识，我想对今天我们国家行政卫生体制乃至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也都应该不无参考价值。

第四，应历史和人文地认识传统时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观念，不仅要看到其在历史上的意义，同时还可以启示我们疫病和防疫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性。古代关于疫病的成因，大体有两套认知系统，一是

疫气致疫，二是鬼神司疫。疫气致疫认识是中国传统医学在长期应对瘟疫中产生的重要成就，虽然中医并不具备整体的疫病防控能力，不过历史地看，其在救治个体病人、维护民众正气平衡等方面的意义，不容忽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社会何以没有发生对社会造成结构性影响的瘟疫。鬼神司疫是一种文化观念，认为瘟疫由鬼神来掌控，其发生乃是因为“乖违天和”、“人事错乱”或“道德失修”等。在今人看来，这样的观念无疑可以归入“封建迷信”之列，但若将其置于历史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应该看到，它们对于当时社会的瘟疫应对其实颇有意义。一方面，这样的观念对于疫情中心人的稳定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多有助益；另一方面众多流传广泛的鬼神故事，实际上包含着不少合理的防疫内涵，比如清代流传疫鬼一般无法破空而行，进入疫区，要立于空旷之地，避免接触物件的说法，霍乱流行期间，关于疫鬼船队从水城门入城的传言，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实际防疫效果。指出这一点，绝不是要宣传“封建迷信”，而是认为，它可以启示我们，疫病本身并非纯粹的生理现象，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建构，疫情也不只是自然现象，而是与文化观念、人伦道德等社会文化因素等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故而，疫情的应对，仅仅依靠科学和医疗，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结合社会人文力量综合地开展。

这样的省思自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来认识中国传统疫病应对特点，并就此出发了思考其内在逻辑及其历史启示，恐怕还是会让我们省思显得片段而缺乏内在的力量。故此，近日，笔者试图在以

上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把握中国传统应对的特征和逻辑出发来思索其历史启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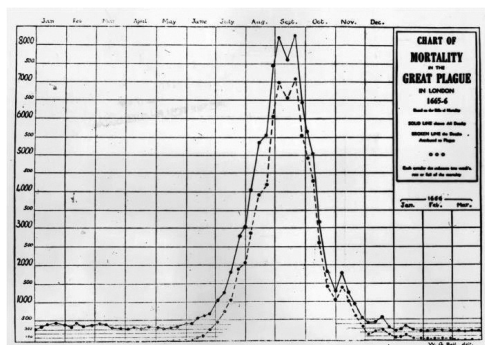
就笔者的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疫病应对整体上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国家虽然不能说对瘟疫的救治缺乏关注，但始终未能像对其他灾害的预防（备荒）和赈济那样，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性规定，甚至可以说没有制度性的规定，而主要由民间社会力量开展疫病的救治。二是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疫病应对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基本都表现为零散而片段的知识，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故而未能发展出一套体系性的疫病救治知识。三是针对疫病防治的关键环节检疫隔离，虽然出于直观的感知和本能反应以及某些特定的目的，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大量了躲避、隔离乃至检疫的行为和事例，但这样的做法，不仅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和思想的鼓励和支持，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发展，反而深受反对和抑制。

从中，笔者感到，至少有两个从中反映出来的现象值得关注和省思。其一，在传统时期的疫病应对中，整体上，社会力量表现得相对更为活跃，国家虽然也有所作为，但并没有从制度建设上担负起其责任，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很难说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绩。其二，当时的社会，不仅整体上缺乏一种积极的力量，去推动社会总结乃至提升疫病防治的知识和举措，而且在关键性的疫病传染这一议题上，还形成了对防控传染相当强烈的阻碍和反动力量。以上现象的产生，无疑很多具体而可以理解的历史缘由，于此不论，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还在于国家缺乏对于

瘟疫救治的真正重视。然而，历代王朝一向标榜“爱民如子”，而且也往往多会在各种文书特别是赈济灾荒的诏令中表达统治者的“恻隐在抱”“民胞物与”之仁心，瘟疫伤害的可直接是“子民”的生命与健康，何以会缺乏真正的重视呢？这就涉及这些现象背后的统治理念和疫病应对内在逻辑问题了。

国家对瘟疫的救治之所以缺乏制度性的建设，除了技术上存在巨大的困难这一原因外，也与瘟疫的特殊性有关，即很少会因为瘟疫引发社会动乱，对其统治秩序造成直接的影响。由此充分说明，古代王朝虽然常常以“仁政”“爱民”相标榜，但其施政的真正出发点还是江山的稳固，只要对民众生命的危害并不会对江山的稳固造成严重的危机，即使危害严重，也难以成为施政的重点。所以就此而论，所谓的“爱民”不过是“爱江山”的托词。可见，在传统的统治理念中，个体其实只是追求整体社会安定的道具，生命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性。在这样的统治理念之下，国家在应对瘟疫时，真正关心的显然不是民众的生命与健康，而是如何将灾害或危机尽可能地转换为展现其仁政爱民和统治合法性的契机。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在面对实际统一救治存在巨大技术困难而又不会对自己的统治秩序造成严重危害的瘟疫时，自然只要表明统治者的关心就足够了。而一旦发现社会对瘟疫直观认知和反应有违关系国家根本的伦理道德时，自然就会予以谴责和抑制。

近代以降，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催生了“生命政治”的诞生，新的统



1665-1666 伦敦大瘟疫死亡人数统计图

治权利从原来的“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逐步转变为“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利”。而这种新的“生命政治”因为负有对民众生命和健康等的责任而推动了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让政权获得干预生命的合法权利。而中国在近代引入和创建现代卫生防疫机制时，限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并未能有很好地去清理传统时期疫病防治的遗产，而是颇为自然地延续了传统国家救治疫病的逻辑，未能比较好地体认卫生防疫本身的维护个体生命的权利的价值和意义，使得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依然

具有强烈的政治的意涵和色彩。

这就提醒我们，如果不能汲取近代的教训，对传统疫病应对的遗产做出必要的省思和清理，多一些对这套机制背后隐涵的个体生命和健康本身价值和权利的尊重等方面，那么，历史的覆辙恐怕还会不时困扰我们。反之，只要我们能“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回归卫生的本义，以多元协同的思路更专业地开展卫生防疫，那当下的灾难自然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历史推手”。

范家伟 | 疫情省思与医疗社会史研究

范家伟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中国医学史与中国中古史。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下，各方专家正努力寻求解救之道。历史学者回顾历史上疫情研究，或会提供一些省思。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名著 *Plagues and Peoples*（《瘟疫与人》）从疾病角度探讨世界历史演变。往后，关注疾病对人类历史影响的著作，陆续译成中文，成为畅销科普读物，多不胜数。疾病（尤其传染病）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和影响，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学术成果，为中国史研究开创新课题和方法，诸如梁其姿、

曹树基、胡成、林富士、余新忠、李玉尚、范燕秋、Carol Benedict 等学者研究。

在未有治疗药物出现前，防止自己受到感染，是至为重要的。有关防疫史研究，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是开风气之作，此书出版于1953年，仔细地论述中国古代防疫方法及其思想。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是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为了重新认识中国古代防疫的历史经验而写的，是最重要的防疫史著



范家伟副教授

作。此书不仅按年代分述瘟疫流行情况、防疫医学思想和举措。此书其中一个重点是分析中共建国以来防疫工作及其成就，并对非典疫情防控的回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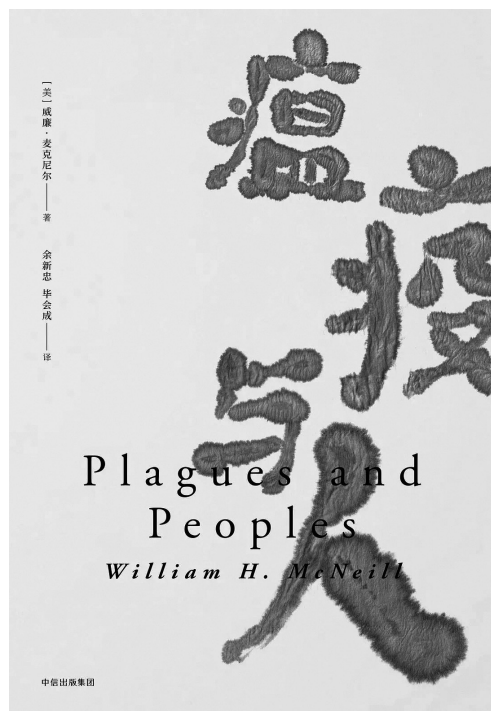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上重要传染病，诸如天花、麻风、鼠疫，都是学者关注课题，有很多突出研究成果（参见林富士，〈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疾病的历史》，台北：联经，2011，页7-21）。建国以后传染病及其防治史，是尚未开拓的领域，还有许多课题和史料等待发掘。建国以后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是一场持续既久，规模极大的防疫运动，研究成果最多。（英文研究成果可参 Gross Miriam,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参考书目所列；中文分别则有王小军、施亚利、万振凡专著）。此外，1966年至1967年，全国红卫兵进行大串联，引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播之快，流

行之广，与新冠肺炎不遑多让。当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停止乘搭交通工具、徒步进行串连。全国各地采取许多预防措施，当时全国物资缺乏，谈不上医疗系统支持抗疫，各地群众自制口罩，并限制人口流动。这次全国流脑爆发，损失人命众多，相关研究却很少（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页620-624）。相关传染病及其防治档案、文件分散各地方档案馆，学界仍未充分利用和研究。

今天在疫情肆虐下，能够对抗疫情，只能依靠科学和医学。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防疫史上的反传染思想。《晋书·庾袞传》、《隋书·辛公义传》为褒扬孝悌、忠义等思想而认为疫病不能传染。南宋程迥《医经本证书》、朱熹《漫记疫疾》都是当中表表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页91-100）。这种反传染思想在历史上带来多大影响？理学家、医者面对这种思想又如何反应？值得反思。

此外，宗教在这个时候，往往也发挥作用。先抛开迷信心理，人在无助时候，希望寻找到精神的慰藉。正如张仲景所形容“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伤寒杂病论·序〉）。东汉末年，疾疫流行，宗教兴起与疾疫流行关系，已有学者深入剖析（林富士，〈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载《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台北：联经，2008，页29-86）。然而，其他朝代疾疫爆发与宗教行为，除了救济之外，宗教思想会否有新的发展？新的教会会否由此出现？这些方面较才受到学者注视。

过去医学史研究，重视医学成就和突破，医学史就像是名医的历史。从病者角度出发的著作，仍然所占不多。人人都会生病，每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书影

个人一生之中不知成为病者多少次。医者与病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紧扣在一起。没有病者，医者失去提供服务的对象；没有医者，病者得不到治疗。在医学发展史中，医者与病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医者从事医学探究，最终目的都是使病者回复健康，挽救性命。若果没有病者，所有医疗技术、理论、临床经验，无从应用，失去可资凭借的对象。Roy Porter 提倡从病者的角度撰写医学历史(a patient-oriented history)的取向(Roy Porter, "The Patient's View: Do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elow," *Theory and Society*, 14 (1985), 175-198)。病者身体感受，所能接收信息，以及与同时代文化、宗教、思想、社会、生活环境等等关系，都是很难在医书中寻找得到的。许多时能够看

到的医案，都是医者的角度。病者的患病心态和恐惧、治疗行为、求医方式，以至患病时日常生活，很少在医书中提及。但是，病者与医者互相依存，没有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满的。当然，从病者角度讨论医疗社会史，也面对资料缺乏的问题。若果这方面能开拓一些新史料或新课题出来，相信能够丰富医疗社会史的内容。

最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随着《燕行录》等史料出版，出现许多崭新的课题和研究视野，也是一时显学，除了政治、文化、经济等外，疾病和传染病史能否也可以成为当中课题？韩使带来药物清心丸，据说有治疗疫病的功效（李春梅，〈《燕行录全集》中的医学史料研究〉，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陈明，〈医药反求之于东夷——朝天使与燕行使旅程中的医事交往〉，《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册，2013，页77-102。吴政纬，〈论朝鲜清心丸的流行与清代辽东社会〉，《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62期，2019，页49-96），然而《燕行录》之中有没有传染病史资料可供研究，有待学者开拓和进一步发掘。



陈昊 | 作为反派的动物？ ——重思疾疫和动物的历史

陈昊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医学和文化史研究。

进入21世纪，全世界遭遇了多次疾疫的流行，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禽流感、塞卡、埃博拉、拉沙热、尼帕，以及最近新冠肺炎。在这些疾疫的流行中，公众遭遇并记住了多种类型的病毒，同时也记住了各种作为病毒宿主和媒介的动物们，果子狸、骆驼、鸟类、食蟹猴、蝙蝠等等。圣安德鲁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和现代疾病史的研究者克里斯托斯·林泰里斯(Christos Lynteris)将这些动物称为疾疫流行叙述中的反派(epidemic villains)。(Christos Lynteris, "Introduction: Infectious Animals and Epidemic Blame", *Christos Lynteris ed., Framing Animals as Epidemic Villains: Histories Of Non-Human Disease Vector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1)当然，这样的故事并不是21世纪才开始发生，之前阿拉善黄鼠、跳蚤和鼠疫，蚊子与黄热病、疟疾，狗与狂犬病，钉螺与血吸虫病等等，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

而与这些故事相关，一个关于动物的知识范畴在不断变化，这就是有害的动物(vermin)。当然，有害动物的范畴不仅指向作为疾病携带者和传播者的动物，它更多指向动物与人类的食物争夺。根据玛丽·费塞尔(Mary Fissell)的研究，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有



陈昊老师

害的动物的主要特征是，它们会盗取人所需要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人们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努力培育或饲养出来的，在人们即将可以消费他们的劳动成果之前，狡猾的动物盗走了食物而大快朵颐。玛丽·费塞尔说，当时翠鸟、鹭、鹗和水獭都被视为有害的动物，这对现在的人是难以想象的(Mary Fissell, "Imagining Vermi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47, 1999, pp. 1-2)。而也正因为这些动物在与人类争夺食物，因此杀死它们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在这一观念背后，是几个世纪以来农业制度的变化，包括庄园

制度转变为封闭的私人耕作制度；牲畜和农作物的选择性育种；以及四种轮作制的引入（Jessica Secmezsoy-Urquhart, “The Troublesome Enemy: Vermin Agency in Pre-Modern Europe 1000-1800”, *Sloth: A Journal of Emerging Voice in Human-Animal Studies*, 3-2, 2017）。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个时代有害动物的观念与疾病无关，只是这种关系与现代观念颇有差异。如果我们以鼠疫为例回观疾疫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叙述。按照露辛达·科尔（Lucinda Cole）的看法，当时虽然有时候会提到动物是疾病的媒介，但却很少认为老鼠是传播瘟疫的动物。但是，老鼠和其他小动物在连接却在一种超自然的语境下将环境和疾病关联起来，一方面，它们被认为是腐败的生物，另一方面，蟾蜍、蝾螈和老鼠这样的生物被认为与巫术、恶魔有密切关系，在瘴气（miasma）的理论中，啮齿类动物也扮演了角色，它们需要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疾病负责（Lucinda Cole, *Imperfect Creatures: Vermin, Literature, and the Sciences of Life, 1550-175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 pp. 24-48）。这种观念随着西方殖民的进程，也将有害动物与东方联系起来。一位生活在17-18世纪的旅行作家约翰·奥文顿（John Ovington, 1653-1731）曾对印度的蜘蛛惊诧不已，他评论说，印度季风季节有害动物的大量繁衍，导致了空气的恶性腐败，而这对前来印度的欧洲人产生了可怕的影响（John Ovington, *A Voyage to Surat in the Year 1689*, edited by H.G. Rawlin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黑死病蔓延时期的医生形象

1929, p. 145)。在这里，动物被塑造为有害的过程，与它们生活的地域环境被塑造为危险的东方的过程密切相关，成为殖民性知识想象的对象。

老鼠和鼠疫传播之间关联的最终建立是在1894年，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被感染的寄主的血液中观察到到了鼠疫杆菌（*pasteurella pestis*，又称耶尔森菌氏 *Yersinia pestis*），并且分离出了跳蚤作为中间寄主的角色：当原有的寄主死于鼠疫后，吸了血的跳蚤找到另一个寄主，将疾病传播给它。这并非是一个个例，在19世纪后期细菌学的叙述中，动物并非被视为疾病的源头，但是动物在疾病的传播的

存在论和动力学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重大的概念性的转换（Christos Lynteris, “Introduction: Infectious Animals and Epidemic Blame”, p. 4）。与之相关，它也引导了一种治疗和防疫策略的变化，即，当无法有效的治疗或者对抗细菌时，我们可以杀死是作为寄主的动物以及改造相关的环境。这也改变了理解有害动物的基本知识基础，虽然它们依然可以被杀死，同时，它也将有害动物生活的环境转化为可以被改造的对象。

而在最近这样的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2014年至2016年非洲西部的埃博拉疫情中，公共卫生的关注点开始转向野味（bushmeat）的获取、屠宰和消费（J. Fairhead, “Understanding Social Resistance to the Ebola Response in the Forest Region of the Republic of Guinea: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9-3, 2016, pp. 7-31）。在这样一种知识论的转向中，表面上看，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不再被视为疾疫传播的罪魁祸首。克里斯托斯·林泰里斯却也担心可能会将热带丛林描述为一个原始而神秘的自然领域，一旦受到人类的侵扰就会释放大量致命的病毒（Christos Lynteris, “Introduction: Infectious Animals and Epidemic Blame”, p. 10）。这样的想象也有可能导致公众对于野生动物及其生活的生态环境的误解、恐惧乃至污名化，而进一步将人与动物所生物的环境割裂开，进而模糊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经济和政治下的极端生态错置，即，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生物被剥离出它的生态环境而在全球的贸易/非法贸易链

条下成为大规模人群聚集区的消费品。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曾在他对霍乱史的研究中，称历史中的霍乱是一种历史学家的“取样装置”，让我们可以研究构成经济生产力的各种有机关联的社会因素（Charles Rosenberg, *Cholera, 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 1825-186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在这里，疾疫的历史及其其中的病原体、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也会构成一种取样和反思的路径。让我们重思人类对于动物的认知是如何历史性建构起来的，从而帮我们理解当下我们与动物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意义（Erica Fudge, *Brutal Reasoning: Animals,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8）。



（三）海外来信

【编者按】

“海外来信”栏目依托多学科交流平台与全球学者网络，邀请身处海外的北大教师和相关学者为专栏撰文，提供他们在全球疫情下人与社会的在地观察，呈现他们对公共危机的思考。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多位学者从数字人文、科学史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灾难、疾病的成因与影响。多位北大教师和相关学者陆续为专栏撰文，记录访学生活，探讨疫情带来的挑战乃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此外，文研院也摘译了北大客座教授哈德曼关于抗疫生活的多篇日记，展现了巴西学者对疫情防控与人类团结的关怀。

杨治宜 | “绿林”疫影——危机时代的非常与日常

杨治宜为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及古典传统的现代转化，写作本文时正在柏林高等研究院任访问学者。

3月17日，下午一点，春阳慵暖地洒在落地窗外的绿草和湖水上。柏林瓦萝街（Wallotstrasse）19号的林德别墅（Villa Linde）底层餐厅里，高研院的访问学者们秩序井然地履行每天的仪式：共同用餐。微笑和低语像平静的浪花卷过静谧的知识之海。然而因为实行错峰就餐，加上几位身体不好的老学者主动自我隔离，和往常相比，

不但人数减少大半，而且原本的四、六人桌都改成了二人桌，桌与桌之间按照柏林市周日颁发的新规定严格保持一点五米距离。我知道，在席卷全球的病毒狂潮消退之前，这将是我在林德别墅的最后午餐了。这场天人之战正酣，没有药物和疫苗的武装、再次成为“裸体动物”的人类，惟有以退守为战斗。四点钟，我将乘高铁回法兰克福家中，坚壁

清野，切实履行“社交疏离”。

柏林高研院每年从全世界邀请大约四十位高级研究员，一般是已经在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的学者，以人文社科为主，另外每年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高级研究员的驻地时间一例十个月，即每年九月至次年六月。此外大概还有二十人左右的博士后，驻地时间长短不等，专长都是“生命科学”，即生物学和医学。本来，高研院的规定除了驻地工作生活外，只有两项：周一至周五每天一次聚餐（周四晚餐，其余午餐），以及周二的讲演会。也有不定期举办的下午、夜晚的讨论会，凭兴趣参加。因为以思想自由为宗旨，所以并没有任何对发表和科研成果的规定，每位驻院学者只需在学年内就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做一次讲演即可，“不成熟”的想法是最好的。因为听众来自各个领域，但又都是顶尖聪明、有各自知识背景和想法、善于提问的学者，因此必须深入浅出，这事实上是开拓思维、把问题讲透的极好训练。每次讲演会两小时，一小时讲座，一小时问答，而问答时间往往不够。据说这也是为什么理科学者仅限于生命科学的主要原因，因为和“精尖专门”的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相比，生命科学和人文社科学者比较容易对话。现在，经过一冬的黑暗，明媚的春天终于来到，学者之间也日益熟稔，正是可以结对遨游的时候，却迎来了这场世纪之疫。

默克尔总理的电视讲话，把这次疫情称为德国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这可能并不为过。莱比锡书展在开幕的前一周狼狈取消；足球比赛一个州一个州地相继取消；各种贸易展会、国际会议、文化活动都接二连三地取消了；原定在波士顿3月23日举行



杨治宜教授

的美国亚洲学会（AAS）年会取消；现在，就连东京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也要延期到明年。我们习以为常的计划、日程、集会，忽然显出其现代性的奢侈。疫情新闻，成了唯一的新闻。不断爆炸增长的数字、社交媒体上意大利医生和基层官员们的呼吁、淹没一切的灾难影像文字与声音……空空荡荡的高铁穿过阳光舞蹈的绿野。我打开随身带的书，恰是《周作人诗全编笺注》。知堂早年是新文化健将，五十生辰之后，忽然复古，自嘲为“打油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驰名汴京的李和儿炒栗，是和平时代的寻常物事。而对靖康乱后、接受了江山半壁的既定秩序、出使北廷的南宋使节而言，一颗李和儿的炒栗却用最切实的温度和香味勾起他们无限的故国悲思。微物寄寓的是“正常”的重量。我忽然仿佛有些明白，为什么知堂在日军压境、国土沦丧之际不愿

意离开北平八道湾的苦雨斋。越是面临无常与无情，人越不愿意放弃建立起来的日常秩序，且总不免有幸免的幻想。原本已经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钱钟书，最后也因为苦思上海的书斋，而回到沦陷区，退守“默存”，从而事实上接受占领和沦陷的秩序。我想，原因种种，但是对内心智识世界之秩序的依赖、对个人选择的自由权之固执，至少是他们成为“合作者”（collaborator）与“妥协者”（accommodator）的原因之一罢。至于道德的判断，不在历史现场的我，不愿意轻易仲裁，正如在柏林电影节品酒论英雄的德国人，恐怕也不曾想到两周后他们会去超市抢购厕纸吧。秩序的坍塌如此之快，资本和生命的对垒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明晰，所有被疫情危机挑战的社会都必须重新审视其价值观。“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s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都被褻渎了。人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真正的生活地位、他与同类的关系。”——《共产党宣言》）

我开玩笑把高研院所在 Grunewald 区译为“绿林”区，因其形近而义反。德文的“绿”是 grün，“林”是 Wald，所以就连德国人，不小心也会把 Grunewald 看成 Grönwald。而高等别墅区 Grunewald 的居民恰是“绿林好汉”的反面。高研院设在这里，和二战及战后的历史密不可分。话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开疆拓土之际，野心勃勃地要把柏林建设成新巴黎，因此建了条欲与香榭丽舍比肩的 Kurfürstendamm 大街，只有富人才有权沿街建房居住，这使得沿街的房产成了身份象征，全德国有权有势的都来争相斗富。大街尽头的这片无数湖水点缀的狩猎森林，因此别墅林立。林德别墅建于 1901 年，为林德家庭所有。1936 年，第三帝国柏林防空署从它当时的主人手里买下了这座房

子，用为总部。战后，四国分占柏林，这座别墅成了英国占领军的俱乐部和高级军官公寓。1978 年，英军把别墅交还给柏林参议院，条件是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因此两年后高研院成立。林德别墅附近高研院的房子还有三座，供访问学者及家人工作起居。这些建筑的历史都同样复杂。我所居住的华特别墅（Villa Walther）因其建筑师 Wilhelm Walther 得名。作为皇家建筑师的华特，担纲建造了附近不少豪华别墅，一位富有的俄国贵族因此请他建一座尤其气派的房子，作为自己的柏林落脚点。忽然一战爆发，随即革命勃兴，俄国贵族赖账不来，华特也因此破产。一个工厂主把房子买下，改造为公寓。纳粹时代，别墅成为第三帝国财政部的产业。在战争后期的柏林大轰炸中，六成被毁，直到 1980 年柏林市才把它修复成高研院的访问学者公寓。优雅精致的雅飞别墅（Villa Jaffé），里面有单人公寓、办公室、我们的德语课堂和电影俱乐部。它的第一任主人是 Edgar Jaffé，慕尼黑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克思·韦伯的朋友和同事。1919 年卖给了犹太实业家 Oskar Grün，后来归他的女儿和女婿 Georg Braun 所有。今天，别墅门前人行道上，有三块黄铜制成的踏脚石，上面有名字和生卒日期、地点。德国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房子原本的主人是犹太人，二战时被逐出。大多数此类纪念石上的人名，都死在集中营。“绿林”区的犹太人倒是大多“善终”在第三国：无他，死神从来不是公平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同样遵循资本的逻辑。Braun 一家 1939 年流亡到了上海，Georg 和他的太太都很快相继去世了，他们的儿子 Herbert 在上海做进出口生意，后来去了以

色列。这些被迫背井离乡的犹太精英，对德国有着复杂的情感。今年的一位驻地学者是以色列的宪法学家。他说来柏林高研院的最大动力是要学德语，因为这是他祖母的语言。他的祖母本是德国共产党，罗莎·卢森堡的战友，后来却嫁入豪门。他们在战前便流亡到了巴勒斯坦，但始终没有办法融入中东的沙漠。他祖母终其一生只会讲德文，苦苦思念着寒冷的柏林。她的多数家人都在战争中消失了。

这样历史复杂、用于文教的建筑，德国境内比比皆是。我所任职的法兰克福大学的主楼名为 IG Farben。这是因为它本是同名的公司总部。IG Farben 在全盛时代是全球最大化工企业。纳粹时代与帝国合作，使用犹太奴隶劳工；毒气室所用的“沙林毒气”也是它光荣提供的。然而战后，法兰克福被炸为废墟，唯独这栋淡黄色大理石盖成、扇面排开的雄伟大楼却幸免轰炸，屹立不倒。这是因为它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青眼，将在战后成为他的办公室。（说起来，我申请法兰克福教职时的试讲，就是在艾森豪威尔办公室，原样装潢、功能调换为讲演厅而已；但当时并不知道。）两德统一、美军撤退后，把这栋建筑交给黑森州，州政府送给法兰克福大学，成为人文学院的主楼，是以有了我们的“西区”（Westend）校园。校园绿地中心有一个小小的玻璃陈列室，放着一张书桌，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犹太学者阿多诺的原物。阿多诺同样在战时流亡美国，但始终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于是在战后选择回到德国。他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作诗歌是野蛮的”，原义是质问用德语写作诗歌、从而为德国文化增添荣誉之举的合法性。



华特别墅（Villa Walther）

但这一质问同时也是自问，因为他的思想也同样成为战后德国哲学的重镇。

战后的德国，是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战后的柏林，迄今还是个伤痕累累的城市。东柏林尤其甚，不少居民楼的墙上还刻着深深的子弹痕，单元与单元之间是炸弹毁灭的空地，而柏林最时髦的俱乐部往往并不光鲜，墙上每每保留着战争的裂缝。离高研院不远的 Grunewald 轻轨车站，保留着一道废弃的铁轨：十三号站台。这是当年柏林的犹太人一车一车被运往各处集中营的地方。今天，铁轨两边铸着每次发车的日期、人数、终点。最后一次发车是在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的一个月前。我想象着，那些恪尽职守的帝国官吏在窗外的柏林被轰炸成废墟之际，还在账簿上一笔一笔认真做着发车记录，仿佛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作。车站背后的“魔鬼山”（Teufelsberg），本来是片平地。战后柏林的妇孺们用双手清理出来的废墟碎石，都堆积在那里，于是成了座小山，而且居然是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最高点。冷战期间，美国国土安全局（NSA）在这里建了一座可以监听全苏联境内电话的窃听塔。今天，人去楼空，灰墙冷瓦盖满色彩斑斓想象奇诡的涂鸦，成了艺术家的殖民地、游客打卡的好去处。柏林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里，黑格尔以其辩证理性的穿透力奠定现代思想的基石，也通过其哲学后裔马克思揭开了世界革命的时代；这里，高级纳粹们在湖畔别墅愉快地用早餐之际决定用毒气室来“最后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这里，默克尔向那些被驱逐和被凌辱的难民振臂一呼“我们可以！”；这座用其前市长的话来说“贫穷但是性感”的城市今天被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

艺术家们视为精神家园。狂热、理性、残忍、同情、自由之想象、平庸之罪恶：柏林用它冷静的“酷”承认人性的不完美、历史的非道德。它是一座拒绝遗忘的记忆之城。

回到法兰克福的家里，炉香花静。原本一月底以来我每天在微信上问候父母安好的日常，变成了父母担心我们、不断询问的日常。因为川普、内坦尼亚胡这样的民选威权型领袖忽然要关闭边界，开放遥遥无期，美国和以色列的访问学者们都狼狽地席卷家当火速回国。讲演会和讨论会，所有高研院的“群智”活动都移入虚拟空间。我们的跨洲界视频讨论会忽然成了斋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亮点时刻。海豚回到威尼斯的运河，法兰克福的上空也忽然少了飞机的呼啸。将来，类似 Zoom 这样的网络视频会议公司或许将会成为环保人士的最爱、地球的救星吧。因为医疗保障、福利保障充分，德国人并不十分焦虑。联邦政府放开了坚持多年的“零赤字”政策，准备动用储备来维持经济，并特别宣布其中 500 亿欧元专项补助文化艺术从业者。不少健身房、瑜伽俱乐部、舞蹈教室都开始在线上直播，并开通了捐款频道，好让自由职业者渡过难关。户外两人以上的集会都被禁止了（家人除外），但是我本人没有看见警察巡逻。德国是相对守规矩的国家，一旦规则明确，绝大多数人都会自觉执行。旅馆不接待游客，但是开车出游是可以的。我和先生遂周末登山去。莱茵河畔的酒庄古堡，春寂无人，恰是明媚的时候。

这次欧洲各国抗疫，策略明显体现了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差别。东欧感染者虽少，一声令下，民众都自觉禁足了。我先生是斯洛伐克人，据他看来，是大家都知道自己国

家的医疗系统薄弱，所以就不以身试险了。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都比较戏剧紧张：意大利的市长们在社交媒体上声竭力嘶呼吁，西班牙学习中国用无人机监控，而法国直接让军队上街强制禁足。德、奥、瑞士、荷兰则尽量用加大检测力度、诉诸民众理性来降低死亡率，医院也尚运转有序。这里没有英雄也没有悲剧。我想，这和战后德国的政治性格有关。联邦德国政治，历来以“乏味”著称。默克尔堪称乏味政治的集大成者，她的竞选口号干脆就是一个名词：“中坚”（Die Mitte）。但在危机时刻，她的冷静沉着就成了德国人民的中流砥柱。她的政治生涯里唯一一次“放飞自我”，大概就是 2015 年难民危机中间大声疾呼的一句“我们可以！”（Wir schaffen das!）吧。这句话激怒了右派，又振奋了左派，于是她后来不得不退守中流时遭到左右夹攻。但我想，默克尔最大的政治失误，恰恰也是她人性最闪光的时刻。周日刚给她注射过肺炎预防针的医生，周一也被确诊了，导致她主动隔离，我希望她一切安好。西方大量政客名流确诊，这在中国是没有见到的。虽然中国政府惯性的不透明策略要为初期疫情爆发负责，但起码在境内而言，病毒很大程度上被严防死守堵在了湖北，又用举国之力得以控制，这的确是大政府的优势。这次欧洲各国各自为营，让苦苦挣扎的意大利、西班牙伤透了心。欧盟新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是德国前国防部长，有五个孩子，还是医生，说多国语言，公众形象干练优雅，但她对这次疫情的应对显然是不合格的。疫情过后，欧盟的统一将面临更大挑战。

今天的这场危机，我们身处其中，尚不

能预测走向何方。但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里，想必是对全球秩序的大考验，体现出人性之最丑恶和最伟大的。今天的世界，所有我们习以为常的固定边界都已经千疮百孔。这不但包括国家、种族、经济体甚至物种的边界，也包括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边界。权威和自由，忽然成了亟待重新厘清的议题。也许是因为德国特殊的历史经验，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其小心，这次也始终不愿意强制实行全国禁足的政策，只有素有孤立主义传统的巴伐利亚单独禁足。尽管如此，德国学者还是极端忧虑在灾难后，很多非常时期的手段将成为日常，进一步削弱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力量。当然，来日大难、口燥舌干，在人命关天、防疫优先的今天，所有这些忧虑都大约显得太书生了吧。面对自然和历史，人类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问题只能按紧要次序解决。

而在法兰克福“苦居”的我，现在最要紧的，是在非常时期保持日常，读懂知堂“庵中黑一团”的谜语。

3月26日于法兰克福



程莹 | 隔离的历史与当下——南非疫情手记



程莹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非洲文化、非洲文学与艺术、非洲青年与城市化问题。

2020年寒假伊始，我从北京出发飞抵南非约翰内斯堡探亲，并希望借假期完成有关南非视觉和表演艺术的田野调研。两个月已经过去，没想到因为疫情的全球蔓延，我还滞留在这里。作为非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的约翰内斯堡也因为新冠疫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春节前后，南非尚未有确诊的新冠肺炎的相关病例报道。因为国内疫情紧张，周围许多中国企业和华人都在四处募集医疗物资包机发往中国。记得当时已经有学者提醒华人社群不要过度采购医疗物资，因为非洲的公共医疗体系十分脆弱，一旦疫情在这片大陆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短短一个月之后，非洲大陆40多国发现新冠病例。南非的第一例病例3月5日确诊，然后在三周左右的时间迅速上升至700例。与意大利等老龄化社会不同，非洲的年龄结构普遍更为年轻化，但更大的挑战在于许多国家有免疫系统疾病的人群基数较大。以南非为例，全国有至少七百万人感染艾滋，每年还有至少50万肺结核新增病例。受基础设施所限，大部分非洲国家并不具备对民众进行大范围检测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截至目前，尼日利亚、刚果（金）等几个非洲国家本地病例报道中以政府部门的高管人员为主。人们普遍认为，在非

洲媒体中公开的确诊感染数字可能并不具备很高的参考价值。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不间断影响非洲多个地区的霍乱，到2014年在西非大面积爆发的埃博拉，大规模的瘟疫一直是当代非洲国家面临的巨大危机，在全球公共意识层面却鲜有关注。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病毒本身不能辨识国籍、身份和阶层，但每一次瘟疫的爆发都带有强烈的等级色彩，进一步加剧着社会不公。

一、一种“中产病”？：疫情下的南非式幽默

在疫情向全球蔓延的初期，相对欧美地区而言，非洲各国是新冠疫情传播较缓的地区。二月初的时候，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塞内加尔和南非两个国家能够检测新冠病毒。记得著名的南非籍脱口秀主持人Trevor Noah还曾在节目中开玩笑说，“看，非洲人民再一次被世界远远抛在了后面。”从报道第一例病例开始，南非的社交媒体上就充斥着有关新冠肺炎是个“中产阶级”病的各种段子：“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些得了新冠肺炎的人是谁，但我们知道他们都去过欧洲度假”；“作为一个连护照都没有、甚至从没用过电子邮件的人，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和一种来自国



程莹老师（右）

外的流行靠得这么近”。的确，南非最初的确病例几乎都有欧洲旅行史，最早发现的几个病例来自同一个赴意大利的十人旅行团。

自3月5日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卫生部长已经先后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或发表公共演讲，向公众确认，目前所有发现的病例及其家人、以及医生、同事、子女以及子女就读学校师生等均已得到妥善的安置和隔离。不过在这些新闻和公共报道里，似乎有一类人从未被提及，那就是生活在这些中产家庭中的女佣。南非专栏作者Haji Mohamed Dawjee尖锐地发问：“这些中产家庭的女佣们被妥善安置了吗？她们去哪儿自我隔离？是会继续工作还是会被发配回家？”南非的许多中上层家庭都有住家的保姆。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南非至少有一百万人口从事家政相关工作。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南非租住过的白人家庭中也几乎都有住家的女佣，她们很多人在房东家工作生活已经超过几十年。（令人感到别扭的是，即便他们都是已年过

半百的中年人，房东也会一直沿用种族隔离时期的称呼，称这些住家女佣为“girls”，称家中的园丁为“boys”。）而在疫情应对的相关新闻中，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安置情况，几乎成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

Jedediah Britton-Purdy在近期发表于雅各宾（Jacobin）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冠肺炎的爆发，揭示了一场以“撤离能力为标准的阶层等级体系”。而这种以“撤离能力”或者“隔离能力”为标志的阶层体系，在当代南非社会一直是一种显性存在。所谓“南非梦”，指的就是拥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保障家庭彻底摆脱对基础设置和公立体系的依赖，例如，能够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为全家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在后院里拥有自己的发电和供水系统，等等。总之，一直以来，“南非梦”的核心定义就是一种从公共领域中“隔离”的能力。疫情爆发以后，住在高墙大院的中上层家庭，除了开始在家办公以外，原有的生活节奏似乎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甚至可以和往常一样在家进行体

育锻炼，因为网球场和游泳池正越来越多地成为约翰内斯堡高档私人住宅的标配。

“你笑了，但这是真的”（“You Laugh But It’s True”），是出身南非黑人聚居区索韦托（Soweto）的脱口秀明星 Trevor Noah 的 Netflix 首秀的标题。它典型地体现了人们如何经常通过“南非式幽默”来排遣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缺失给普通人带来的无奈和绝望。南非全国近六千万人口中，10% 的人口拥有国民收入总值的三分之二，有 55% 的人（大约三千多万人）人均月收入低于 82 美元；全国有 82% 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完全倚赖脆弱的公共医疗体系。而要应对此次疫情，公立系统的医疗资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根据金山大学社会安全与管理教授 Alex van den Heever 的估计，作为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的非洲国家，南非全国公立系统中目前只有 448 个可用的重症床位，而私立系统中有 2479 个剩余重症床位，数量远远超过公立系统。目前，南非七百万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有三百万人尚未能接受任何治疗。疫情的发展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医疗体系的瘫痪。

近年来，南非社会不断爆发以“倒下主义”（Fallist Movement）为代表的底层社会运动。在南非人特别是年轻人中，似乎已经确立了这样一种共识：作为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当代南非社会愈发严重的贫困和不公是结构性的，需要迫切地改变。

二、“国家灾难状态”

3月15日傍晚，我们守着电视直播，等待总统拉马福萨就新冠疫情发表全国讲话。

原定七点的讲话推迟两个小时后终于开

始，总统拉马福萨宣布南非进入国家灾难状态（national state of disaster），开始实行旅行禁令、关闭学校、禁止高风险地区旅客入境、取消百人以上聚集活动等一系列措施，他说，“共和国的民主历史上，从未面临和今天一样严峻的形式。”

消息一出，原本平静的城市似乎一下子大变样。原先社交媒体上弥漫的轻松情绪逐渐演变成一种剑拔弩张的焦虑。金山大学医学院有学生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学校紧急宣布学生需从宿舍中撤离。因为不满学校在未做全面检测的前提下要求所有南非学生撤离宿舍、可能会在返家路途中带来更多传播风险，法律系两名学生连夜将学校告上法庭。最终在照顾国际学生的前提下，法院维护了学校的决定。不过，全国所有的学校关闭之后，根据南非的网络基础设施情况，远程授课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我们租住的公寓楼位于繁忙的 Rosebank 地区，经常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短期访问的住户。总统全国讲话之后，全楼的住户纷纷拖着行李搬走，一夜之间，平时满满的停车场里竟只剩下零星的几辆车。教会纷纷宣布取消复活节活动，南非国家艺术节决定改为线上举行，同志马拉松、两洋马拉松等超级马拉松赛事也纷纷取消。娱乐与创意产业的媒体人纷纷发起“#KeepYourTicket”的话题，号召人们不要申请退票，帮助遭受重创的创意产业度过难关。然而，面临真正“灾难状态”的，似乎是另外一群并不怎么使用推特等社交媒体的人。

里尼在我们住的公寓大楼里担任清洁工。她和公寓几乎所有员工一样，生活在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区之一索韦托。每天清晨，

她要花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换乘两班小巴车到达酒店，然后负责清洁 10 间以上的酒店房间。她每月工作 25 天，共收入 3000 兰特（大约 1400 人民币）。作为一名单身母亲，除去每月的通勤花费 1300 兰特，剩下的所有费用要来抚养两名 8 岁和 9 岁的学龄儿童、和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同时还要赡养平日帮她带孩子的年愈七旬的母亲。她八岁的女儿还常年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可能因为年龄相仿，我在约堡停留的两个月中，里尼经常来找我聊天，询问我中国的情况。不管我如何描述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严重性，她似乎一直觉得这件事情离自己很远，“你去过我生活的索韦托，应该知道那里有很多比 Corona 更危险的病毒吧。”她经常半开玩笑地这样打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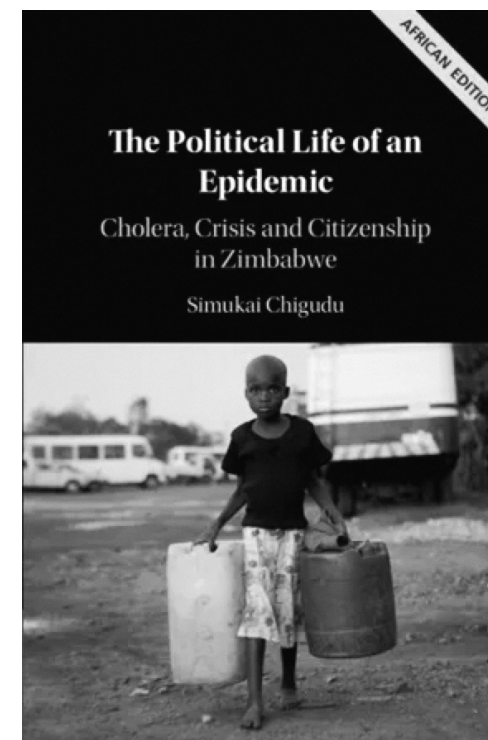
在南非，有 1100 万人生活在非正式的棚户区（informal settlement）中。通常全家人挤在一个铁皮屋中，没有基本的电力和卫生保障，更没有 24 小时新闻和网络不间断更新新冠肺炎的发展状况和注意事项。根据《美国流行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的研究，面对病毒，这些拥挤的棚户区住所比其他工业社会中普通家庭感染的概率要平均高出 40%。

疫情将不会以“常规”的方式影响这些人的生活，他们不会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多数人口那样应对这次危机——四处购买口罩、洗手液、去超市排队囤积食物。如果真的必须全部在家、不能出门，他们的感染风险可能更高。总统全国讲话之后，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当地 Woolworth 超市的冷藏食品架被拿空的图片，我拿给里尼看的时候，她淡淡地说，“我从没有去过这家超市。他

们的东西太贵了。”

3月19号清晨，我们住处附近的一家酒店发现一例确诊病例，楼一下子停了数十辆救护车。我们也开始紧急找房、寻找人员流动量相对较小的住所。搬走前我去找里尼，给她灌了一瓶我之前买好的洗手液，让她叮嘱家里的孩子要多加小心，尽量不要去教堂等公共聚集的场所。里尼说：“经理让我们从明天开始不用继续上班了，也不知道下次再见到你，会是什么时候了。”说实话，把洗手液拿给里尼的时候，我心里充满矛盾。因为我知道在她生活的地方，连洁净的饮用水都成问题，强调用流水洗手 20 秒以上，是一件多么奢侈又讽刺的事。

因为公寓已经基本搬空，酒店不再需要



《瘟疫的政治生活：霍乱、危机与公民意识在津巴布韦》书影

那么多工作人员，里尼和其他大部分工作人员，开始了无薪待岗的状态。刚来酒店工作不久的里尼，最担心的是自己会因为疫情爆发被裁员。而即便酒店不裁员，每天乘坐私人小巴（每辆小巴容量 14 人，但严重超载状况十分普遍）数小时往返索韦托和桑顿城区工作的里尼，也要面临极大的感染风险。疫情爆发之后，每天早晨酒店给剩余的工作人员发放一个口罩，在下班时让他们按照规定丢弃在特定的垃圾桶内。而在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里，他们却是毫无保护措施。为了防止物资丢失，酒店的清洁工在下班时候还要接受安保和管理人员搜身。所以，为了让里尼要把洗手液带回家给孩子，还需要我手写一份“物品赠予说明”给酒店管理人员。

三、另一段“隔离”的历史

总统第一次全国讲话之后，我们之前联络的租房中介纷纷告知政策调整，原先看好的住所处于冻结状态。情急之下，我们在 AirBnB 应用上按照地图搜索，最终找到了

一家离约翰内斯堡市区稍远的、可以即刻自主入住的住处。

这个新的住处位于哈特比斯波特（Hartbeespoort）大坝，当地华人习惯上称之为大湖地区，距离约翰内斯堡约一小时车程。周五结束了一周的网课，我们决定出门了解一下这个之前完全不熟悉的小镇、希望能找一个人少又空旷的公共场所休息一下。哈特比斯波特由围绕着大湖的几个小镇构成，在沿着湖边开车两小时绕了整整一周之后，我们发现占地两千多公顷的大湖岸边，竟然全部被私人住宅区用铁网占领，毫无供公众使用的休憩空间可言。在地图上反复搜索后，看到小镇有两家可以跑步的公园，到了门口才发现这里的公园也是私人所有、每人要收取 100 兰特的门票费用。正当我们对这样高度私有化的城市规划和结构感到震惊的时候，有一位同样来自约翰内斯堡的白人女性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她感叹着：“只有这里才有‘像样’的公园，在约翰内斯堡，可完全没有这样安全和放松的去处！”



开普敦街头标语（图片来源：Ashraf Hendricks）

这位女士的话令人匪夷所思。约翰内斯堡城内有大量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公园和草地用地占了整个城市面积的十分之一。而这位女士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大概是因为这些公园已经成为许多无家可归的黑人流浪人员聚集的场所。种族隔离期间，约翰内斯堡城区是允许白人居住生活。种族隔离结束之后，各大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逐渐撤离老城区。虽然政府在近年来实行了新城项目（Newtown Project）等利用文化艺术的方式振兴城市的计划，却收效甚微。因为治安原因，许多白人几乎从不涉足约翰内斯堡的老城地区。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些公共空间就像《犯罪天堂》、《黑帮暴徒》等南非电影里刻意描绘的那样，充满了暴力、不安和危险。

这段短短的小镇居住经历，也成为我这学期开设的《非洲文化与社会》课程的一段小插曲。在准备有关“南非电影与种族隔离”这一讲直播课程的时候，我顺手查找了以哈特比斯波特为代表的小镇的相关史料，发现原来这里的湖岸线虽为国家所有，但租约几乎全部掌握在白人手中。几年前，曾经有当地黑人居民试图请愿改变这一现状，一直未果。更有甚者，在一些度假村和餐馆中，业主援引“保留进入权”（“Rights of Admission Reserved”）条例，拒绝黑人游客进入。2018 年，一位黑人居民在一家传统上以白人为主的游艇俱乐部遭到毒打，引发了该地区一次抗议种族主义的游行。

在种族隔离结束 25 年之后，肤色和阶层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生活的空间、以及在特定空间中生存的能力。在全球大隔离的时刻，种族隔离的历史也会不断地

浮出地表，与愈加复杂和紧张的空间政治盘根错节。

四、全境 Lockdown !

3 月 23 日，南非的新冠肺炎病例一日内激增五成。傍晚时分，总统拉马福萨再次进行全国演讲。从 3 月 26 日子夜开始，南非实行为期 21 天的全境大封锁。封锁期间，除了紧急就医和购买必备食物，不得外出。

消息一出，我们在 AirBnB 上预定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决定拒绝外来住客。于是，刚刚搬来不到一周的我们，又要搬家了。紧急状态下已经不可能在一天之内租好新的房子，幸好有朋友因为疫情原因无法返回南非而暂居国内，慷慨地将自家房子借给我们暂住。以最快速度收拾好行李，我们再次开车返回约翰内斯堡。

在加油站停车加油时，我们储备了一些食物和饮用水。加油站的工人们并没有口罩，他们用普通的围脖遮掩口鼻。除此以外，这一路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和平日一样，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和红绿灯下，站着些许乞讨的路人。先生一边开车一边问我：“如果明天开始全面全境严格限制出行，那这些人该怎么办？”

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对于这些每天都面临饥饿和疾病威胁、而别无选择的人，又意味着什么？在总统发表这次全国演讲以前，朋友发来南非军队提前进驻我们所在的豪登省以应对紧急状况的图片。当地华人社群的讨论中，弥漫着种种可能发生暴乱的隐忧。

封城前一天，我打电话给居住在约翰内斯堡 Thembisa 的津巴布韦移民朋友安德莱，询问她的近况。她告诉我，原定返回津巴布

韦的计划因为南非封锁而不得不放弃；这几天津巴布韦的医疗系统人员也因为政府面对疫情完全无所作为而不得不发起罢工。不过她的家人们并不听她的劝告，依然在参加周末的教会活动。

安德莱是五年前跟随她的姐姐坐小巴车从津巴布韦的布拉瓦约（Bulawayo）跨越国境线来到南非的。除了父母仍旧留在津巴布韦帮忙照看姐姐的孩子，她们姐妹七人全部在约翰内斯堡生活，主要靠做家政工人和打零工维持生计。安德莱居住的 Thembisa，是许多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外来移民聚居的地方。大约一个月以前、南非尚未有新冠病例报道的时候，我曾在周日清晨和家人散步时遇到过一次津巴布韦社群的教会活动。他们当时在位于城市北部一个农场的一块水域旁祈祷和洗礼。有朋友曾提及，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丛林、水边等单独的户外处所进行祈祷活动，除了宗教文化原因，另外一个重要

的原因是来自津巴布韦移民经常会被本地人的教会和宗教场所排斥。在与他们聊天的时候，几位来自津巴布韦的人关切地问及当时在中国蔓延的新冠疫情，并真诚地告诉我，他们会一起为我们祈祷。

在过去两周里不断因为疫情原因更换住处、打包搬家的时候，我时常想起这一幕。外来移民聚居的 Thembisa 经常被本地媒体和公众认为是混乱和肮脏的所在。当亚裔面孔因为疫情在许多地方被排斥和误解的时候，这些同样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却给了我一份最朴实的善意。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距离南非全境封锁还剩下四个小时的时间。外面的街道出奇地安静。希望这些曾给我慰藉的陌生人，也这样的时刻同样被记挂、被惦念。

3月27日于约翰内斯堡

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 | 北京随笔（节选）

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Francisco Foot Hardman）为巴西著名文学研究者，任教于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自2019年8月起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担任客座教授。本文原是哈德曼教授受母国邀请、刊载于巴西媒体的日记，我们摘录部分章节，并由北京大学西葡语系博雅博士后马琳翻译成中文。

一、写在前面

中国朋友们将会读到的这些文字是我在巴西已刊发的随笔节选。我从1月

31日起撰写文章记录在北京的生活，因为新冠病毒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影响，几周后，成为了席卷全球的大流行。因为中国



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教授在北大课堂上

的初步防控措施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也因为此前我在北京给旗士电视台（TV-Bandeirante）录制过视频，《圣保罗页报》邀我写下第一篇文章。其他文章在我所任教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校报上发表，每周一篇。此外，新闻网站“Carta Campinas”（坎皮纳斯来信）也发布了这些文章。在此我想感谢我在北大的同事们，樊星老师，闵雪飞老师，胡旭东老师，郭浩老师和范晔老师，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鼓励和热情的接待。我还要感谢我在北大外国语学院的可爱的学生们，感谢他们的坚持与友谊。

二、2月14日 世上最隐秘的咖啡屋

北京在小雨中迎来黎明。天气还要再冷一段时间，但最近气温已有所回升。这雨很好，净化空气，完全不同于在圣保罗和贝洛奥里藏特降下的造成严重灾

难的暴雨。这些日子，北京的空气质量下降了，虽说比前几年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候要差很多，但依然很差，现在，为了降低传染风险，人们不得不待在家里，空气益发差劲。海淀的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如果你了解北京这座特大城市，了解这一个区，或是能够想象人口比圣保罗多一倍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尽管北京面积远大于圣保罗），便会觉得这里目前就如同一座鬼城，一片寂静，不同以往，简直是超现实。

在这能做什么？我用音频录课，通过微信和邮件把课程材料发给学生们。我和班长沟通，他的作用很重要，完全不是装饰性的。同学们都急着想回北京，想回到无比美丽的校园。这里有他们的宿舍，供本科生和研究生从入学住到毕业。目前学校已经停课，尚不清楚何时能返校。一位家在广东省吴川市的同学向我提问，关于格拉西里亚诺·哈莫斯的小说《干涸的生

命》，我接下来要讲这本书，她已经开始自学。她和其他同学都问我在北京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们多么亲切！多么友爱！多么体贴啊！他们和巴西学生肯定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相互学到丰富的知识。幸运的是，这种机会已经安排好了！

另一位同学，家在浙江杭州。她正在翻译米亚·科托的小说，随时会向我提问。还有三位同学，分别来自郑州、深圳和福州，他们正一如既往地努力，专注完成毕业论文。这三人研究的作家并不相同，分别是鲁本·丰塞卡，吉马良斯·罗萨和米亚·科托，但他们研究的中心主题都是“抛弃”：《八月》中在 1954 年悲剧般的八月里被抛弃的巴西；《河的第三岸》中遥不可及的父亲对家庭的抛弃；《一条叫做时间的河，一座叫做大地的房子》中被城市和历史抛弃的小岛。

如今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着“抛弃”，被抛弃的是最穷的人、病人、食不果腹之人、战争难民和资本主义文明自杀式发展导致的生态灾难所造成的难民。此时，一条来自学生的信息令我感动不已。这位同学正在她美丽的家乡武汉过着隔离生活。我之前给她发去一个视频，是由葡萄牙的学生制作的，给中国人民加油鼓气，表达国际团结。她回复了我：“老师，谢谢您给我发来这个充满热情的视频！这段时间，我的城市见证了灾难也见证了爱。来自各方的支持和鼓励是让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您不用为我担心，我和家人都很安全，也很健康。非常期待能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和您校园里重逢！”

如果说有一种文明经历过战争、半殖民地化和饥荒，在数千年中发展出了等待的智慧，那就是中国。因此，目前这种时候，我们更应该等待。在被抛弃的风景中，我们可以探访马路、树木、无名湖、矗立在冷清街道上的过街天桥、小广场、小路、充满活力的胡同，胡同总是混乱的，带着一种破败的古典主义之美，这是最好的路，有时甚至从表面上都看不出有路。

在三里屯这个平时人群熙熙攘攘、如今空空荡荡的地方，有一位街头理发师，可不是塞维利亚理发师，但这位理发师在这个没有行人的周日独自一人坚持开工：女士剪发 12 雷，男士 9 雷（雷亚尔，巴西货币，1 雷亚尔约等于 1.3 人民币）。谁准备好了？只有两位顾客在等，就站在路上。说实话我有些犹豫，因为这位剪刀大师没有遵守戴口罩这一安全规定。

三、2月21日 通行证和其他忧虑

我第二次被拦在了小区门外，目前只有一扇门可以通行。出入规则相比之前更加严格，这虽然会引起不便，但对防控疫情确实有效。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人们减少出行使得目前确诊人数没有超过 400 人，确定死亡仅 4 例，对于拥有两千四百万人口的北京来说，这一数据相对而言并不算多。我所在的海淀区目前官方确诊病例是 61 例。他们之中有人是我的邻居吗？那几位逝者里有人曾住在我附近吗？我隐隐有些担心。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总会有相似的忧虑。好在太阳出来了，鸟儿回来了，气温也升高了，“行凶作恶”的新冠病毒先生将会逐渐失势。

然而，巴西狂欢节打消了我的疑神疑鬼。在狂欢节的游行队伍里，尤其是在里约，“皇冠 + 病毒”装扮深受大众欢迎，无论男女。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是幽默讽刺。笑总归比哭好，尤其是在总有令人不悦的消息从巴西利亚传来的时候，现在的说法是：今天似乎比昨天更糟糕。或者借用路易斯·费尔南多·维利希莫（Luis Fernando Ver í ssimo）在报刊专栏中写到的一句睿智的话：威胁我们（巴西）的不是冠状病毒，而是一种更加悲剧、更加无法医治的病——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逐渐变得靠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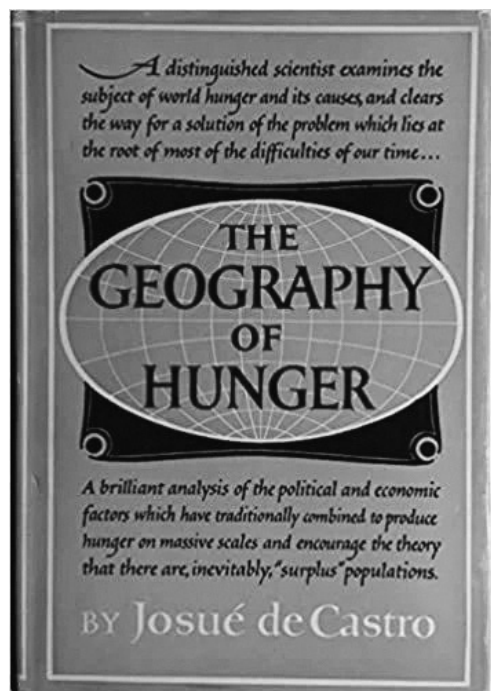
我们都知道，无论某些记者、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如何努力用假象迷惑大众，人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并不是简单的数据。就比如我现在的情况：如果不想睡马路被冻死，就得想办法进家门，为此就需要到小区管理部门重新报备我作为暂住访客的身份，那里离我的住处有 50 米远，与我目前所在的大门相距 200 米。我住的小区原本有三个门可以进出，以前行人、自行车、三轮车混在一起十分热闹，唯独汽车夹在其中不太和谐。小区面积约为十万平方米，有四条南北向的路、四条东西向的路，基本构成一个四边形。如今在唯一开着的大门，有一块电子屏，上面显示着醒目的标语：万众一心，坚定信心，科学防控，战胜疫情。

两位向来十分友善的小区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写有我的个人信息，这就是我在防疫期间的通行证，我感到一丝喜悦。护照在这时并不管用，访问学者证也不行，它们也都旧了，现在这张通行证上写有我的名字和住址，背面还有温馨提示：“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勤锻炼、不扎堆、讲礼仪、稳心态”。据我的同事樊星解释，最后三个字是不要过度担心的意思。“是指对病毒的担心还是对所有的事？”我问她。“卡上没有细说。”她回答，“但我觉得说的是不要过分担心病毒。”我明白了，仔细想来，这些提示我基本上都做到了。我觉得它们有一定道理。

但如何才能不为那些比我们更加痛苦的人担心呢？我想到在我亲爱的巴西还有很多食不果腹的人，很多失业者。我想到那些经历了政治暴力和刑事暴力的受害者，如今这两种暴力正危险地相互趋近。我想起玛里艾丽·弗兰科（Marielle Franco*）和那些下令将她刺杀的幕后黑手。我想起那些因为叙利亚战争而受伤、死去或惊恐地逃难的孩子。这场战争已持续近十年，它标着一些大国虚伪的无能。

说到底，我们应该寻求一种团结的力量，它能将我们连在一起，拯救我们。我们可以且应该靠这种团结去拯救所有人共

* 玛里艾丽·弗兰科（Marielle Franco，1979–2018）是巴西政治家与人权活动家，长期关注警察暴力执法等问题，致力于保护贫民区居民权力。她于 2016 年当选里约热内卢市议员，2017 年上任，2018 年遭到枪杀身亡。



约绪·德·卡斯特罗《饥饿地理》书影

同的家园——地球，所有警示信号都已亮起来，剧烈闪烁着，发出刺耳的响声，我们正处在环境告急的时代。人类不只在为平等和多样性进行抗争，也应该去阻止——如果还来得及——那些对任何生命形式做出摧残的人继续支配世界命运。

这张通行证现在足以让我先平静下来。我确信我们并不孤单。

四、2月28日 面包，白水和知识：我的心是共同体

在这些天的半幽居生活中，我出门基本只去一个地方：目前仍勇敢开着的一个食堂。它位于小区的一角，离我住处有400米远。在这几个星期里，到食堂吃饭

的人非常少，于是我慢慢成了厨师和工作人员眼里的常客。查体温和居民通行证的保安也都记住了我。（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北京大学以前的教职工和他们的家属。）那位平时一直闲不下来、很有节奏地收餐盘的女士如今掌管着食堂大门的钥匙。我和她几乎算是朋友了。

我在他们的帮助下点爱吃的素菜。这些菜很够味，搭配得极好，我对它们的喜爱仍在与日俱增。有土豆搭配茄子的地三鲜，有酸甜口味的鸡蛋炒西红柿，这道可謂是必点菜肴，还有西蓝花、菠菜和熟到正好程度的豆芽。现在已经用不着我说要米饭。后厨早就把饭从巨大的饭锅里盛出来，取小份放在餐盘中间的位置，等待着配菜与之会合。就这么简单，不需要过多交流，可以保护自己。全国对抗疫情的战斗仍在继续，北京目前似乎取得了大范围的胜利。负责卖饮料、汤、红薯和面食（馒头、包子、馅饼等）的女士总想让我再多买点什么，即便我每次都拒绝。

我知道在这我不会缺少每天所需的食物。饮用水也不缺，在离住处50米远的地方就有自助取水机，我最珍贵的一张卡便是水卡，6.5升好水花费相当于80分雷亚尔。

有水有饭，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上课了，现在都是远程教学，我的学生们分散在十二个省市，其中有些很遥远。你们相信巧合吗？我更喜欢“时空交汇”的说法，以避免用“等时性”这样的术语。也许我们正生活在同步的时空之中。我亲爱的巴西正经受着种种野蛮行为，这野蛮是由上到下的，面对此种情况，我们应该由下而上重新开始，从二十世纪伯南布哥（巴西

地名）的两位思想家说起，没有任何一种野蛮能够将他们的遗迹抹去。约绪·德·卡斯特罗的（Josué de Castro）的杰作《饥饿地理》（1946）揭示的是最简单也最基本的问题，可悲的是，今天这些问题依旧存在。保罗·弗莱里（Paulo Freire）的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1968）是被全世界人文领域学者广泛引用的佳作。弗莱里是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和平教育奖，是巴西教育的捍卫者，任何反教育的无能之人都无法将其推翻。

五、3月13日 加油，中国！

西方开始了动荡，世界卫生组织最终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全球大流行”。世界金融市场犹如被放到撒哈拉沙漠中的冰棍，迅速融化了。在这个时候，中国正逐渐从新年的冬眠中苏醒，准备好迎接新一轮战斗。冬眠只是表象，我们都知道，熊类中唯一不需要冬眠的就是熊猫。

北京的街上隐约能看到一些人，和之前繁忙的日常相比，人并不算多。China在中文里是“中国”，北京是这个“中心的国家”既古老又新潮的首都。

当疫情只在中国范围内的时候，从西方传来了一些声音，或悲观或不满，还有一些属于种族歧视，他们在西方笑着看亚洲巨龙跌倒。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但中国人并不习惯笑别人的不幸，因为他们知道人类的命运是共同的。只有那些不作为的政府，比如正让巴西人民受罪的巴西政府，才会疯狂到忽视疫情的严重性，明知道这疫情仅在中国就

已经夺去了3000条生命。如果说全球化在影响国际市场兴衰之外还能有其他作用，那就应该是帮我们形成一种全球生态意识，它以社会生态为原则，依靠所有人的共同参与。

通过这次的事，我们能明白，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学会了有耐心，学会了等待。虽然中国早已开放了市场，发展市场经济，但仍以人民集体和国际团结为主导理念。有霸权利益在影响吗？毋庸置疑。但中国在如今的国际版图中是国际和平的担保人，为不同半球、大洲和国家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

六、3月20日 另一种全球化：克莱纳克和米尔顿·桑托斯有话要说

世界在快速运转。两个月前，疫情在中国全国范围内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大面积扩张。那时我们似乎陷入了不被中国之外的世界所理解的境地。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国访客来说，仿佛是经历着彻底的流放。

但是现在，方向调转过来。在此我向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校长及整个管理部门表示问候，他们面对疫情的严重性勇敢地快速作出决断。我还要向教职工和学生们——尤其是语言研究院——表达我的支持，他们正处在困惑与痛苦之中。我能确定的是，这一切终将会过去。照顾好自己是必要的，先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他人。

自十二月以来，疫情中心湖北省武汉市首次出现了零感染的情况。昨天中国的新增病例为34例，其中21例在北京。所有这些新增病例均为国外输入病例，主要来自欧洲。欧洲成了新的疫情中心，意大

利成为疫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已确认那里出现了大规模疫情。

不能去我们最想去的地方，这确实很糟糕。也不能去原本为了工作、学习或情感维系而应该去的地方。我们的城市被飞速发展和数字化普及所吞噬。所有城市似乎都有只能下达一个命令的按钮：加速，加速，加速；消费，消费，消费。如同战争一般的危险迫近，“停止”键造成了困惑、愤怒和恐惧。

我们需要再次向传统的人民学习生存之道，学习重新迎接四季交替的希望。但全世界确实正经历着社会生态性的崩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等待也许只能迎一场美梦，一场世界末日前的“城市美梦”。反乌托邦这个词直到近年来都仅被用于哲学或科学层面，如今我逐渐明白，这个词将会在人们日常生活语境中慢慢占有一席之地。不论是哪一方面。

乌托邦辩证地意味着对斗争的新的激励，这是一种为争取一个可供全体人类居住的世界而展开的斗争，所谓全体人类，是指朝向一种人类的新概念开放，将类人（quase-humanos*）包纳其中的人。这个概念实际上尚未建立，也尚未将自身认同于此。我在这里改写了艾奥顿·克雷

纳克（Ailton Krenak）的一些旨在推迟世界末日到来的思考，见于他去年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但思想十分伟大的书中，我在北京大学和我的学生们一起阅读了这本书。它正好启发我们在2019年末到2020年初之际对世界进行反思。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

如今，远程教学已进行了六周，我们开始阅读米尔顿·桑托斯（Milton Santos）的作品。他是一位伟大的巴西黑人知识分子，来自巴伊亚州，是一位世界公民。桑托斯离开我们的前一年，时值世纪之交，他基本上预言出了接下来这不幸的20年里人类所遇到的困境，并说得十分详尽。这位始终心系城市土地规划的城市地理学家，再次以乌托邦、以人类仍需为捍卫人性而做出努力为主线，书写了这部作品。我说的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另一种全球化》（2000）。

面对着虚拟货币的大肆流通和全球的无界化发展，我们必须回头看看，看向我们的本源所在、我们出发的地方，如果人类还有点运气的话，那里将会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葛兆光 | 疫情下的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



葛兆光教授（右）与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所长羽田正合影

一

去年年底，我应邀到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日文：东京カレッジ，英文：Tokyo College）担任特任教授八个月，原本想借这个机会多看些新的日文书，毕竟这些年一直忙碌，难得有机会定下心来细读；也想看看东京大学新成立的这个研究机构，怎样沟通人文与科技两界，毕竟这里聚集了好些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顶级学者。今年的1月和2月初，一切都很顺利，在这里我陆续听了诺贝尔奖得主梶田隆章、日本外交官兼原信克、德国日本语言学者Szabo等的讲座，进行了几次午餐讨论和关于“认同”问题的Seminar。

没想到，刚刚过了二月中旬，新冠病毒就从中国横扫世界，日本东京也不能幸免，于是，一切都停顿下来，就连预定的第二次关于“认同”的讨论，也只能通过Zoom进行。

二

东京カレッジ是一个很新的机构，说白了就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院，去年（2019）才刚刚成立，据东京大学副校长，也是这个研究院的院长羽田正教授说，它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学术交流的国际化，提出值得思考的前沿问题，及促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话。所以，研究院的创

* “类人”是巴西当代印第安领袖艾奥顿·克莱纳克（Ailton Krenak）发明的术语，用以指代印第安人、被奴役者等并不全面享受人类权益的弱势群体。在克莱纳克看来，这些群体目前并未被当做真正的人来看待。



东大校园樱花满开

办计划中，就列出了东京カレッジ应当关注的问题包括“数字革命”、“跨学科方法”，“从内与外看日本”以及“朝向2050年的人文学”等等。院长羽田正教授是伊斯兰世界史的专家，一直在日本提倡“新世界史”，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应当培养“地球居民”，而这个“地球居民”的英文，不是 world citizen 而是 residents of earth。为了培养未来的“地球居民”，学者的责任就是普及世界上一切美好而有意义的学问，传播共享资源和关爱地球的文化。所以，从这个研究所成立起，就一方面聘请各学科各领域的顶尖学者，进行面向公众的演讲，一方面聘请不同领域的各国教授，在一起进行跨学科跨地域的交流。

如果看东京大学东京カレッジ的网页 (<https://www.tc.u-tokyo.ac.jp/>)，你就会看到，前面提到的院长羽田正是伊斯兰及世界史专家，而两位副院长佐野雅己和大竹晓，则分别是资深的物理学家和科技政策专家。邀请担任名誉院长的是 Sir Anthony J. Leggett，一个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低温物理学界的领袖。而研究所成员则囊括了三位东京大学的卓越教授，一位是前面我们提到的诺贝尔奖得主梶田隆章，其他两位是物理学家十仓好纪和化学家藤田诚，他们都获得过日本学士院赏和紫绶勋章，也是日本科学界寄予厚望的学者。此外，还有环境学家味埜俊和经济学家星岳雄。至于海外邀请的学者，目前虽然以人文学界为主，当然也不乏自然科学家，除了现在在任的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日本近现代经济史专家 Andrew Gordon，和德国杜宾根大学教授、日本语言与文化研究专家 Viktoria E-Szabo，以及我本人之外，2019年11月也曾经邀请过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科学史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原会长及诺贝尔博物馆第一代馆长 Svante Lindqvist，以及国际关系学家、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的日本专家朴哲熙 (PARK Cheol Hee)。

三

学科交叉与跨越专业领域，面对公众与议论社会问题，立足日本却始终怀抱世界，这也许是这个研究院成立以来，不断推进的方向。

除了面向公众的演讲之外，我在这里和同事也有过几次讨论，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也有的话题相当有意思。这里简单

介绍两例。有一位年轻学者讨论桦太岛（库页岛）的阿依努人问题，其中涉及族群的“认同”问题。他提到明治时期，日本政府面对俄国的时候，就强调阿依努人是“日本人”，而面对国内国民的时候，则视阿依努人为“野蛮人”。这种有关“我者”与“他者”的处理，让我不由想到，库页岛的曾经名称既是库页岛（大清），也是萨哈林岛（俄国）或是桦太岛（日本），当这一区域的国家归属不断变动时，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少数民族，认同和身份问题可能相当复杂。现在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新趋向是，不止是追寻他们的族群源头，更注意他们自身的认同建构，所以需要追问的问题是，现在在桦太岛和北海道的阿依努人各有多少，他们自己如何定位自己的族群身份？同时也要追问的是，日本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极少数非大和民族人？是优待并鼓励他们保持身份和文化，还是强力推行国民同一性的身份并改造他们？而另一次午餐讨论会上，又有一位年轻学者介绍近代伊朗的博物馆历史，这也让我想到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博物馆当然是近代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它实际上承担了“国家认同与制造历史”以及“保存古物和发扬传统”两种功能，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就是两种功能的代表。不过，在中国官方的大型的博物馆中，似乎现代艺术的陈列不多，还是传统艺术品和文物为主，这一点和巴列维时代（1977）的伊朗博物馆开始逐渐接受现代甚至当代艺术不太一样，那么，这一差异在意识形态上它象征了什么呢？

最让我有兴趣的，当然是有关“认同”问题的 seminar。2月4日，第一次讨论由羽田正教授与我各讲20分钟。羽田正从他访问墨西哥时，询问墨西哥学者“什么是你们国家的认同”，得到的回答居然是“Being Divers”开始说起，介绍了各种语言中的“认同”概念；我则简单介绍了“认同”概念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被关注的过程，“identity”的中文翻译，中国“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历史来源，以及中国认同讨论中需要警惕的趋向。也许，羽田正教授是世界史专家，精通法语、英语、波斯语，显然更关心理论与语言，而我是中国历史学者，更关心族群与国家认同的历史形成，大概彼此关注的重心还是有差异，所以，第一次讨论虽然热闹，却像三岔口摸黑打仗，还没有找到问题的交集点。不过很显然，大家都有兴趣，都期待着不久进行“认同”问题的第二次 seminar。

四

新冠病毒疫情弥漫的三月，正值日本的樱花时节，东京大学校园的樱花如云如雾正在满开，不远处的不忍池和上野恩赐公园，更是日本赏樱的名胜之地。因为疫情紧张，日本政府和东京都力劝民众“自肃”即自我克制，因此，原来杯觥交错、游人如织的“花见”盛况不再。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我去了一趟上野，看着公园樱花大道的满树樱花，看到为防止聚众设置的绿色路障，以及樱花树下空无一人的冷清景象，让人看了多少有些惆怅和伤感。偏偏是在三月末的一天，很意外，东京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据电视上说，这是三十

年未曾有过三月末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粉红色的樱花花瓣上，这种樱花吹雪却无人观赏的场景，仿佛有一种浸入骨髓的凄清美感，让人清凉，也让人怅惘。

二月下旬以来，很多讲座都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暂停，2月27日，印度塔塔集团主席 N. Chandrasekaran 关于 21 世纪数字革命的讲座，3月10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David Damrosch 关于日本文学与世界的讲座，3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Sheila Blair 关于艺术品中的蒙古帝国讲座，都无奈地取消了，原计划中我的第一次公开讲座《朝贡圈最后的盛会》当然也只好中止。不过，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四月，东京学院仍然计划用 Zoom 讨

论学术，明天举行的这一次“认同”话题 seminar，由哈佛大学 Andrew Gordon 和德国杜宾根大学 Viktoria E-Szabo 主讲。在疫情蔓延与樱花飘落的时候，思考仍在继续，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的讨论班，也仍然透过视频进行。

4月2日于东京

补记：在这篇介绍文字写完之后，东京カレッジ迎来了八位新人，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助教、研究员和博士后；4月3日，第二次“Identity”讨论会通过 zoom 顺利进行，而第三次“identity”问题的讨论会，也将在4月17日再次进行。

戴燕 | 大疫之下的东京读书记

戴燕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曾担任“文研讲座”主讲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古文学、近代学术史、日本汉学。

一

原以为过完寒假就回学校上课，没想到新冠肺炎来势汹汹，且绵延不退，人只能被迫滞留在东京。到了4月上旬，东京等七都府县进入紧急事态，东京大学忽然关闭，最要命的是东大图书馆也停止了借阅，周围书店又陆续关张，客居异乡的我，于是，手里面只剩下一本书，就是《十八史略》。

当初借这本书，是因为过去读一些明治时代学者的东西，曾留下过一个印象，就是在那珂通世《中国（支那）通史》出版以前，这是他们提到最多的一本中国史，就像《论语》一样，几乎是必读的教科书。这让我在心中始终有一个悬念，很想知道，在中国并没有太大名气的这么一本书，它到底是怎样讲元代以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使它在大约 16 世纪传入日本以后，

一直到近代，都为日本人所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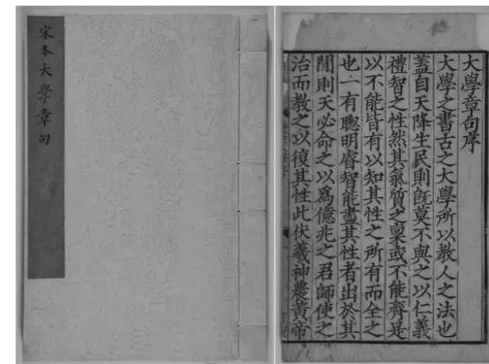
在图书馆借到的这一本，是由竹内弘行翻译、注释及解说的讲谈社学术文库本（2008）。借时没有细看，等拿回来一翻，才知道它并不是曾先之所撰《十八史略》的全本，只是一个节选本，不过，由于竹内的译注和解说占篇幅较多，整本书也有了厚厚的五百多页。然而，大疫当前，读书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究，何况这还是一个纸本，一卷在手，总比刷手机上网，看了更让人心安，不如随遇而安、将错就错。当然，这样的结果便是，原来我要读的是曾先之，现在变成了竹内弘行。

二

但必须要说的是，竹内做的这个选注本，其实颇见功力。

他的训读和翻译，不在我的关心范围，我要说的，首先是他的注释，做得相当到位。

虽然是针对一个通俗读本，可他有的地方注得很专业，比如，书中一开头写道：“天皇氏以木德为王，岁起摄提。”他便就“木德”与五行的关系、五行与政治的关系，做了一番解释，并说明“摄提格”



宋本大学章句



戴燕教授在文研讲座现场

是太岁纪年，怎样就等于后世的甲寅。又比如，书中写到春秋时的吴，“十九世至寿梦，始称王”，他拈出“称王”一语解释，本来周王授其子爵，应该叫“吴子”，可是他自称为王，也有人认为这就是出于蛮人不肯臣服于周的习惯。像这些地方，他都是不限于字面，结合各种文化史知识，而讲得比较深。当然，也有的地方，他注得平易近人，比如，书中引《麦秀之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兮”，他也摘出渐渐、油油，解释前者是形容麦子一点点拔高，后者是形容禾黍已经长大。

对书中提到的人物、地名、职官、制度、事件等，他都是这样巨细无遗地给以注解，注文写得清楚又浅白，即便是现代的日本普通读者，我想也能通过这样的注释，克服阅读中国古书的障碍。而就是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看到《十八史略》为什么会在日本长盛不衰，有它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竹内弘行教授大概也是在有意识地保持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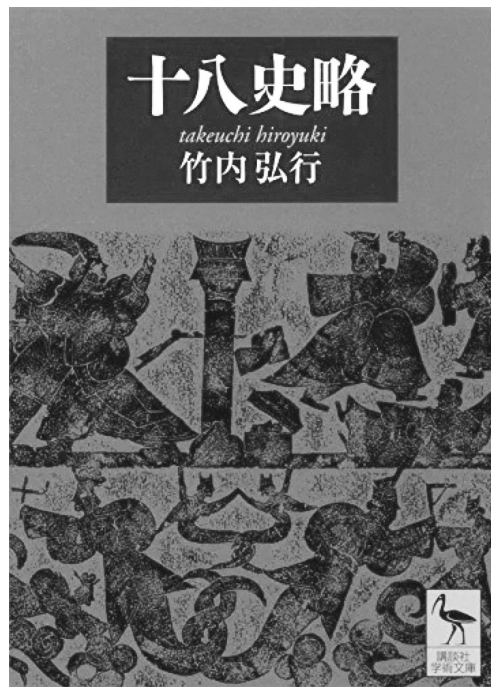
一阅读传统。

但是，竹内做得最精彩的部分，还不是注释，而是解说。他的解说，实际包含着评论。

比如，在太古这一章的解说中，他就指出：很久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没有神话，只有系统的历史叙述，的确，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重视历史的国家，留下了海量史书，就连古代神话，也穿上了历史的服装，从《十八史略》中就可以看到，从天皇、地皇、人皇，到伏羲、神农、轩辕，他们都是被按照时间顺序整编过的，都已经历史化了，以今日的考古学与严格的实证主义史学立场去看，这样的叙述没有一点价值，可是，如果换成古代神话的历史叙述这个视角，便会发现其中还是有很深的意味。

又比如，在三国这一章的解说中，他指出：古代中国是以天命所授为天子的，史家也要根据这一点来判断王朝的正统性，并引以为历史书写的轴心，陈寿的《三国志》因此是按照汉—魏—晋的系谱来写的，到了曾先之写《十八史略》，从现存的二卷本可以看到，他本来也是这么做的，问题是经后人修改过的七卷本，变成了以蜀为中心，而从学术上看，这是一种倒退。

还有一例，是在最后一章，对南宋末陆秀夫之战的解说。他认为《十八史略》写到陆秀夫在流亡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这本是有褒有贬，不过，《大学章句》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之一，也是宋代新儒家的基本教义，即后来所说“朱子学”，而视忠诚、贞节等个人品质为一种普遍道德，也就是“天理”，最后归结为绝对服从的尊王、忠君，这一“朱子学”理论，对东洋的精神世界，却曾经有过极



《十八史略》，竹内弘行译

大的影响，自然也表现在陆秀夫、文天祥这些人身上，他们都是“节义之士”。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写到过南宋的灭亡，在他看来，南宋毫无招架之力，可他就是没能看到这一点，而这也正是《十八史略》等史书的思想价值之所在。

三

竹内弘行的精彩解说比比皆是，这里只是举出几个例子。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认为他讲得精彩？

首先，他就《十八史略》做解说，当然要依靠它来讲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给传说中的历史“去魅”，而这正是现代史家的本分，即使是在一个通俗史书的讲解中，他也照样本着严肃的、批评的学

者态度。在日本，要做到这一点，可能还不是太难，因为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学者都是这个态度，只是我时常想到我们自己的环境，便觉得这是弥足珍贵。

其次，他对于传统的历史叙述，一面怀有警惕，可是另一面，也有相当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能够将它们放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认识、去评价，显示他虽然坚持科学史学的立场，却并不固执，对于历史特别是历史中的人，依然能葆有温情和关怀。

最后，他还能从更广的“东洋史”角度，发掘《十八史略》这一类传统中国史书的意义，有意思的是，他似乎还借以稍稍“批判”了一下西方中心史观，而这一点，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唯有日本学者能够做到，因为所谓“东洋史”的视角，虽然不涉及日本史，可是如果不懂传统的日本汉学，那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当然，我自己是读他的书而有所得，起码原来心中的悬念、

疑问，在这里涣然冰释。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这一行的专家，事实上，并不了解在我看来如此精彩的解说和评论，有多少已经属于学界共识，又有多少是竹内教授个人的意见。好在我不是要写一篇认真的专业性书评，我只是觉得一个通俗史书的选本，可以注释得这么有耐心，而又解说得这么高质量，很是让人佩服。尤其是在日本现在扩大到全国进入紧急事态，政府一再呼吁“不要不急外出自肃”，而人们的心情却是在忍耐和焦虑中摇摆，漫漫长日不知何时结束，在这样前所未有的时刻，能够读到既谈不上经典又和时尚话题绝不沾边的这么一本书，对我来说，本来也是“不(重)要不急(需)”，但读过之后竟很有收获的这么一本书，无论如何，都算得上幸运。

4月20日于东京

章永乐 | 南特高研院访学记

章永乐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曾担任“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研究领域包括公法与政治理论、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近代宪法史—思想史、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撰写本文时为法国南特高研院访问学者。

我经常在半夜时分下楼，到卢瓦尔河边透气。对面南特岛上的灯火倒映在湍急的水面上，就像过年时孩子们点燃的烟花棒喷出的火花。除了水流声，以及偶尔疾

驰而过的汽车的声音，再也没有别的声响。

而在生活秩序还正常的时候，总有人倚着栏杆，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当我走过的时候，总有人跟我打招呼“Bonjour”，

不管是否认识我。这是处于外省的南特比大都会巴黎更让人暖心的一个现象。然而现在，这些问候都消失了。卢瓦尔河从城市中间穿过，将寂静分成两半。

我的访学时间刚刚过半。回忆和回味似乎都开始得太早了，然而在特殊时期，一切都这么自然地发生了。

我在2020年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抵达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受到已经在这里驻扎三个月的一群同事的欢迎。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高等研究机构，座落在卢瓦尔河（La Loire）与埃德河（L'Erdre）的汇合处，正对着南特岛，研究院和研究员公寓在同一个联体大楼里，只是要从不同的门进出，根本不存在任何上下班交通问题。研究员的构成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占到一半左右的比例。在这里，可以和阿根廷学者讨论罗马教廷，和印度学者讨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斯里兰卡学者讨论“发展地理学”，和埃及学者讨论中东在上个十年的动荡，和喀麦隆学者讨论他们的去殖民化经历……在这里，我与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任教的朋友王璞汇合，我们的话题就更为天马行空，从三大战役到荷尔德林，无所不有。

是我的博士导师之一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把我“诱”到这里。2012-13学年，他曾经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年，甚至和另一位访问研究员苏莱曼·穆拉德（Suleiman Mourad，黎巴嫩人）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Mosaic of Islam*（London: Verso, 2016）。在这本书里，安德森主要负责



章永乐副教授

发问，苏莱曼·穆拉德进行回答，两人对伊斯兰的历史与当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在安德森的所有作品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在2月份的一次共餐会上，我见到了来法国开会的穆拉德，和他面对面畅聊了地中海世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种种历史纠缠，这次对话带来了许多思想上的惊喜。要继续类似的讨论，在南特高研院并不困难，好几位来自印度的同事就是穆斯林，在印度莫迪政府修改《公民身份法》引发的宗教和族群冲突中，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正体现了南特高等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比于我在2014-15学年访问的柏林高等研究院，它的北大西洋色彩更淡一些，更面向地中海世界，也更面向于全球南方。这当然跟法国的地理位置与历史传统有关：法国既是个大西洋国家，也是一个地中海国家，曾经在非洲、

亚洲、美洲、大洋洲许多地方拥有殖民地，现在仍然有不少“海外领地”。地中海的位置使得它需要关注中东，关注非洲，关注伊斯兰，而殖民帝国的经历，使得它与一系列有法兰西殖民帝国遗产的亚非拉国家拥有语言与文化上的联系。但南特高研院并不是一个逝去的帝国追忆自己昔日辉煌的地方，大量第三世界学者的存在所带来的结果是，在这里，反帝反殖差不多是不言自明的共识。

抵达南特之后，我参加的第一个集体活动就是观看和讨论埃及导演优素福·沙欣（Youssef Chahine）在2007年11月发行的电影《混乱》（Le Chaos）。这是在穆巴拉克政权之下拍摄的一场影片，揭露了埃及警察和官僚对于民众的压迫，影片的最后，社区的民众动员起来占领了警察局，而滥用权力的警察Hatim举枪自杀。这部影片几乎是2011年末中东爆发的茉莉花革命的预言。在埃及，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一度上台执政，但很快被军方重新赶下台。比影片的内容更为令人窒息的，是这部影片所遭遇的命运：在穆巴拉克统治之下，这部影片被允许播放，它预言了一场反对穆巴拉克的革命，但这场革命的结果却是这部影片变成了禁片。研究员们看完了电影一起讨论，每一个话题都很复杂也很沉重：依附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压迫性的政治统治、宗教势力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讨论不仅是关于埃及和中东，它也使得我对地中海世界的整体性有了一种切身的体验。

我们差不多每周都能见到研究院的创始人阿兰·苏彼欧（Alain Supi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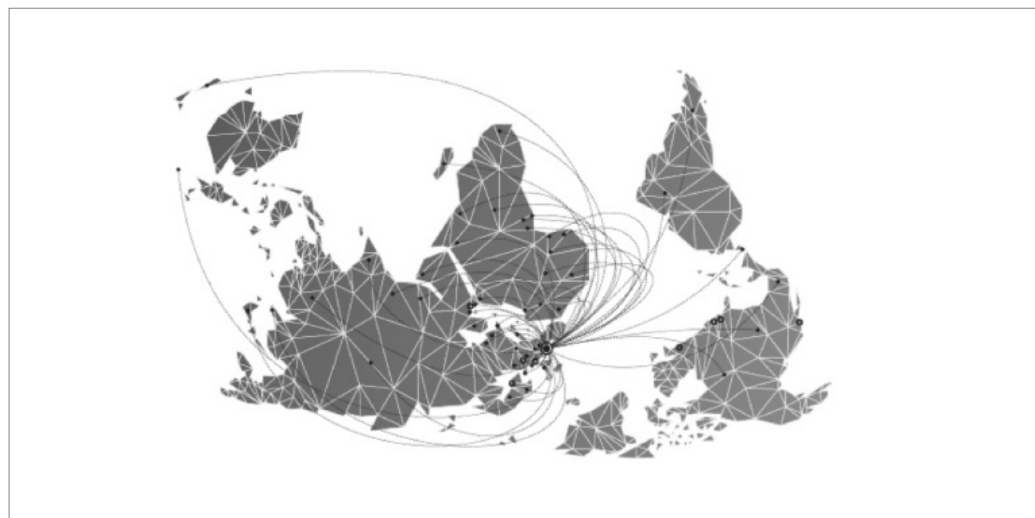
他是一名具有哲学家气质和思维深度的法学家，中等身材，络腮胡已经花白，待人非常谦和。他的经典著作 *Homo Juridicus: Essai sur la fonction anthropologique du Droit*（目前中译名“法律人：试论法的人类学功能”）刚刚出中译本。在新冠病毒在中国和意大利爆发时，苏彼欧在共餐会上见到我和另一位意大利同事，就跟我们说：来来来，特别欢迎我们的中国和意大利朋友。于是我们就坐在他的旁边。这就是苏彼欧的风格，总是让人如沐春风。

苏彼欧目前担任研究院的战略委员会主席。当初，在法国社会党若斯潘（Lionel Jospin）内阁的教育部长邀请他为法国学术研究的未来出谋划策时，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巴黎创建一个与柏林高等研究院类似的研究院。然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巴黎高师等单位纷纷表示反对，因为它们觉得自己是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机构，有何必要再创建一个新的呢？几年之后，社会党的让-马克·艾罗（Jean-Marc Ayrault）执政的南特市政府接过了这个思路，委任苏彼欧创建这个研究院。于是，事就这样成了。安德森在其《伦敦书评》上发表的“Diary: Forget about Paris（日记：忘记巴黎）”一文中对此高度评价——毕竟，法国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巴黎集中了全国方方面面的精华资源，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在外省建立一个这样的高等研究机构，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他同时认为，在英国，金融资本造成了全国资源高度集中于伦敦，在首都之外建立类似的机构，甚至比在法国更难以想象。

与柏林高等研究院周二聚会不同，南特高等研究院是周一早上 10 点聚会，全体研究员听一位同事做学术报告，讨论到 12 点半左右，演讲一个钟头，休息 5 分钟，接下来讨论一个半钟头。报告会的程序与柏林高等研究院一样，也是由一位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介绍演讲人，并协调后续讨论。演讲和讨论用法语或英语进行，配有同声传译，相当一部分同事会选择用法语演讲或讨论。在柏林高研院，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事从事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研究，我在柏林的一年，听了很多场自然科学的学术报告，这当然能开阔视野，但如果自己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一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的话，寻找结合点未必是那么容易。但南特高研院是清一色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大家寻找交叉的研究兴趣会比较快。同时，由于大量同事来自发展中国家，讨论也会有一些新的特色——在北美和欧洲主流学界，发展中国

家的知识分子通常是在“区域研究”中被给予一席之地，但南特高研院试图打破这一窠臼，给来自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从自己的经验研究中提炼普遍理论提供一个孵化器 and 展示平台，推进知识上的南北对话。

在周一上午的思想“会饮”之后，我们就会开始一周的第一次共餐。周二晚上通常有研讨会或观影活动。研讨会有时候会在埃德河另一边的 Le Lieu Unique（直译：独特的地方）举办，这个“独特的地方”原来是 Lefèvre Utile 饼干公司的厂房，在“去工业化”之后，变成了艺术文化活动中心，属于南特的文化地标之一。南特“三大洲电影节”（Festival des 3 Continents）的部分活动在这里举行，中国导演侯孝贤、贾樟柯正是从这个电影节起步，进而在欧洲获得广泛声誉。研讨会或观影活动结束后，举行第二次共餐，会饮经常持续到晚上 10 点半乃至 11 点。遇有研讨会的情况，我们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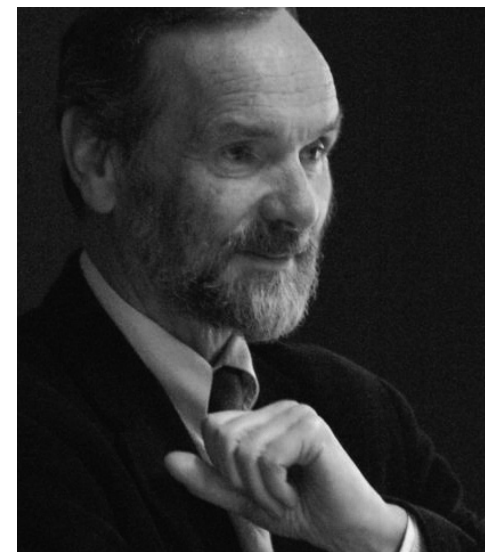


南特研究院的标志图——颠倒的世界地图

经常在共餐会上看到苏彼欧西装革履，热情地招呼临时来访的外地学者。

第三次共餐是在周四中午。周三和周五通常没有集体活动。如果临时有事去不了共餐会，就要通知行政人员，以免造成食物浪费。这样，研究院实际上是用共餐，不动声色地掌握了每位研究员的出勤状况。这没有任何让人不适之处。自从抵达研究院以来，我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共餐，因为这的确是身心的双重享受——大家一边享受纯正的法餐，一边漫无边际地聊天。一到周末，同事们都会纷纷出游，在法国乃至欧洲各地看城堡、教堂、博物馆，下周共餐的时候就可以分享漫游经历和各种怀古感想，这时候我们的法国同事就经常要扮演百晓生的角色，给大家解答各种历史疑惑。在各种自发和随机的对话中，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没有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同事，我大概不会对莫迪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多么深的感受；没有信奉天主教的阿根廷同事，我大概也很难深入体会来自阿根廷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拉丁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没有我的非洲同事，我也无法知道西非正在进行着的经济上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影响，以及给当地知识分子留下的印象。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同事来说，毛主义是他们当年共同的知识背景，但对当下的中国，他们的认识就有很多的分歧；西方媒体的许多双重标准的报道，很明显也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会饮”所饮的不仅是酒。有一天晚上，苏彼欧邀请一位法国钢琴家来院里，



南特高研院创始人阿兰·苏彼欧

和同事们共进晚餐之后，钢琴家即兴弹了五六首曲子。音乐响起，同事们或站或坐或“葛优躺”，有人托着下巴，有人闭上双目，有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钢琴家的双手在琴键上跳跃，各各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之中。

但这不幸成了未能持续的美好时刻。到 3 月中旬，随着法国高校的全面关闭，研究院也面临着是否停止集体活动的选择。一些同事希望能够持续报告会和共餐，而一位同事在春假时刚去过意大利，对意大利接下来疫情大爆发深感恐惧，强烈要求暂停集体活动。我和另一位中国同事刚刚从 2 月份国内各种抗疫信息的轰炸中缓过神来，我们向行政班子提交意见，认为基于中国的经验，暂停集体活动是比较稳妥的。3 月 16 日，高研院通知停止一切集体活动。而且停止得比我预想的更



卢瓦尔河畔的南特高研院大楼

为彻底——我原以为，在集体活动停止之后，我们至少还可以期待保留图书服务，但是由于高研院的图书服务依赖于高校的馆际互借系统，一旦高校图书馆关闭，我们也不可能借到书了。

研究院停止聚会之后，一些研究员买了机票回自己的国家了，留守南特的人，就过上了国内人民2月份过的隔离生活。只是，我还可以从研究员们住的雷西家（Residhome）酒店公寓走下来，走两分钟的路，到我的办公室用大电脑写作。生活就这样成了两点一线，除了去家乐福买菜会碰到人，其他时候完全是离群索居。办公室的窗外，卢瓦尔河湍急奔涌，时而有狂风大作，树上的花苞悄然变成了花朵，在风中摇曳。打开我的办公室的门，可以看到楼后面的 Marcel Saupin 体育场草越长越高，每天都有几十只鸟在草丛

中觅食，很难想象在一个月之前，这里还是球队激烈对战的地方。

早在二月份武汉封城的时候，我就询问过法国同事，二战之后的法国有没有类似的封城经历，答案是否定的。3月份马克龙总统下的禁足令，在他们的一生中是前所未见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所有的法国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以中国的经验为参照，我和我的中国同事忍不住对法国的防疫措施表示一定程度的悲观——经历了二月份惊心动魄的抗疫斗争，我们知道，封城和隔离只是起步的措施，关键是应测尽测，应收尽收，将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分开，把轻症与重症分开；轻症集中隔离治疗，防止转化为重症或感染他人；重症重点监护。然而法国在测试的第一关，就展现出了巨大的局限性。在过去的十年，出于对国际供应链的过度信任，法国已经从世界上具有最多口罩储备的国家之一，变成了储备量贫乏的国家，疫情一来，医护人员的口罩都严重缺乏，至于防护服、呼吸机等战略储备，更是不容乐观。这一基础条件限制了测试能力。但法国防疫更多的是认识上的不到位，导致许多措施无法与防疫的需要相匹配。在法国，我们如果怀疑自己被感染，除非症状已经相当严重，基本上得不到检测的机会的；但危险也就在于此：如果症状很严重了，治愈的希望也就会日益减少。至于将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分开、把轻症与重症分开，进行不同的干预与治疗，看起来是遥遥无期的任务。

法国在统计上也有自身的局限，3月份通报的数据只涉及医院系统的确诊、病

亡人数，4月份才开始加入养老院等社会医疗机构的确诊、病亡人数，于是数字骤然提升，4月7日单日死亡人数达到1417人。目前，法国疫情严重程度，在欧洲仅次于西班牙与意大利。在3月初，南特街头没有任何人戴口罩，禁足之后，我一周出去买菜一次，可以看到南特街头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日益增长的确诊和死亡数字，确实让南特人害怕了。我期待这里能像意大利那样出现“阳台音乐会”，大家一起唱欧盟的盟歌《欢乐颂》和法国国歌《马赛曲》，这并没有变成现实。但每天晚上8点钟，各个住宅楼都会响起掌声，这是他们感谢一线工作人员特别是医护人员的奉献的活动。

高研院停止了面对面的集体聚会，但没有停止思考。研究员们用Zoom组织了两次线上研讨会。而苏彼欧也给大家发信，通知高研院网站设置了专栏，专门收集大家关于全球疫情的文章：

(https://www.iea-nantes.fr/fr/actualites/l-analyse-de-la-crise-sanitaire-par-nos-fellows-et-partenaires-a-travers-la-presse_921)

并建议举办一次关于全球疫情的视频研讨会，合编一本关于全球疫情的文集。禁足以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线上活动参与得不多。但我也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一些关于疫情和思考。欧洲“震中”为思想工作带来一种特有的现场感，我相信这是从北京远观时不会有的。

我一直把在高等研究院访学戏称为“修仙”——一群平时处于高校教学行政

工作重压下的学者，从各种琐碎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各种短平快的、功利的写作任务中解放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思想的“会饮”，打开新的视野。而现在，“会饮”差不多已经成为了“独酌”，而酒是苦涩的。我在“独酌”中怀念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尽情“会饮”的时光，但我知道有很多同事跟我一样，在进行着类似的思想的“独酌”，我所追踪的世情，他们也在默默地关注，“吾道不孤”。想到这一点，我的内心就会平静下来。

在这个寂静的春天，南特高研院的大楼，孤独地矗立在卢瓦尔河畔。但我相信，“会饮”终有重开的一天。通过南特高研院，我们这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相遇相识，并共同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在大瘟疫之后的世界，卢瓦尔河畔孕育的思想不会缺席。

4月12日于法国南特



季剑青 | 重建小的共同体

季剑青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参加“文研读书”活动，发稿时正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



季剑青研究员

3月23日是哈佛春假后的第一个周一，此前校方已经决定将这学期剩余的所有课程都改为网络教学，午饭后打开笔记本，在Zoom上继续旁听王德威教授的“文学与危机状态”讨论课。第一次听网课，除了偶尔发生卡顿，基本上还算顺利。当“危机状态”从理论概念变成现实境遇的时候，这门课也促使我去思考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带来的智识、情感和伦理上的挑战。

几乎没有人会想到疫情在美国会以如此的速度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3月10日哈佛校方通知春假后改成网上授课，要求所有本科生搬离宿舍，我还在幻想哈佛燕京图书馆春假后或许会继续正常开放，于

是只从自己的研习间（carrel）拿了几本最近要看的书带回家。好在哈佛图书馆的网络资源足够丰富，加上平常积累的电子书，待在家中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除了听王教授的讨论课，还有两门历史系的大课要听，上课的时间也跟以前一样。此外，与在系里认识的一位美国朋友每周两次的语言交换也照常进行，只是改成电话交谈。还有之前参加的一个ESL英语口语班，也以线上的形式继续开课。总之，虽然是宅在家中，大体上仍延续以往的节奏，保持着某种“一切正常”的感觉。窗外院墙上跳跃的松鼠，也依旧时不时跃入眼帘。

即便是偶尔出门（差不多三天一次），也有一种“街市依旧太平”的印象。我居住的萨默维尔（Somerville）是剑桥北边的小城，平常走路去哈佛校园的路上，距离戴维斯广场不远，有一家Bfresh杂货店，是我购物的固定场所。一是位置方便，二是价格便宜，再者是自助结账。最后这一点在强调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当下显得更重要，因无须与收银员交谈。店内货源基本充足，人流也没有太大变化。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店内，除我之外，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尽管CDC已经开始建议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萨默维尔平日就很安静，街上行人很少，这段时间因为州政府要求所有餐馆停止堂食，略有一点沉寂，但私家车公交车络绎

不绝，提示着这座城市仍在有序地运转。

或许这是我们——小到个人，大到城市和国家——应对危机的本能策略：把危机“正常”化，至少是维持某种正常的表象。我想起孙歌老师提出的“常态偏执”的概念。她注意到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之后，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民众都急切地想要恢复常态，这不是日本的特殊现象，而是普遍的情感结构：“人类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危机感觉，即使在现实危机没有结束的情况下，人们也会想办法在想象世界结束它”（《“常态偏执”与当今世界》，《天涯》2013年第3期）。在危机刚刚展露苗头的时候努力去淡化它，当危机出现的时候希望它尽早过去，这种心理以及它所造成的隐瞒和失误，不是在这次疫情中又再次上演了吗？

特朗普政府原计划复活节（4月12日）就全面复工，在医疗专家的强烈反对下不得不将社交隔离令延长到本月底。政客们需要面对经济下滑的压力，普通民众也无法接受危机长时间延续的前景。知名的脱口秀主持人Stephen Colbert在他最近一期的线上节目以情感抚慰收场：“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我们会很快回来，和你们一起度过这场灾难。”（“Whatever comes after this, whatever next, we will be back soon to go through all of it with you.”）

然而，至少在置身于危机之中的时刻，人们不得不停下来审视自己的真实处境和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就我个人而言，这场危机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暂时的）平静表象与网络世界上的汹涌信息之间的强烈反

差而得以显现的。这种反差有时甚至给我一种不真实的错觉，那看不见的病毒和它造成的巨大灾难，我多半是通过网络上海量的信息来确认它们的存在（就此而言，身处中国抑或美国并没有本质差别）。那些并未染上病毒但被迫或主动地自我隔离的人们，大概也有类似的经验。吊诡的是，正是在彼此的隔离中，我们确认了与遥远的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多么密切的——在这场疫情中甚至是致命的——关联。

这种危机被感知的独特方式，是对我们的认知系统和道德想象力的巨大考验。每天通过社交媒体奔涌而来的信息，调动起我们的悲伤、愤怒、失望、感动等多种情绪。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人的共



萨默维尔街景

情心是一种有限的资源。本雅明很早就认识到，现代新闻业并没有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反而使得我们的经验日益萎缩，想象力趋于瘫痪。报纸上的报道无法像亲耳听到的故事那样嵌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互联网将人的这种“无法同化周围世界的材料”（《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的无力感又放大了无数倍，更何况在网络成为我们感知疫情几乎唯一的渠道的时候。我真的能仅仅通过网络，对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境遇感同身受吗？当我在朋友圈转发一篇文章，或在豆瓣转发一条消息，有时候我怀疑自己究竟是出于某种道义责任，还是只是在经营自己的“人设”。

面对波谲云诡真伪杂陈的疫情信息，我看到许多人急匆匆地将它们纳入到预设的认知轨道和叙述框架中，发出简单明确的信号来召唤别人的认同，也让自己安心。不见得是有意识的误导，或许更多还是一种无意识的“转危为安”的行为。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一种信息化时代的生存策略：自动屏蔽“不愉快的事实”，保护自己的“正常”心智不受到挑战。总有足够的信息来强化自己的成见，经营让自己舒服的世界观。危机总会过去的。

我不能说所有的反应都是趋向于这种常态化的认知。我为李文亮医生的遭遇感到愤怒，也为《我们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那段视频而感动落泪，作为自发的情感，它们并不冲突。也许我们需要做的是像呵护火苗一样呵护它们，不要太过匆忙地将它们用作维持或助推某种现成的大论述的燃料。如果我们暂时看不清整体的图景，不妨尝试在具

体而真实的感应和联结中建立某种“小的共同体”，同声抗议或相互拥抱，而不必把某个大词树作敌人或奉为神明。

事实上也已经有很多人在这样做了。我看到国内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在抗疫中释放出的惊人能量，也有认识的朋友通过微信群组为医疗物资的筹措与分发不遗余力；我也知道在我所在的社区，高岩教会（High Rock Church）在为所有受到疫情影响的居民提供物质支持和精神抚慰，依托美国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邻里之间的守望关爱正在成为抗击病毒的最可信赖的依靠。这些小规模共同体真正发挥了互联网的媒介潜能，并且跨越种族和国界。当这场全球疫情正在冲击种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旧的边界的时候，重建小的共同体显得如此迫切。

在疫情出现之前，每次早上步行去哈佛校园的路上，差不多就在Bfresh的门口，总能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站在那里叫卖《萨默维尔时报》。他戴着一顶绒帽，穿着破旧，但声音洪亮，底气十足，每当行人经过的时候，便有意提高音量。无论晴日还是雨雪天气，他都会准时出现。我想他可能会认出我，但我只是目不斜视地径自走过。最近我去超市却再没遇见他，或许受疫情的影响生意被叫停了吧。我期待着当哈佛校园重新开放的时候，这位老人也能回来，那时我一定要跟他打个招呼，并从他的手中买一份报纸。

本文于2020年4月6日刊发于文研院公众号



陈诗沛 | 数字人文与历史上的灾害研究

在此特殊时期，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多位学者为文研院的读者录制了视频，从科学史、医学史、数字人文等多学科角度，探讨和分析疫病、灾难的成因和影响，让我们看到国际学术共同体在此危机时刻的团结和友谊。本期主讲人为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陈诗沛研究员。她与读者分享了如何利用新近开发的数位工具LoGaRT研究中国历史中有关蝗灾的记载。本文字稿根据主讲人提供的视频整理而成。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有关如何绘制全中国蝗神庙的历史地图的小文，这篇论文也是关于如何在数字时代，用数字方法提供新的视野，来研究以往已经被大家充分使用的历史材料。蝗灾是中国自古以来常见的天然灾害之一，前阵子新闻也报道了来自非洲的四千亿蝗虫大军，一路向东入侵到了印度，幸而在入侵中国之前被多数歼灭。在中国历史上早自秦汉时期便有蝗灾的记载，而蝗神庙便是受蝗灾打击严重的地区、人民试图用贿赂的方法来平息蝗灾的一种手段。通过绘制全中国的蝗神庙地图，能帮助我们知道历史上哪些地区常受到蝗灾的袭击，当中国步入现代化之后，这样的历史数据也成为与现代科学数据接壤的重要领域。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从哪里知道中国历史上哪里有蝗灾、哪里有蝗神庙呢？1960年代的一位地理学家陈正祥，想到了利用现存的旧方志来搜集历史上的蝗灾与蝗神庙数据，他徒手翻阅了当时藏在香港、台湾、日本的三千套旧方志，将所有有蝗神庙的地点都记录下来，绘制成了中国蝗神庙分布图。

我在马普所的地方志项目，是研究如何运用已经全文数字化的方志，发展数字



陈诗沛研究员

时代下才可能实现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个项目有两个重点，其一是突破以往人力阅读的限制，将所有现存、已经数字化的方志视为一个整体，一起来回答关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大尺度的问题，其二是发展适合的数字工具，来支持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发展的这套地方志研究工具集叫做LoGaRT。我2016年发表的这篇论文，是利用当时还是雏形的LoGaRT做的。当时在LoGaRT只能查到爱如生中国方志库的第一级、共两千套数字方志的全文，但就

现存、估计有八千至一万套的旧方志而言，这在统计上已经是很大的数量，足够我们作大规模的观察了。

我用 LoGaRT 绘制的蝗神庙地图，使用了陈正祥老师在他文章中提到的四个关键词在两千套的方志中进行全文检索，包括蝗神庙、八蜡庙、刘猛将军庙、与虫王庙。我绘制出来的地图与陈正祥老师的图相比，主要的地域分布情况是差不多的，即便他用的三千套方志与我用的两千套方志在数量上有相当的差距，而且并不知道他用的方志究竟是哪三千套。这带出了数字材料对比于纸本材料的优势：当有全文数字化的文本时，研究者能够透过计算机，很快找到特定关键词出现的位置，因此能很快验证或者反证我们对材料的了解与假设，再进一步修正。陈老师当初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搜集的数据，现在只需要花几分钟便能有初步结果，当然，后续的阅读与验证还是需要时间的。

另一个数字工具的优势，是我们可以将搜集到的数据进行不同方面的可视化，譬如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地图的可视化工具，它也支持了圆饼图与时间轴工具，并且它的用户界面是交互式的，任何人都可以再进行进一步缩放地图、或者用个人感兴趣的条件筛选数据点，最重要的是，这类可视化工具的背后一定保存了原始数据，让大家可以仔细检验，未来如果有研究者想补充其他来源的数据，也能够再加入。

马普所的薛凤老师、上海交大的车群老师、跟我最近也用 LoGaRT 搜集了在地方志中提到的桑灾数据。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虽然利用全文检索可以很快从现有的数字化方志中搜集数据，

但对于数据整体呈现模式的解读，不应该简化成为对量化数字的解读。这是因为地方志的每一笔纪录，根据其主题、地区、年代，都有不同的产生背景，身为人文学者，我们必须了解这种不一致性，避免做出单纯根据量化数据而导出天真的结论。譬如，我们注意到各朝地方志都集中的报告元代发生的桑灾，乍看之下似乎印证明代史家所说：元代非正统、因而灾祸不断的论点，但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其实是因为元代为了普及制丝业，政府对于桑灾有系统性的补偿措施，因而才促使地方对于桑灾有较完整的报告，保留在方志里。从这里，我们可以再回头看现在世界各国对于新冠疫情的病例数据，他们产生的背景都是一致的吗？不同国家对于确诊的计算方法都有所不同，有些地区很积极的对任何可能的病患做新冠病毒的检测，而有些地区只对有接触史的人作检测；有些地区只有中央的疾病管制局能够检测，而其他地区却有普及的检测站，这些都会影响各国报告的确诊人数。因此，我想让大家 take away 的 message 就是，当您在看现在火热的大数据时，不论是新冠疫情或是历史上的大数据，请记得，每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意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分析诠释的时候，请仔细考虑他们的产生背景，以变做出能反应真实的判断。谢谢大家！

本文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刊发于文研院公众号
(整理：赵相宜)

玛蒂娜·舒伦德 | 一战时期的疫苗研发

本篇文章来自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玛蒂娜·舒伦德 (Martina Schlünder) 研究员。她将和读者分享一战期间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爆发及其疫苗开发研制过程。本文字稿根据主讲人提供的英文视频整理、翻译而成。



玛蒂娜·舒伦德研究员

尽管在生命科学中有大量复杂文献关注动物作为认知模型的历史，但是关于实验室动物的“本体论”、它们的多种“存在方式”，以及它们的现实和生活条件如何介入知识生产，在科学史学中仍有一个明显的空白。我在跨物种的层面上研究生物政治问题：生物的秩序是如何被安排和被衡量的？谁可以活下去而谁不能？一个生命何时、为什么以及如何被剥夺？如何将生物个体转化为技术环境，如癌症研究中的实验室小白鼠或疫苗生产中的虱子？研究实验室本身的技术环境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同一个历史学关切：科技如何协调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

一、症状表现

“他觉得事情完全不对，但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人们不应该对他——国王，甚至皇帝——更恭敬一些吗？昨天有人把什么东西戴在他头上，也许是王冠吧？他不确定。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嫉妒？他们显然很羡慕他能飞。不然他为什么会被绑在床上？”在彼得·英格伦 (Peter Englund) 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他讲述了文森佐·达奎拉 (Vincenzo d' Aquila) 的故事。一位美籍意大利人作为战争志愿者来到意大利，很快就染上了流行性斑疹伤寒。在他的幻想中，他认

我是 Martina Schlünder，来自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我是一名科学史和医学史学者，同时也是一名医学博士，专修神经学和精神病学。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我目前正在研究临床研究的历史，特别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如何在二战后的德国建立新的跨学科临床研究形式——比如临床研究单位。

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我还隶属于后殖民规划史和动物史工作组。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研究便是来自于非人类生物政治学——生物医学中的动物。

为自己是一个国王或是一个会飞的孕妇。除了高烧，剧烈的头痛和皮疹，病人会经历一个神经兴奋的阶段，伴有偏执、谵妄和躁狂发作。

斑疹伤寒（typhus）一词——意为朦胧或烟雾——指的就是这些最显著的症状。英格伦生动地描述了斑疹伤寒病人切身的病痛感受，以及一个有斑疹伤寒病人的病房会是什么样子。病人经常不得被绑在床上，以保护医护人员不受攻击，或者防止病人因为对周围环境和身体的狂躁的错误感知而伤害自己。

二、疾病由来与应对方法

流行性斑疹伤寒作为一类疾病的医学标签，还有许多别名：“监狱热”、“饥荒和战争斑疹伤寒症”或“移动斑疹伤寒症”，这些都清楚说明了这种疾病通常在什么可怕条件下出现。与传统细菌学所认为的传染病只由病原体所定义不同，我们有必要把斑疹伤寒看作是由战争、饥荒和军营生活中的特定遭遇和密切接触所引起的。“移动性斑疹伤寒”的含义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难民、流动的军队或为寻找食物而四处流浪的饥民等大规模人口流动是产生斑疹伤寒的关键因素。

流动堵塞、基础设施崩溃等，会引发多种危险接触，包括病原体——立克次体携带者（虱子和人类）——以及他们的衣服等之间的接触。这些情况使致命的密切接触更有可能发生，其相互“束缚”也更稳定，最终导致斑疹伤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冬天，塞尔维亚的流行性斑疹伤寒大爆发中，

情况尤其如此。在大约6个月内，超过150,000人死亡。基础设施的缺乏——不仅是在交通方面，而且在住房、避难所和公共卫生方面，更广泛地导致了斑疹伤寒流行病的爆发。这一情况引起了大量国际关注。来自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卫生委员会被派往塞尔维亚。除了人道主义使命之外，这些委员会还具有科学旨趣，因为自从查尔斯·尼科莱（Charles Nicolle，法国细菌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在1909年发现虱子为斑疹伤寒病媒以来，塞尔维亚的疫情是第一次重大疫情。

这些委员会推出了相应的公共卫生策略，打算除去人们身上的虱子（及立克次体）。鉴于人群流动是疫病蔓延的主因，控制铁路和公路运输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火车旅客需办理通行证，发车数量也相应减少，而负担较轻的铁路基础设施则用于移动消毒车的往返。卫生列车由一节节清洁车厢组成，每节车厢都使用了一种将微生物、虱子、人体三者分离的方法，如汽蒸、消毒布、淋浴和理发。

三、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研究

实验室里的研究策略则与公共卫生领域不同。科学家们所做的并非将人、虱、菌分开，而是借助谨慎的实验操作，让三者尽可能地紧密接触。毫无疑问，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虱子成为了细菌学研究的热点（注：lousy一词有“多虱的”和“糟糕的”两重意思，这里是双关），寻找虱子携带的病原体的工作开始起步。

然而，与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细菌学奠基人）研究生涯的巅峰期



一战西线为军队建立了除虱站点

相比，如今这种细菌显得更难识别、更加凶险。1910年，霍华德·立克次（Howard Ricketts）于墨西哥进行研究期间染病去世。五年后，斯坦尼斯劳斯·冯·普罗瓦泽克（Stanislaus von Prowazek）在一座爆发疫情的德国战俘营进行研究时也感染了斑疹伤寒。1916年，巴西细菌学家罗沙·利玛（Rocha Lima）描述了一种新观察到的、“比最小的细菌还要小”的微生物，它能够侵入虱子的消化道并在其中大量繁殖。为纪念两位著名的受害者，利玛将该微生物命名为“普氏立克次体”。

尽管得到了命名，这种微生物却仍然是细菌学里的一个谜。利玛无法在固体明胶等人工培养基上培养它。因此，他的证明不符合科赫法则（Koch postulates）。这种微生物很难染色，也无法进行体外培养。立克次体难以分类、无法体外培养的特点不仅有着理论重要性，也为疾病的治疗增添了难度，更阻碍了疫苗的生产。

由于很难直接研究这种微生物本身，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携带有它的衣虱身上似乎

更为明智。衣虱寄生在人类的衣物中，它们至少一天两次离开赖以藏身的缝隙中间和纽扣下面，爬到人们的皮肤上吸血以汲取营养。

四、实验中的爱与关怀

在德国，希尔达·西科拉（Hilda Sikora）可以跻身最著名、或许也最古怪的虱子研究者之列。她于1916年出版了关于体虱解剖的最早专著之一。在25年多的时间里，希尔达不断用自己的身体培育了不下500只虱子。当然，个体的性状会不时变化。有一次，她成功在臂弯处将一支品系培育到了第十一代。希尔达还研制了一套样式各异的养虱盒，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这种被命名为“西科拉笼”（Sikora-cage）的工具是最早的养虱盒。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根据品系的规模、形态和育种目的（用于实验或疫苗生产）来调整它的样式，以满足特定的需要。这些盒子可以日夜固定在研究人员的身上，并最好固定在不会因虱子吸血干扰其他实验室活动的位置。希尔达明白，她对虱子的态度、对每只小虫的关爱令人们感到困



彼得·恩格伦《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书影

感，但她无法将求知和科研与关怀和博爱分开。希尔达的同事们用“体贴”来形容她对虱子的态度，仿佛“在爱的边缘倔强地蹒跚着”。尽管希尔达对虱子的关爱或许独一无二，但她并非唯一一位将自己作为虱子寄主的研究人员。

她的大多数男同事的身体也变成了虱子的孵化器。每种方法都是把虱子装进盒子里，把它们从疾病载体变成实验动物，成为一种技术“装置”。这个“装置”被用来了解、分离和培养斑疹伤寒的病原体。这种病原体显然生活在虱子盒中，并通过虱子盒传染给人类。

五、疫苗研发过程

疫苗通常由被削弱、死亡、灭活或碎片化的微生物制成。如何从无法培育的微生物中研发疫苗呢？由于没有已知的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立克次体的方法，必须找到一种活体形式来培养这种微生物。来自利沃夫的波兰裔德国生物学家鲁道夫·魏格勒（Rudolf Weigl）想出了一种方法来操纵这种“人类-虱子-微生物”盒型装置，并将这种可能

致命的缠结转化为可生产疫苗的组合。

疫苗研究方向上最重要的一步是魏格勒在 1919 年开发的用于虱子的直肠内接种技术。这就允许人们将由感染立克次氏体的虱子制成的悬浮液注射到健康虱子的直肠中，从而将它们变成一个装有危险而珍贵的微生物的盒子。

通过这种方法，魏格勒系统地培养和建立了微生物的种群。他不再依赖于斑疹伤寒病人——这些病人的血液曾被用来感染健康的虱子，以供研究之用。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波兰政府不断敦促他测试疫苗。他根据福特主义式的分工（Fordist division of labour）重组了他的实验室，并加快了疫苗的生产，使其更安全、更有效。生产在所谓的“繁殖单位”开始，这里包括一个监督员和 12 到 15 个虱子饲养员。繁殖单元产生健康的虱子，然后转移到“注射单元”。在那里，经过专门训练的“注射员”用受感染的立克次氏体悬浮液人工接种虱子。他们还负责用他们的血液喂养得到注射（患病）的虱子。因此，在注射单位工作的人都曾感染斑疹伤寒，他们因此获得了对立克次体的免疫。

熟练和有经验的注射者每小时能注射 2000 个虱子。五天后，患病的虱子被带到“解剖站”，在那里受过专门训练的解剖员将收集含立克次体浓度最高的虱子内脏。平均来说，一名训练有素的解剖员每小时可以处理 300 个虱子。一支标准的斑疹伤寒疫苗包括三周内三次注射，相当于需要 90 个虱子的内脏，所以一名解剖员每天可以为大约 30 人准备疫苗。即使在根据“福特主义”重组了他的实验室之后，魏格勒疫苗的生产仍然非常困难和繁琐。

六、疾病的消灭方法

随着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战以来，德国一直并未十分重视流行斑疹伤寒的研究，同时这种疾病不是德国特有，研究也很难开展。现在，面临着下一次大战，德方显然没能做好足够的准备保护自己的士兵。流行伤寒卷土重来，疫苗的生产成为了战备后勤的关键。现在魏格勒疫苗是已知所有疫苗当中最可靠的，其他尚在临床测试中。由于疫苗的制作方法过于精细复杂，加上魏格勒本人“臭名昭著”的完美主义倾向、不愿意轻易将其公开，德军难以掌握生产疫苗的技术，只得完全依赖于魏格勒自己的实验室扩大产量。

大约有 3000 名“虱子饲养员”得到了德军的官方证书，用于证明他们参与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后勤军备事业。魏格勒的实验室成了折磨非犹太籍波兰人的合法场地，魏格勒的助手在战后曾表示，它是另一场噩梦：“那些需要存款的人都成为了‘虱子饲养员’”。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研究显示，魏格勒复杂的物种活体组合还存在另外的排列方式。大部分测试疫苗不同序列的实验都是在这里进行的。除了作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所谓的“中间人”还需要受到微生物感染。他们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活体容器储藏病原体，因为病原体只有在活细胞中才能生长。如果他们生命垂危，在死之前会有新的“中间人”来承受病原体。可见，这些“中间人”在魏格勒疫苗生产线中的地位就像虱子一样。

在魏格勒的人-虱子-微生物的活体组合中，犹太人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按照纳粹的“种族清洗”和反人性大屠杀的逻辑，

与其说犹太人是肮脏污秽、因而吸引虱子和斑疹伤寒的，不如说他们就是“虱子”本身。魏格勒的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所谓的隐喻与现实、“容器”与“内容物”之间不再有边界，所有（的人与事）都被简化为寄生虫的容器。

七、结语

传统的病菌史和流行病传染史研究往往采用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在物种之间画出明确的界限、有明确的“英雄”与“恶魔”角色叙事。我在这里讲的故事则不太一样。例如，照护和关爱同样可以在人和虱子之间产生，而自相残杀的行为也发生在人类身上。因此，无需引用大量的后人类研究文献，我们就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非人化行为是否与人类中心主义相伴相生？在多大程度上二者相互关联？“后人类”的视角又能否带领我们走出这条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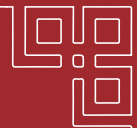
后人类研究往往高度谴责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主体-客体、人-动物、自然-文化二分法，而我们有必要探究，这种深嵌于启蒙运动中的偏见是否推动形成了在欧洲历史悠久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殖民主义。我的研究可以作为一扇窗口，去更好地检视后人类主义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反思西方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复杂联系，以及隐藏于它们内部的暴力。

本文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刊发于文研院公众号
（翻译：陆兵哲 刘子辰 魏玉槐 陈至清
整理：赵相宜）





文研学术



（一）文研讲座

166

王立铭 | 新冠肺炎——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海内外。值此特殊时期，文研院、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于2月15日联合举办一场线上讲座，主题为“新冠肺炎：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本次讲座为“科学·文明”系列讲座暨“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六期，由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客座教授王立铭主讲，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评议。

王立铭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背景和目的：通过梳理新冠疫情背后的医学与科学知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与对抗此次疫情。本次讲座，王立铭教授通过基础介绍、复盘梳理、防治措施、未来展望四个模块，对波涛汹涌的新冠疫情影响做出系统的梳理与呈现。

王立铭教授指出，新冠病毒是引发本次疫情的病原体，简单地说，当新冠病毒入侵人体特殊类型的细胞，包括上呼吸道上皮、肺部之后，就会引发统称为“新冠肺炎”的疾病。之后，他接连就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进化路径以及临床上的发生机制和治疗走向这三个维度，提示听众注

意，科学界和医学界对新冠病毒的完整面貌的探索仍有很大空间。

接着，王立铭教授试图以复盘疫情的方式来回应当前科学工作的优势与不足。他充分肯定了确诊病原体过程中对新技术的应用，并认为此次远比十七年前攻坚SARS疫情好得多。同时，对于“人传人”的预警，王教授认为，在检测到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之后，或许可以根据历史经验或新技术的应用做更大胆、更超前的预警，而不必等到大规模流行病学的情况发生。

谈到疾病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如何防治的问题，王立铭教授认为，在武汉决战、全国严守的防控下，新冠病毒要么会彻底销声匿迹，要么会像流感一样在人类世界长期存在。根据对比发现，新冠肺炎疾病严重程度与SARS有所不同，反而像一次比较严重的流感。当然他同时强调，流感本身并不是一种很轻微的疾病，与普通感冒不能混为一谈。另外，由于此次新冠潜在症状较轻微，还没有确诊的患者数量级可能会进一步增大，所以长期存在于人类世界也是有可能的。基于这样的判断，疫苗或特效药无疑是对抗如此大规模流行病的第一选择。但王立铭教授同时提醒听众

不可过于轻信特效药或疫苗立刻能够上市应对此次疫情。

无论是柯立志还是瑞德西韦（Remdesivir），原本都是为了应对其他疾病的“老”药，且功效也仅限于个案，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双盲随机临床实验。因此，目前来说，并没有针对新冠肺炎特效药。而疫苗的研发规律也提示我们，即便有政策的绿色通道，新冠疫苗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因此，对于当前疫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需要注意的是，“没有特效药”，并不等于“不能治”。目前采用的补液、辅助呼吸、抗病毒等支持疗法，能给予大部分患者足够的时间凭借自身免疫力消灭病毒。

在王立铭教授看来，此次疫情作为一次突发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不能单纯从科学医学角度加以理解，而须进行涉及社会全方位管理的系统性思考。他首先谈到公共舆论中的谣言传播。减少谣言，传递高质量信息的关键在于保证信息公开透明——真相要比谣言“跑”得快才行。进一步，他认为，在传递信息，尤其是涉及医学专业信息时，要用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以“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为例，这句话在科学上有道理，但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理解起来就稍显费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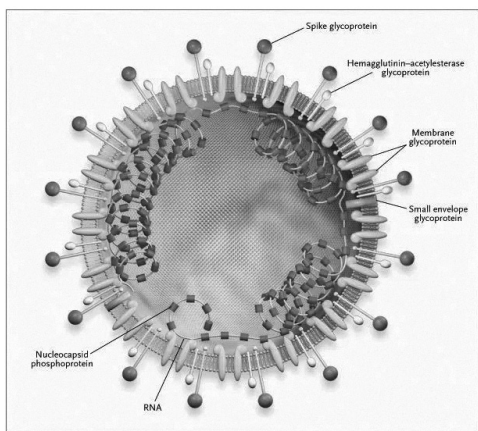
另外，王立铭教授还提到本次舆情发酵中的一个现象，即人格化形象（如钟南山）对传递有效信息的重要性。他认为，公众



王立铭教授

更愿意相信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这表明在公共突发事件中，有专业背景的人格化形象对于公众接受理解信息、防止谣言和恐慌情绪是十分重要的。最后，王立铭教授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重要性不亚于医务工作者和科学家。涉及预警与隔离时间、隔离方式、保障物资运输等，须公共管理专家配合解决。因此，未来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公共管理和科学专业分析如何有效互动将变得极为重要，比如：专家意见如何快速触达公共管理者，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平台供专家学者共同讨论等。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一个在兼顾各方的同时又基于科学决策的公共管理政策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类似的突发事件。

王立铭教授在讲演时语言简练、逻辑清晰，给诸位评议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评议环节，唐金陵教授对此表示赞赏，认为短期内的注意力还应当集中于扑灭和控制疫情，疫苗和药物开发并非当务之急。他表示，目前，疫情状况仍处在爬坡上升期，



新冠病毒结构图

但病例数和患者增速表明，过去一段时间的防治措施和力度是有效的。然而，现在仍是最严峻的时刻，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唐教授说，如果将疫情早期比作傍晚，那么现在正处在半夜十二点——我们远远没有到达黎明。尤其考虑到接下来的状况，复工和开学必然会增加传染机会。因此，他建议大家习惯新的生活方式，减少聚集机会，出门戴口罩，勤洗手、消毒，稍感不适立即去医院。唐金陵教授强调，疫情的控制仍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

随后，翟介明博士从一线临床医生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次疫情值得反思的地方在于，病毒研究机构、流行病防治机构以及临床医生之间以何种方式加强信息的共享、联动，以便做出科学研判，更快切断传染源，更有效保护易感人群。他提出了一条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科室建设的改革建议，即平战结合——在平时诊治一般疾病，但在战时应该设有应急响应系统。目前，这一措施在各省市

地区还不够完备。我们虽有顶层设计，但是落实到地方感染科设置上，却并没有针对传染性比较强、易致重症的呼吸道疾病设置完备的科室体系。此举导致以收治传染病为特点的专科医院救治能力薄弱，仍依赖综合医院专业人才支持。因此，他建议，将传染病建成大专科，并建立综合性传染病医院。最后，翟介明博士特别提到，当下我国传染科人才流失严重，若未来建立平战结合体系，要以财政措施来支持这批专业人才，鼓励他们投身于传染病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工作。

讲座最后，张静教授进行评议。她表示，科学家们的见解使其收获良多，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则在于“为什么在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层面来推动科学精神尤为重要？”她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诚实、真实、尊重事实。现代社会，人们相互依赖生存，尊重公共利益对每个人都十分关键。科学精神呼吁人们和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利益、情感以及有限的经验保持一定距离。更进一步地，她表示，科学精神需要依赖批评来推动。因此，对信息和知识的批评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知识成为决策的基础。社会政策依据知识、依据科学，才能有效保护公众健康。

本次讲座以视频录像的新形式着力呈现了科学家、医生和社会学家对于新冠疫情的不同介入方式，为听众带来思想上的启迪。当日播放量逾二十万次，引发热议。

(撰稿：孙静)

(二) 文研课程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藏

2019年10月，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深入开展文物保护与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在此背景下，文研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携手，迅速落实全方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2020年适逢紫禁城建城600周年。今年春季学期，文研院协同北大历史学系、艺术学院，与故宫研究院共同推出共同推出“明清宫廷建筑与宫殿陈设”和“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藏”两门新一期的文研课程。文研课程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程。此为其中之一“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藏”课程，由文研院和北大历史学系、故宫研究院开设，课程引入故宫研究院的学术骨干团队，由著名书画鉴定专家王连起先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段莹三位老师担任主讲。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丰富的中国古代书画。其中既有晋唐宋元的稀世孤本，也有明清各个画派名家的代表作品，可以清晰、系统地反映中国古代书法与绘画艺术发展的脉络。以徐邦达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代故宫人，积累了极为深厚的书画鉴定。

书画鉴定，古已有之，发展至今已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当代鉴定家的研究及其成果将传统的、经验性的书画鉴定上升为专门之学，他们个人堪称经典的书画鉴定范例，无疑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随着公、私古代书画藏品面，未来书画研究的范围、题材将不断拓宽、深入，成为研究者的更多契机。

该课程主要围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藏进行讲授，以徐邦达先生《古书画鉴



定概论》等著作为教材，讲解古书画鉴定与鉴藏的范畴和基本方法，包括历代重要书画家及作品简述、古书画的基本构成与题跋印鉴装潢等、古书画作伪和误定的情况、碑帖及著录文献等内容。重点围绕故宫博物院藏品，对古书画名家名作进行个案分析鉴赏与讲解。课程还将带领学生在故宫开展观摩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对古代书画名家名作和鉴藏研究方法的认识，提高艺术素养。

在这个特殊的学期，虽然老师们无法面授课程，但贯彻北京大学“延期不停教、延期不停学”的教学精神，文研课程采用线上教学方式，以“研讨授课”的形式保障同学们在疫情期间的课业学习。为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保障师生间的互动需求，老师们精心准备，为课程及文研院公众号录制音频，介绍课程内容及授课计划，推荐相关参考书目。并提前上传学习资料至北大教学网等网络平台，制定详细具体的学习要求。据统计，目前两门课程共有近二百人选课、旁听，受到了校内外师生的广泛欢迎与关注。因特殊时期无法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王连起老师特意录制开课寄

语，为课程及文研院公众号录制音频，介绍课程内容及授课计划，推荐相关参考书目。古书画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但如果拥有和收藏，则涉及书画的经济价值，因此对伪书画的鉴定很早就出现了。王连起老师指出，徐邦达先生的概论是一本全面的、系统的对古书画鉴定研究的著作，而本次课程则是在先生的概论框架讲理论，在老师的多年鉴定经验中讲实操，是一次由概论入手到实操鉴定由内而外的学习。通过王连起先生的讲述，同学们可以更多的了解本门“文研课程”的讲授内容，感受一代代故宫人积累而成的、极为深厚的书画鉴定魅力。

此外，文研院微信公众号也将围绕两门课程内容，发布系列课堂推送文章及相关文献供同学们研读，让更多关注两门文研课程的校内外师生感受故宫书画鉴藏的魅力，探寻宫廷建筑装修的学问。在紫禁城建城600周年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中，两门新一期的文研课程邀请故宫走进北大，让这座历史殿堂在青年学子中再次刮起旋风。

(整理：张若瑾)



王连起研究员



赵国英副院长



段莹副研究员

明清宫廷建筑与宫殿陈设

文研课程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程。此为2020年春节学期第二门课“明清宫廷建筑与宫殿陈设”，由文研院和北大历史学系、故宫研究院联合开设。课程引入故宫研究院的学术骨干团队，由王子林、张淑娟、李燮平三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担任主讲。在本次课程中，老师们将以紫禁城的历史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对明清宫廷建筑内檐装修、明清宫廷建筑内檐装修和明清宫殿陈设与陈设思想的仔细探讨，使同学们对故宫建筑文化知识获得更加深入的学习与认识。

中国传统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它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成就与创造，凝聚了前人的智慧。故宫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之一，始建于公元1406年，距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紫禁城建于明代，是明清两代的宫城，是一座集举办大典、皇帝处理政务、大臣上朝办公、帝后皇子皇孙燕寝、太监宫女服务、侍卫巡逻守护、工匠当差等功能为一体的庞大建筑群，建筑宏伟，装修精美，陈设完善，它是中国至今保存最完整、遗存文物最多的文化遗产。紫禁城建筑历经数代帝王，在最初宫城规制的基础上逐渐改变、发展而形成独具特



色的紫禁城模块。紫禁城的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的历史，它的文化就是一部中国的文化。本次课程旨在通过对明清紫禁城建筑、装修、陈设三个部分的解读，梳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艺术和文化内涵，挖掘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并为同学们继续深造和选题研究提供资料 and 方向。

因特殊时期无法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王子林老师特接受文研院线上采访，就“紫禁城的正名与溯源”等诸多问题一一解答。王子林老师指出，谈及故宫，首先要从它的起源和文化本质说起。明代紫禁城的营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与帝国政治中心的转移相结合，到了清代，大部分建筑已被重建或改建，逐渐形成成其自身的特点。张淑娴老师也受邀为本课程及文研院公众号录制音频，由文研院工作人员进行后期制作，形成视频。视频中，张淑娴老师简单介绍了新一期“文研课程”的部分授课内容——明清宫廷建筑内檐装修。故宫的建筑集传统技艺于大成，其建筑布局层层递进。由于中国梁架式结构特点，墙体不承重、室内空间可隔离，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室内空间的间隔艺术。从内檐外檐的装饰作用再到宫殿内部陈设的思想，明清皇宫建筑将装修与艺术相结合，将装修赋予艺术性，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皇家的空间美学。

故宫是有生命的，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息息相关，与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紧密相连。在2020年这样特殊意义的一年中，古老的故宫仍然焕发着蓬勃生机，植根于故宫的故宫学也日益呈现出自身的活力。同学们在课堂中从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等角度出发，追根溯源，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故宫宫廷建筑与宫殿陈设，感受由一代代故宫人积累而成的、厚重的故宫建筑文化。

(整理：张若瑾)



研究馆员李燮平



研究馆员王子林



研究馆员张淑娴

(三) 读书的风景

【编者按】

文研院支持过许多自发的小型读书会，师生共读文献，热烈讨论，深化对先行研究理论的理解。特殊时期，文研院开辟“读书的风景”栏目，回顾过往线下读书会成果。第一期介绍梵文写本读书会，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梵文专业师生和来自京津地区的学者发起参加。

共凝神于贝叶——记三个学期的梵文写本读书会

一、背景

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本土灭亡，梵语佛典在印度也消失殆尽。近百年来，西方学者发掘和整理了大量梵语写本，但很多重要经典至今仍无梵本可参。

“梵文大藏经”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概念，而与之相当，在佛教学者们的头脑中（或电脑中）几乎都有一个长长的书目单，记录着哪位学者在在哪年发现和发表了哪部佛经的梵文写本。这个书目单被不断地更新续写。每一次新梵文材料的发现，甚至是片叶残纸上寥寥数语，都有可能为佛教学提供珍贵的“原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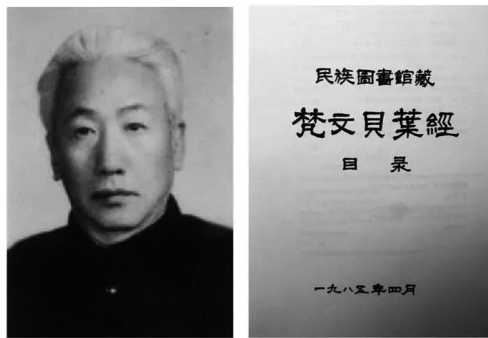
我国西藏地区现存的梵本数量多，保存状况也好，但一直没有完整公开，可称是世界上最后一座尚未完全开发的梵本宝库，也吊足了全世界佛教学者的胃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度学僧罗睺罗与意大利学者图齐曾分别造访西藏，拍摄携回大量梵本照片，引发了国际学界的研究热潮，在此基础上出版的佛典梵文校勘本达数十种，直到今天仍不断有新的发现。例如最近的一次，在图齐携回照片中发现了《佛所行赞》的大篇梵语逸文（松田和信2019年《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刊文）。

在西藏梵本领域我国有两项先驱性的工作。1961年一批梵文写本共259函被从西藏运至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王森先生为其编写了简目。1983年开始罗炤先生赴西藏各个寺院调研梵本，至1985年完成详目手稿，涵盖写本600余函，其中绝大多数是首次发现和披露。

不得不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虽然佛教传统深厚，对梵文写本研究这一学术潮流的参与度整体是不够的。由季羨林先生开创，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唯一的梵语专业，一直以来都是这一领域的生力军。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北京大学东语系组织人力物力，将民族宫梵文写本拍摄成缩微胶卷。2004年段晴教授主持成立了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以下称梵佛所），将这批珍贵资料电子化并展开研究，已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为国际学界所瞩目。

二、缘起

十几年前，笔者曾留学于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受教于已故著名佛教学者辛嶋静志先生。辛嶋先生博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季羨林先生。从2004年开始，辛嶋先生在自己的研究室召集“婆罗米读书会”（Brāhmī Club），研讨会读以中亚婆罗米字体书写的梵文写本，读书会持续了15年，至2019年夏天先生突然离世停止，产出相关学术著作十余部，在学界影响巨大。笔者有幸参加了2006-2008年的婆罗米读书会，看到十数位梵文学者齐聚在离东京市中心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偏僻小镇的校园里，不禁感慨，在当时的整个中国，有兴



王森先生为民族宫梵本编制的简目

趣有能力从事梵文写本研究的学者，恐怕也没有这么多。

近年来，北大的梵文专业不断壮大，其他各个高校和研究单位的梵文人才也在增长积累，机缘逐渐会聚。2018年夏，在北大文研院的鼎力支持下，笔者召集同道同好者在静园二院聚会，每学期6次，共同释读北大所藏梵本缩微胶卷，活动定名为“梵文写本读书会”，英语名称为 Sanskrit Manuscript Club，以向辛嶋先生致敬。读书会至今已经持续三个学期，参加者十余人，主要是北大梵文专业师生和来自京津地区高校、研究所的学者。

与会者包括北京大学南亚系教授段晴、副教授萨尔吉、助理教授范晶晶、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学竹、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研究室副研究员平措次旦、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惟善、北京藏医院副研究员刘英华、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讲师吉太才让、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讲师王俊淇、中国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涵静、南开大学哲学院讲师赵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

朱竞旻，以及北大南亚系研究生关迪、高婷、李晓楠、马艳、袁勇等。

三、主要活动和成果

1. 《瑜伽师地论》注释残本的发现

《瑜伽师地论》（后称《瑜伽论》）曾是玄奘西行印度取经的主要目的，其梵文本半数尚存。读书会上释读的民族宫第62号梵本，是《瑜伽论》梵文释论，据字体判断抄于约10世纪，残存11片贝叶，无首尾叶，未见篇名与作者。数年前笔者曾在民族宫梵本17号之中发现了仅存一叶的《瑜伽论·摄抉择分》注释，是世界范围内《瑜伽论》梵文注释的首次发现。此次新发现的11叶梵本也由笔者比定，与前述一叶并非出自同一写本。该写本的发现对于研究《瑜伽论》的流传史，订正其梵文原本有重要意义。

由于没有藏、汉译本可资参照，缩微胶卷的图像又不是十分清晰，释读有着相当的难度。笔者与张涵静博士合作对写本进行初步转写，在读书会上提出疑难处供大家讨论。



读书会现场

初步报告将于今夏在日本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值得一提的是，该写本中有一叶大段引用了《杂阿含经·杂因诵》（*Nidānaṣamyukta*）中的第一经《树经》（*Vṛkṣasūtra*）的开头部分。这一部分的梵文本最早由季羨林先生的德国导师——瓦尔施密特教授于1957年校订发表，所依据的是一片残缺严重的新疆出土梵文残叶，其上可见的字迹不足20%，缺失的文字都是由瓦尔施密特参考其他文本构拟出来。藉由此次发现的写本就可以完整补足这一段文本。

新疆出土《树经》梵文残叶，右侧是瓦尔施密特1957年的校订，仅阴影部分的文字见于写本，其他都是构拟文本

2. 梵文残本《如来大悲解说经》的发现

民族宫梵本第59号《如来大悲解说经》（*Tathāgatamahākaraṇīrdeśa*），残存12片贝叶，包含首页但未见题名，据字体判断约为10世纪之物。笔者作了初步转写并主持会读，正是在读书会上各位学者的启发之下，得以确认这些残叶出自《如来大

悲解说经》的开头部分。

该经是重要的早期大乘经典，又称《陀罗尼自在王经》（*Dhāraṇīśvararāja*）。历史上有两次汉译：公元291年的竺法护译本和5世纪初的昙无讖译本，后者被编为《大方等大集经》的第一、二品。《究竟一乘宝性论》梵本中引用了此经寥寥数句，除此以外，此次发现的写本是这部经典的梵文本首次为人所知。

3.《现观庄严论明义释》与《金洲疏》写本会读

《现观庄严论》（*Abhisamayālaṅkāra*）是印度佛教“瑜伽行中观派”的奠基之作，流传很广，有21部印度注释，以狮子贤所著《明义释》（*Vivṛti*）最负盛名，目前这部释论的梵文刊本是基于两部残损较为严重的尼泊尔写本校订而成。此外，曾为阿底峡授业师的法称论师（居于古代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故又称金洲法称），又为《明义释》撰写复注，称为《金洲疏》。

北京大学梵文专业博士生关迪在民族宫梵本的第13和17号中比定出20叶《明义释》，据之可补尼泊尔写本的缺损。同时，关迪还发现民族宫第75号写本为早已佚失的《金洲疏》。在世界范围内，这也是一件孤本，现存25叶，约为全本半数。关迪的博士论文便以这两部写本为题。在导师段晴教授的带领之下，关迪在读书会上逐句校读文本，与会学者参与讨论，提出改进意见。该论文已于2019年11月顺利完成答辩。

4.《月官发愿文》新写本的释读

西藏布达拉宫副研究员平措次旦先生

退休后驻访于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2019年9月应梵佛所邀请，平措先生来北京大学进行为期两个月的交流驻访，与笔者合作研究布达拉宫藏梵文写本《月官发愿文》（*Candragomipraṇidhāna*）。该写本只有一叶，是5世纪印度著名佛教论师、诗人和语法学家月官所作的祈祷赞颂。欧洲学者P. Szántó曾在尼泊尔发现该文献的梵文残叶，于2017年发表，但其中缺损较多，布达拉宫藏的这片贝叶基本可以补全其文。笔者与平措次旦先生合作转写这一写本，并在读书会上征求各位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成果将于今年发表。

四、结语

很多先哲所著的文献原本，也许不可避免地消失在人类文明史之中，然而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这一拼图上的缺失部分不断收窄，可见部分的脉络关系渐趋显现，其中喜悦也许只有从事一手材料解读的学者才能体会。较之独乐乐而更乐者，是与诸位同好者一起，共凝神于贝叶，将斑驳漫漶的一钩一划，连缀成句成文，携手将一篇篇久佚的文本送还于人类文明记忆之中。

本文由叶少勇撰写。叶少勇为北京大学南亚系副教授。

（四）丝路现场

【编者按】

近年来，北大的丝绸之路研究团队采取多学科配合的方法，前往丝路沿线实地考察调研，取得显著成就。疫情期间，文研院设立“丝路现场”栏目，推出北大及相关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考察时所做的纪要、随感、实录。特此摘录学者漫步丝路的纪实性文字，以飨读者。

荣新江 | 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 ——2012年初考察纪要

这次借去伊朗开会之机，在山雨欲来的风声吹拂中，我们从北到南，走马观花式地考察了部分马可·波罗在伊朗走过的地方。从学术的角度来思考，此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总结：

一、伊朗地区保存了大量中国的文物，值得我们加以整理和研究。比如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有900多件，据他们说其中元青花有30多件，其中有些是元、明王朝的赠物，有些是贸易所得，其中很多精品，我们在国家博

物馆库房中看到几件，上面有阿巴斯大帝打上的波斯文印记。这批瓷器有相当部分还放在大不里士（Tabriz）附近的伊尔汗国王宫里。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非常希望我们组织人跟他们合作，把这900多件瓷器整理出来，出版图录。海外收藏的青花瓷不少，在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宫（Topkapi Palace）也有一批，因为土耳其跟西方关系密切，所以其藏品已经过充分研究。而伊朗的部分，学界所知不多。《波斯艺术综览》里收了

一些，有些学者也看过一些，但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过，很值得合作研究刊布。而且，在伊朗的一些地方博物馆或者考古陈列室里，也有从中国来的瓷器，值得调查研究。

二、从《马可·波罗行纪》的伊朗部分来看，我们不能仅仅从一个访古的角度去看他对世界的记录，其实马可·波罗并不

访古，他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更注意的是当时的商品的情况和如何贩卖。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马可·波罗关于山川、道路的记录，这些对于商人有举足轻重意义的事项，我们不要轻易略过。比如伊朗特别重视水，马可·波罗也经常记载他们怎么保存水、利用水。我们一行在各地的波斯王宫和富有人家的庭院里看到的情景，基本上都是一进去就是一个水池。伊朗的坎儿井也十分壮观，我们在亚兹德时参观了一个水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很长的坎儿井的模型以及有关坎儿井的各种文物和图示。马可·波罗其实没有意识到坎儿井，在起儿漫的首都设拉子时，他说：“沿河地表有一些洞穴，为河流侵蚀而成，可见水流，随之又入地下。”其实这种洞穴我们在路上经常看得到，和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一样，上面盖着木板之类的东西，底下就是坎儿井的竖穴，其实他看到的就是坎儿井。伊朗坎儿井里流的水主要是地下水，不像新疆那样是天山上的雪水。波



波斯波利斯遗址

斯人在山坡上发现地下水所在的时候，就打一个深井，有阶梯下去，从地下向城中开凿。坎儿井水道在进入城里之前，都有水窖，把一部分水储存下来，然后分流进入城市，再通到很多家里面。私家的坎儿井会有一个继续流的清水，还有一个污水道，很短，慢慢就渗到地下了，非常合理。水通过这个城后，然后再分散开来浇灌农田。有些坎儿井继续向前，浇灌下一个城镇，所以有的坎儿井非常长。正是由于伊朗地区坎儿井发达，蒙古军队在攻打一些城市的时候，就会利用这些地下的通道进入城市，或者断绝城中的水源，逼其投降。

三、《马可·波罗行纪》涉及许多宗教的问题。马可·波罗从设拉子往东北走的时候，特别记载了一棵大的“独树”，这棵树在伊朗历史上有很多传说，它原来是一棵琐罗亚斯德的圣树，穆斯林来了以后要砍伐它，结果要砍伐的哈里发就死了。这种树我们在去居鲁士墓的路上也经过了一棵，类似的这种树早

在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就有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柏树树种，很高大，生存年代很长，所以它与伊朗的宗教演变史息息相关。对于马可·波罗的研究，离不开对于风物、对文物、对一些事件、对一些宗教故事的清理，特别是马可·波罗记载的教派纷争，也是一项重要的课题。马可·波罗自有其基督教的背景，所以他对穆斯林有一些不好的记载，而对于当地的基督教则多有关照，所以应当细致研究当时的不同宗教。

四、马可·波罗是蒙元时期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一个典型，而且他走过陆路，也走过海路，为我们留下丰富的记载。但马可·波罗并非当时丝绸之路上唯一的旅行者，还有许多商人、使者、传教士也穿行其间，有的还留下了记载。我们希望借《马可·波罗行纪》为引导，来推进伊斯兰时期或者是13世纪前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但是仅就伊斯兰

时期的中伊关系史来说，要透彻地加以研究，也需要关注从波斯帝国一直到马可·波罗时代伊朗的历史和文化。我们这次走访过的波斯波利斯，应该是最辉煌的伊朗文明的遗迹，要了解马可·波罗时期的伊朗文化因子的来源，也还是要追溯到波斯大流士皇帝的辉煌时代。同样，对于伊朗这样一个热爱自身传统与文明的国度来说，从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寻找马可·波罗时代的伊朗影响，也一样值得重视。

伊朗是马可·波罗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述的地区，我们短暂的旅程无法走遍马可·波罗到过的地方，但实实在在地踏上伊朗的土地，对于《马可·波罗行纪》的有关记载自然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原载于《紫禁城》2012年第10期）



伊斯法罕城中心的王宫广场

朱玉麒 | 伊朗——来自民间的视野



2012年元旦前后，我有了一次伊朗之行，一次从德黑兰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经历。在这次不寻常的游历中，我寻找几千年来丝绸之路之路上中国的西方邻国；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今天的伊朗和古代的波斯：土地、人民、城市、巴扎、政治、文化……。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穿梭中，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来自中国民间的视野：伊朗是我们的友邦，是我们的镜子，是一个有着淳朴、美好、善良心地的人民的国度。

我们一行10人是得到德黑兰国家博物馆邀请，去参加一个“伊朗与中国古代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China），因此而有了十天在伊朗的访问，在那里进行了三天的学术交流，和七天的学术考察。我们全部的行程，就是从靠近伊朗北部的首都德黑兰往南走（除了会议期间前往德黑兰西北的加兹温考察之外），经过伊斯法罕、亚兹德、设拉子，一直走到了最南边的城市阿巴斯港，上了霍尔木兹岛，感受了刚刚结束军事演习的霍尔木兹海峡。最后从阿巴斯坐飞机到迪拜，进入阿联酋，从那里飞回了中国。

对于伊朗的印象，虽然是行色匆匆，只有十天的时间，随着跟伊朗土地的接触、跟当地人的接触，确实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南行的过程当中逐渐地加深。

我们可以看看今天伊朗的地图：伊朗现在的面积是163万平方公里，正好同我们的新疆非常接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有16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省份，占了中国的六分之一的面积。也就是说，伊朗的面积相当于中国的六分之一，在世界国家地理面积的排行中，排名第十六，也是一个大国。

因为是冬天，我们没有去北边大不里士、里海沿岸。伊朗的友人也非常有意思，你如果没去伊朗的哪个地方，他就会说：你没去的这个地方呢，才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地方，下次你还要来。虽然里海的鱼子酱充满了诱惑，大不里士作为蒙古人在伊朗建立的伊儿汗国的首都，也一样吸引着我们，但我们从德黑兰一直南下，也是一条我们特别想走的线路，它基本的方向是马可波罗往返中国曾经走过的路。马可波罗从遥远的意大利出发，从西北往东南，经由陆路，穿越了整个的伊朗高原，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准备从霍尔木兹海峡坐海船进入中国。可是到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季节，他们没有遇到一个可以将海船送往东去的季风，同时这霍尔木兹的船呢，比他们意大利的船要小得多，让他们感到忧虑。这样，他们又重新从霍尔木兹海峡折返往沙漠深处的东北方向前行，走上了今天的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进入元朝。等他在中国呆了17年后，以护送蒙古公主到

波斯成婚的使命返回时，仍然从海路到达霍尔木兹港口，从那里沿着来路从南到北，前往伊儿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我们走的路呢，基本上也是马可波罗在伊朗从北到南的道路。

即使是走马观花，只是看了伊朗向我们掀开了的面纱的有限一角，在这些地方，我们的感受是：今天的伊朗并不是被美国妖魔化了的伊朗，而是一个美丽而和平的国度。

在伊朗，我们首先感受了首都德黑兰。德黑兰的意思是山脚下，这个城市也确实建立在积雪皑皑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的南坡下，高楼不多。我们所下榻的饭店，可能就是德黑兰最好的饭店之一了，名字是革命饭店。伊朗在1979年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之后，那一年就被称为革命年，所以很多地方都打着这个旗号。革命饭店的地位大概也相当于中国的北京饭店了，可是呢也不过如此，要说现代化的程度，确实比我们30年来的步伐差远了。位于德黑兰市的自由纪念碑，1971年为纪念波斯帝国创立2500周年而

建立，可能是德黑兰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我们在德黑兰的时间主要是在参加研讨会、参观博物馆，街景看得很少。今天网络非常流行，去过伊朗的人都忍不住要写博客，在他们粘贴的丰富的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德黑兰这个城市确实要比北京差远了。

然而有一天，我们几位同行者偶然晚上从革命饭店出门散步，去看地铁。因为听说伊朗所有的地铁是中国人援建的，是中国在海外承建的第一个地铁项目，而伊朗也是中东和海湾地区第一个拥有地铁交通的国家。你到伊朗去，伊朗的出租司机如果听说你是中国人，可能会问你：“你是来修地铁的吗？”我们看到这个地铁站确实修得很漂亮，同行的孟宪实教授在他的博客里面写到他看了地铁以后，很感慨，说他看到中国人建的伊朗地铁站往上往下的滚动电梯都有，可是我们中国的地铁里面——北京的地铁里面，也没有完全做到上上下下的电梯都有——这样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不方便的；而且即使有了上下的



德黑兰地毯艺术博物馆展品



德黑兰玻璃与陶器博物馆展品

电梯，这往下的滚动电梯还经常是关闭的。可是在伊朗呢，它这方面给民众提供的方便确实做到位了。因此从软件、硬件上看城市的现代化，好像还不能完全说德黑兰是落伍的。此外，公共汽车设定的男女前后分坐制，我相信它的用意也在于保护妇女儿童，而不是美国早年白人、黑人前后分坐的歧视政策。

在伊朗，作为学者，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它的众多的博物馆，而且门票非常便宜，大概就是三千里亚尔。三千的数字听起来很贵，其实不贵，一万里亚尔相当于一美金，今天受到美国的制裁以后，大概两三万里亚尔才相当于一美金。中国人到那个地方一换里亚尔，马上就变成了千百万元的富翁，非常有钱。所以三千里亚尔是非常少的价格，因此在伊朗看博物馆是非常享受的，也体现了国家对博物馆民众教育中的重视。而且在那里你也看不到像中国的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那么气派的博物馆建筑，那么大的博物馆在伊朗没有。但是它非常有特点，除了国家博物馆的综合性之外，德黑兰众多的博物馆显得非常小巧，全部是一些专门博物馆。

我们到达德黑兰的第一天，就去参观了两个专业博物馆。一个是专门展示玻璃器皿和陶器的博物馆。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玻璃在古代中国没有，有的是从丝绸之路传来的。伊朗高原是比较早地传递和掌握了玻璃技术的，因此这里的玻璃器皿保存得非常多样，最早的玻璃和陶器陈列品是公元前 2000 年的制作。而博物馆建筑本身也是一个具有近百年历史的私人庭院。

像织布机一样的建筑外形，是德黑兰的地毯博物馆，伊朗的手工地毯技术以历史悠久、织工精巧而享誉全球。伊朗至少从 2500 年前就使用地毯，这种技术也一直传承到现在。现在买一块小小的丝织地毯，动辄上万人民币，我们在那儿都没有买地毯。但是从博物馆的陈列中，你确实可以看到波斯文明在地毯艺术上的伟大创造。

德黑兰的伊朗国家博物馆是 1937 年建成的历史性建筑，被称为德黑兰的精神家园。如今它有两个大楼组成，左边的红色大楼，是伊斯兰前的物质文明陈列，右边这个白色大楼，是伊朗伊斯兰化以来的文明陈列。毫无疑问，那是了解伊朗历史最为系统而直接

的方式。我们因为得到国家博物馆馆长的邀请而来参加会议，特别为我们展示了珍藏在库房内的来自中国的瓷器，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目前特别抢眼的青花瓷，从蒙元以来一直到明、清两代都流行的青花瓷艺术。青花瓷是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逐渐地被伊朗高原的人们所欣赏的，以至于后来在西亚、北非、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世界，对于中国青花瓷的需求量非常地大。中国汉民族文化原本并不太崇尚这种青花瓷，但是伊朗从伊儿汗国以来的历代王朝都很喜欢，专门到中国来定做这样的青花瓷，用于神庙和宫廷。因此我们今天在伊朗的博物馆里面所看到的青花瓷，可以说在当时都是国宝级的，是专门为出口定制的外销瓷。在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里面，可以看到元代以来最好的青花瓷，据说多达 900 多件。他们也愿意与中国交流，将这些艺术品开放给中国学者共同研究。伊朗的青花瓷，说起来也确实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展现吧。

让我感到特别值得记录的，是伊朗的博物馆事业开展的非常好。我们在会议期间，除了遇到大量的博物馆游客外，而不断地碰到由学校组织了的小学生、中学生成群结队地来看展览。男女分校的特点，在学生队伍中看的很分明。女生的队伍出现的时候，清一色围着校服式的头巾。虽然如此，从洋溢着的笑容中，相信她们还是享受着伊朗文明健康、向上的教育和熏陶，并不因为那些保守的装束而影响了欢乐、幸福的童年。

这个博物馆的事业做得更好的地方呢，还有让我们所体会到的环境：在我们开会期间的茶歇处，墙上挂的都是中国元素的东西。这次会议主要是中国学者和伊朗学者就古代

中国与伊朗关系史的对话，我们看到墙上挂的都是青花瓷，为会议准备的请柬和一块礼品壁挂瓷砖，也是青花瓷，并且印上了中国主办方北京大学的标志；相连着的一个休息室，则挂了一墙的水彩画，每幅画上是两个形象、服饰都不相同的妇女，那是从中国的汉代到清代、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到恺加王朝期间，两千年来波斯与中国妇女的同期对比图。这幅放大的画面，就是伊朗画家描绘的中国明代和萨法维王朝时期的妇女形象。这样的环境真的叫感同身受——看似轻描淡写的布置，让你好像走到自己的家里一样，那种自古以来就是一家人的亲切感，真是扑面而来，如沐春风。博物馆事业做到如此体贴、人性化的服务，怎不让人叫绝？反观我们中国呢，博物馆事业呢也不断地在开展，至少已经做到免费了。但是有没有做到这样无微不至的、让你在博物馆的时候就像走在家中的厅堂和庭院中那样自在、舒适呢？我觉得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在伊朗这样一个国家，在被妖魔化为一个野蛮的国家，通过博物馆来使民众得到教育方面，却让我觉得已经非常出色。我们在伊朗遇到的任何一个愿意跟我们交流的人，都会夸赞中国是多么的伟大，说些他所知道的中国情况；而听说你是历史学家时，又会马上给你摆谱地说伊朗的历史也一样悠久。包括很多导游的水平都非常高，感觉他们是受到了专业的训练。这个素质，我觉得是跟国家的博物馆事业普及有很大关系的。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原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第八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林梅村 | 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接触

——2012年伊朗考察记



尽管中国与伊朗远隔千山万水，但是两大古文明之间很早就发生经济文化联系。2012年1月伊朗之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实地考察了伊思法罕省锡亚勒克山（Tepe Sialk）、设拉子市郊波斯波利斯王宫及其附近帝王之谷（Naqsh-e Rostam）等世界文化遗产级别的考古圣地，并在德黑兰伊朗国家博物馆亲眼目睹了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伊朗文物，从而发现天山康家石门子宗教舞蹈岩画与伊朗高原锡亚勒克文化相关；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出土异形兵器实际上模仿亚述王的“镰形剑”（sickle sword），而中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青铜马的造型取材于萨珊波斯艺术。许多千古之谜，一朝冰释。

一、锡亚勒克山的通灵塔

锡亚勒克山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位于伊朗中部伊思法罕省卡尚市近郊。锡亚勒克山以世界上最早的通灵塔而闻名，其名源于阿卡德语 Ziggurat（通天塔）。锡亚勒克山通灵塔属于前埃兰时期（Proto-Elamite, c. 3200~2700 BC），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锡亚勒克山通灵塔建于公元前2900年，属于埃兰文明四大通灵塔之一。其他三个皆在伊朗胡齐斯坦省境内，分别为楚恰·赞比勒通灵塔，建于公元前1250年；

苏萨通灵塔，建于公元前1800年；哈夫特山通灵塔，建于公元前1375年，时代均晚于锡亚勒克山通灵塔。伊拉克的乌尔通灵塔建于公元前2100年，不过，现存遗址是萨达姆·侯赛因后来重建的，并在塔上用砖砌筑了萨达姆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罗曼·葛什曼（Roman Ghirshman）首次发掘锡亚勒克山。于是，这里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考古圣地之一，所出文物相继入藏卢浮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伊朗国家博物馆。法国考古队曾经在锡亚勒克山通灵塔下发掘了一个距今7500年的墓地，说明公元前5500年当地已有人定居。我们到锡亚勒克考察时，入口处有一个遗址内发现的1米高的帕提亚大陶瓮，说明该遗址一直沿用至帕提亚时代（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

锡亚勒克山是两河流域彩陶文化发源地之一。法国考古队在这里发现的彩陶碗及残陶片上绘有锡亚勒克第三期文化的舞蹈图、人马共舞图，现藏卢浮宫。一件锡亚勒克彩陶壶上还绘有古代印欧人崇祀的双马神，创作于公元前10~前9世纪，亦为卢浮宫藏品。

二、天山岩画所见近东文明宗教舞蹈

198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山康家石门子岩画上发现生殖崇拜岩画，面

积达100多平方米。调查者认为这幅岩画属于塞人遗迹，完成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前半期，但不会早到距今三千年以前

根据岩画上两幅双马神像，我们判断这幅岩画实乃吐火罗人祭神遗址。双马神是古代印欧人万神殿最早的神祇之一，始见于公元前1400年米坦尼协议（Mittani Treaties）泥版文书的雅利安神名表，双马神的艺术形象见于晚商青铜器，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1世纪就传入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康家石门子岩画与锡亚勒克彩陶壶所绘舞蹈人物和双马神相同，再次证明这幅宗教舞蹈岩画由来已久，不晚于公元前10~前9世纪。

古代印欧人崇奉的双马神还见于新疆巴里坤石人沟岩画、内蒙古阴山岩画，以及晚商青铜器，说明近东文明宗教舞蹈很早就对中国文明产生重要影响。

三、亚述文明的天籁之音

在伊朗加兹温浴室博物馆考察时，见到一个展室内陈列着两河流域古乐器——箜篌，其艺术造型与伊拉克出土的亚述浮雕画板上乐师演奏的箜篌如出一辙。这种古老的西亚乐器后来经伊朗高原传入中亚、印度，乃至新疆天山。中国与近东文明的最初交往就从箜篌开始。汉武帝年间，箜篌从西域传入中原，《汉书·郊祀志》、东汉应劭《风俗通》皆有记述。《隋书·音乐志》则说：“今曲颈琵琶（瑟），竖箜篌之徒，并出西域。非华夏旧器。”

箜篌是西方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源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化，历经古埃及、



武威市雷台西晋墓出土波斯艺术风格的青铜马踏飞燕

亚述、古波斯几个发展阶段，传入欧洲后称之为 Harp（竖琴）。

箜篌传入中国与亚述帝国密切相关，汉语“箜篌”一词即源于亚述语 canku。亚述人在两河流域的历史分为早期亚述、中期亚述和亚述帝国（亦称“新亚述”）三个时期，称雄美索不达米亚近300年（公元前10~前7世纪）。那么箜篌传入中国不晚于公元前7世纪。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亚述王阿顺希尔帕勒二世时期（公元前865~前850年）创作的《庆贺猎牛图》浮雕画板，上面有两位亚述乐师弹奏卧箜篌图像。

200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发掘出一件亚述风格的卧箜篌，属于苏贝希文化早期（公元前9世纪）。这件箜篌实物与大英博物馆藏亚述帝国乐师弹奏的卧箜篌如出一辙。可谓亚述文明传来的天籁之音。

如前所述，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古代印欧人的双马神像就传入中国，分别见于新疆天山康家石门子、巴里坤石人沟、内蒙古阴山岩画。内蒙古博物馆为五原县韩

乌拉山双马神岩画做了一个复制品，同时展出了一件赤峰市宁城县征集的双马神铜牌。

晚商青铜器族徽上的双马神中间皆有“人”字，与卢里斯坦青铜器双马神的艺术造型相同。卢里斯坦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联系还表现在欧亚草原出土的各类青铜羊首刀剑，如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晚期卡拉苏克文化、新疆塔城和巴里坤以及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羊首刀剑。这些青铜器的动物纹以卢里斯坦青铜器年代最早，如美国圣巴巴拉艺术博物馆藏卢里斯坦青铜羊首权杖头。

四、鄂尔多斯青铜器之近东文化来源

（从略）

五、近东文明城垛艺术之东传

（从略）

六、中国艺术中的波斯战马

公元3世纪，萨珊家族崛起于伊朗西南部法尔斯，建立萨珊波斯王朝。该王朝始祖萨珊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祭司，3世纪初萨珊之子帕佩克在其领地伊斯塔赫尔自立为王。224年，帕佩克之子阿尔达希尔一世推翻帕提亚王朝（即安息帝国）；226年在泰西封（巴格达附近）加冕，自称诸王之王。这是波斯人自阿契美尼德帝国之后首次重新统一，堪称波斯史上第二个波斯帝国。萨珊王朝鼎盛时期，多次威胁中亚贵霜王朝，并与东罗马帝国征战不休。伊朗设拉子附近帝王谷（Naqsh-e Rostam）有一幅罗马皇帝跪拜在萨珊波斯

王战马下的大型浮雕，再现了萨珊王朝昔日的辉煌。

萨珊波斯商人还通过丝绸之路，与遥远的中国进行长途国际贸易。1981年，在山西北魏封和突墓发现萨珊波斯王夏普尔二世打造的银盘；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内发现了萨珊波斯银币和许多波斯艺术风格的金银器。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以及两位波斯王相继被刺杀，不可一世的萨珊波斯帝国终于土崩瓦解，末代君主伊嗣埃三世之子俾路斯流亡长安城，任唐高宗朝右武卫将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与波斯王室流亡长安有关。

殊不知，萨珊波斯艺术还对魏晋时代中国战马的艺术造型产生过重要影响。我们在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近郊帝王之谷考察时，见到一幅萨珊波斯浮雕上波斯武士和敌方战马头上马鬃皆被扎束起来，这幅浮雕创作于萨珊波斯王霍尔木兹二世在位时期（303~309年）。无独有偶，华盛顿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萨珊波斯银盘上波斯王的坐骑，也把头上马鬃扎起来。此外，法国考古学家葛什曼的名作《波斯艺术》一书著录的萨珊波斯战马银造像，也把马头上马鬃扎起来。毋庸置疑，这是萨珊波斯艺术表现战马的典型手法。

1969年，甘肃武威市擂台汉墓出土了99件青铜车马仪仗俑，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其中包括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青铜马。考古学一般根据墓穴里年代最晚的东西来推断文物的年份，当初发掘擂台古墓时，铜器上虽有铭文，但是没有标明年份。于是，

发掘者根据墓里出土五铢钱币，推断是东汉墓。后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增教授在甘肃省博物馆库房内重新检验了擂台墓出土的古钱币，发现大批西晋五铢，并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学术讨论会上公布了这项研究成果。此后，中国考古界业内人士都把擂台汉墓改为西晋墓。

问题是，这些西晋五铢钱只能说明擂台墓的年代在西晋，并不能证明墓中青铜车马亦为西晋之物。按照考古学的原则，早期文物可以出现在晚期墓中。《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灭商后，把殷人宗彝和各种宝物分赐有功之臣；“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因此，西周墓有时随葬商代青铜器，甚至良渚文化玉器，当系周初瓜分的殷王室宝物。擂台西晋墓完全可能随葬东汉铜车马，所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走向盛唐”文物展时仍把擂台铜车马称作“东汉铜车马”。

这次伊朗考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擂台西晋墓出土“马踏飞燕”青铜马

模仿了萨珊波斯艺术，把马头上的鬃毛扎束起来。这一点从甘肃省博物馆展出的擂台西晋墓出土青铜车马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其艺术造型也是把马头上的鬃毛扎起来，而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马、汉元帝渭陵出土西汉玉马，皆无扎束马头鬃毛的现象。

萨珊波斯王朝建于公元226~650年（相当于曹魏文帝黄初七年—唐高宗永徽元年），那么擂台晋墓出土“马踏飞燕”青铜马和青铜车马当即中国与萨珊波斯帝国文化交流的产物。这就从考古学角度首次证明，时下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青铜马是西晋工匠模仿萨珊波斯艺术创作的。

秦古籍有一本书，名叫《世本》。其书早佚，如今只有辑本流传于世。《世本·作篇》专门收集历代古书说的中国各种发明创造，诸如“黄帝始蒸谷为饭”（《逸周书》）；“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路史·后纪》四注）；“苍颉作书”（《尚书序正义》）；“相士作乘马”《周



伊朗胡齐斯坦省楚恰·赞比勒通灵塔

礼·校人注》)；“鯀作城郭”(《礼记·祭法正义》)；“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注》)；“杜康造酒”(《书正义》同上)；“空侯(即箜篌),空国侯所造”(《通鉴·汉纪》三十六胡三省注)，不胜枚举。殊不知，世界上许多发明创造皆与中国人无关。据考古发现，小麦最早在西亚人工培养成功；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城市皆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家马是南俄草原游牧人在乌克兰驯化成功的；哈萨克草原辛塔什塔·彼得罗夫斯卡文化的创造者于公元前2000~前1800年率先发明了双

轮战车；葡萄酒是希腊人的一大发明，烧酒的发明则归功于阿拉伯人，而古代中国起初只会做米酒。尽管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文明的发展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不断交流的历史，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失落的文明”，与中国人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我们在伊朗考察的研究成果再次揭示了这一点。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原载于《紫禁城》2012年第10期。)

王一丹 | 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访伊朗



2016年9月29日—10月2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马可·波罗研究项目成员荣新江、党宝海、王一丹、马晓林等四人，应邀参加伊朗德黑兰大学历史系举办的第四届“波斯湾：历史、文明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rsian Gulf: History,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2017, 10, 1-2)。会后的10月2—8日，对马可·波罗经行过的伊朗西北大不里士、朱尔法、马拉盖等地进行了为期7天的学术考察，项目成员求芝蓉也加

入考察队，负责摄影工作。伊朗西北部是马可·波罗东来时于伊朗境内最早踏足的地方，《马可·波罗行纪》中对这片地区有过细致的描述。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沿着马可·波罗的经行路线，对行记中的相关记述作实地调查。

通过德黑兰大学历史系乌苏吉教授(Prof. Muḥammad Bāqir Vuṣūqī)的协调安排，伊朗塔巴塔巴依大学伊朗学基金会(Bunyād-i Īrān-shināsī, Dānishgāh-i ‘Alāma Ṭabāṭabāyī)旅游文化中心专职导游、毕业于考古学专业的哈密德·拉马丹扎德博

士(Dr. Ḥāmid Ramāzānzāda)担任我们这次考察的全程陪同。由于考察目的地多处于高山或荒野中，公共交通工具无法前往，我们只得租赁了一辆小型面包车，司机是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阿里礼萨·尤素福内贾德(‘Alirizā Yūsuf-nizhād)先生，人称“阿里大哥”。

10月2日傍晚，德黑兰大学的波斯湾研讨会宣布闭幕，考察小组随即登车启程，考察活动正式开始。沿2号高速公路(德黑兰一大不里士高速路)车行约两小时后，于深夜23:00左右抵达加兹温(Qazvīn)，顺道探访了两处古迹：一是伊朗恺加王朝(1779-1921)时期的遗存、有大道朝南直通德黑兰的老城门“德黑兰门”(Darvāza-yi Tihṛān)，一是“侯赛因王子圣祠”(Imāmzāda-yi Shāhzāda Ḥusayn)。加兹温距德黑兰140公里，是伊朗北部、西部和里海西南沿岸各地前往德黑兰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也是个文人辈出的历史文化名城，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组的部分成员曾于2012年初到访这里，考察过城内外的古迹[1]，因此加兹温这次并不在考察之列。之所以连夜赶路投宿于此，是为了便于第二天一早前往此行的第一个考察目标——阿拉木特古堡(Qal‘a-yi Alamūt)。

一、阿拉木特

10月3日早晨9:00，考察小组驱车前往阿拉木特。阿拉木特古堡是马可·波罗所记旭烈兀率蒙古大军“围之三年而不能克”的山老及其杀手阿萨辛(一译哈昔新)们据守的山中要塞。《马可·波罗行纪》第43节记载：



阿拉木特城堡遗址

在基督降生后的1262年，让整个东方臣服于自己的大汗的兄弟旭烈兀，前说的(Z)所有(LT)东方鞑靼的五(LT)大王旭烈兀，他知道所有这些恶劣的(Z)罪恶之事，山老和他的哈昔新(L)邪恶的(Z)勾当，他的习惯，还因为山老还洗劫所有过路的人(VB)，他告诉自己他要驱除所有这些邪恶之人(LT)，将他们消灭(V)。于是他挑了几个将领，派他们去攻打(Z)山老(Z)和很多人所在的园子和(LT)堡垒，他们包围了城堡，包围的(V)非常紧，没人能逃出(VB)，整整三年没攻下来，因为城堡很坚固，因此猛攻并不能攻破(VA)。如果他们有足够的食物，他们将永远攻不下来，但最终(Z)在三年之末，城堡里(VA)再没有食物了，因想要食物(VA)，他们被攻下了，叫阿老丁的山中(L)老人和他的人都被杀死，所有的哈昔新(VA)，那地方的一切都被东方鞑靼的

旭烈兀大王的人破坏，完全被蹂躏（LT）。他把那城堡夷平，以这种方式让可恶的山老终结（V）。

阿拉木特古堡位于横亘伊朗西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脉（Rishta-kūh-i Alburz）之中，距加兹温约一百公里，有一条名为“阿拉木特路”（Jāda-yi Alamūt）的盘山公路可通。汽车一路向东，在连绵不绝的群山中忽上忽下，颠簸前行，像大海中随波浪起伏摇摆的小船，把每个人都颠得几乎呕吐。行驶近三小时，途经 Rajāyi Dasht、Mu‘alim Kilāya 等山中村镇，终于在近午时分抵达阿拉木特山脚。阿拉木特山（Kūh-i Alamūt）是一座巨大的石山，远望犹如天外飞来的奇峰，拔地而起，山崖正面如刀削般陡峭，根本无法攀援，必须从山后坡度较缓的一侧上山。见到这座久闻大名的高山就在眼前，大家精神为之一振，马上开始攀登。山路峻峭艰险，虽有石阶，却极易滑倒，

需十分谨慎小心，大约 40 分钟后，抵达半山腰的下城堡（Qal‘a-yi Pāyin），门楣上写着一行阿拉伯语大字“安拉之国度”（al-Mulk Allah）。继续往上攀行约半小时，抵达上城堡（Qal‘a-yi Bālā），随后胜利登顶。古堡遗址包括大门、清真寺、大厅、龕坑、马厩、储藏室、水渠、瞭望台等，内部结构复杂，遗迹斑斑可考。站在山顶眺望四周，一面是村庄，另三面群山环绕，的确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完全印证了马可·波罗的描述并非耸人听闻。“阿拉木特”（Alamūt）意为“鹰巢”，既喻其地势高峻，同时也指此处是鹰隼集结之地。我们考察完毕下山时，果然望见空中不时有山鹰在盘旋。

回到山下，在小村庄 Rūstā-yi Gāzur Khān 简单用餐之后，我们沿原路返回加兹温。途中经过一个十分美丽的小湖——伊凡湖（Daryācha-yi Ivān），这是伊朗难得

一见的淡水湖，湖水来自湖底的泉眼，清澈如镜，芦苇丛在微风中摇曳生姿，湖边的度假小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充满生机的一切，与我们刚刚考察过的阿拉木特山像是两个世界。

我们在夕阳下继续赶路，再次翻越巍峨的厄尔布尔士群山，日落时分回到加兹温，马晓林由此处乘出租车返回德黑兰，赶乘当晚的航班回国。考察小组其他成员按原计划北行，继续沿 2 号高速公路前往大不里士。

二、大不里士

从加兹温到大不里士约 400 公里。在连续驱车近 5 小时后，我们于 10 月 4 日凌晨 00:40 到达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首府、伊朗西北第一大城市——大不里士（Tabriz）。马可·波罗曾如此赞美这座他称为桃里寺（Tauris）的伊利汗国（Īlkhāniyān, 1256-1353）都城：

这是一座伟大、非常华贵的城市。它地处亚美尼亚和波斯之间，因为它位于靠近报达的名叫伊刺克（Yrac）的大区，它也叫这个名字 [伊刺克]。在那个大区下还有很多其他城市和村庄，非常富裕。不过，桃里寺是那个地区所有城市中最美丽、最好、最华贵的城市……它是一个巨大的商业城市，来往的商人们可以在那里获利甚丰……这座城市被很多美丽、令人愉悦的园林所环绕，园中满是各种优良的水果和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水源充足。

正如马可·波罗所述，作为伊利汗国的都城，大不里士是一座令来往商旅倍加称赞的繁荣都市，在第七任伊利汗合赞

（1295-1304 在位）时，大不里士更是大力发展城市建设，在城市西郊一个名叫苦卜（Shanb 或 Shām）的地方兴建了一座以合赞的名字命名的新城“合赞尼牙”（Ghāzāniya），据史书记载，新城中宫殿壮丽，设施完备，还有一个大花园，可惜的是，后来几次大地震，以及战争等人为破坏，使得合赞尼牙今日已无迹可寻，只有地图上留下的地名 Shanb-i Ghāzān（合赞的苦卜），提醒着人们这里曾一度是伊利汗王城之所在。

大不里士另一处著名的伊利汗时期古迹，是合赞汗的宰相、御医和史臣拉施特（1247-1318）在城市东北郊兴建的“拉施特镇”（Rab‘-i Rashīdī），这是一个可与合赞尼牙媲美的建筑群，据《拉施特镇捐赠书》（*Vaqf-nāma-yi Rab‘-i Rashīdī*）记载，拉施特在这里兴建了一系列公共设施及文化机构，如学校、图书馆、医院、药店、制药厂、天文台、造纸厂、抄本房、清真寺、道堂、驿站、孤儿院等，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艺术家和工匠，这里的医院有多达 50 名来自印度、中国、埃及、叙利亚和突厥斯坦的医生，图书馆收藏有近 6 万卷各种语言文字的图书，被视为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交流场所。不过，当我们来到拉施特小镇时，看到这里大门（南门）紧锁，铁门上悬挂着东阿塞拜疆省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所书“拉施特镇及大不里士城堡建筑群”（*Majmū‘a-yi Rab‘-i Rashīdī va Qal‘a-yi Tabriz*）牌匾，透过铁门向里张望，只见到一些类似城堡遗址的土堆和三个指示牌。我们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位于僻巷深处的一个西门，这里有一位管理人员及一个门



加兹温“德黑兰门”

卫，我们在说明来意后，获准进入参观。“小镇”占地面积大约有 13 公顷，四周有围墙，空旷的墙内已没有多少可供凭吊的建筑，在靠近大门的一隅散放着几十块墓顶石和石柱，都是从大不里士附近收集来的，属 13-15 世纪；另外还有几个大土墩，但都不是拉施特镇最初的建筑遗存，而属于萨法维王朝(Şafaviyân, 1501-1736) 时期。萨法维时期，伊朗与其西部强邻奥斯曼帝国长期对峙，地处伊朗西北的大不里士曾几度被奥斯曼军队攻占，奥斯曼人撤离时对这座城市大肆掳掠，拉施特镇也未能幸免，原本收

藏的各种奇珍异宝、包括大量古籍抄本都被洗劫一空，建筑也被夷为平地。目前镇中所见城堡、炮台等遗迹，均是萨法维王朝的阿巴斯大帝(Shāh ‘Abbās-i Buzurg, 1571-1629) 收复大不里士后，为抵抗奥斯曼帝国所建。据介绍，伊朗文化遗产组织正在设法对拉施特镇的建筑进行修复和重建，依据《拉施特镇捐赠书》等历史文献的描述，还原拉施特镇昔日的风貌。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原载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 15 期。)

李零 | 波斯笔记——统一宗教

中国古代，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除道教属本土宗教，很多都是外来宗教。中国没有宗教大一统，接纳外来宗教最多，简直是个世界宗教博物馆。中国古代外来宗教分六种：佛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回教、一赐乐业教，全都和伊朗有关。

一、佛教

佛教(Buddhism) 出自印度，创教者释迦牟尼(Śakyamuni, 前 463—前 383)。一般认为，释迦牟尼是生活于公元前 5 世纪的人，比琐罗亚斯德晚，但汉

武帝凿通西域(前 139—前 126)，汉明帝永平求法(64 年)，首先风靡中国，对中国影响最大，当推佛教。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势必经过伊朗东北、阿富汗和中亚，即所谓大呼罗珊地区(Greater Khorasan)。汉代的伊朗是由帕提亚王朝统治，中国古代叫安息。安息是从今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崛起，势力范围包括今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南梁释慧皎《高僧传》为最早来华译经传法的西域高僧立传，安世高(名安清)名列第一，相传就是安息王太子。

二、火祆教

火祆教，西人叫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顾名思义，就是琐罗亚斯德(Zoroaster) 创立的宗教。一般看法，火祆教就是琐罗亚斯德教，两者可以画等号，其实不然。

火祆教的产生可能相当早，琐罗亚斯德的年代恐怕比较晚。

火祆教是米底人和波斯人共奉的宗教，典型的伊朗宗教。这批雅利安人，大约公元前 1500—前 1000 年就已进入伊朗高原。米底西邻亚述。亚述铭文提到米底，可以早到公元前 9 世纪上半叶。火祆教的祭司叫麻葛(单数叫 Magus, 复数叫 Magi)。希罗多德说，麻葛是米底六部之一。此部专出麻葛，可见居鲁士二世灭米底前，这种宗教就已存在。

琐罗亚斯德是什么时候的人，学者有各种推测，早可以早到公元前 1800 年，晚可以晚到公元前 6 世纪，有人甚至怀疑，这只是个想象的人物，其实并不存在。

年代偏早的估计，主要是据《阿维斯塔》的《伽萨》篇。有些学者相信，此篇是琐罗亚斯德亲作，韵律与《梨俱吠陀》接近，可能作于公元前 1500—前 1000 年或公元前 1200—前 900 年。很多研究《阿维斯塔》的学者都相信，琐罗亚斯德是公元前 1000 年以前的人。

年代偏晚的估计，主要是据希腊化时代的传说，即琐罗亚斯德比亚历山大灭波斯(前 330 年) 早 258 年，该年琐罗亚斯德 40 岁，他一共活了 77 岁。据此推算，其生卒年代为公元前 628—前 551 年，正好在居鲁士二世灭米底前。这就是与亚历



草庵摩尼光明佛像

山大纪年相对的琐罗亚斯德纪年。

琐罗亚斯德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有争论。《阿维斯塔》只字未提米底、波斯。中古时期和伊斯兰时代，或说他生于乌尔米耶(在西阿塞拜疆省的乌尔米耶湖一带)，或说他生于雷伊(在德黑兰东南)，但现代学者多主东部说，或说他生于锡斯坦—俾路支斯坦，或说他生于帕提亚和与之邻近的阿富汗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

有一种看法，《阿维斯塔》的维什塔斯帕就是大流士的父亲希斯塔斯普。琐罗亚斯德 40 岁那年，维什塔斯帕皈依了琐罗亚斯德教。他是琐罗亚斯德最早的追随者和庇护者。公元前 520 年，帕提亚和瓦尔卡纳(希尔卡尼亚) 发生叛乱，大流士的父亲希斯塔斯普曾在帕提亚平叛。据贝希斯敦铭文，学者推测，他是帕提亚和希尔卡尼亚的总督，正好在这一带。

我怀疑，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传教，恐怕是利用米底、波斯原来就有的宗教，就像基督教利用犹太教，他是耶稣式的人物，一位宗教改革家，大流士一世以来的波斯国教其实是经他改革，新立的宗教。宗教大一统是与国家大一统匹配。

阿契美尼德时期，阿胡拉·马兹达崇拜流行于波斯帝国，但立为国教，恐怕在大流士一世时。大流士一世，铭文只呼阿胡拉·马兹达之号，可见处于独尊的地位。

居鲁士二世时，天下初定，情况好像还不是这样。他占领什么地方，总是尊呼当地的神名。如他征服巴比伦之后，铭文所呼神名为马尔杜克，并非阿胡拉·马兹达。冈比西斯二世征埃及，也是以法老自居，尊当地的教。

此教奉阿胡拉·马兹达为至尊之神，有如中国的太一、太极，下分善恶二神，代表光明黑暗，有如中国的阴阳、日月、水火。这种一分为二，并一为三的宗教哲学，也见于摩尼教和景教，其实是一神教的共同思路。汉武帝立太一、三一崇拜，虽有类似尝试，但受挫于王莽改制。宋儒援释济儒、援道济儒，借易学和道教再造儒家哲学，试图复兴此类设计，依然未能把儒家哲学改造成类似宗教。中国选择的是另一条道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

阿契美尼德时期，火祆教是国教。亚历山大灭波斯，其国虽亡，其教未绝，仍行于波斯故地。萨珊时期，波斯复兴，火祆教再度成国教。伊斯兰时期，此教衰落，但伊朗仍有信徒，集中在亚兹德一带，还有人东逃，集中在印度孟买一带。

陈垣考证，胡天之祀，始于北魏灵太后时（516—527）。荣新江据敦煌出土粟特文书，把传入时间上推到西晋。王素引《高僧传·维祇难传》，认为至少三国之初，火祆教就为中国所知。林梅村更认为，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汉代就已传入新疆。我想，敦煌地近西域，新疆遥通伊朗，皆过渡地带，传入西域或许比较早，但风行汉地则晚，中间当有时间差。萨珊既亡，此教托庇中国，大盛于唐，但融入中国、深入民众，不及佛教，也不及摩尼教。

三、摩尼教

摩尼教（Manichaeism）兴起于萨珊王朝。萨珊王朝上承帕提亚王朝。帕提亚王朝，火祆教与景教、佛教并存。摩尼（Māni，216—274）在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传教，试图折中三教，创建世界宗教。沙普尔一世（Shapur I，240—272年在位）提倡宗教包容，摩尼事之，出入宫廷，得宣其教。但巴赫拉姆一世（Bahram I，273—276年在位）时，遭火祆教大祭司卡提尔（Kartir）迫害，人被杀，教被禁。摩尼死后，其说西传欧洲，东传中亚、印度，影响很大，传入中国也比较早。

唐延载元年（694），拂多诞携二宗三际之说来朝，摩尼教大盛于唐。宋以来，此教也叫牟尼教或明教，流行于浙江、福建。明教之明，既谐摩尼之音，又含光明之义。这种教融入中国，深入民众，比火祆教强，因此更有生命力。

福建晋江市的草庵遗址和摩尼光明佛像是宋元以来摩尼教在汉地传播的重要遗存，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景教

基督教（Christianity）分罗马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景教是从东正教分裂出来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唐贞观九年（635），此教始入长安，号称大秦景教，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指拜占庭，景教指基督教。

聂斯脱利（Nestorius，386—450）是叙利亚人，其学出自叙利亚教会，传经用叙利亚文，亦称叙利亚派。他主张耶稣亦神亦人，玛利亚是人母而非圣母，431年被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裁定为异端，被迫东传，进入波斯，成立独立的东方教会，故亦称波斯教。

唐代，此教与火祆教、摩尼教，号称三夷教，三教皆自伊朗入，并存于中国，相互借鉴，相互传染，难免带有混合宗教的味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说“真

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明明景教，言归我唐”。景教一名，很对中国口味。景可训明，引申为大，又可读影。语云如影随形，阴影是光明投射的结果。景从、景仰、景慕等词皆由此义派生，含有追慕光明之义。碑文景字，凡二十见，或训明（如景日、景宿），或指景教（如景教、景门、景寺、景尊、景士、景众），或为景教僧侣的名字（如景净、景通、景福）。景风是东南风，也与阳明之义有关。此说与火祆教、摩尼教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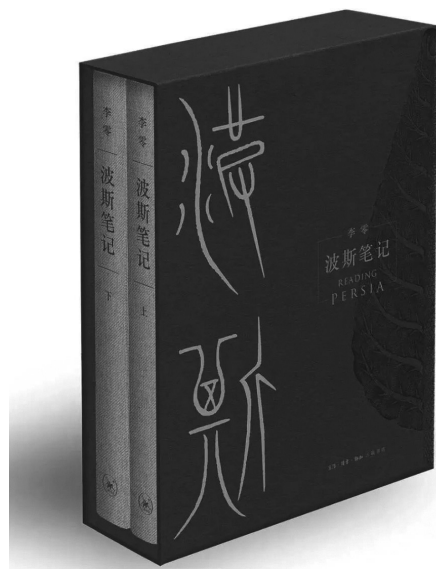
元代，基督教风行蒙古，号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也里可温指基督教传教士。

五、回教（伊斯兰教）

回教即伊斯兰教（Islam）。此教出现比较晚，公元7世纪才创教，但一经出现，迅即传入中国。海路：从阿拉伯半岛，出波斯湾，绕行印度，穿马六甲海峡，在广州、泉州、扬州登陆。陆路：从被它占领的伊朗出发，沿丝绸之路故道，经中亚各国，从新疆传入内地。唐宋时期，海路比陆路占优；元代，陆路比海路占优。伊斯兰教在中亚、新疆取佛教而代之，主要在元代。中国回教经堂语，很多词汇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波斯语尤多，亦可反映中国伊斯兰教与伊朗的关系。

六、一赐乐业教（犹太教）

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Judaism）。据林梅村考证，“丝绸之路上的犹太人遗存以及有关文物大都集中在7世纪中叶至14世纪，也即我国历史上的隋唐至宋元时期”，初入时间与伊斯兰教相近。宋金时



李零《波斯笔记》书影

期，犹太教建寺开封，号称一赐乐业教。“一赐乐业”是以色列之音译。因为海路经印度，又称天竺教。因为宰杀牛羊必挑去其筋，又称挑筋教。其寺称清真寺，其僧称“蓝帽回回”，常被汉民误解，混同伊斯兰教。犹太教入华，海路走波斯湾，陆路走中亚，也与伊朗有关。

上述六教，传教策略不同。佛教、景教、回教，尊重中国礼教，扎根基层，最成功。火祆教，信众不如这三教广，亡于宋元。摩尼教带有“左道”色彩，危及国家安全，屡遭禁止，亡于明清。

开封犹太人被中国同化，犹太教亦归消亡。

中国传统，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各种宗教，来者不拒，只要尊重中国礼教，只要服从社会秩序，只要不煽动造反，爱信什么信什么，爱怎么信怎么信，甚至可以杂着拜，混着信，这是它们可以在中国落脚，长期待下来的原因。

(本文节选自李零《波斯笔记》(上册)(三联书店2019年10月)“第十章 统一宗教”，注释部分请参阅本书。)

罗新 | 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我很喜欢和法浩特聊天，不仅因为意外地发现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经历（比如都在安卡拉住过很久），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还且也因为在好些议题上思路接近。比如，我们都对所谓“蓝突厥”、对突厥狼祖传说等等，存着深深的疑虑。更重要的，我们都对大月氏西迁说不敢深信。

在铁尔梅兹的最后一天的下午，我们再一次造访市中心那个非常棒的考古博物馆，李肖等在馆里大肆拍摄时，我和法浩特坐在馆外台阶上闲聊。马路对面我早晨跑步的那个公园有好多小孩子嬉闹，几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一扭一拐地走在树林里。一天的酷热正

在消退，虽然没有风，还是能感觉到清凉像是从地底升上来，缓缓向上空的阳光里蔓延。

我提到大月氏，我知道这是巴克特里亚历史叙述中无可回避的一环，但是我觉得月氏从河西走廊远道迁徙至巴克特里亚建立王朝的说法，太像前古典时代的传说，传闻之辞加上想象与附会，成了《史记》《汉书》里那几句话，更成为现代研究者加以发挥的基础。就如同匈奴西迁成为欧洲古典后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匈（Hun）人的那个说法，本来是一个捕风捉影的联想与想象，后来竟成为那么多学者进一步深化细化研究的前提。



从喀拉秋别山顶看阿姆河

法浩特说，是的，我一直有此疑惑。长途迁徙，跨越多个地区、多个文化与多个政治体，最后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建立王朝，这个叙事模式具有强烈的传说属性，传说的特点是，类似的事情在可查证的历史上难以再现。迁徙往往是王朝历史叙述的结果，取决于谁讲述、对谁讲述、为什么要如此讲述。任何一个具体的迁徙传说，都构成一个复杂的历史体系。然而，要把历史与神话传说剥离开，远不是怀疑一下就可实现。研究缺乏系统文献史料的古代巴克特里亚，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和困难。

聊起乌兹别克斯坦的学界，我说我近年在美国、德国、土耳其等国开会时遇到一些年轻的乌兹别克学者，他们对西方学术之了解、英语之流畅、议题之新颖，都给我很深印象。我感觉，在俄苏学术传统之外，新一代学者迅速接上了西方传统，这使得中亚学术至少在某些学科，比如考古和历史学，具有了融汇多个传统的优势。考虑到俄苏有关学科的深厚传统与独特性，

这种融汇是很让我们中国学人羡慕的。

法浩特说：表面看似似乎是这样，然而存在另一种危机。现在年轻学者普遍重西方轻俄苏，有的甚至拒绝学俄语。比如说，在我们考古所，年轻学者要求我们的刊物以后仍然是双语，但不再是俄语和乌兹别克语，而是英语与乌兹别克语，这意味着学术刊物不再发表俄语文章。年青一代有些人，不仅不喜欢学，甚至也读不了俄语著作。要知道过去的中亚考古，几乎全都是用俄语出版的，不读俄语，等于放弃了近百年的学术积累，那可是中亚知识宝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过去父母倾向于送孩子进俄语幼儿园，让孩子从小学好俄语。现在变了，家长把孩子都送到英语幼儿园里，越来越多的中小學生完全不懂俄语。法浩特最后说：“我家孩子读的都是俄语幼儿园。”

那天晚上我们在铁尔梅兹市区北边的机场上飞机，飞去塔什干，次日飞回北京。在候机室，法浩特指给我看一面贴满照片

的墙，我原以为是模范表彰宣传栏，走近一看才知道全都是通缉对象，几乎都是从乌兹别克斯坦跑去叙利亚参加 ISIS 的。法浩特问我，你注意他们的年龄和性别了吗？我仔细看一遍，对法浩特说，大部分是 90 后，大部分是女性。他点点头，神情凝重，长叹一口气。我想起我关注了好几年的那个重复人类迁徙之旅的萨洛帕克（Paul Salopek），他在走完乌兹别克斯坦一程后所写的报道中，提到他被沿途军警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你带着什么宗教书籍或音像制品？”他说能感觉到当局对宗教势力的上升极为紧张。2014 年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我听当地官员和学者说起费尔干纳地区极端宗教势力日益壮大。和抽象的形势分析不同，在机场看到的这些照片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他们，

你会模模糊糊地感触到中亚社会与政治的另一面，普通旅行者不容易触及的那一面。

飞机升入夜空时，我努力向南看，希望看到阿姆河。下面的铁尔梅兹市亮闪闪的，环绕它南边的阿姆河却隐藏在黑暗中，阿姆河以南的阿富汗沙漠也全无踪影。看不见月亮，即使看得见也只是弯弯如眉的一小撇，不足以照亮巴克特里亚的大地、山谷与河流。我想起抵达铁尔梅兹的那个夜晚，圆月高悬，天空明净。如果那时从空中看下去，大概会看到一条银灰色的长练，在暗夜里摇摇曳曳，由东向西，如同听到了亘古的召唤，刺穿时间，飘向远方，飘向末日和终结。

（本文为文章节选，全文原载于《文汇学人》
2019 年 4 月刊。）



铁尔梅兹考古博物馆

（五）线上雅集

【编者按】

作为“静园雅集”的延伸，“线上雅集”栏目邀约海内外学者讨论中西多文明传统中的艺术、人文修养和技艺问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应邀撰写栏目开篇“塔缪的理想——‘云养’一只埃及猫”主题系列文章，从多重侧面展现古埃及艺术中深受喜爱的“猫”之形象以及人猫之间密切互动的故事。

贾妍 | 云养一只“青铜猫”系列文章（一）

具体的抽象：一个经典范式的诞生

在第一篇文章中，贾妍老师着眼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盖尔·安德森猫”（Gayer-Anderson Cat）青铜小像，回溯古埃及“猫”作为经典范式的起源与诞生。从整体塑造来看，“盖尔·安德森猫”是一件十分贴合西方古典艺术推重的“自然主义”特质的艺术作品，对猫的形、神状态的捕捉描摹显得极其“写实”，但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核，则与西方古典艺术镜像般反映现实的理想相去甚远，代表着古埃及文明特有的视觉表达理念，即“具体的抽象”。

贾妍老师分析指出，埃及艺术是一种建立在高度概念化、深度程式化基础上，集“图像再现”与“符号表征”于一体的视觉语言系统，既是“符号化的图像”，也是“图像

化的符号”。一方面，这一系统极其强调语义在图像符号之上相对固定的附着与延续，这种对信息传达稳定性的要求，保证了图像本身在形式与风格上的高度稳定性；另一方面，与所有的符号图像系统一样，在信息传达传统形成的漫长过程中，符号中凝结的信息经过不断的聚合与压缩，常常会形成一个“沉积岩”般的“堆叠型意义空间”，甚至于“密码式意义体系”。对待埃及艺术，贾妍老师认为，应当有处理“洋葱”一样的耐心，由内到外，尝试“一层一层剥开”它的意义内核，洞见隐藏在“最深处的秘密”。

埃及艺术“具体的抽象”的特质，在很大程度上与古埃及独特的象形文字系统一脉相承，互为表里，而“图”与“文”在古埃及文明史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贾妍老



盖尔·安德森猫” (The Gayer-Anderson Cat), 后期埃及 (公元前 664- 前 332 年), 出土地不详, 伦敦大英博物馆, 藏品号 EA64391

师认为, 这些特点在“盖尔·安德森猫”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在埃及语符号表中, 用以指代“猫”的限定符号“𐩔”本身就是一只蹲坐的猫。绘画与雕刻遵循“神圣书写”的范式, 很早就形成了与文字一样标准化的图像再现传统, 并促成了一种稳定性、延续性极强的“𐩔型猫”范式, 广泛见于法老时代各种语境、各种类型的视觉艺术遗存中。这种介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图像, 有着突出而典型的埃及特色。一方面, 基于其“语言符号”的本质, 它与中文里的“猫”, 英文里的“cat”一样, 并非直接指向现实中的某个物质性个体, 而是指代与其相关的概念性集成; 另一方面, 在以“象形”为特质的文字体系中, 抽象的语言符号与具象的图像再现之间并没有索绪尔所谓的“任意性”关联, 相反, 符号性的“能指”与图像性的“所

指”之间常常界限模糊。贾妍老师进而尝试用索绪尔符号学经典范例为基础, 将古埃及“𐩔”符号置于“能指”与“所指”所构成的象征体系中, 认为“盖尔·安德森猫”恰恰代表了一类介于符号表征和图像再现之间的状态, 它是“物质化的符号”, 也是真实世界的投影, 是基于具体现实之上的抽象, 也是基于抽象符号之上的具体, 可以作为埃及艺术“具体的抽象”特质的绝佳范例。

而在分析同一范式下的早期艺术品、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石罐猫时, 贾妍老师关注到其眼部采用多种材质镶嵌眼睛的方式, 这种为塑像“点睛”的处理方式, 也为后期在同一范式下创作的其他“𐩔”雕塑提供范本。基于“盖尔·安德森猫”现在眼部呈现的凹陷状态, 将其放于埃及雕像眼部镶嵌的整体传统中, 贾妍老师推断, 这件青铜猫应该原本也是有“点睛”的, 而法国卢浮宫收藏的同一时期、采用同一范式的青铜猫雕像上, 采用的“黄金”搭配“青金”的眼部配色处理与镶嵌细节, 亦可为“盖尔·安德森猫”原有的眼部镶嵌与最初的样貌提供一个想象的方向。

援引德国艺术史学家阿比·瓦尔堡 (Aby Warburg) 所言“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 细致观察“盖尔·安德森猫”, 贾妍老师认为其雕刻细节中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图像与符号信息, 这些信息多包藏于猫身附加的装饰物上, 这些看似无用的“身外之物”, 可被视为象征身份、彰显地位的“信息亮点”, 而体现在“埃及猫”的塑造上, 则是“神品”与“凡品”的界线所在。“盖尔·安德森猫”猫身由上而下, 胸前、颈间、鼻端、耳根、额头均有配饰, 这些配饰疏密得当地环绕猫

头铺陈开来, 形成一个让人“挪不开眼”的“粘性”图像空间与意义区间, 而她也认为, 要读懂这只猫, 也需对这些配饰渐次拆解开来、逐一分析清楚。

具体而言, 猫身胸前的三组佩饰, 营造出“分层叠搭”的效果。颈项上侧打底的“乌塞赫宽领” (usekh collar) 形式隆重华丽, 用料配色讲究, 给人“堆金砌玉”之感, 而作为一种华丽贵重的饰品, “盖尔·安德森猫”所戴的“乌塞赫宽领”, 搭配其耳尖与鼻梢纯金质地的耳环与鼻环, 煊赫出主人的尊贵身份。而真正吐露这只猫信仰属性的, 是颈间的另外两块配饰: 其一为“乌加特眼” (wadjet eye, 象形文字符号为 𐩔) 浮雕鎏银护身符, 在古埃及“意义密集型”的符号象征体系中, 饰牌上刻画的右眼 (日眼), 也被称为“拉神 (日神) 之眼”; 其二为猫前胸与额头的同样标示日神信仰的“圣甲虫” (scarab) 装饰, 对应象形文字的符号“𐩔”, 而“圣甲虫”是太阳神拉 (Ra) 三个主要化身之一的凯布利 (Khepri) 的象征, 埃及人常以圣甲虫来象征早上初升的太阳, 而尽管“圣甲虫”母题在“𐩔”基础上有许多变体,

但它作为日神的化身, 蓄力往复、助祐新生的寓意是常在的。在埃及人的信仰体系中, 猫与日神崇拜密切相关; 在猫的形象符号 (𐩔) 上叠加象征太阳的“日眼” (𐩔) 与“圣甲虫” (𐩔) 符号, 标示着猫在埃及信仰体系中的基本站位, 为它贴上“日神所属”的标签, 为其“神猫”的身份盖章认证。

这只“神猫”, 在古代埃及, 被称为贝斯泰特 (Bastet), 即“猫女神”。公元前五世纪,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游历到埃及, 在猫女神的圣地布巴斯提斯 (Bubastis) 目睹七十万民众共庆贝斯泰特节, 曾经震惊不已; 而如今, 面对分散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埃及文物里数不清的“神猫”收藏, 人们也会忍不住好奇, 关切埃及人为什么会奉猫为神, 而“埃及猫”的神圣属性来自哪里, 又去向何方。贾妍老师认为, 想要通过“盖尔·安德森猫”与埃及文明“对话”, 须得就这些问题进一步探究方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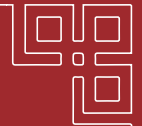
本文为根据主讲人原文稿提炼而成的学术纪要, 具体请见文研院官方网站。

(整理: 章涵青)





在线展览



（一）“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新疆”专题展览

文研院举办袁复礼旧藏西北科考团摄影线上展览



在新冠肺炎蔓延的特殊时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开辟“线上展览”栏目，积极利用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及官网发布图文及音视频内容，在优质学术资源与公众之间搭建一个可视化的平台。

“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新疆”专题展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朱玉麒教授担任学术顾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中国学者开始科学意义的西北考察的里程碑，在自然科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开创中国学术之先河。

袁复礼先生曾担任中方代理团长，在长达数年的考察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采集品、测绘图、野簿等实物资源，存留了丰富的、能够反映当时工作场景和西北风土人情的摄影作品。这些珍贵的资料，在袁复礼先生生前鲜有发表和公开。展览分

为漫漫征途、科学考察和西域风情三个部分，原定于三月在静园二院展厅开幕。因应疫情时期的特殊形势，文研院自3月8日起在微信公众号上以每周一期的频率推出，至3月29日为止一共推出四期，并在官网集中发布，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公众号转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展览筹备期间，文研院特邀袁复礼先生的女儿、年逾八旬的袁刚女士录制了视频，讲述她记忆中的父亲与西北往事，并通过音频录制朗诵了父亲的考察手记；同时，朱玉麒教授专门为展览写了五段袁复礼先生少为人知的掌故，也都随线上展览发布。

在展览陆续推送的过程中，文研院陆续收到多方肯定。原考查团成员陈宗器先生的后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雅丹女士评价说：“袁先生不只是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他在西部考察中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各个领域都可深入研究的资料。……

此次展览为袁先生的成就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为展开进一步研究迈出了很有意义与学术价值的一步。”

青年学者邵学成博士在谈到自己的观后感时说：“里面很多人和家族的故事都被复原，感觉很有意义。他们考察团多年后终于被人看见，做展览、做推送，都是要传递一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不同视角看到不同世界，新疆是中亚研究的一部分，文化混合的地区也需要多种文化视角来看，多去实地看，多去听听不同的人去谈谈这个世界。整理这些材料很辛苦，很了不起，但愿更多人看见。”

朱玉麒在其写的掌故中说：“毫无疑问，外国探险家在中亚探险中领尽风骚的身影，使我面对这些收集品，总是有点说不出的惆怅。直到袁复礼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作品的出现，才彻底地改变了这种观感。他留下的这些资料，不是作为一本探险游记的插图，作为文字的配料附加给读者一些视觉体验，而是把他在新疆五年的感受，

用相机记录下来，全部呈现给了我们。这些反映了从晚清以来延续到民国的新疆风情摄影，我敢说，所有外国探险家的图片加起来，也不如袁复礼旧照给我的震撼。”

文研院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回顾和纪念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继承代代学人在探索前行中凝聚而成的学术传统与精神。北大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努力一直是文研院关注的议题，三年来围绕“丝绸之路”的议题开展了一系列讲座，举办了“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纪念展暨研讨会、“丝路研究与北大人”专题展览，近期还增设了“丝路现场”专题，陆续推出北夫人在丝路沿线的考察纪要、随感、实录。以本次展览为探索，文研院将会延续疫情期间摸索的线上展览模式，展示北夫大学人的开拓精神以及前沿学术议题。

（本文于2020年3月31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胡甲鸣）

“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新疆”线上展览精选



2020年3月8日至3月29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

心、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主办“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新疆”专题展览。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朱玉麒教

授担任学术顾问。展览分为漫漫征途、科学考察和西域风情三个部分，原定于三月份于静园二院展厅开幕，因应疫情时期的特殊形势，文研院改为线上推送，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共分四期推出，并于官网集中发布。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西北考查团研究会公众号转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前言

1927年至1933年，由中外科学工作者联合组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中国广袤的西北地区进行了学科众多、地域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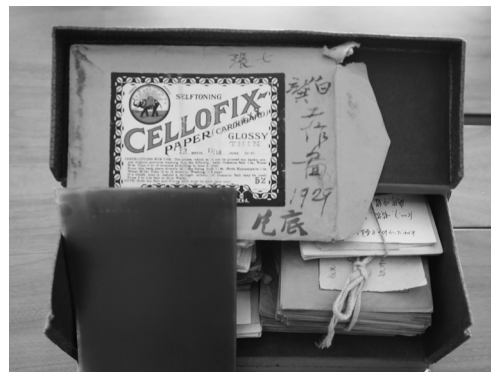
• 整理行李，1930年摄于博格达湖



返程驼队行经蒙新交界处博克苏等地，1932年2月8日摄



1932年2月8日，返程驼队行经噶顺淖尔，落雪



袁复礼保存并整理的照片及底片

泛的科学考察活动。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对祖国的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他们以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以严谨的态度开展科学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袁复礼（1893—1987）先生是考查团中杰出的地学家，也是在西北连续考察时间最长、获得采集品最多的工作者。除

了留下大量的采集品、测绘图表、野外工作记录簿之外，袁复礼还拍摄了考察途中的工作场景以及大西北的风土人情。期间，袁复礼担任了为期三年多的中方代理团长，汇集了自己与考查团员成员的摄影作品，多达5000多张。袁复礼生前曾多次对摄影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却少有发表。

袁复礼先生去世之后，这些图片经由其子女珍藏保留，并以天下公器的理念，无偿地提供给黄文弼中心及筹建中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纪念馆”展览、利用。

如今，我们展出部分新疆地区的图片以及笔记手稿，抚今思昔，回顾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考察与研究发轫期的艰辛历程，以见几十年来中国西北的沧桑变化。以下为展品选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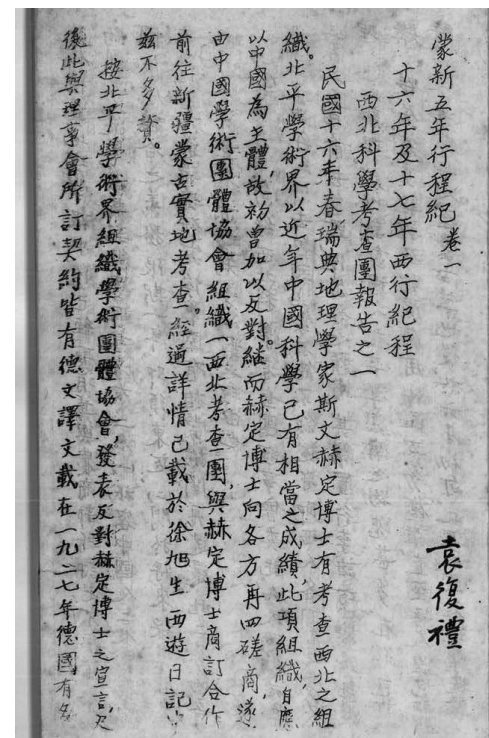
焉耆过开都河



• 返程驼队扎营噶顺淖尔北陶赖莫多，1932年2月3日摄



• 雪天扎营红官鄂博，1932年4月7日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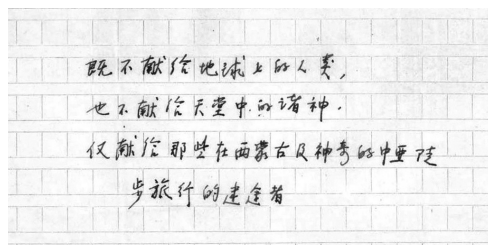
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纪》内页



• 红土坡全架化石

一、漫漫征途

采集品的运输也颇艰难,全靠驼队东运,不似今日汽车、火车四通八达。为便于骆驼驮运,所有采集品,如岩石、矿石、化石标本、石器,考古文物等,分别用棉花、棉纸,有的还用铁盒包装,盛装于80×40×60厘米的大木箱中,箱中还垫麦草数层,以免采集品相互碰撞。(袁复礼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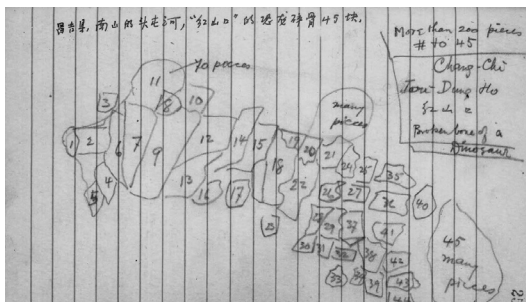
袁复礼野簿自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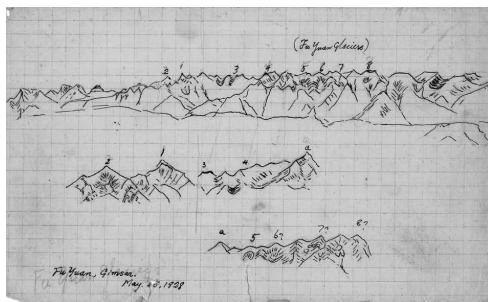
• 在博格达山左近测图



准东考察大龙口的工作情形, 1929 摄



袁复礼在昌吉县红山口的恐龙化石挖掘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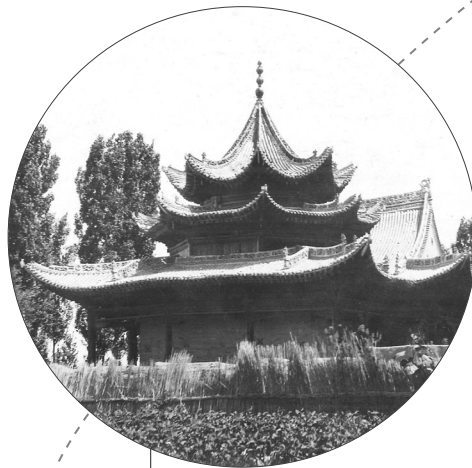
袁复礼于吉木萨的速写, 1928 年 5 月绘

二、科学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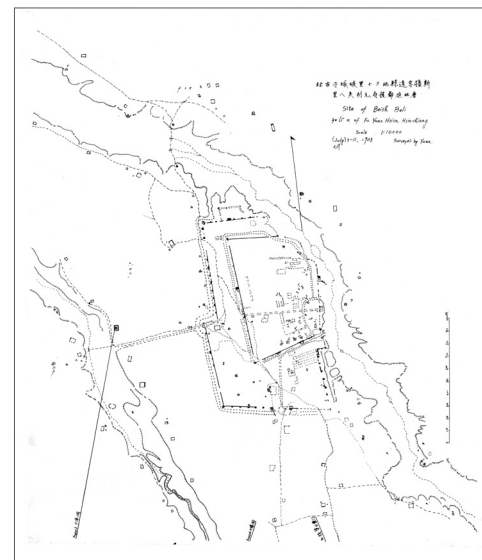
从 9 月 16 日开始,我们集中在第三个小山——东红山逐层细做,在第六地点连续发现了四个相距很近,并较完整的个体,一大三小。我在地上划出方格网,每人四格,每格约 9 平方米,让大家小心采掘。最要紧的化石采出后要按顺序排好,尤其是长条形的肋骨易断,脚骨、趾骨数多,它们的顺序不得有误。标本由我或白万玉、丁同仁编号,然后包装后携回驻地。(袁复礼 1982)



• 北庭考古时发现的佛头



• 吉木斯回教寺



袁复礼绘制的《北庭故城遗址测绘图》, 1:10000, 1928 年 7 月测绘完成



迪化街景江浙会馆



袁复礼的部分科学考查笔记本(野簿)

三、西域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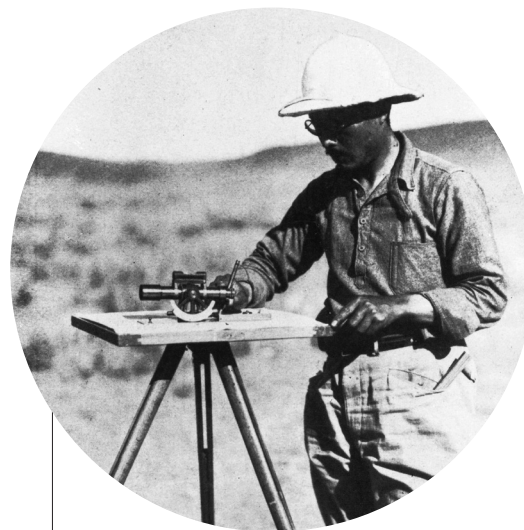
考查团先后在额济纳、迪化、库车、若羌建立了四个气象站，“这四个气象站都送给了新疆省政府，作为答谢。

袁复礼 1928 年进入新疆，即感叹“村落尤多，汉人与缠头各分庄务农，颇具承平气象”，又云“中亚固为各种人种会聚之地，而哈密又在中亚极东，来此者各遗其容貌肤色，诚为人类学者应研究之要地，惜同人中无专此门者，不然，材料当必甚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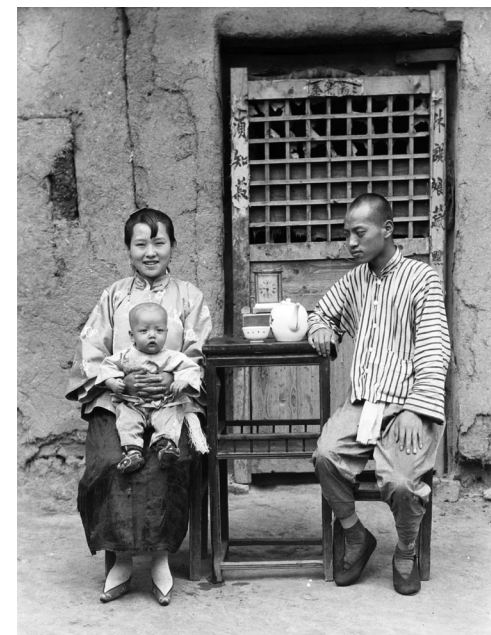
虽然受限于专业的分类，考察团员未曾从事社会学的研究，但在他们的镜头下，



焉耆珠勒都斯草原蒙古骑兵营



袁复礼在地质考察前测绘地形图，1928 摄



三台的一家三口，1929 年摄



吐鲁番的汉族戏班



银格纳斯（因格斯）山中偶遇



1930 年，袁复礼与白万玉、李宪之、刘衍淮、丁道衡等在迪化气象站合影

九十年前沧桑岁月中的西域民生百态，仍穿越时空，生动而丰富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袁复礼 1937）

结语

袁复礼先生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摄影，不仅展现了他们在西北野外考察的工作场景，也展现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西北的社会面貌，这些珍贵的历史画面，意义是多元的。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以科学的方法，对于中国大西北进行的多方面综合考察。袁复礼先生本人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既是一个全方位的地学家，又承担了古生物学、考古学、地理测绘、气象观测、社会学等等多领域的工作。通过他的照相记录及收集，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恶



烧房沟的哈萨克族人



吐鲁番旧城木头沟博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1928 年刚在迪化启用的碾路机



劣环境下坚持科学的顽强意志、关注社会的大爱情怀和奉献国家的担当精神。而这种交叉、综合学科的考察与研究思路，也正是当代学术努力的方向，因此在今天仍有其值得借鉴的意义。

大西北变幻无穷的自然风貌，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态，在其亲临其境的生活俯拾即是。这些凝固的画面，显示出近百年前不可复制的西北风土人情的不同细节，提供给我们鉴古知今、震撼心灵的视觉印象。结合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留下的其他文献，更深入地挖掘蕴含在图片中那个时期的历史，是我们将来努力的方向。

而由这些图片缅怀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丝绸之路上的艰苦卓绝，也激励着我们

在新时代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一带一路”上再创辉煌！

注：本展览照片名称均据袁复礼《照片登记本》著录（部分地名括注今名），说明文字据袁复礼《蒙新五年行程纪》（简称袁复礼 1937）、《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简称袁复礼 1982）、《西北照片编号册》（简称袁复礼 1954）。

（撰稿：朱玉麒 整理：胡甲鸣）



延伸阅读：走近袁复礼——展览背后的故事



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摄影作品给予我的震撼，不仅因为数量之多，更重要的原因，是较之外国探险家，袁复礼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长期驻足，与新疆的脉搏跳在了一起。他为了考察团的事业，周旋于官场、出入于民间，他的科学知识提高了当地民众炼铁的技术、帮助他们寻找了水源，老百姓为他建生祠供养；而他出色的西学修养，又使其在乌鲁木齐这个比现在更为国际化的都市里深入到形形色色的社交圈中。他眼中的景象聚焦到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照片，今天看起来都饱含着历史的余温。

看官会问：这里面的建筑、这里面的物人物，都已经百年，有你认得的吗？你说这历史的温度，是从哪根筋脉上号出来的？

好的，我们聚焦一下“三忠祠”。

三忠祠也是前面提及的“一炮成功”之后，为祭奠在奇、乌、吐东疆三城保卫战中殉职的办事大臣保恒、都统平瑞、领队大臣惠庆及所有阵亡官兵修建的祠堂。我在 2008 年知道三忠祠这个名称。

此前一年，国家图书馆的张燕婴博士转给我一份刚刚影印出版的《行程日记》，说封面上写的是“同治三年自叶尔羌由草地至归化城”，也许我有兴趣。于是我开始阅读，根据行年事迹，认定是叶尔羌参赞大臣景廉的日记稿本。景廉在南疆的莎车任职，得了重病，希望回到内地就医，内心的恐惧是哪怕不治也要死在正黄旗的家中。于是他一路遄行，走了八个月，经过蒙古草原，到达了呼和浩特。此期，在



袁复礼（右一）在奇台县县长（博孝昌）家中



奇台古城三忠祠牌坊，牌坊下左一为袁复礼，右一为奇台县长博孝昌

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蔓延全疆的同治民变如星火燎原，追着他的脚步，将沿途接待过他的地方官员逐一赶尽杀绝。《行程日记》竟然成了新疆军府制度最后时期的“录鬼簿”，景廉本人因病得福，在历史的时间差里捡回一条老命。

景廉在奇台休整的时间最长，每天来看望他的，就是古城办事大臣保恒和他的儿子锡老三锡纶。锡纶是《行程日记》中少数没有被杀戮的幸存者，奇台沦陷时，他正好被派去巴里坤搬救兵。家国情仇，使锡纶誓死坚守在收复新疆第一线，成为左宗棠的得力助手，官至署理伊犁将军。奇台收复后，由他出面请旨，建立了三忠祠。因病离职的景廉此刻也被重新起用，担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直到光绪元年左宗棠前来接替。他们与新疆的缘分，都成了命中注定的事情。

关于保恒之死，历史档案和现在的《奇台县志》记载不一，后者注明保恒阵亡的信息是保恒曾孙博大诚提供。博大诚是奇台县广播局退休干部，现在昌吉颐养天年。我找在昌吉的学生邵建华帮我向当地文体局打听能否联系博大诚，邵建华回复说不用打听，博大诚的女儿就是她原来阜康中学的同事。

很快，我就和当年85岁的博大诚在昌吉见了面。博大诚告诉我：他们家不是现在填写的满族，而是孝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就是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蒙古人，老家在科尔沁草原上。曾祖父保恒任官新疆，就在这里落了户。祖父是锡纶，锡纶的哥哥是锡缜，当过林则徐的幕僚，做到驻藏大臣。父亲博孝昌，担任过绥定、奇台县令。在奇台任上，与包尔汉修过新疆的第一条公

路——乌奇公路，包尔汉的回忆录中有记载。后来马仲英进疆，他不肯出仕，被盛世才作为叛逆整死。博大诚兄弟四人，老大是新疆第一批留苏学生，归来担任过包尔汉的行政科长、彭德怀解放新疆的俄文翻译；老三解放后就读北京大学东语系，后来在中央民院工作；他是老二；还有老四，担任过温宿公安局长。三忠祠在他父亲任县令的时候还在，有他祖父写的对联：“万里显三忠自应万古，孤城经百战尚有孤儿。”了解当时的历史场景，再看下联里饱含的忠愤之气，真的是令人发指。

2008年，我写完《〈行程日记〉作者及相关人事考》发表后，就把近现代史上博孝昌这一新疆的功臣家族放到了记忆深处。

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之后，袁复礼旧照中的三忠祠、博孝昌赫然在目！三忠祠的牌楼下，最左边站着的是袁复礼先生，右边的是博孝昌县长。三忠祠的匾额，是光绪三年锡纶的手笔。此外，你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在不同场合的合影。1937年，袁复礼写《蒙新五年行程纪》，深情回忆：“（1931年）十二月十七日午时，自古城启程，在东郊水磨沟由孝虞臣县长祖饯，攀谈甚久。咏：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二时始就道。白雪遍地，深皆没足。”到了1982年，他再写《三十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再次回忆说：“在古城子（奇台县）备齐了骆驼、帐房和食品后，12月17日启程，县长孝昌（字虞臣，满族）送行十里，吟诵古诗‘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感情诚挚，又情景洽合，至今记忆犹新。”贯穿了半

个世纪的记忆，真是历久弥新。今年专题展的预告片中，袁刚老师说她小的时候，父亲不止一次地提起那次送行，都情不自禁吟诵“正是天山雪下时”的句子，让她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天山雪下时”是岑参担任北庭节度判官时的诗句。同样的场景下，博孝昌用它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最后离开新疆的袁复礼送行。慷慨的诗句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温暖着袁复礼走过了八千里路的冰雪荒寒，也让我在朗润园的冬季里，感受到“熊熊火焰温暖着我的心窝”。

（撰稿：朱玉麒）



（二）“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 专题展览

文研院举办“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 线上展览



自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设立新栏目，组织线上学术活动。其中“线上展览”，将学术展览从展厅跃然至屏幕，读者可以通过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及网站浏览丰富的展品资料。

继上月推出的“袁复礼藏西北科考团摄影·新疆”线上展后，文研院于4月7—16日举办了“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线上展览。

博物学是围绕“生活世界”而生的一门学问、生存智慧，涉及人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多个维度。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林奈、卢梭、达尔文、赫胥黎等都是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显现的伟大的博物学家，我国《周易》《诗经》《道德经》《庄子》等这类探讨人与自然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一定的博物色彩。在如今新冠疫情导致全球陷入公共危机之时，深度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就显得尤为必要。

文研院希望借由展示丰富多彩的博物图像，重启哲学与博物学相结合的这一古老而又有趣话题，引导读者关注身边的生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体会自然演化的复杂与生命的精致，对共生有更全面的理解。

为此，文研院特邀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作为展览的学术主持。刘华杰近年来不断致力于博物学研究及推广，

在海内外多地进行博物学考察与标本采集工作。展览依托刘华杰在博物学考察中所积累的摄影、标本资料以及考察日记，以朴素的、叙事的方式引领读者走近博物学世界。

展览分为导言、夏威夷考察记、勐海植物记、东北与华北植物、格物致知与博物人生五期推出。在导言中，刘华杰叙述了何为博物学以及博物学的发展和必要性。第二期夏威夷考察记中，刘华杰慷慨地展示了诸多中文世界中基本找不到文献的植物，这些均有他自己拍摄并鉴定，同时也引导读者关注为夏威夷植物贡献一生的博物学家洛克及其著作。

在“云南勐海植物记”中，刘华杰带领读者一起探秘的雨林，分享了自己数次考察的线路，以及在繁密的植物中所辨认出的各类属种。第三期，刘华杰把读者的视野从难以接触的花草中带到身边随处可见的野生植物上，谈到了吉林、北京及周边城市的野花野草，最后落到了北京大学的草木，透露着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最后一期，刘华杰介绍了自己对于博物学与现代生活的思考，以及六种自己跟踪调查过的在中国生长的外来入侵种，警醒人们直面本土种与外来种的矛盾、体会全球化和人类发展对生态的影响，学会欣赏地方性知识、民间智慧。

“看花”不只是肉眼的看，更包括心灵的看（即思），在观察日常生活及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理解并顺应自然规律，这是一种世界观的形成，但对于学者而言仅作为一阶的博物活动。二阶的

博物活动则要求学者将博物学与科学史、科学哲学等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展览结束后，文研院公众号接续开辟“走近博物学”栏目，发布与博物学研究相关的文章，希望能够拓展读者的阅读视野、激发研究兴趣，进而为人文社科领域提供另一种可能的研究视角。

（本文于2020年4月28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胡甲鸣）



“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线上展览精选



洛克遗嘱执行人韦西奇先生从柜子里拿出洛克的旅行箱，一件一件地为刘教授讲述其中的遗物。行李签上洛克手书的地址是 Dr.J.F.Rock/3860 Old Pali Road/Honolulu,Hawaii, 其中老帕利路 3860 号是洛克的女粉丝家的地址，晚年洛克一直住在这所大房子中。



2020 年 4 月 7 日至 4 月 16 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刘华杰教授主持举办“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线上展览。本次展览分为夏威夷考察记、勐海植物记、东北与华北植物、格物致知与博物人生四个部分，依托刘华杰教授在博物学考察中积累的摄影、标本资料以及考察日记，以朴素的、叙事的方式引领读者走近博物学世界。希望通过这次“足不出户”的自然之旅，借由丰富多样的博物图像，重启哲学与博物学相结合的这一古老而有趣的话题，引导观展者关注身边的生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体会自然演化的复杂与生命的精致，对共生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黑喉红臀鸭在啄食豆科大叶宝冠木 (*Brownea macrophylla*) 的花蜜，同时为其传粉。“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一个月后观察，树上依然有几簇花，原来的落了，结出豆荚，新的又开放。三个月后观察，依然如此。过了一年，还在开放！



桃金娘科草莓番石榴 (*Psidium cattlenium*)，外来种，在夏威夷野外最容易吃到的一种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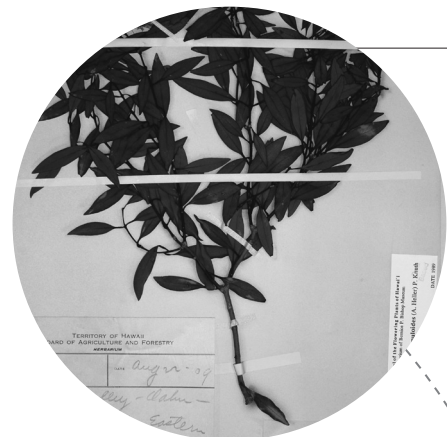
这一串红果就能让人吃个半饱，而一株大拇指粗的小树就能长出好几串。它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什么时候上山差不多都能吃到果子。



一、夏威夷博物考察记

这一部分展示了刘华杰教授在 2011—2012 年在夏威夷进行博物考察的部分成果，重点在植物。刘老师慷慨地展示了诸多中文世界中基本找不到文献的植物，这些均有刘老师自己拍摄并鉴定。在展示植物的同时，刘华杰老师还引导读者关注为夏威夷植物贡献一生的博物学家洛克及其著作。

洛克 1909 年采集的摇叶铁心木标本 4827 号，摄于 Bishop 博物馆植物标本室。与标本馆的标本对比，是鉴定植物的重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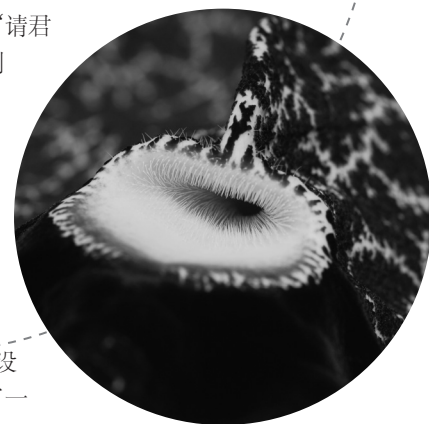
二、勐海植物记

刘华杰老师曾多次赴云南勐海进行博物考察，一次次地在植物生长的不同阶段观察、攀登、走访，不断丰富勐海植物知识，了解以及当地人对于植物的认知。在“勐海植物记”的结尾，他就本土植物保护与生活多样性、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生态旅游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锦葵科基苾婆 (*Sterculia principis*)，灌木，高一米左右。叶椭圆形或条状椭圆形。总状花序或少分枝的圆锥花序。花期 3 月，果期 6 月。见于蚌岗林中。

马兜铃科美洲马兜铃 (*Aristolochia durior*) 花的喇叭口中央入口处微距图，可见密密麻麻的倒刺儿，客人到此，“请君入瓮”，倒刺儿会推着昆虫向前走，一直走到雌蕊着生的花筒底部。花在演化过程中展现出的所有“设计”，都为了一个“目的”：传粉从而传宗接代。喇叭口部紫红色，白色的花筋儿闪电状，具有自相似的分形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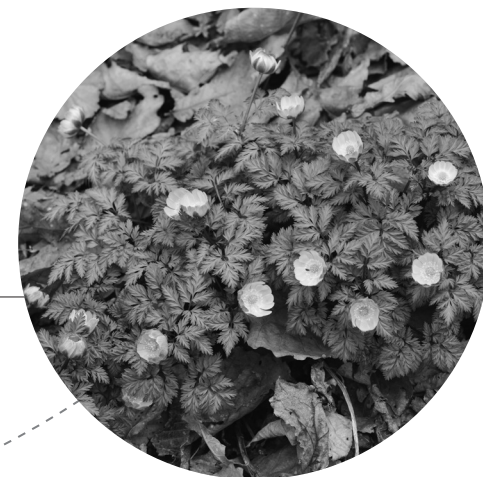
三、东北与华北植物记

而来到“东北与华北植物”篇章，刘华杰老师将读者的视野从难以接触的花草带回身边随处可见的野生植物上，在熟悉的土地上发现“新知”，考察吉林松花湖大青山的植物生长，观察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野生植物现状，而回到燕园，校园中的生物同样令他有所思考，思索草木多样性、现代性的规训与多样性的矛盾，以及植物世界与学科脉络、人类处理的相通之处。

豆科巴豆藤 (*Craspedolobium unijugum*)，巴豆藤属仅此一种，在渤海常见。叶3出，荚果内有种子3-7粒。要鉴定此植物，必需爬到藤子顶部采到花或果。多种植物志上均说此藤长3米，不准确，实际上可达25米，甚至更长！在民间，巴豆藤也称血藤。而“血藤”对应的植物非常多。



毛茛科侧金盏花 (*Adonis amurensis*)，别名冰凉花、福寿草。多年生草本。根状茎短而粗。茎上有紫色纵条纹，常扭转。茎下部叶有长柄，无毛。叶片正三角形，三全裂，全裂片有长柄，二至三回细裂。萼片约9，下面常带淡灰紫色，长圆形或倒卵形长圆形，与花瓣等长或稍长。花瓣约10，黄色。心皮多数，子房有短柔毛。瘦果倒卵球形，被短柔毛，有短宿存花柱。东北早春最具特色并且分布极广的一种优秀野生观赏植物。



无患子科韶子 (*Nephelium chryseum*)，与热带水果红毛丹同属韶子属的，但不是一个种。



韶子属在我国有三种：红毛丹、韶子和海南韶子，其中红毛丹是外来种。韶子在在渤海长成乔木，树干笔直，胸径40厘米，高约20米。偶数羽状复叶，小叶常4对；叶薄革质，长圆形，全缘；侧脉每侧大于9条。这种植物我跟踪了整一年，如愿以偿，看到了花也吃到了大量的果。



蔷薇科水榆花楸 (*Sorbus alnifolia*)，乔木，在大青山多处、不同海拔都有生长。事后看这并不是十分特别的树种，但是当时硬是没有认出来，而且持续了大半年时间，因为始终没有见到花、果。仅这一种植物我就为它拍下了近百张照片。中间拿着一些正反面叶的照片咨询过当地的植物学专家，以前请教别的物种马上就有反馈，但这次没了下文，也就是说信息不足当地专家也识别不了。到了2017年秋季，突然在地上拾到一些小红果，谜题瞬间解开，花楸属植物无疑！之后，我又在辽宁、北京延庆找到了水榆花楸。

毛茛科宽叶曼乌头 (*Aconitum sczukinii*)。块根倒圆锥形。茎缠绕，可左旋也可以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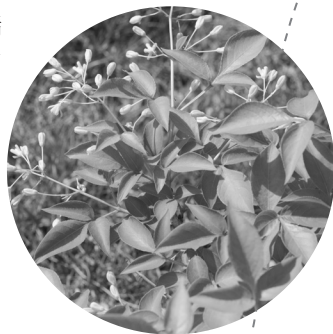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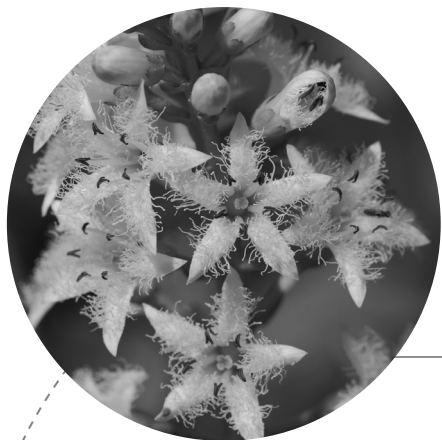
旋，以左旋为主。茎中部叶有短柄。叶片基部心形，三全裂，全裂片具短柄或长柄。我在滑雪时首先注意到雪地上露出的膏药果，于是启动了《青山草木》写书计划。

桔梗科羊乳 (*Codonopsis lanceolata*)，别名轮叶党参、羊奶参、山胡萝卜。植株光滑无毛，茎叶偶疏生柔毛。根肉质肥大，呈纺锤状。茎缠绕，以左旋为主，同一株植物也同时右旋。花盘肉质，深绿色。蒴果下部半球状，上部有喙。遭受毁灭性采挖，应注意保护。现已大量人工栽种。北京附近偶尔也能遇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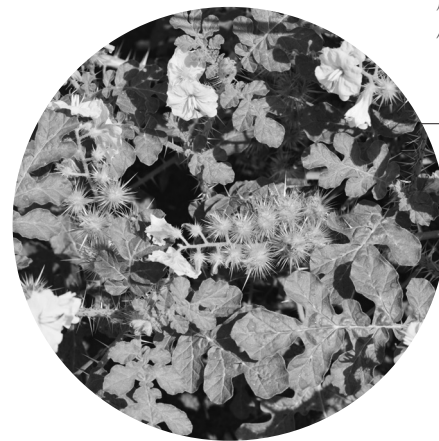
菊科款冬 (*Tussilago farfara*)，于北京延庆。在北京算濒危物种。



省沽油科省沽油 (*Staphylea bumalda*)。见于人文学苑东北角。落叶灌木，高约2米，稀达5米。枝略带弧形。树皮紫红色或灰褐色，有纵棱；枝条开展。复叶对生，具三小叶。圆锥花序顶生，直立，花白色；萼片长椭圆形，浅黄白色，花瓣5，白色，倒卵状长圆形。雄蕊5。蒴果外形像荷包，扁平，2室，先端2裂。北京大学校园仅一株。



睡菜科(原龙胆科)睡菜 (*Menyanthes trifoliata*)，北京市算濒危物种，只分布在延庆田宋营一带，急需专门保护。



茄科黄花刺茄 (*Solanum rostratum*)，入侵种，原产于北美。见于河北张家口，近些年迅速传播，G6高速路休息区及附近荒地均有分布。



2014年8月2日拜访王文采院士

四、格物致知与博物人生

博物学，是围绕着“生活世界”而生的一门学问、生存智慧，涉及人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多个维度。“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看花，以及与天地之间的植物相遇，在刘华杰教授看来，即是一种博物、格物而致知的活动。在展览中，刘华杰教授曾提及《法华经》中的“真理自然”，认为世间法即佛法，生活世界即科学世界，生活史即科技史。在他看来，博物分形，一叶、一叶、复一叶，真理自然、悟在当下。带着对于“生活世界”的好奇，看花、观察植物，这一经验感十足的活动，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之间关联紧密，而经由古老的博物之学作为中介，他也向观展者们展示了“看花”与“做哲学”的启发式关联。在他看来，植物是看世界的一个窗

口、一个门缝，这种“看”不仅是肉眼的、更包括心灵上的看（即思），启示观展者们观察丰富多彩的植物，理解并顺应自然规律，欣赏地方性知识与民间智慧，进而思考体会全球化与人类发展对于生态的影响。举一例而言，包含有种类与分布多样性的草木多样性，在现代性单向度的规训中逐渐表现为简单性、整齐划一与显示度，呈现出人为操控的“单一秩序”，而博物学作为视角上的“变焦”与“反思”，经由实地观察与归纳思考，让人们重新去发现多元物种与秩序的意义，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相处。

在格物致知与博物人生这一期中，刘华杰老师介绍了自己对于博物学与现代生活的思考，以及六种自己跟踪调查过的在中国生

长的外来入侵种，警醒人们直面本土种与外来种的矛盾、体会全球化和人类发展对生态的影响，学会欣赏地方性知识、民间智慧。

(整理：胡甲鸣、章涵青)



禾本科雀麦 (*Bromus japonicus*)。

一年生草本。秆直立。

叶鞘闭合，被柔毛；

叶舌先端近圆形；叶片两面生柔毛。圆锥花序疏展，长20-30厘米，宽5-10厘米，具2-8分枝，向下弯垂；分枝细，长5-10厘米，上部着生1-4枚小穗；小穗黄绿色，密生7-11小花。见于新校医院西南角草地。《北京植物志》1182页就曾记载见于北京大学校园。



延伸阅读：博物文化传统不是科学也不是科普



新冠疫情突然而至，大家都规规矩矩闷在家里。有一天，文研院来信邀我做一次与博物学相关的线上展览，还转了文研院组织的西北科考团摄影展供我参考。我哪敢凑这热闹，心里没底，没敢立即答应。3月10日文研院又组织一个六人微信小会，文研院老师专门介绍了展览的用意和形式，我这才胆子大起来。疫情期间，人们无法自由地在大自然中畅游，但愿翻翻植物图片能调节一下心情。

“看花是种世界观”是作家半夏构造的一个句子，准确说是那位云南作家半夏。我不开中药铺，却认识三个半夏。一位是河北的男半夏（新生活四公子之一），一位是云南的女半夏（《与虫在野》作者），还有天南星科植物半夏。后者北京大学校园就有，北京西山上更是多得很多。

半夏说，“看花是种世界观”中的“种”字有两种读法，也表示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是作量词用，读zhǒng；二是做动词用，读zhòng。她用这样一个标题作为采访我的一本小书的书名，可谓用了心思，不过，似乎也给人一种印象：企图把看花这般“颇低俗”的活动与“挺高雅”的哲学系扯上一点联系。一种世界观，不管正确与否，也是世界观；种下世界观，不管种得多深，当然还是世界观。哲学与花朵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两者有没有联系？自然是有的，如濂溪爱莲、佛陀拈花。论孰高孰低，也无定论。

哲学不着调时，也难称高雅。只是在统计意义上，在缺省配置中，哲学借了亚里士多德、老子、康德、马克思等前辈的力，沾了思想、智慧的光。

不过，对于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没必要拔高、故作深沉。首先，看花是一种好玩的活动。何谓好玩？有趣，自娱自乐。看花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增长见识。花有许多，百花千花万花不止，看了一种想看第二种，而且可以喜新不厌旧。

看花会上瘾，这跟购物、打麻将、攀岩、炒股能上瘾一样，各有千秋。我不好特别夸奖看花的好处。先说负面吧。其坏处是占用时间，大把的时间，有多少时间都不嫌多。也会因此花些钱，这个倒不重要，至少我不会倾家荡产去看花。花1000美元去看一种花，确有其事，只是偶尔。看花，是我个人的一项业余爱好而已。做为一个正常人，除了工作，生活中露脸的事、不良嗜好和爱好总得占一样吧。曾有意锻炼过喝酒，后来发现在缺乏天赋，每当聚会举杯就有点发怵，遂编出“三个一般”：“一般不喝酒、不和一般的人喝酒、不喝一般的酒”，不是酒桌境界高，只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实际上是没底气。多年试下来，唯小时候就实践过的看花识草还算适合自身，也算与植物有缘。我上小学前，家住东北长白山的一个山沟里，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中草药调查小队。他们边喝着水，边摆弄着一株大叶柴胡，好

像在说这东西不好找。作为小屁孩的我，在一旁听着，插嘴道“山上有的是”，大人们根本不相信。不出10分钟我就抱了一大抱回来，有几十株，用手刚拔下来的，没挖根只采了茎叶。专家们一看，果然是大叶柴胡。其实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更不知道伞形科。这大概算是免费认识了一种乡土植物吧。后来，在父亲的指导下，根据家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认识了身边的许多中草药。后来，读书耽误了看花。从小学到博士，仅在极特殊时候看一眼植物，只有到了我博士毕业，当了老师，才重拾儿时的爱好，一发而不可收拾。

看花，不是字面上的只看花。它包含观看整个一株植物、不同时期的一株植物、各种植物，由喜爱其形态而了解其名字，“命名与相知”又是相伴的，进而了解它的解剖结构、分布、演化、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等。看花、看石头、观星、观鸟是差不多的活动，都不限于观察具体的对象，还要顺便考察其周边、与其他事物的关联。

看花是一种博物活动，这是我很久以后才搞明白的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不仅巫师能为、科学家能为，老百姓也能为。读大学时，发现达尔文、徐霞客、丁文江、王世襄、马未都是博物的好榜样。工作后又发现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卢梭、怀特、歌德、梭罗、利奥波德是博物学家，而且他们的博物活动与某种哲学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极其自然的，不需要通过逻辑经验主义那样坚持还原论，由观察语句的层层构造而建立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



刘华杰教授教授在夏威夷观察植物

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得知曾翻译威伯尔《欧洲哲学史》的徐旭生，当过哲学系主任，他做了一件与博物有关的重要事情。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说上几句。

九十多年前启动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并非单纯的自然科学考察，而是综合性的多学科考察。哲学与那次科考也有关系，在通常的历史叙事中常常遗忘或淡化这一点（注：上次线上展览预告第一段提到中方代理团长却没有提中方团长）。其实那次科考的中方团长是徐炳昶（1888-1976），他就是哲学出身，留法哲学博士，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考察团的团员中还有北大哲学系1918年毕业生黄文弼（1893-1966）。当然，后来徐旭生改行研究历史，黄文弼改行研究考古，皆成一代学界名人。

那次西北科考中地质学自然是主力学科，袁复礼和丁道衡都是地质学出身，后者是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者（我还专门驾车从



豆科多花紫藤 大管祐一绘

北京去白云鄂博瞧过)。丁道衡与考察团中郝景盛(植物学)和李宪之(气象学)均为北大毕业生。那次著名的科考,相当程度上也是博物学野外调查,也可以说那是以“北大系”学者为主力队员完成的博物大考察,考察过程的大量采集品后来大多进了博物馆。

一、博物：从地质到哲学再到植物

我个人的经历恰好与北大、地质、哲学、植物有着某种联系。中学在吉林通化读高二时参加过一次地学夏令营,1984年就报考了北京大学地质系。1987年读地质本科时喜欢上哲学,第二年本科毕业时就考取了哲学硕士。后来又读哲学博士、当哲学系教师,重拾儿时的植物爱好。现在则在吆喝复兴古老的博物学。

博物学是什么?跟博物馆有关系吗?说来话长,但不难理解。博物跟博物学好比物理与物理学。博物学三字联用源于近代日本,但博物两字联用中国早就有了。就像今人听说数学、物理学、地质学、文学、社会学字样不会感觉陌生一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曾是一门显学,解放前也风光过。那时有“哲学门”,也有“博物门”。同样,“听说”不意味着就“懂得”其中的滋味、缘起。简单讲,博物学是围绕“生活世界”而生的一门学问、生存智慧,涉及人与大自然打交道的多个维度,它比较平面化又非常综合。这门学问中有人物有理论,更不缺少可操作的方法和细节。

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林奈、布丰、卢梭、歌德、洪堡、达尔文、E.O.威尔逊、纳博科夫、古尔德等是大家熟悉其名字的伟大博物学家。塞奥弗拉斯特、格斯纳、杜布赞斯基、缪尔、迈尔、卡森、劳伦兹等也是,但人们可能不清楚他们与博物有何瓜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创始人、WWF 的创始人朱丽安·赫胥巴跟他爷爷托马斯·赫胥黎一样都是著名的博物学家,为推动博物学发展贡献颇大。其实,《周易》《诗经》《道德经》《庄子》等某种意义上也是博物类作品,中国古代学问有相当的博物色彩。只是相当长时间里人们没那么看、没那么想。千百年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到处都有博物的内容。

博物是科学吗?在科学时代,任何与认知相关的事情一般都要纳入科学的范畴来考虑,要么做为具体的科学学科来展开,要么作为科学史来探究。这一切进行得非常自然,不易引起人们反思。博物学也的确与(自然)

科学有交集,其实它们有共同的起源,都涉及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利用,均包含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在近现代,博物学传统经常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子系统加以考察。起初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发现不对劲,于是提出“平行论”:博物学与自然科学平行存在和演化,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如此。就认知而言,现代自然科学有四大传统:博物、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现在三者特别是后两者极受重视,易拿到经费、成果也十分丰硕,其中的博物传统虽悠久却显得肤浅而日渐衰落。如今的植物分类学、动物行为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仍有明显的博物学影子,但也因此处于边缘,在科学大家庭中地位也不高,这可从相关专业期刊的影响因子看出来。除了综合、“肤浅”外,博物类学科对世界的控制力比较弱,不被“现代性”所看重。

二、博物中的 history(探究)不远离“生活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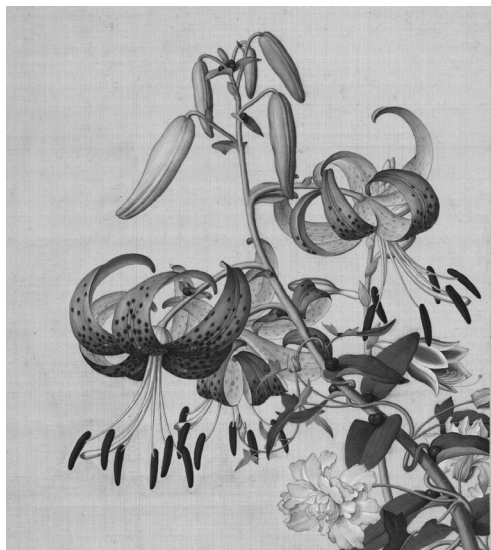
以现代的眼光看,博物学与感觉、经验、质料十分密切,对研究对象的圈定、还原均做得不够深入,对数学方法和现代实验方法也不够迷恋。但它并不排斥数学和简单实验。在英语中博物对应的词语是 natural history,两个词再普通不过,但是这个固定搭配十分久远了。其中的 history 源于拉丁词希斯托丽亚(historia),而后者又来自希腊词伊斯特丽亚,意思是“探究”,而不是“历史”。其中的 natural 作为修饰语一方面指研究的对象原本都是自然界的東西(也不全如此),二是指研究的手法、进路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也不全如此,也大

量采用象征、比喻),这是用现在的概念来解说。在古希腊,同时还有另外一种非常特别的研究方式,比较重视事物不变的本质、理性、形式,通常认为与西方哲学和数理科学的起源有关,沿着这个线索后来演化出了 natural philosophy,牛顿的代表著书名就包含这个词组。不过,无论 natural history 还是 natural philosophy 都不可简单地做现代英语的字面解释。那里的 history 和 philosophy 与如今的历史和哲学并不吻合。它们是两大类互相补充的探究事物的方式,都是学问,甚至都是哲学家关注的,亚里士多德及其大弟子两者都研究。这与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分野、交织、争论有关联。比较而言,在哲学家当中,亚里士多德、F.培根、休谟、歌德、胡塞尔、费耶阿本德、罗蒂、罗尔斯顿三世、卡尔松等少数人更同情博物学。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博物学意义上的最高成就。之后,博物学的天地被各门具体的新兴学科不断瓜分,就像哲学中不断分化出新学科一样。达尔文本来是标准的博物学家,身份也变成了生物学家、科学家。到了19世纪末,博物学开始衰落,以后局部虽然还有起伏,但整体上博物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主流学术界式微。“博物学家”也从一个褒义词变成贬义词,多数学者不敢自称、不愿意他称,个别有足够自信心的大佬例外,如E.O.威尔逊,其自传就是《博物学家》(Naturalist),中译本改为《大自然的猎人》。但是,在发达国家,在主流学术之外的社会上,博物学传统一直得以很好延续,社会上有大量的博物学民间组织,博物类活动丰富多彩,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缠枝牡丹 余省绘



卷丹、紫萼和缠枝牡丹 郎世宁绘

比如英国皇家鸟类学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博物类民间组织，有会员 100 多万。美国的山岳俱乐部、奥杜邦学会也是这样的民间组织。

历史上，博物学语义时而扩张时而收缩，在现在它大致对应于人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一种综合性的感知和探究，百姓的衣食住行、旅游休闲、兴趣爱好都涉及博物。CCTV 播

放的《舌尖上的中国》其实就是博物片（制作团队也许没这样考虑），BBC 下设一个“博物部”，制作播出了大量博物影片。公民博物是公众理解科学（PUS）的重要手法、渠道，博物提供了通向高深自然科学的良好接口。除此之外，博物还有其他意味和未竟的使命。

博物学注重记录、描写、绘画，相关历史资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其中的绘画，能传达许多信息。如今手机、单反相机拍照都十分方便，似乎不到一秒钟就能做出一天的活儿，但人们仍然觉得传统博物绘画具有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重启古老的博物学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人类世”和“风险社会”，人类在资本、科技和权力三驾马车的牵引下加速前行，进步的同时，人类自身和大自然也都疲惫不堪，天人系统的可持续未来并不明朗。谁曾想到，在 2019 年末，一种肉眼看不到的新冠病毒就令欣欣向荣的现代世界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在博物家眼中，这样的灾难并不特别，估计它迟早会到来。

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科学史、环境史、文化史、物质文化研究、自然文学、哲学界重新密切关注博物学，多领域学者合作研究出版了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从 1996 年的《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和 2018 年的《博物世界》（Worlds of Natural History）可窥一斑。坦率说，不同学者的动机未必相同，现在大家意识到这种边缘性的文化传统依然有趣、值得延续。

中国历史上没有欧氏几何、伽利略—牛顿力学、麦克斯韦方程组、爱因斯坦相对

论、迈克耳逊—莫雷实验、吴健雄实验那样的显著成果（这非常正常，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也没有），却有极为丰富的博物成果，中国发达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医学、农学均与博物有关。作为关心人类认知史的一名哲学系教师，我重新看到、找到了博物学。实际上，许多领域的华人学者也沿着各自不同的路径重新发现了博物学，比如范发迪、余欣、程美宝、袁剑、赖毓芝、吴国盛、刘兵、江晓原、刘孝廷、黄小峰等，但出发点、进路可能很不一样。于我个人而言，新的科学编史学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波兰尼的个人知识理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现代性的反思、科学传播学等，都引向博物学这个“吸引子”（attractor）。近十几年，我和我的同事、学生做起博物学史、博物学文化的研究工作，参与创办以书代刊杂志《中国博物学评论》，创办“博物学文化论坛”。也积极推动博物类图书的出版，近年仅作序推荐的博物类图书就有 30 多种。我的博士生翻译出版了《植物学通信》《看不见的森林》《探寻自然的秩序》《性、植物学与帝国》《林奈传》等，博士论文已经出版了《约翰·雷的博物学》《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2019 年还组织出版了《西方博物学文化》。

将一阶博物活动看花，与二阶的科学史、科学哲学专业研究结合起来，是后来的事情。二阶学术的开启并没有中止一阶爱好。“观察植物”——看花，仍然花费了我大把时间。实际中也可以并行，在校园一边走路一边看花，出差开会顺便看花等。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也写了若干关于花草的书，如《天涯芳草》《草木相伴》《燕园草木补》《檀

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崇礼野花》《青山草木》《勐海植物记》。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工作方式无疑是非常边缘化的，不具有推广价值，也许只在北大的小环境下才能允许。这样做，也意味着对主流学院哲学过分关注文本的不认同。

学术考虑“文本”并无错。伽利略当年面对两个文本：一是《圣经》，二是大自然，两者均被视为上帝的作品，即广义文本。为此他创立了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科学革命随之展开，想拦都拦不住。今日学者也面对两个文本：一是前辈大佬们的论著，相当于《圣经》，前辈们所做工作很重要，是前进的基础。二是当今的大千世界。地球怎样、人类社会怎样？这个也很重要，学者必须回应时代的考问。前人的工作、自己的思考要放到经验世界中验证，闭门写论文和专著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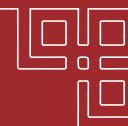
在科学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哲学被边缘化，这是大势使然，也与自身的学术导向有关。自然科学是否能包揽对大自然及人类社会的认知？回答是：不能，哲学依然要发声。哲学工作者发出有价值声音的前提是，了解大地，特别是涉及大尺度战略问题时，单靠想象、推理并不能简单地实现跨越、超越。对于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的几乎所有重大事情，当今哲学界都保持着沉默，却津津乐道于细节的严谨论证，这不应该啊。看看花，或许能转移一点注意力。谁知道呢？

（撰稿：刘华杰）





文研回望



文研院联合三联中读推出“文研学堂”音频讲座

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称“文研院”）立足于服务学术、服务学者，积极拓宽线上学术交流平台，为读者提供优质的学术内容。在此背景下，文研院与三联中读携手，共同推出“北大文研学堂”栏目，现已在“三联中读”官方APP上线。其中，第一季“文明的起源”专题，共十期，已于近日全部更新完成。该栏目免费向听众开放，扫描下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订阅收听。文研院微信公众号也将陆续进行“北大文研学堂”栏目内容的推送，敬请关注。

自2019年11月，文研院与三联中读开展合作，共同设计、筹划“北大文研学堂”栏目，通过以音频为主的方式，配以独具特色的“文研海报”，线上推出文研院往期学术活动内容，还原活动现场。该栏目围绕“文明：中华与世界”这一主题，聚焦不同的学术议题，将文研讲座、论坛等活动进行梳理与归并。第一季“文明的

起源”专题，精选了十场文研院以往优质的学术活动，主讲人有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等十余位学者。他们从各自的领域和视角出发，回溯早期中国的历史，探究西方文明的起源，寻找东西方文明之间交流互通的路径。

首期“为何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选自北大文研讲座第一期“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主讲人为樊锦诗。透过音频，听众可以感受这场内容丰富且具有震撼力的讲座，聆听樊锦诗讲述敦煌的历史地理面貌，介绍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发现过程和文化价值。

“早期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值得探讨的学术议题。文研院围绕此议题开展过多场学术活动，凝聚了来自历史、考古、地理等各学科领域的学者进行讨论。“北大文研学堂”栏目也着力于“早期中国”这一学术议题，在第一季“文明的起源”专题中，汇集了七场文研讲座、论坛，多

方面呈现学者们不同的看法与声音，带领听众更为深入地认识、了解“我们的中国”。

李零形象生动地将西周和以西周为中心的东南西北地区比作为“西周的四合院”，从历史与地理的双重层面，探究周秦的崛起。围绕“对早期中国的叙事与想象”的主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李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齐聚一堂，对“早期中国”的问题，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研究员，分别讲述良渚与石峁两个重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展现史前中国的塞北与江南。

二里头与陶寺，究竟哪一个可以称为最早的“中国”？许宏与何努，两人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又分别是上述两个重要遗址的发掘者，却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此外，许宏还从他的著作《先秦城邑考古》出发，讲述城邑最初的发展历史。

“族徽中的早期金文和商周社会”一期的内容，节选自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九期中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何景成的发言。何景成重点讨论了“族”和“徽”的概念以及早期金文中以“族徽”标示血缘家族集团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铭文所反映的作器者的亲称或职称与族徽之间的联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张海则以陶器、玉器和青铜器为例，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区域互动和时代变革情况。中原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的独特道路即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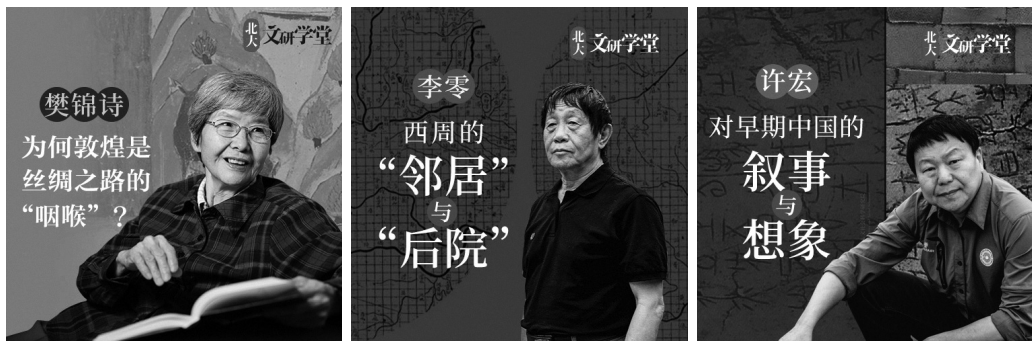
为从地理中心逐步走向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而这样的中心或许正是早期中国。

除了对于“早期中国”的探讨，“文明的起源”专题也勾连了西方古老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杨建华教授从两河流域的物质文化面貌入手，结合农业、制陶业、聚落形态和宗教建筑等诸多方面，讲述当时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演进路径。

“鸟笼”与“围城”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两则家喻户晓的譬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丽娟助理教授以这两则譬喻为切入点，考察其可能源头，将相似结构的婚姻譬喻在希腊、叙利亚、阿拉伯等文化传统中的流变状况一一道来。“围城考：是谁最早将婚姻置于围困之地”，以独特的视角，不断追根溯源，通过梳理一个观念传播和迁徙的脉络，将性格各异却又彼此关联的文化传统串联起来，为“北大文研学堂”第一季“文明的起源”专题画上句号。

“北大文研学堂”栏目自上线以来，吸引了众多听众订阅。文研院始终致力于切实凝聚，守正创新，将学术活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转化，搭建有效的线上学术交流平台，让更多关心和热爱学术的人听到学者们在文研院发出的声音。

（本文于2020年2月18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刘雨桐）



新栏目、新形式、新举措 ——文研院线上开展新学期学术活动

庚子春节如期而至，人们却与迅速蔓延的新冠肺炎不期而遇。直面疫情，文研院以新栏目、新形式、新举措，迎接特殊时期的困难与挑战。

为积极响应北京大学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与2020年春季学期教学工作部署，文研院在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小组，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工作部署。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副校长王博来访调研时，邓小南院长介绍了文研院防控工作情况和新学期工作安排。

非常时期，文研院调整既有的活动形式，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号与中英文网站等线上平台，围绕“文明：中华与世界”的主题，服务学术，服务学者。

2月15日，针对当下态势，文研院、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联合线上举办“科学·文明”系列讲座第六讲“新冠肺炎：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客座教授、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围绕新冠肺炎的自然史、传播机制和治疗策略，复盘两个月里的得与失，举一反三地思考疫情折射出的公共卫生事件、科学传播和公众科学素养等相关问题。本次讲座是新学期首场学术活动，当日播放量逾20万次，引发热议。

疫情改变了授课方式，却丝毫未减师生探求知识的渴望。文研课程是文研院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为北大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程。2020年春季学期，适逢

紫禁城建城600周年，文研院协同历史学系、艺术学院，与故宫研究院共同推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藏”、“明清宫廷建筑与宫殿陈设”。在疫情影响下，本次授课由线下转至线上。两位主讲人，王连起先生与张淑娴老师，受邀为课程录制音频。文研院工作人员将对素材进行后期制作，形成视频后加以推送，供读者领略深厚的书画鉴定魅力与明清宫廷建筑内檐装修情况。据统计，近200名师生报选旁听本次课程。

为持续输出优质的学术内容，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新增设“疫情下的省思”“文研线上学堂”“新书推介”“学人往事”等专题栏目。“疫情下的省思”以学者的笔谈、文章为承载，围绕与本次疫情以及历史上公共事件、公共危机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复杂成因及后果，进行分析和反思，也将尝试在古今中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从人类曾经的各种灾难与危机中寻找镜鉴。截至目前，车浩、陈映芳、陈平原、梁其姿等六位来自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良心与担当，直抒关切。栏目文章总阅读量逾10万次。其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所著《言路的通塞，对国家治理意味着什么》达4.5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所著《到后台看历史卸妆》达3.6万次。

“文研线上学堂”栏目聚焦不同学术议题，将文研讲座、论坛等活动进行梳理



“新书推介”栏目

与归并，未来也会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在栏目中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度交流。目前，该栏目正在陆续推出由文研院与三联中读合作展开的“北大文研学堂”第一季内容。樊锦诗先生、李零教授、许宏教授等十余位学者围绕“文明的起源”专题，从各自的领域和视角出发，回溯早期中国的历史，探究西方文明的起源，寻找东西方文明之间交流互通的路径。

“新书推介”栏目则对和文研院有关学者的学术出版情况进行追踪和介绍。截至目前，已有三位邀请学者在该版块下推布新书，分别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的《鸡冠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志远的《六朝佛教史研究论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的《九个汉字里的中国》。

文研院依托多学科背景，新增“学人往事”等版块，或以学理性议题凝聚多方学术力量，或以学人往事钩沉学术史脉络，通过音频、视频、图文搭配的方式加以推送。

同时，原定于本学期举办的文研展览，也将通过线上展出的方式呈现部分展陈内容。其中，将于近期推出的“袁

复礼旧藏西北科考团摄影展·新疆”分为漫漫征途、科学考察和西域风情此三部分，追怀前辈学人的开拓精神，探索丝绸之路研究的今昔与未来。展览在筹备阶段得到了多方支持，并将于文研院公众号陆续推出展陈内容。

此外，为减少聚集，文研院延缓第八期邀访项目的开始时间及秋季学期邀访项目申请的截止时间，以期为有意申请的学者预留充足的准备时间。

在这段注定不寻常的岁月里，文研院秉持“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致力于切实凝聚，守正创新，以多种方式开展学术活动，拓宽线上学术交流平台，让更多关心和热爱学术的人听到学者们在文研院发出的声音。学人的睿智与哲思，学术的道义与担当，将赋予我们面对挑战的理性与勇气。

(本文于2020年3月4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周诗雨)



文研院“特别推送”上线与北大名家“云”见面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特殊形势，文研院积极开拓线上学术交流新形式，自3月起，于微信公众号新开辟“特别推送”栏目，旨在邀请北大人文社科各领域的学者，以视频的形式呈现他们对当前世界与人心的思考。截止4月底，共推出六期讲座视频，渠敬东教授、周飞舟教授、周程教授、王缉思教授、段晴教授、张建君教授陆续担任主讲人。透过镜头，他们或省视疫情下的社会，或阐释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或分享最新的学术成果，为师生持续贡献凝聚思想的学术精品，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

3月5日，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在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首期讲座视频，经后期制作，“特别推送”正式上线。渠敬东教授以“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为题，在当前的疫情背景下反思既有社会的研究理路与范式，探讨解决危机的途径。他首先提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传染的社会，病毒等有形物质传染性的加剧与人们恐惧心理的集聚相互作用，对社会产生强大的破坏力。因此，我们必须讨论国家、社会乃至宗教和文化，对于危机时代有什么样的治理和重建作用。针对这个问题，他认为国家主权中的生命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国家必须充分考虑到民间的反映，国家治理也必须照料到现实、具体的生命及生命背后的故事、痛苦与危险。在他看来，信息、知识和心理的保障在治理过程中非常重要，既要形成不同领域人群的联动机制来塑造危

及治理中的良好秩序，也要思考受到威胁的生命需要哪些呵护，来构成危机下最重要的力量来源。最后，渠敬东教授从学术的角度反思，指出我们必须重建面向变迁甚至剧变的社会学，必须重新塑造面向危险、面向重大变化的学问。

第二期视频讲座来自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主题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周飞舟教授于3月20日录制讲座视频，分享近年来开展“脱贫攻坚”调研的研究成果，探讨“脱贫攻坚”中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问题。通过湖南永州野猪桥村的例子，他首先指出乡村产业发展最大的困难是劳动力问题，其实也就是人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管理的问题；二是“乡土性”或“乡土扎根”的问题；三是产业生态的问题；四是农民劳动力从哪里来的问题。接着，他以案例介绍的方式展开深入讲述，阐明乡村产业中劳动力或者人的瓶颈问题是靠社会关系来解决的。在他看来，“统分结合”的产业组织形式很适合中国国情，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统”解决了基本技术和市场的问题，“分”则通过村庄原有的传统、农民基本的社会伦理和社会关系解决了人的问题。最后，他谈到，时间上和空间上不断流动的劳动力为产业带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劳动力基础，从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其实也是人的城镇化，或者说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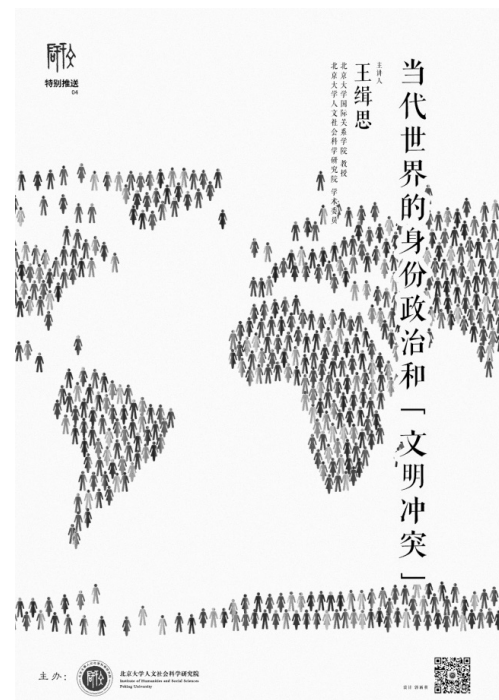
4月3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周程主讲的第三期视频讲座在北大电视台的视频支持下，通过北大快手、B站、央视频、百度、人民日报新媒体账号等官方视频平台直播开讲，当日累计观看量达35万人次。本次视频讲座主题为“病毒是什么？——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的过程考察”，周程教授基于科学思想史的视角，讲述与考察了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烟草花叶病毒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冠病毒疫情，探讨了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等问题。首先，他按照发现烟草花叶病毒的时间线，依次分析了其中的研究进路与研究背景，然后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提出，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决定科学家认识新鲜事物需要一个过程，而病毒的发现也离不开这批跨时代、跨国别、跨专业科学家持续性的、反思性的“集体学习”。在他看来，科学始于疑问，其发展又是累积性的，很多重大发现都是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和合作交流的机制，来使真理越辩越明。最后，周程教授强调每位科学家对建立健全的科学文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月27日，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为栏目录制第四期视频讲座，主题为“当代世界的身份政治和‘文明冲突’”。在本次视频讲座中，王缉思教授对身份政治给国际政治带来的冲击和挑战进行了重点阐释，并回答了如何看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问题。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身份政治都是过去三十年造成政治共同体撕裂的重要症候，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王缉思教授认为，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

身份政治在美国、欧洲、中东等地区不仅割裂了社会与国家，而且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念和左派右派的划分提出了挑战，当代西方已经陷入了身份政治造成的自由民主制度危机。对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其核心是担心美国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变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是论证身份政治的鼻祖。针对如何评价与看待“文明冲突论”的问题，他表示这一观点既有深刻的预见性，亦存在明显的片面和偏狭之处，总的来说，它开辟了研究世界政治的另一个视角。

第五期视频讲座“天灾人祸所生发的信仰与习俗——基于古代于阗文明的观察”于3月24日完成录制，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讲。作为于阗语文献研究的深耕者，段晴教授在本次视频讲座中将眼光特





周程教授在视频讲座现场

别投向天灾人祸降临之下的于阆人，考察其应对方式及背后的信仰和理念。首先，“龙女索夫”的传说反映了于阆王室应对天灾的措施，段晴教授据此指出，普遍接受佛教信仰的于阆人实际上保留了斯基泰人对自然与天神的崇拜，杀生祭祀就是一种因此生发的人文习俗。她接着谈到，人类社会的灾祸是促使于阆佛教信仰不断发展的动能之一，如观音菩萨显然就是专门为救苦救难而设计的。古代于阆人对待疾病有着积极的态度，因此他们往往诉诸佛教，陀罗尼经中延年益寿、对治疾病的咒语就寄托着他们对健康长寿以及对抗疾病的渴望，《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作品也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抚慰。最后，她表示，于阆人不仅有着对传统信仰的执著，又是富于创新的，而于阆文明也提示我们可以更有意识地关注疫情之中的人文精神层面，来促进有益于社会的习俗的形成。

4月22日，第六期视频讲座完成录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建君主讲，主题为“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地区差异的影

响因素”。通过镜头，张建君教授利用丰富的数据，分析了全国各地在应对疫情防控和面临复工复产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影响它们个体表现的因素。首先在疫情防控层面，他用病例数与治愈率衡量各地表现，并依次考察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诸多影响因素中，社会经济结构性的因素和主观能动性带来的差别具有重要的地位。然后，张建君教授将目光转向复工复产层面，采用出行强度作为代理指标，并分别阐释了治愈率、医疗水平、社会经济结构、领导干部特征等影响因素与复工复产的相关性。根据以上两项研究，张建君教授得出初步结论：综合来看，影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因素既有经济、社会、人口等结构性因素，又有各地的主观能动性带来的差别。其中，党政领导干部的相关经历和特征对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有显著影响，基层经验非常重要，责任担当亦必不可少。

两个月来，“特别推送”栏目致力于向热爱学术的人们传递静园二院的思想跳动和人文关怀，在积极适应疫情形势、搭建学术桥梁方面迈出了扎实一步。在六期视频讲座中，主讲人们以不同的角度与视野，省视现象、阐释问题、分享感悟，不仅呈现了多学科之间奇妙的共鸣与互动，也以崭新的形式再次实现了人的聚合。

（本文根据于2020年3月23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的新闻稿改写而成）

（撰稿：徐铖）

文研院举办“袁复礼旧藏西北科考团摄影”线上展览

具体内容参见在线展览·新闻报道

（本文于2020年3月31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文研院推出“海外来信”呈现全球学人的理性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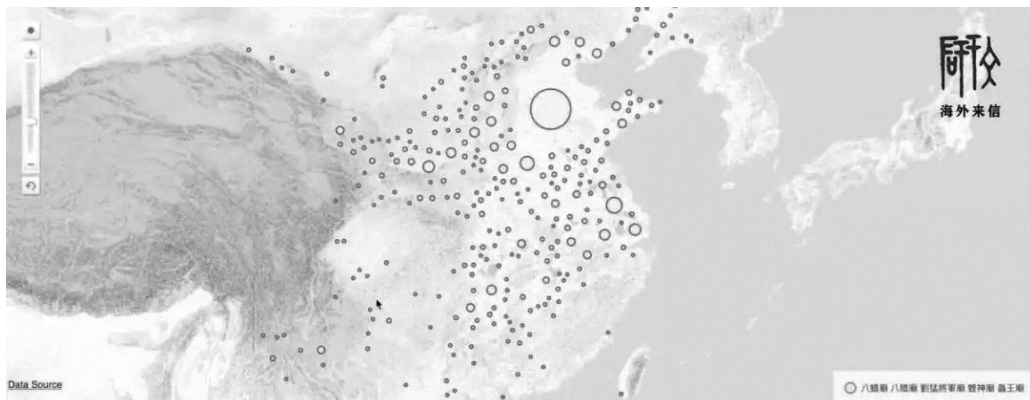
自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文研院通过新媒体平台，设立多个栏目，积极组织学术讨论，分享学术信息，展现人文知识界在疫情面前的团结和友谊。其中“海外来信”栏目，依托文研院遍布全球多地的学者网络，邀请他们以视频、文章等形式，呈现他们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历史上公共危机的观察与思考。

二月中旬，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多位学者率先响应文研院的邀请，录制了短视频讲座，并陆续在文研院网站与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出。此次合作得益于马普所科学史研究所现任所长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的积极支持。她曾于2019年秋季学期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并在文研院开设“物质文化史的方法和实践”工作坊，反应热烈。在马普所的一系列视频中，三位学者从数字人文、科学史、医学史等多学科角度，探讨和分析灾难、疫病的成因和影响，体现了交叉学科的突出优势，也让我们看到国际学术共同体在此危机时刻的团结和友谊。

其中，马普所科学史研究所的陈诗沛研究员是数字人文领域的专家，长期以来带领团队将数字方法与中国地方志的研究结合，在数字时代展开新的探索。她在视频中分享了如何利用新近开发的数位工具LoGaRT研究中国历史中有关蝗灾的记载。借助不同的数字化工具，全面准确地检索中国古代地方志不再是学术上的难题，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何在已被充分使用的资料中开辟出新的研究路径的困惑。

马普所科学史研究所的博士后孙萌萌在视频讲座中，分析了恶劣天气以及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在20世纪，天气预测系统和相应的控制方法尚未成熟，当时由恶劣气候给人们所带来的损失并不比流行传染病小。恶劣天气和病毒一样，都是人类无法彻底消除的潜在威胁。人类对于气候研究的重点在于观测和管理，更在于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存。

玛蒂娜·舒伦德（Martina Schlünder）教授的视频讲座，带领读者回到了一战时期，展示了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爆发及其疫苗开



使用 LoGaRT 绘制的蝗神庙地图

发研制过程。在研究中，她翻转了传统的病菌史和流行病传染史研究中的人类中心观点，转而观察“虱子”在一战后人类寻找伤寒疫苗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视频在详细介绍疾病爆发和疫苗研制的同时，也强调了生物学中的动物试验品对于生命科学和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作者也从后人类的视角引领我们思考：科技如何协调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

三月以来，中国国内的新冠病毒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场全球流行病的风暴中心开始移向国外，在全球多地蔓延。文研院积极联络了多位身处海外的北大教师和相关学者，通过他们的观察与描述，带来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看待疫情的多元视角。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目前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的杨治宜教授，本学期正在柏林高等研究院担任访问学人。随着欧洲防疫形势日益严峻，柏林高研院已取消了学术活动。在为“海外来信”栏目特别撰写的《“绿林”疫影：危机时代的非常与日常》一文中，她由柏林高研院的

日常场景开始，穿行于非常时期的柏林与法兰克福，勾勒出疫情阴影下的德国社会。

同在欧洲进行访问交流活动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自法国发来了《从“会饮”到“独酌”——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访学记》。2020年1月，章永乐来到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études avancées de Nantes）担任访问学人。南特高等研究院吸引了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为推进知识上的南北对话提供了平台。尽管疫病肆虐，高研院停止了面对面的集体聚会，但没有停止思考，而仍然以在线研讨形式开展讨论。这篇发自欧洲新冠病毒“震中”地区的文章，为读者带来思想现场的震撼。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季剑青，目前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访问学人。他在为“海外来信”栏目撰写的文章《重建小的共同体》中，谈到随着美国确诊人数的迅速扩大，“危机状态”从理论概念变成现实境遇。季剑青从自己在哈佛大学的访问生活出发，探讨这场猝不及防的疫病带来

的智识、情感和伦理上的挑战。

与中国“风月同天”的日本也在四月中迎来了疫情高峰。文研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教授于去年年底受邀访日，在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担任特任教授，因疫情滞留。他自东京为“海外来信”栏目撰写《疫情下的东京大学国际高等研究所》一文，对研究所的学术生活加以介绍。樱花飘落之际，思考仍在继续。

本次全球性疫情中，发展中国家尤为脆弱，文研院也将目光投向欧美以外的第三世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助理教授程莹老师因疫情滞留在南非，通过她为“海外来信”栏目撰写的《隔离的历史与当下——南非疫情手记》，读者得以关注到在数字时代几乎“消失”的南非贫困群体和种族隔离带来的特殊历史遗产。在大多数人为手机和电脑上实时更新的疫情信息而感到焦虑恐慌时，南非的弱势群体甚至缺乏稳定的基本生活条件。在疫情加重他们日常生活负担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南非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阶级问题。

“海外来信”呈现的国际观点不仅仅来自海外学人的经历，也包括了与北大师生站

在一起的外籍教师。现任北大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客座教授、巴西著名文学研究学者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Francisco Foot Hardman）教授向读者们展示了一位外国学者的坚守。自2019年8月起，哈德曼在燕园开展教学工作。随着新冠病毒防控形势的升级，他体验了中国强有力管控措施行之有效，也为万里之外巴西国内疫情的蔓延而担忧。受巴西媒体的邀请，哈德曼以日记形式记录下北京的生活点滴与感悟，表现出一位巴西知识分子对人类团结抗疫的呼吁。文研院在北大西葡语系师生的帮助下，摘译了其中多篇日记。在文中，哈德曼对中国的防疫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

“环球同此凉热”，限制入境、航班停飞、城市社区的隔离，关闭了我们熟悉的互联互通的渠道。我们从未曾像今天这样，在物理空间上隔绝，又在心理上接近和共鸣他人的生存处境。文研院“海外来信”栏目，将继续以多样的形式和丰富的主题，提供人文学者审视疫情下的社会与人情的多重视角。

（本文于2020年4月22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撰稿：赵相宜）

文研院举办“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线上展览

具体内容参见在线展览·新闻报道

（本文于2020年4月28日载于北京大学主页“北大要闻”）



文研纪事



文研纪事

29

2020-01

文研院成立疫情防控小组。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组长，副院长杨弘博担任防控小组负责人。防控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学校疫情防控专项工作视频会议。根据会议精神，邓小南院长结合文研院实际情况做出部署，包括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学术工作规划、内部管理等相关工作，并按时向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提交《每日防疫简讯》。

31

2020-01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到访文研院，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介绍防控工作部署及近期工作规划。

03

2020-02

面对疫情带来的困难与挑战，院务会紧急召开第二次视频会议，讨论既有活动形式转变、线上工作开展模式、新栏目开拓、邀请学者延期等内容。

04

2020-02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副校长王博、黄如到访文研院，调研防控工作安排。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副院长杨弘博汇报近期工作计划。

文研院向各期邀请学者、未名学者发起主题为“公共危机下的社会与人”的征稿，希望在疫情期，以文研院为学术平台，发挥多学科交流优势，凸显危机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价值。

06

2020-02

2020年春季学期，文研院联合历史学系、艺术学院开设两门故宫学文研课程。受疫情影响，2月4日，文研院与历史学系、艺术学院相关老师沟通教学计划，适时调整授课方案。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访法国，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院长余曦（Jean-François Huchet）、东亚文明研究所所长迈克尔·卢肯（Michael Lucken）、东亚文明研究所亚洲研究系主任汲喆会面，讨论双方合作与学者互派事宜。

文研院向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机构的学者征集有关疾病史研究的推荐书目或文章。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副院长萨比娜·洛里加（Sabina Loriga）、研究院教授弗雷德里克·布拉哈米（Frédéric Brahami）、研究院教授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教授会面，共同讨论 EHESS—北京大学—文研院合作框架协议及具体合作事宜。

08

2020-02

院务会召开视频会议，商议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在线会议，安排到岗轮值及开学相关工作。

文研院与故宫研究院商议准备疫情防控期间“文研课程”教学方案。

10

2020-02

学校组织召开春季学期教学工作专项视频会议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副院长杨弘博参加。

院务会召开视频会议，进一步商议组织线上学术活动的方案及文研院电子期刊编辑等工作。

14

2020-02

由文研院、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共同主办的讲座“新冠肺炎：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在腾讯视频平台上线播出。本次讲座为“科学·文明”系列讲座暨“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六期，由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客座教授王立铭主讲，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评议。本次讲座引发热议，当日播放量逾20万次。

16

2020-02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开启新学期推送，以线上形式延续既有学术活动，并增设“疫情下的省思”、“海外来信”、“文研线上学堂”、“新书推介”、“学人往事”等专题栏目。

17

2020-02

自2019年11月起，文研院与三联中读合作开展“北大文研学堂”栏目，围绕“文明：中华与世界”这一主题，以音频为主要形式，线上推出文研院往期学术活动内容。2月17日，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推送课程报道“文研院联合三联中读推出‘文研学堂’音频讲座”。

文研院召开全体工作人员视频会议。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对新学期各项工作做出部署并提出要求，对于疫情期间工作任务的特殊性给予说明，并强调在这一时期文研院需要通过特殊的工作方式继续秉持“涵育学术 激活思想”的宗旨，利用线上平台积极开展工作。

新学期开学，受疫情影响，文研院安排工作人员到岗轮值，其他人员居家办公。确定工作模式为每日早九点召开全体视频工作会，每人报告当日工作安排，下午四点微信工作群汇总工作进展。

18

2020-02

受疫情影响，原定于本学期驻访的2020年春季学期邀请学者不能如期到访，文研院与本期20位邀请学者逐一沟通访学推迟事宜。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增设“疫情下的省思”栏目，以学者的笔谈、文章为承载，围绕与本次疫情以及历史上公共事件、公共危机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复杂成因及后果，进行分析和反思，同时尝试汲取古今中外的相关历史经验，从人类曾经的各种灾难与危机中寻找镜鉴。截至4月19日，该栏目陆续推送19篇由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并推出7篇“来自社会学家的观察”主题连载文章。主题文章为文研院学术委员、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在微博上对美国疫情发展所做的逐日记录，经授权发布了3月4日至4月7日间撰写的全部疫情日记。

21

2020-02

2020年春季学期文研课程于本周正式启动。文研院协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艺术学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共同推出两门课程，分别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鉴藏”，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副院长赵国英、副研究员段莹主讲；“明

24

2020-02

清宫廷建筑与宫殿陈设”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子林、张淑娴、李燮平主讲。受疫情影响，两门课程均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同时，主讲人利用北大教学网讨论版与选课学生进行研讨和答疑。为配合课程开展，文研院在此后两个月内，陆续推出若干篇内容，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介绍课程内容。王连起、张淑娴等老师应邀为本次课程专门录制音频，为呈现故宫文物、建筑的魅力做了精彩讲解。

文研院召开全体工作人员视频工作会议，总结开学一周以来各项工作进展，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文研线上学堂”栏目第一期，推送文研院首位邀请学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主讲的“为何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

26

2020-02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召开视频会，部署疫情期间文科科研工作并研究北京大学“十四五”文科发展战略。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参加。

28

2020-02

文研院通过中英文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2020年秋季学期（9月-12月）邀请学者项目延长申请周期的通知。受疫情影响，为使有意申请的邀请项目的学者能从容规划，网上申请的截止日期由2月29日延期至4月15日。

02

2020-03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增设“新书推介”栏目，追踪和介绍相关学者的学术出版在特殊时期通过书籍推介的形式呈现人文学者清明透彻的思考。截至4月19日，该栏目陆续推布由各期邀请学者所著的9本新书及章节摘录。第六期邀请学者、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群与第四期邀请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志斌专门录制音频，介绍书籍内容与写作心得。

07-29

2020-03

受疫情影响，文研院主办的“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摄影集萃·新疆”专题展览将线下展览改为线上展示。本次展览由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教授朱玉麒担任学术顾问，将分为漫漫征途、科学考察、西域风情（上、下）四部分在文研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陆续推出。袁复礼先生年逾八旬的女儿袁刚特别为本次展

览录制视频。3月7日，同时推出刘卫东、刘子凡撰写的《袁复礼新疆出土文书未刊稿研究》。

09

2020-03

文研院开辟线上专栏“学人往事”，以系列纪念性文章向学术道路的先行者表达敬意。截至4月21日，该栏目分别推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撰写的首篇文章“燕东园小楼的近代学人”及两篇纪念陈梦家先生诞辰109年的文章。

12

2020-03

文研院召开博物学线上展览视频筹备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及相关负责人参加。

16

2020-03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设立“丝路现场”栏目，推出北京大学及相关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所做考察的纪要、随感、实录。截至4月20日，该栏目陆续推送6篇对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等地进行考察的文章，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外国语学院的资深学者主笔。

文研院召开“丝绸之路上的乐器”线上展览视频筹备会，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萧梅、青年教师邢媛，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及相关负责人参加。

18-19

2020-03

受疫情影响，线下学术活动无法开展，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设立“特别推送”栏目，以视频、文字稿形式呈现学者对当前世界与人心的思考。“特别推送”第一期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讲，报告题目为“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视频总观看量达1.8万次。

19

2020-03

文研院依托国际学者网络，开设“海外来信”栏目，邀请身处海外的学界友人以视频、文章等形式，呈现其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历史上公共危机的思考。截至4月15日，该栏目陆续完成10次推送，包括：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学者为文研院录制的短视频，身在海外的北大教师和相关学者专门撰写的文章，以及巴西籍北大客座教授的日记摘录。

20

2020-03

文研院举行工作委员会视频会议，介绍疫情形势下的工作举措，共同商讨未来阶段的学术规划与活动安排，并就2020年秋季学期邀访项目申请人进行合议。

25

2020-03

文研院筹划并推出《文研院电子期刊》，希望通过对往期邀访学者的学术追踪，呈现邀访学者群体的学术动向。第一期（2020年3月刊）于3月25日正式推出，并通过邮件、微信等形式发送给海内外相关学人。

27

2020-03

受学校委托，文研院参与北京大学“十四五”规划文科发展战略的起草，并已提交草案。院务会成员参加由校领导和社科部召集的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商讨。

28

2020-03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二期由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主讲，报告题目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文研院网站同步推出视频内容实录文字稿。

31

2020-03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文研四时”栏目推送北大校园春景。

01

2020-04

文研院召开“跨学科视角的佛教学”云端论坛视频筹备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范晶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王俊淇博士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讨论论坛开展方案。

02

2020-04

北京大学官微推送“从北大拾起，这不该被忘却的名字”一文，介绍了近期由文研院主办的“袁复礼旧藏西北科考团摄影·新疆”线上展览的相关资讯及观展方式。

03

2020-04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三期“病毒是什么？——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的过程考察”在北大电视台的技术支持下通过北大快手、B站、央视频、百度、人民日报新媒体账号等官方视频平台推出。本讲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周程主讲。当日累计观看量达35万人次。视频内容回看及主讲人同名文章于4月5日推出。

07-16

2020-04

文研院主办的博物学线上展览“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在线开展。本次展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担任学术主持，将分为夏威夷考察记、勐海植物记、东北与华北植物、格物致知与博物人生四部分在文研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陆续推出。

10

2020-04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四期由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主讲，报告题目为“当代世界的身份政治和‘文明冲突’”。

文研院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在静园二院录制口述史视频，讲述中文系乐黛云、谢冕、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五位先生的学术与人生。4月17日、24日，两位教授再次进行录制。

13

2020-04

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咎涛、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洪喆举行工作会议，商议线上内部论坛组织策划事宜。

17

2020-04

北京大学举办文科发展规划意见交流会，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参加并发言。

18

2020-04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五期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讲，报告题目为“天灾人祸所生发的信仰与习俗——基于古代于阗文明的观察”。

文研院主办的“云端论坛”第一期“多元视角下的佛教学”通过Zoom平台完成录制。论坛发言人包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范晶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王俊淇博士。

21

2020-04

文研院召开全体工作人员视频会议，总结开学两个月来各项工作进展和相关经验，院务会部署后半学期重点工作。

文研院举行“伊朗四十柱宫壁画”线上展览视频筹备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刘英军、院长助理韩笑及相关负责人参加，热烈讨论前期筹备工作和具体呈现形式。

22

2020-04

作为“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系列活动在线上的延伸，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增设“传承”栏目。该栏目分别于4月22日、4月28日推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的文章《“千里马”、“呆头鹅”与“山居猪”》以及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纪念文章《我认识的李学勤先生》。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走进博物学”栏目推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的文章《博物学是什么》，作为文研院博物学线上展览“看花是种世界观——博物学考察记”的延伸阅读。

23

2020-04

适逢世界读书日，文研院微信公众号今日起开辟专题栏目“读书的风景”，介绍文研院建院来支持过的许多自发小型读书会。栏目第一期介绍梵文写本读书会，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梵文专业师生和来自京津地区高校、研究所的一批学者发起参加。

24

2020-04

疫情期间，文研院开设“线上雅集”栏目，将原有常规系列活动“静园雅集”延伸至线上。栏目第一期推送“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的系列文章《塔缪的理想——“云养”一只埃及猫》。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推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的文章《可以像卢梭一样喜欢植物》。线上展览结束后，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将继续在“走近博物学”栏目下发布与展览及博物学相关的文章。

26

2020-04

文研院梳理近年来学界在“国家与文明”议题上的重要进展，于微信公众号推送系列文章。今日，文研院推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六十年圆一梦》。

27

2020-04

近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荣获2020年德国“莱布尼茨奖”。4月27日，文研院微信公众号推送薛凤教授在访问期间主讲的“灾害与数字人文”讲座纪要。

28

2020-04

北京大学官微发布抗疫原创诗朗诵短片《汉江春》，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作为北大教师唯一代表倾情出演。

文研院召开电影学“云端论坛”线上筹备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孙柏、副教授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魏然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热烈讨论电影主题“云端论坛”的开展方法与构想。

29

2020-04

文研院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作为社科部党支部小组成员参与了学校组织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校园大扫除”活动。

30

2020-04

文研院举行工作委员会视频会议，就2020年秋季学期邀访项目申请人进行合议，并讨论规划下一阶段工作。

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栏目第六期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建君教授主讲，报告题目为“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